

---

# 近现代社会历史

(1840 ~ 1949 年)

## 一、鸦片战争后的四川

鸦片战争前夕,四川承平日久,社会矛盾日渐尖锐:一方面社会经济得到发展,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井盐、制糖、制茶、丝织、矿冶等业和部分农业生产出现了商品化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激增,人均耕地减少,佃农和失去土地的流民数量急剧增加,社会危机深重,白莲教、囍等秘密社会的反清斗争此起彼伏。

鸦片战争时期,在川驻军奉调分批出川参加抗英战争。战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鸦片和洋货大量输入四川,原料输出,白银外流,加快封建经济结构的解体。封建地主转嫁负担,农民遭受到更加惨重的剥削,阶级矛盾更加尖锐。

### (一)鸦片战争中四川军队出川抗战

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6月),英国为打开中国通商门户,保护其鸦片贸易,发动了侵华战争。英国侵略军先后侵犯中国广东、福建,7月攻陷浙江定海。8月,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口。清廷惊惶失措,一方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办理中英交涉;一方面谕会四川等内陆各省调兵遣将,

驰赴东南沿海前线增援抗英战争。四川军队开始参加抗英作战的军事行动。

1 川军浴血广东 道光二十年腊月初三(1840年12月26日),清廷谕全四川备兵2000名,听候调遣。几天以后,清廷急令2000名川军开赴了广东。赴粤川军由四川总兵张青云带领,奉命听候钦差大臣琦善差遣。川军队尚在途中,广东战局发生变化,琦善私自与英国侵华军妥协,签订了《穿鼻条约》,同意开放广州,割让香港,赔偿英方烟价银600万两。道光帝恼羞成怒,将琦善拿京查办,同时,颁诏对英国宣战。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1841年1月27日),任命御前大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又从各省抽调官兵,协同作战。

1月30日~31日,清廷谕全四川增派官兵2000名,开赴广东前线,听候奕山调遣。3月,令前四川绿营提督张必禄随军出征,又调四川绿营提督齐慎亲率川军数百名驰赴广东,任参赞大臣,会同剿办。4000余名四川军队两月后陆续抵达广东。时值英军

进犯广州,城外炮台全部被攻占,广州城被围。川军即投入广州守卫战。5月30日,川军在张必禄指挥下,配合广东义勇,参加了石门之战,歼敌10余名,击毙英军军官2人。另一支四川军队在四川总兵张青云率领下,参加了守卫位于珠江口的西宁炮台的战斗。张青云设伏于西宁炮台,英军以为守御空虚,数百人登岸。伏兵四面出击,英军急忙撤退,不及登舟,我兵踊出,迎刃皆毙,无一存者。随后,与湘军配合攻打夷馆。英军首领义律被喊杀声惊醒,仓惶逃出,乘小舢板渡江回到英舰。川军、湘军得知义律居所,蜂踊而入,登楼搜捕未获。

广东战役之始,虽然打击了英国侵略军,但奕山昏庸腐败,他担心英国侵略军扩大战火,又畏惧各省兵勇和广东民众相配合,战斗日益扩大,难以控制。因此,主动向英军求和,订立了《广州和约》,向包围广州城的英军赔款白银600万两。英军暂时从广州撤往虎门。奕山认为广东战事已结束,征得清廷同意,各省军队分期分批撤回各省。于是,四川军队按奕山规定的班师日期,陆续回川。

2 参加浙江方面的作战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1841年4月),英国政府收到义律关于穿鼻条约的报告后,大为不满,认为割让香港未得到清廷的正式承认,赔款数量太少,内阁会议否决了《广州和约》。撤销义律职务,改派

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指示他必须让清廷无条件接受英国全部要求,才能停止战争。

8月,璞鼎查率领军舰26艘,侵略军3500余名从香港沿海北上,攻占厦门鼓浪屿。10月,攻占定海、镇海、宁波。

镇海之战,川籍将领谢朝恩英勇抵抗,身先士卒,壮烈殉国。谢朝恩为四川华阳县人,当时任江苏狼山镇总兵,奉命扼守金鸡岭炮台。10月10日,侵略军1400余人兵分两路,包抄金鸡岭炮台。谢朝恩占据制高点炮击英舰,英舰被迫后退。陆路英军大炮猛轰炮台,火箭长八、九尺,炮台上士兵头焦额烂,多被击中,又无后援,朝恩不愿被俘受英军凌辱,腾身入海牺牲,与葛云飞等同称“四镇”。

担负镇海招宝山防务的浙江提督,四川广安人余步云则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败类。当谢朝恩在金鸡岭受到英军围攻时,他拥兵龟缩,“托疾不赴”,后又遇敌先逃,弃招宝山逃往宁波,致使金鸡岭落入敌手,镇海沦陷。浙江连失要塞,清廷大为震惊。10月,道光帝任命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文蔚、特伊顺为参赞大臣,谕令各省火速派兵赴浙江东前线收复失地。10月26日,清廷谕令川督宝兴选派四川建昌、松潘两属精兵和省内屯兵共2000人,前赴浙江军营听候调遣,同时又选调一批四川军官赴浙江作战,

有游击张富川、李喜猷,都司许超、梁有才,守备伍玉琳、张定川、颜朝斌,千总郑心广、王国英、李超、刘炳、熊翥飞,把总彭友泉、朱擘南、刘天培等。川军经过3个月长途行军,于1842年初先后到达浙江前线。但是,负责浙东战事的奕经与奕山一样,是昏庸、腐朽之辈。出京以后,一路沉缅酒色,流连月余不返;且迷信至深。1842年1月,他梦见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于是从嘉兴移驻绍兴,准备进兵。到绍兴后,又沉醉于绍酒,一心盼望梦中胜利到来。3月10日,他心血来潮,轻率决定兵分三路,同日夜袭宁波、镇海、定海三城,企图出奇制胜。

奕经将主力部队放在宁波一线,兵力为3600人,由朱桂率领分两路进攻宁波西门和北门。四川军队主攻西门,金川土副阿木穰率少数民族屯兵400人为前锋,游击梁有才、守备王国英率绿营兵500人、续备兵300名为主力,游击张富川等带绿营兵600余名、续备兵200名担负接应。

宁波攻城战役一开始,阿木穰率部下400人充当敢死队,争先爬城,冲进宁波西门。英军早有准备,埋藏地雷和伏兵,阿木穰和士兵百余壮烈殉国。守备王国英随后冲进月城,奋力接应,但受到英军伏击,寡不敌众,英军从楼上抛掷火球、火箭,王国英左腿被火箭击中,为英军俘获。英军将王国英囚禁在府署,令医调治,多方诱之

投降,王国英骂不绝口,遂遇害。当时,提督段永福率兵4000驻扎城外,提督余步云率兵2000驻扎奉化,准备合围城内英军。得知城内英军有备,立即逃往绍兴。文蔚率队反攻镇海的作战计划,也是兵分两路,一路直接攻打镇海城,一路攻招宝山威远城。四川金川土守备哈克里率领300屯兵为先锋,攻夺招宝山,攀援而上,抢入威远城。敌舰从金鸡山前面的剪江而至,用炮向上轰击,哈克里及部下不支而退,后亦战死。

担负浙东反击战总指挥的参赞大臣文蔚,统辖八旗、绿营兵1600余兵,包括川军400余名,进驻慈溪山,其任务是接应宁波、镇海的攻城部队。他的前队在长溪岭遭到英军阻击,他又抽调四川鸟枪兵200名迅速前往接应,他自己却带着主力部队逃之夭夭。结果是,不仅未收复宁波、镇海,还让慈溪陷落敌手。

因此,在浙东反击战中,尽管川军英勇作战,给英军以沉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奕经、文蔚等指挥失误,又贪生怕死,除郑鼎臣一路从水路袭击定海的战斗稍为得手外,其余均告失败。

值得一提的是担任台湾知府的四川永川县人黄开基。鸦片战争开始时,他已洞察到英国侵略者虎视眈眈,妄图吞并台湾的野心。于是积极组织台湾人民加强防务,增筑炮墩,募集义勇千余名,并与淡水同知曹瑾形成呼

应之势。1841年9月,英舰攻基隆,基隆各炮台猛烈还击,英舰“纳尔不达”号被击伤,触礁沉没,台湾军民共俘虏敌军130余人,夺获大炮10尊。1842年3月,英国侵略者在侵略闽浙沿海的同时,又分兵侵犯台湾,英舰双桅船“阿纳号”侵入大宝港洋面,黄开基计诱敌舰搁浅,然后出兵四面环攻,擒斩敌兵、夺获旗帜无算,英军自此以后不敢轻视台湾军民的防卫能力。

3 参加江苏方面的作战 清军浙江战事失利,道光帝决心投降,派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前往浙江求和,但英国侵略者接连得手之后,不肯轻易媾和,决心将战事向北推进,进军南京,以迫使清廷无条件接受其停战条约。

1842年6月,英军舰队攻陷长江要塞吴淞口,江苏提督陈化成战死。由于清廷疏忽长江沿岸防务,英军得以从长江口顺利西上,于是7月21日直达镇江。镇江为长江下游重要商埠,地势险要,城池坚固,有利于防守。吴淞口失守后,清廷急令各省参战部队驰援江苏;在浙江作战的四川军队1300余名又奉命转战江苏。参赞大臣、四川提督齐慎率所部700余名于7月13日到达镇江后,火速奏报清廷,准备与江南提督刘允孝所部1000名合力保卫镇江,协同防剿。但是驻守镇江的八旗兵副都统海龄骄傲自大,歧视汉军,拒绝齐、刘二军入城。要他们在城外不利环境中布防,齐慎一面

与刘允孝分据东北山梁,布置防务,一面知会海龄督率旗兵严守城垣,准备作战。不久,英军舰溯江而上,齐慎下令开炮轰击。不料当天风大潮涨,江面宽阔,英舰活动自如,岸上炮力不能及远,英舰大炮火力凶猛,所有护炮土墩多半被英军击毁,守台士兵难以蔽身。海龄则将旗营官兵全部调进城内,使城外齐慎、刘允孝部得不到支援,处于不利地位。

7月21日拂晓,英军对齐慎、刘允孝守军发动攻击,英军万余人由西北方向分路登岸,守军仅2000余人,众寡悬殊。英军见守军分作数队,也化为10余队进行分割包围,英军一头目将守军把总周兆熊击毙,又以排炮轰击。齐慎乘马督兵厮杀,自卯至未,毙伤英军多人。但英军人多势众,又分数队攻城,西南两城门被击中起火。因天晚寡不敌众,齐慎与刘允孝退守距镇江府46里的新丰镇。新丰镇驻兵讹传英军到达,中夜惊溃。城外守军退走后,英军集中兵力攻城,镇江沦陷。8月,英军攻占南京,清廷被迫接受城下之盟,由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侵略者签署了《南京条约》,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

## (二)洋教传播与四川教案

1 洋教传播引起的社会震荡 天主教入川,远肇唐代。公元8世纪,成都西门石笋街新建有大秦寺(景教)1座。明末,耶稣会教士利类思也曾将

天主教传入四川。康熙二年(1663年),成都1处经堂,有教友300名。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川有圣堂两座,司铎住所3处。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法国传教士穆天尺、毕天祥、白日升、梁弘仁等到四川,在重庆、成都、金堂、安岳、邛州、嘉定、叙府等地收徒传教,仅在安岳就发展教徒1200余名。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帝派费隐、潘如两位外籍教士以四川绘制地图,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们趁此机会,吸收了一批教徒。当时,传教活动只限于走家串户,洗礼、祈祷等仪式多在教徒家中进行。

雍正至道光初,清廷一改康熙对天主教的宽容态度,三令五申查禁天主教,一再修订刑律,对入境传教者,轻者驱逐,重者量刑。雍正十一年(1733年),巴黎对方传教会派李安德到金堂舒家湾教堂任司铎。乾隆十一年(1746年),由于清廷严禁天主教,四川的教徒或发配充军,或在官府前写悔教稟帖,或在家中粘贴五字牌,背叛圣教。还采取了一些特别的办法,禁止洋教传入四川。外船初至,外客必读告示,踏铜板,告示叙说天主邪教煽惑人心,铜板铸天主像,践踏以明无习教之人。但是,各国传教士来华都不言身份,作客商,读告示,踏铜板,混入四川,寄迹民间,租赁民房,暗中进行传教活动,在川东川南发展了一些教徒。如巴黎外方传教会于乾隆

四十六至道光元年(1781~1821年)在四川不仅发展了很多教徒,还培养了46名中国人晋升为司铎。有的教士教民被官府发现,就要受到惩罚,在《圣教入川记》一书中记载的驱逐、充军、籍没财产等事例很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强迫清廷订立《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外国教会获得在中国各省自由传教的特权,传教士进入内地,地方官必须“厚待保护”。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使已在四川活动多年的法国巴黎外方传道会得以扩大其传教范围,以重庆为西南据点,设主教,籍云南、贵州、四川三省教务,咸丰十一年(1861年)又由法国政府与罗马教廷商定,派遣一名主教,率领法籍教士,深入川滇两省,并到川边地区立堂传教,并准备在西藏设立教区,向拉萨派遣主教,因藏民以对,未获成功。同治初,天主教在四川也得到迅速发展,罗马教廷将四川划分为三个教区,分别由三位主教管辖,共有外籍教士37名,华籍教士57名。重庆教区所辖川东各县纷纷设立教堂,光绪九年(1883年),已有24州县设立了天主教堂。成都、宜宾两教区也遍设教堂。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全川共有天主教堂161座,布道室1239处。此外,教会还开办许多修道院、医馆、学校、育婴堂等,为传教活动服务。

基督教(路德新教)来华传教的时

间晚于天主教。光绪二年(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英、美传教士开始进入四川,立堂传教。光绪三年(1877年),英国“中华内地会”传教士麦卡梯在重庆建立了第一座福音堂。光绪五至七年(1879~188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梦到成都传教。从此以后,“美以美会”、“圣公会”、“伦敦会”、“公谊会”、“浸礼会”、“英美会”等传教差会相继入川,建立了许多福音堂、医馆、书院、育婴堂。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基督教各差会在四川有外籍教士142名,华籍神职人员32名,建有总堂29座,分堂25座,拥有教徒859名。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底,有外籍教士189名,教徒及皈依者7889名,四川重要城镇均有福音堂。20世纪初,天主、基督教堂遍布全川,教徒达到50万名。

洋教入川后,对四川社会的冲击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大量发展教徒,构成民教冲突。由于教会以入教人数多少来确定教士的功过,因此,传教士要想成牧师、主教,必须尽量多发展教徒,作为晋升阶梯。为了拉人入教,传教士往往不择手段,增加入教人数,或用金钱物质手段,诱人入教;如果遭到拒绝,就挟嫌、诬陷,从而造成不少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酿成教案。如黔江教案、巴塘教案就是逼迫乡民改奉洋教

的结果。为增加教徒数量,不少传教士还大量发展地方恶棍、地痞、流氓入教。如川南教区传教士余若望在井研县收买人入教,有的给钱三、四百文,一些盗贼、流氓、无赖之徒也争相入教,寻求庇护。

二是纵容不法教民欺压平民,引起各种事端。如川西华阳县,劣迹斑斑的教民得到教会庇护,有恃无恐,横行乡里,故有“吃教”之名。南充有的教徒还干涉地方词讼。地方官以息事宁人,对待民教争端,灌县教民因此受到官府保护。由于这些教民作恶多端,积怨日深,其罪行到了平民忍无可忍的地步,自然成为教案的导火线。

三是教会强买土地,夺人房屋引起平民愤慨。如同治二年(1863年)第一次重庆教案,光绪十二年(1886年)第二次重庆教案,同治十二年(1873年)黔江教案,均因教会强买、强占土地、民房,修建教堂,引起公愤,导致打教风潮。

四是教民冲突发生后,清廷和地方官吏畏惧洋人,一味偏袒教士、教民,残害平民,制造冤狱,从而激起民变。如同治四年(1865年)、同治七年(1868年)两次酉阳教案,清廷都偏袒教士,制造冤狱。钦差大臣李鸿章就将百名反教者处死、流放,又赔偿教会白银18000两;而对教会方面,有命案在身的覃司铎,则以奉教皇令出洋议事,无法追究而不了了之。教徒中杀

人无数的王学鼎、张添兴等6人,全部逍遥法外,不予法办。这种崇洋媚外的办案方式,激起了四川人民更加强烈的仇教情绪,19世纪70年代川东北地区发生的8个教案,就是对清廷镇压反洋教斗争的有力反击。

五是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活动的加剧,不断刺激四川人民的仇教情绪,使教案愈演愈烈,形成群众性的武装反抗风潮。19世纪70年代前后,西方列强和后起的日本加紧对四川、云南、西藏的侵略活动。光绪二年(1876年)《烟台条约》及其续增专款,使西方列强取得了对四川、云南、西藏的侵略特权。川江航权的丧失、重庆海关的设立,从越南入滇入川,从四川进入西藏的传教活动日益猖獗,以及不断扩大洋货的输入,土货的输出,都使四川人民增加了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恐惧和仇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的订立,重庆全面开放,领事馆和租界的确立,洋行的开办,通商开矿协议的纷纷出笼,使四川人民切身感受到,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激起了反教御侮的民族义愤。

另外,洋教的冲击,在官僚、士绅当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本能地感到教会的存在和传教士的活动,对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是一种严重的威胁。他们看到,传教士不仅是传播洋教,更严重的是,他们搜敛广大民众的财物和引发民教冲突,造成社

会的动乱。因此,官绅们视外国教会势力为仇讎,倡导和加入反洋教斗争的行列。

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内地士大夫明显地感受到,洋教把西方的文化、宗教等等带入中国,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伦理观念的统治地位构成巨大的威胁,危及其传统信仰和价值观,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不能不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抵制。

更为严重的是,教会势力还直接侵犯、损害官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在19世纪60年代,传教士借《北京条约》中关于“发还旧址”的条款,纷纷在各地霸占田地房屋,强说绅士们的房屋就是以前的教堂,逼迫绅士们退让。或索取绅士们所尊崇的公所、会馆、庙宇抵给教堂。如同治二年(1863年)川东主教强索重庆长安寺。另外,各地传教士还因大量增置不动产,经常与官绅发生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的冲突,这对以土地为主要资产和生活来源的士绅来说,不仅使他们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使他们在民众中的威信受到严重影响,封建统治赋予他们的特权也相应削弱。

与此同时,地方官吏的权利也受到动摇。传教士以本国武力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往往凌驾于地方政权之上。官绅们不甘心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受到侵犯与损害,



总是要伺机报复。这样,官绅联为一气,对抗教会的事件也就层出不穷。

2 教案与反洋教斗争 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教案便接连不断地在川东地区发生,主要有:重庆教案(1863年)、酉阳教案(1865、1868年)、黔江教案(1873年)、巴中、南充教案(1874年)、内江、涪州教案(1876年)。到20世纪初已达百次以上,其中大规模的有20余次。

#### (1) 第一次重庆教案(1863年)

第一次重庆教案由“还堂”事件所引起。咸丰八年(1858年),法国教士以《天津条约》弛禁、“还堂”为由,要求退还川东四所教堂旧址。教士范若瑟持清廷文牒,强行拆除长安寺,修建真原堂,并侵及附近民产民居,就连川东三十六属团体保甲办公暨八省首事聚会之地,均被逼出长安寺。不久,范若瑟升任川东教区主教,又扩建真原堂,强占民房。重庆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同治二年一至二月(1863年3月),一举捣毁真原堂及教士住宅多处。

教案发生后,范若瑟通过法驻京公使向总署施加压力,并说“暴徒”拉走存放在教堂内的“川黔滇藏寄存货物”及教民铺中的“川苏洋厂匹头、杂货、绸缎”,索赔甚巨。清廷指令川吏火速处理。成都将军、署川督崇实疑八省会馆首士为肇事祸首,即将会首傅苍岩、张朗斋等提省讯办。后迫于

全川人民的反对,并经成都知府再三调停议妥:八省会馆赔款20余万两;允法国教士另行卜地修建教堂,各属境内教民如有典买田宅、修理经堂、医馆等,应给予方便;长安寺“转给八省永作办公之所”,偏右地段永请驻扎军营,以卫阖城。

#### (2) 第一次酉阳教案(1865年)

自从咸丰八年五月十七日(1858年6月27日)签订的中法《天津条约》的第十三条款规定传教士自由传教“不受拦阻”,特别是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1860年10月24日)《中法北京续约》中又把传教士可到内地活动的条款加进去后,传教士便进入四川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活动。

首先进入川东少数民族地区的是法国教士邓司铎。同治元年(1862年),他带着一份法国公使发的“护照”到达川东土家族、苗族聚居的酉阳州。邓司铎到酉阳建立公信堂,公开招收信徒,引起地方士绅不满。团首张佩超、冯仕银暗中支持民众反教。同治四年(1865年),刘胜超带头聚众,捣毁了公信堂,反教风波迅速蔓延至州境。八月初(9月底),土家族头人冉丛之(冉老五)殴毙教士玛弼乐。教案发生后,法国公使派兵入川进行威胁。清廷急忙把镇压群众不力的酉阳候补知府董贻清、试用直隶州知州邓清涛撤职,由川东道道尹锡佩接办此案。锡佩一味迁就法国要挟,逮捕了刘胜

超、冉丛之、张佩超父子等 将冉丛之处斩 ,其余人杖责或刺配充军 ,或久禁渝监。同时 ,与教会议结 赔偿教会白银 8 万两 ,酉阳知州胡圻还多次到教堂赔礼道歉。这一屈辱的结案 ,为酉阳再一次发生打教事件埋下了伏线。

(3)第二次酉阳教案(1868 年)  
第一次酉阳教案后 ,酉阳天主教会传教士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利用教会武装变本加厉地欺凌非教百姓 ,因而再次激起事变 ,导致了同治七年九月至十月(1868 年 11 月)的第二次酉阳教案。

教案的起因是无赖痞匪教民龙秀秀之逼勒朱永秦退婚 ,并率教民抢朱家财产 ,烧毁房屋多间 ,激起公愤。群众在何彩的率领下一轰而起 ,焚毁了火石垭教堂 ,继而捣毁酉阳城内的法国天主教大教堂。烧死法国司铎李国。酉阳县各乡 民众纷纷响应 ,聚众约万人。清廷派军队进行镇压 ,捕杀打教民众多名。法国教士覃辅臣乘机动用教堂武装 ,枪杀民众 145 人 ,打伤 700 余人 ,烧毁 100 户民房。

教案发生后 ,法国公使派员来川 ,扬言再起战争。清廷将酉阳知州曾传道革职调任 ,改派田秀栗接任州牧 ,率兵前往镇压。翌年 ,清廷又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入川查办。李鸿章入川后 ,颁发告示 ,发布谕令 ,禁止人民有任何反教举止 ,将何彩等人押解到重庆杀害。同时与法国公使、教会议结 ,

赔偿白银 3 万两。

(4)邻水、江北、涪州教案(1876 年) 第一次重庆教案议结后 ,法国天主教得以在川东所属府厅州县建堂传教。邻水、江北厅、涪州等地都有不法教民欺凌百姓之事 ,民教纠纷屡屡出现。

法绪三年(1876 年)初 ,邻水教民王同兴纠结教众 ,黑夜抢劫 ,杀害人命 ,官府不敢过问 ,广大下层贫苦百姓互相联络 ,倡言逐教。大批的为非作歹的教民被驱逐出境 ,捣毁县城内外 5 处教堂 ,教民房屋被焚毁百余家。邻水反洋教斗争很快蔓延到江北厅、涪州等地。

江北厅与邻水距离很近。天主教在江北厅势力雄厚 ,并受川东主教范若瑟指使 ,大肆发展教会势力。不法教民气焰嚣张 ,干了不少坏事 ,严重侵犯了当地士绅、团首、百姓的利益与自身安全。光绪元年(1875 年) ,在团首陈子香等的倡议下 ,发起灭教。于 3 月 13 日集合 48 乡乡民数千人捣毁教堂、焚烧医馆 10 余处 ,有 300 余户教民遭到打击。陈子香等据城垣、设稽卡 ,立刑罚 ,操生死 ,传号令 ,给予教会势力以严厉打击。

光绪元年五、六月(1875 年 3、4 月) ,涪州百姓在张在初等人率领下 ,仿效江北打教之风 ,聚众焚毁各乡场教堂及教民房屋 100 余家。十月(9 月) ,数千乡民头裹红布巾 ,扬旗鸣炮 ,

拥到州城,将城内外教堂一并焚毁,教民驱逐出境。

三地教案发生后,范若瑟通过驻京法使,向总署施加压力,谕旨饬四川大吏赶快议结。教士乘机提出苛刻条件,故意拖延。清廷最后不得不以教士的意图作为议结的条件,仅赔款一项即达白银62000两(邻水23000两,江北厅29000两,涪州10000两)。

#### (5) 第二次重庆教案(1886年)

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一日(1886年7月2日),重庆再次发生教案。这次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传教士对重庆地区的渗透,引起了重庆民众的强烈不满,日积月累,终于以传教士购地建屋肇衅为诱发因素,引爆了第二次重庆教案。

1885年冬,美国传教士嘉腓力等在重庆城郊的鹅项颈、亮风垭买得土地,英国传教士李心田在南岸丛树碑也购得一块土地。鹅项颈、亮风垭、丛树碑三处都是重庆形胜扼要之地,传教士在这些险要之区购地筑房,遭到重庆民众的强烈反对。巴县知县国璋为消弭群众反洋教情绪,多次布告解释传教士买地筑房乃条约允许,并告之传教士暂时停工,以避风头。1886年6月17日,是中国传统的端午节。这一天,部分过节群众来到鹅项颈、亮风垭等处,与在场的传教士发生冲突。县令国璋立即派兵弹压群众,保护传

教士。此一事件使群众暂已平缓的反洋教情绪迅速高涨。重庆绅民表示愿集资赎回传教士所买3处地基,县令国璋派人几次与传教士交涉,未得结果。正在重庆应试的府属各县武童,首先发出揭帖,号召群众打教。7月1日凌晨,数百武童及群众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鹅项颈等地,将传教士所建房屋全部打毁。当日下午2时许,数千群众将城内的英美教堂、医馆全部打毁,传教士也受殴辱。下午4时,打教群众已逾万人,将法国传教士的教堂、住宅、医馆全部打毁。

7月2日,打教群众与教民罗元义发生流血冲突,使这次反洋教斗争进一步扩大。罗元义与重庆绅民“蓄怨已久”,7月2日上午,部分打教群众拥至罗家,将耳门挤毁,罗元义早有防备,所雇打手手执刀械准备斗杀。打手们有恃无恐,出手凶狠。结果打死11人,伤22人。清军闻地起来才制止了这场凶杀。

7月25日,重庆附近的民团约3000人,在团首石开阳、石汇父子率领下开赴白果树教堂,与保护教堂的清军发生冲突。此后数日内,重庆群众将各处所剩教堂、医馆、学校、教士教民住宅、店铺打毁,使城内外的“洋房无一存者”。风声所播,川东30余州县均发生打教事件。

重庆第二次教案发生后,清廷于7月16日谕令护理川督游智开派员

弹压,保护教士的安全,并命川督刘秉璋赴返成都,妥善了结。经磋商达成协议,重庆地方官府赔偿英、美、法等国教会银 261570 两,外加赎回鹅项颈、亮风垭、丛树碑等地地基银 2680 两,共计银 264250 两。协议还规定,传教士另觅新地基建屋造堂,清廷须竭力保护,派差料理。

(6)第一次大足教案(1886~1887年) 第一次重庆教案议结,允许传教士到川东所属传教建堂后,法国传教士于同治四年(1865年)在大足马跑场燕子窝修建了县属第一座天主教教堂。光绪八年(1882年)后,法教士彭若瑟又先后在龙水镇等地建堂多座,传教士和教民依仗侵略特权,霸占田地,包揽词讼,欺压百姓。光绪十二年(1886年)夏,重庆第二次教案的消息传到大足,广大群众仇教情绪高昂。六月十九日(7月20日),适逢龙水镇灵官会会期,四乡群众云集,并前往观看新教堂。教民数十人执凶器严阵以待,如临大敌。双方发生口角,继而互相斗殴,相持不下,不久,大批群众蜂涌而至,一声呼啸,冲进教堂,将所有设施、房屋全部捣毁。余栋臣、余翠坪兄弟都是这次打教堂的积极参加者。距龙水镇 30 里的三躯场教堂和 50 里外的万吉场教堂、医馆,也相继被百姓捣毁,98 家教民房屋受到袭击。教会逼迫清廷惩办主使人,但官府无从追究,只好将这次教案与重庆第二次教

案合并处理,赔银 15000 两,并饬令地方官究办滋事之人。

#### (7)第二次大足教案(1890年)

光绪十三年六月十九日(1887年8月8日),又值龙水镇灵官会会期,重修的天主教堂也恰好落成,乡镇人心浮动,旧仇难平,大足县令惧怕出事,布署兵勇守卫教堂,引起群众极大的愤怒。由余栋臣弟兄暗中联络,组织煤矿、纸厂工人一举捣毁教堂,打完即散,传教士和官府无从究诘。

光绪十六年(1890年),新教堂再度修成,灵官会会期也快到了。彭若瑟通知大足县令钱葆塘,要他出令禁止举办迎神赛会,钱知县遵照办理。但到了会期,镇上仍旧拥挤异常。把总刘连升带官兵把守教堂,教民王怀之等人到处寻衅,结果在教堂门口发生冲突。群众异常激愤,捣毁教堂。教民在与平民争斗时,缴获铜锣一面,因上写“蒋赞臣”三字,被教会据此呈控,诬蒋赞臣为“仇教祸首”。大足县令钱葆塘派人缉捕蒋赞臣,蒋闻讯逃往西山余栋臣家。余栋臣十分愤怒,当即邀约余翠坪、李玉亭等人在余家院子歃血为盟,众推余栋臣为首,准备起事。

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890年8月8日),余栋臣等率领 100 多个西山的煤窑、纸厂工人,攻入龙水镇。杀死教民 12 人,打毁 200 余家教民的房屋,没收教民财产,并强迫他们退

教。距龙水镇数十里的马跑场、强家坝的群众也群起响应,焚毁该地天主教堂。清廷命重庆知府王增文到大足查办,义军受清军团练内外夹击,被迫撤离龙水镇,隐匿西山。

光绪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1892年1月7日),清廷与法国公使议结教案,赔银50000两,并通缉余栋臣等人。

(8)成都教案(1895年) 在此起彼的反洋教浪潮中,成都民众早已怒火中烧。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五日(1895年5月28日)端午节,成都民众按传统风俗习惯聚集在东较场撒李子作玩。忽然有人传言附近四圣祠教堂有洋人杀小孩,于是群众蜂拥至四圣祠,将教堂捣毁。之后,群众又分赴平安桥及北门外将法国教堂捣毁。群众情绪平息后,当晚即散,成都各国传教士纷纷逃往新都躲避。成都教案发生后,教会与地方官府议定赔偿和惩办凶手协议。英、美等国派出八艘军舰游弋长江,向清廷进行恫吓、威胁,各国驻华公使又联衔提出“抗议”。清廷按侵略者和传教士旨意,将四川总督刘秉璋、候补道周振琼、成都知府唐承烈及华阳、乐山、灌县、大邑、冕宁、新津等县知县全部革职,朱瑞亭等6人作为肇事主犯被杀害,另外有17人充军。赔偿教堂白银50万两。

### (三)四川社会危机与反清浪潮

咸丰元年至同治三年(1851~

1864年),发生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数年之间,席卷广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安徽各省,并在南京建立了政权,与清廷对峙10余年之久。这场农民大起义,触发了四川原有的社会危机,点燃了李永和、蓝朝鼎反清起义的熊熊烈火。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将四川列入协调省。通过捐输、津贴、厘金等搜括方式,对四川人民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掠夺,使四川民穷财尽,百业凋敝,无业流民激增,直接造成嘬嚙、会党势力的壮大和活动的频繁。四川社会从此进入动荡时期。

#### 1 鸦片战争以后四川社会矛盾激化

(1)鸦片泛滥 鸦片战争以后,印度鸦片大量输入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增加20~30倍,刺激了鸦片的大面积种植。四川简阳县道光末年,乡民争相种植罌粟。咸丰、同治之际,四川许多地区大面积种植鸦片。咸丰六年(1856年)以前,云贵川境内的土地,一片连着一片,种植罌粟。咸丰末年,广安州开始种植罌粟,光绪时遍乡种植,成为广安州出产大宗。苍溪县早在嘉庆、道光年间还无种烟的人,自咸丰、同治以后种植渐广。从此之后,鸦片在四川泛滥成灾,光绪年间,川东到处种植罌粟,从湖北入川,沿江市集10户人中有6~7人为卖鸦片烟者。鸦片的大面积种植,使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受到排挤。农民为多渔利,往往不种粮食而种罌粟,严重破坏农业

生产,给四川社会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吸食鸦片的人与日俱增,使四川群众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极大摧残。据清末重庆海关统计,四川每年出产的鸦片烟总值已达3500万海关两,输出省外的约1200海关两,四川出产的鸦片有2/3是供本省消费。

(2)银贵钱贱危机的出现破坏了农村经济。中国在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五口。鸦片不断涌入,白银外流严重,道光二十三至二十六年(1843~1846年)间,白银外流约有3400~4700万银元。银贵钱贱的现象日益加重。即使四川在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四川犍为县银钱比价,咸丰四年(1854年)比道光十二年(1832年)银价升高近1倍。银贵钱贱的结果引起农产品以银价表示的价格不断降低。在道光末年,即使在收成较好的年头农民每年所得,也不敷工本。而农民交纳赋税须折合成银两,银贵钱贱必然加重农民的负担。

(3)战后的疯狂掠夺。鸦片战争后,巨额的军费和赔款转嫁在人民头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战争期间,四川地方官府为支付军队出川费用,征收“夷务津贴”,号召“捐输报效”,强行摊派,乘机勒索,中饱私囊。战后,四川官场中贿赂公行,贪风益盛,吏治尤坏。犍为县令朱在东搜括民脂,贿赂历任将军、院司、道府,经后任县令查出短缺正杂款9万余金。加之酷吏横

行,滥施刑狱,鱼肉百姓。勒索不遂动辄拘禁入牢,人民怨声载道。

(4)土地兼并日趋严重。战后10余年,四川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高利贷盘剥十分普遍,高利贷者大利滚算,无所不为。高利贷者聚敛钱财后,购置田产。合川县有的高利贷者以数千金起家,拥资数十万,买田百余顷。地方官吏在土地兼并中落井下石,推波助澜。因土地买卖须向官府缴纳“契税”,于是,官吏借征契税,“以肥身家”。在封建压迫剥削之下,小农纷纷破产,丧失土地。川西川南的富庶之区,土地兼并的情况更为严重,有的地方,一个县的土地竟然集中在几家大地主的手中,农民或是沦为佃农,遭受剥削,或是流离失所,远走他乡。加之战后灾害频仍,更将农民逼入绝境。咸丰二年(1852年)四川许多州县发生灾害,颗粒无收,饥民食草根,草根食尽食白泥,无以为生。

(5)游民数量日益增加。游民的增多是鸦片战争前四川社会危机的继续和发展。鸦片战争后,除本省的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加入游民队伍之外,邻近各省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仍源源不断的涌入四川。尤其是四川道路艰险,交通不便,商旅往来需要大量的脚夫,陆路由陕西、甘肃入川;水路由湖北宜州至重庆、夔州入蜀,纤夫、苦力入川后无事可做,无钱回乡,又无处居住,流落异乡,成为游民队伍源源不

断的后备军。鸦片战争后四川人口仍在继续增长,较之各省,增长率偏高。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川人口次于江苏居全国第二位,仅仅10年间,四川人口即超过江苏居全国第一位。10年间人口净增582.6万,比贵州省总人口还略多,年年均增长率为1.58%,居全国第一位。

(6) 嘯嚕反抗加剧 鸦片战争后10余年间,四川嘯嚕的反抗活动越来越频繁。嘯嚕的基本成员是无业游民,多来自川外省区。乾隆八年十月三十日(1743年12月15日)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嘯嚕是来自湖广、江西、陕西、广东等省的无业之民,也有记载说嘯嚕主要是来自湖北的游民。清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载,嘯嚕来源于打箭炉以西地区。

嘯嚕提倡烧香结盟,互助互济,具有秘密会党的形式。尤其是表现出反清的倾向。在乾隆年间,嘯嚕的活动已十分频繁。嘉庆时,白莲教起义发生,不少嘯嚕成员加入起义,成为起义军中很有战斗力的一部分。白莲教失败后,嘯嚕的反抗并未停息。嘉庆十五至十六年(1810~1811年),嘯嚕的活动主要在川北川东一带。

鸦片战争后,嘯嚕的活动有增无减,形成高潮。这一时期,众多的游民加入嘯嚕的反抗斗争,使其声势日益壮大,并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武装反抗斗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张灯

杆子聚众400余人,在彭县将军庙操练队伍;林蛮头纠集数千人公开与大邑县令郭志融打仗。

清王朝对此惶惶不可终日,对嘯嚕的活动采取极为残酷的镇压。凡被捕为嘯嚕成员一律处死,并借搜捕嘯嚕为名,滥施刑狱,枉杀无辜,使四川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

## 2 经济与社会危机的加剧——“协济省”地位的形戎

咸丰元年(1851年),清廷正式定四川为“协济省”,向清军与太平军作战的各省供应军饷、军粮和各种军用物资。到咸丰四年(1854年)底,四川向各省调拨饷银达330余万两,历年库藏被搜括一空。从咸丰元年(1851年)起,清廷就令四川地方官将川省沿长江各州县所存仓谷拨运广西、湖北、安徽、江西各省。同治二年(1863年)因拨运军粮,沿江而下,川米调运湖北甚多,使四川米价暴涨。咸丰元年至十年(1851~1860年),清廷先后从四川征调上万余名军队分赴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等省围剿太平军,所用军饷耗银,不予调拨,俱由四川省库开支。仅至咸丰四年(1854年),这项开销已耗银20余万两。

搜括范围最广、危害最巨的是“津贴”、“捐输”和“厘金”。

“津贴”是田赋附加。始于嘉庆年间。征额是田赋银1两加征银1两。咸丰三年(1853年)清廷为筹集军饷,

令四川办理借征次年钱粮 1 年,以后按年递推。川督裕瑞奏准“按粮津贴,请免借征”,规定按照正额钱粮 1 两,征津贴 1 两。全川除贫瘠的梓潼、广元等 30 厅州县免征外,其余县无一漏过,并无停办之日,成为固定的田赋附征,全川每年额征银约 54 万余两。津贴是四川特有的田赋附加,为其他省所未有。

“捐输”是清廷补助财政收入的一种搜括方式。凡捐官捐监缴纳的银两,襄助官府筹措军饷而报效银两,支持地方修祠庙、城池而捐助银两,以及赎免所犯罪例而贡献银两,统称捐输。嘉庆初,四川地方官筹集镇压白莲教起义的粮饷,曾“按粮加征”捐输。如江津县派征银 14000 两,为该县田赋正额的两倍以上。咸丰二年元月(1852 年 2 月),清廷以“军需河工用度浩繁”,令山西、陕西、四川等省督抚劝谕官绅士民捐输。四川名为“劝捐”,实际上是按粮摊派。自咸丰二年(1852 年)起,四川开办捐输持续不断。全川常年征派总额为银 190 万两。

津贴、捐输成为四川人民的沉重负担,由于地方官吏巧立名目,勒索侵渔,征收银两往往超过额定数目。自咸丰以来,浮收苛派,层出不穷,官绅勾结,肆意欺侵,以至川省杂费多如牛毛。

“厘金”有盐厘、百货厘金和洋药

厘金。盐厘有楚厘,咸丰四年(1854 年)在宜昌设局,对入楚川盐抽收厘金,每斤抽银 1 5 厘,后增至 3 5 厘。其次的夔厘,咸丰五年(1855 年)在夔关设卡抽厘,每百斤抽银 1 3 钱。再次为厂厘,咸丰五年(1855 年)在犍为五通桥、富顺自流井、豆芽湾、蓬溪康家渡等地设总局 4 处,每斤抽 1 厘。盐厘每年约征银 120 万两,加上其余名目的盐税,每年总征银 350 余万两有奇。百货厘金于咸丰十年(1860 年)定通省厘金办法,在省会设总局,“平均税则约抽值百之二”。洋药厘金又称土税,在重庆、广元、泸州、万县、雅安、绥定、叙永、嘉定等处设局抽收,按每百斤水路抽银 30 两,陆路抽银 20 两。咸丰九年(1859 年),雅安县仅洋药厘金一项就征银 3000 两。咸丰六年至同治十二年(1856 ~ 1873 年)间,四川共收盐厘、货厘达 2100 多万两。

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后,清廷用于镇压西南人民的军费支出达 7874 万两,镇压太平天国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军费支出共 42230 万两。对四川人民的横征暴敛、竭泽而渔,激化了四川的社会矛盾,特别是洋药厘金的抽收,直接导致了咸丰九年(1859 年)李永和、蓝朝鼎的起义。

### 3 燃遍全川的反抗怒火—李蓝起义

咸丰九年九月八日(1859 年 10 月 3 日),云南昭通府大关县民李永和、蓝朝鼎(蓝二顺)、蓝朝柱(蓝大顺)为



反对地方官苛索“洋药厘金”，在大关县牛皮寨揭竿起义。李蓝义军建“川天旗”，自称“顺天军”，共推李永和为“顺天王”。义军提出不交租、不纳粮和打富济贫的口号，远近贫苦乡民闻风响应。

不久，李蓝义军进兵四川。义军在四川转战数十州县，队伍发展到30余万人，经历了许多次殊死决战，歼灭数十万官军和地方团练武装。义军还由四川向湖北、陕西、甘肃等省发展，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西南、西北的统治。李蓝义军在四川的重大战事有以下几次。

(1)叙府攻城战 李蓝起义军于10月初入川，10月上旬，以迅猛攻势连续攻占筠连、高县、庆符三县。筠连、高县知县弃城逃走，庆符知县自杀身亡。叙州知府急调官兵防守金沙江，攻占安边镇。1月15日，义军由安边经柏溪直逼叙州府城下，义军声威大振。10月26日，义军在较场坝击毙清千总赵三元，生擒守备马国良，歼敌数百名，并迅速攻占城北真武山和城西翠屏山，对叙州府形成居高临下的俯攻之势。叙州知府英江、知县汪观光闭城龟缩，不敢出城，求神保佑，死守救援。不久，义军攻战叙州府城北重镇吊黄楼，切断了由成都驰援的清军水道。在五马溪一战中，击溃清参将高克騫，游击明跃光所部千余人。

成都将军兼四川总督有凤急令提督万福与按察使蒋征蒲率军救援，由于义军攻势凶猛，援军不敢逼近，只好在距叙州府西50里的高家场扎营观望。有凤痛恨二人援救不力，奏请清廷将万福革职，升任重庆镇总兵，皂升为提督，并升任亲信副将马天贵为重庆镇总兵，命二人率军驰援叙州府。清廷又从陕西调兵千名，调运火药万斤入川增援。

皂升、蒋征蒲、马天贵会合后，从高家场分兵三路对攻城义军形成包抄之势。义军因唐友耕叛逃投清，泄漏了攻城计划，以至叙州府久攻不克，义军又受到陆续驰援清军的威胁，于是决定放弃攻占叙州府的打算，撤军北上，转攻犍乐、自贡盐场。12月9日，义军渡过岷江，对高家场清军发动猛攻，击毙重庆镇总兵马天贵。提督皂升、按察使蒋征蒲一触即溃，率残部退守嘉定府城（今乐山市）。清廷收到败报，当即将川督有凤撤职，谕令陕西巡抚曾望颜署理川督，并命其火速赴四川布署川南盐场剿抚事宜。

(2)攻占川南盐场 犍乐和富荣为川南两大主要井盐产区，犍乐盐场位于乐山县和犍为县接界的五通桥、牛华溪和马踏井地区。富荣盐场位于富顺县和荣县接界的自流井和贡井地区。两场食盐供应四川全省和贵州、云南、湖北、湖南广大销区。

援救叙州府的清军被李、蓝义军

打败后,清廷大为震惊,为阻止义军入占犍乐、自贡盐场,清廷急忙调遣甘肃提督郭相忠统带甘陕标营驰援川南,又命四川提督皂升整顿溃军,率领督府标营和重庆镇兵、川北镇总兵占泰率川北镇兵、湖北宜昌镇总兵虎嵩林率宜昌镇兵火速进驻叙州府通往犍乐盐场和富荣盐场的各处要津,摆出与义军决战的态势。与此同时,清廷又命云南巡抚张亮基督饬滇军与四川军队配合“并力夹击”。为了更有力地牵制义军,清廷又命川督曾望颜迅速督饬各地团练,修筑寨堡,坚壁清野,会同官兵阻击李蓝义军。

李蓝义军在叙州府高家场打败皂升、蒋征蒲军之后,咸丰九年十一月(1859年12月底),兵分两路:一路由李永和、卯德兴率领,沿岷江西上,进入犍为县境,夺占地势险要的铁山,作为根据地。一路由蓝朝鼎带领,进占五通桥,控制了犍乐盐场。义军在犍乐盐场开仓放粮,打富济贫,大得人心,盐工纷纷参加起义军,义军增加到2万余人。咸丰十年正月一日(1860年1月23日)夜,蓝军绕过犍为到自贡之间的长山镇、荣县、乐德镇、双石铺等地的清军大营,由山间小道向自贡进军,经过两天多的战斗,于1月26日攻占富荣盐场,盐商富豪多逃往三多寨避难。广大盐工和贫苦农民奔走相告,兴高采烈地欢迎义军,数以万计的盐工群众争相加入义军,义军队

伍很快壮大到10余万人。义军在自贡得到充足的兵员粮秣补充,实力大增,斗志旺盛。且军风严明,深得民心。

由于成都将军有凤和川督曾望颜指挥无方,官军屡战屡败,他们又互相倾轧,推卸责任,战局混乱,将帅离心,兵无斗志。清廷严旨切责,又以调度无方的罪名,将四川提督皂升撤职,另委川北镇总兵占泰为四川提督,要他统率各路官兵剿办义军,重点加强成都防务。义军则获得了1个多月的休整机会,经过周密策划,开始更大规模的行动。

(3)驰骋川西平原 咸丰十年二月十五日(1860年3月7日)夜间,李、蓝义军撤离富荣盐场。他们分兵两路:一路由李永和、卯德兴带领义军一部开辟和扩大铁山根据地。铁山形势险要,横亘川南犍为、井研、荣县、威远各县之间,这里煤、铁资源丰富,可为义军提供无穷的后勤武备。义军进军铁山,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很快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另一路为义军主力,共10余万人,由蓝朝鼎、蓝朝柱、訾洪发、谢华瑶、何从政等率领攻克荣县、威远,在荣县沙子坡一战,消灭了尾追的清军副将张万禄,而后向川西平原乘胜挺进。

3月下旬,蓝军一部由何从政率领从富顺突攻资阳县境,占据万寿场。2日后,分兵一支进据老鸦山,又攻资

阳县城门户南津驿。资阳地方团练据守宜溪桥西,闻风而溃。义军占领南津驿,出榜安民,署年号为“顺天二年”。资阳县城受到义军威胁,增援官军和地方团练扼沱江防守,双方对峙数日,义军弃资阳转道清水河北进。

蓝朝鼎率10万义军从小道北进,由虎溪渡进军青神县城,很快攻克青神县城。旋即放弃青神县进攻眉州(今眉山县),因清军明跃光部早有防范,义军攻城未克,遂分路攻取彭山、蒲江、邛州各州县。

当蓝部义军扫荡川西各县府时,成都附近邛州等地即有人聚众焚香,准备响应。崇宁(今郫县唐昌)有人与地方团练作对,打伤团丁。新都县唐家寺也有人白天出来活动,并公开散布要迎接蓝朝鼎部义军,共同攻打成都。曾望颜急令尚在井研、仁寿追剿义军的占泰率军兼程回省,保护成都。占泰撤军回省一事,被蓝军侦知,于是沿途设伏,占泰军突遇伏击,溃逃省城。清廷见有义军攻占成都的危险,急令湘军肖启江部由湖南常德取道入蜀,并命川东道、重庆府准备船只,筹措军饷。成都将军有凤和川督曾望颜为逃避罪责,竞相上奏,互相攻击,清廷命驻藏大臣崇实赴川查办。稍后,又命湖南巡抚骆秉章火速入川办理四川军务。

蓝部义军于3月26日攻克彭山县,清军肖庆高部救援失败。义军旋

攻蒲江县城。攻破西北二门,义军蜂拥入城,歼灭清军300余名,县令杨尚炳弃城逃走。义军随即直抵邛州城下,义军战士身着红滚身军装,红白大套头,采用龙杓子、羊角叉、大刀、火枪及土炮等武器攻城,邛州知州许培身坚守不出。四川提督占泰、陕西候补知府田良率兵驰援邛州,义军退守文笔山。4月10日,义军迂回至名山,攻占名山县城,雅安知县何鼎勋传檄邻县团练,又招来过境烟帮李拐耙等,协助官军会剿名山义军。义军兵分5路,连营数十里,切断了雅州至成都的大道,占据金鸡关要隘。4月25日,义军从金鸡关间道偷袭雅州,迅速包围了雅州,昼夜攻城。占泰率数千清军尾随义军由邛州到名山,遥遥相随,不敢接战,义军包围雅州府时,占泰在名山按兵不动。5月3日,占泰哨探义军已撤围,才率兵奔赴雅州。占泰大军至大兴场,遇义军,仍不接战,义军退一程,占军进一程,随义军至洪雅,下峨眉。义军围攻峨眉10余日,不克,两三个月中周旋于雅州远近各州县,连下荥经、天全;随即折而向东,转战成都附近的大邑、崇庆、灌县、新都、郫县、双流等地;8月中旬,蓝部义军攻占崇庆州怀远镇、元通场,义军主力进驻元通场,距成都仅70里,省城警报频传,一片惊慌。

清军一败涂地,清廷深为震怒。崇实不断向清廷告急,认为川局糜烂

的罪责是曾望颜昏庸老迈,不懂军事造成的。清廷先令广西巡抚曹树钟赴川办理军务。因曹树钟回籍守制,令东纯暂时接办四川军务。不久清廷收回成命,革去曾望颜川督职务,另委湖北巡抚东纯接四川总督任。东纯来川途中病故,清廷又命崇实署理四川总督,要他主持防剿大局。但是,清廷对崇实的能力也存在怀疑,咸丰十年九月(1860年10月),又命剿办太平军有功的湖南巡抚骆秉章接办四川军务。两月之间,走马灯似的撤换四川大吏,说明,清廷处于进退失据的窘状。

(4)转战川北、川东 1860年夏,李蓝义军声威大震,队伍壮大到30万人,军事活动遍及川西、川南。咸丰十年十一月(12月),李蓝义军在富顺牛佛渡会师,确定了分路进攻川北、川东,并建立川南铁山根据地的计划。1861年初,由蓝朝鼎率10万大兵由沱江流域迂回到嘉陵江流域,4月下旬围攻潼川府,5月初兵临绵州城下。新任知州唐炯曾在川南力战义军,号称“唐拼命”。他利用绵州山环水绕的有利地势,坚壁清野,加固城防,与50万义军对抗四个多月,未被破城。7月中旬,四川提督占泰救援绵州,被义军诱杀。9月初,骆秉章率湘军坐镇潼川,指挥分路合剿蓝军战役。经几次激战,湘军发动总攻,焚烧城西北义军70余垒,义军死者4万余人。蓝朝鼎败走丹棱,试图与正在眉州激战的

李永和军会合。丹棱地势险要,蓝军四、五万人在城外东、南、北三面扎营40余座,昼夜攻城。骆秉章命湘果、果毅、护军三营,会同蒋玉龙所率川军,围剿丹棱蓝军。12月11日,义军精锐在蓝朝鼎的带领下向西突围被歼,蓝朝鼎战死。

李永和密切配合蓝朝鼎的绵州战役,于1860年5月率义军数万人围攻眉州,连营30里,横列数十里,并分兵进袭崇庆、攻克名山。因清军牵制,未能与败走丹棱的蓝军会合。骆秉章解绵州围后,也派唐友耕部对眉州李永和军进行围剿。11月13日各路清军同时进攻,双方激战,伤亡惨重。李永和为避开清军主力,转移冬瓜场,与湘军胡中和部遭遇,再次激战。清军集中兵力,全线出击,焚李军营垒百余座,击毙李军3万余人,夺取船只190余艘。李永和连夜撤离眉州,退往青神县,又受到四路清军包围,只好退回铁山。骆秉章严令叙州各县坚壁清野,断绝铁山粮道,使之坐困。铁山地势险要,方圆百余里,李军与訾洪发残部死守险地。1862年10月,李永和部在犍为龙孔场遭到围歼,李永和、卯德兴等被解往成都杀害。

周绍勇、曹灿章、蔡冒龄等分兵东下,经大足、荣昌,攻克永川县城,取道璧山、巴县向川东进军,活跃于定远(今武胜县)、顺庆(今南充市)、达州(今达县市)、东乡(今宣汉县)、岳池、

广安、大竹、邻水、梁山(今梁平县)、垫江一带,并以涪州(今涪陵市)北部鹤游坪(今属垫江县)为其中心地区。丹棱之战失败,蓝朝柱、谢华瑶率部突围后,经德阳、江油、越太华山,经平武到达川甘边境,他们折而向东,经剑州、南部直抵达州、东乡。在那里,他们与转战于梁山、大竹的曹灿章、郭富贵等军会合。同治元年元月(1862年2月),他们合兵攻克开江,进围垫江。3月,到达鹤游坪,与周绍勇会合。当时,石达开率太平军正攻打涪州,与李蓝义军相距不过百里,几乎是隔江相望,因湘军刘照狱部密集涪州,用水师封锁长江,难以抢渡,两军失去了会合的机会。

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李蓝义军分兵作战,蓝朝柱、张弟才部东走丰都、万县、忠县进入云阳盐场,而后北走东乡、太平(今万源)。6月初,离开太平,再次分兵,上郭富贵率兵向湖北竹溪、竹山等县进兵,蓝朝柱北上攻克陕西宁远厅(今镇巴县),而后活动于川陕边境。

周绍勇、曹灿章、蔡冒龄等留府鹤游坪,清廷将鹤游坪视为与宜宾八角寨同等危险的义军堡垒,谕令骆秉章迅速将周、曹二人剿除。6月,为了避开清军围剿,保存实力,留守鹤游坪的周绍勇、曹灿章等部开始分兵行动,向川陕鄂交界山区转移。一部在曹灿章率领下,进入梁山县,与湘军遭遇,作

战失利,退往开江、开县,经由太平县进入陕南。周绍勇率部撤离鹤游坪后,转战开县、云阳、万县、开江、梁山、达州。11月17日在大竹吉安场与清军周达武部遭遇,激战失利,兵败被俘,惨遭杀害。

周绍勇战死后,李蓝军在川东的战事基本结束。其余部均转移到川、甘、陕、鄂边区,互不统率,各自作战。郭富贵部到湖北竹山、竹溪进入陕南,同治元年九月(1862年10月)底,攻克郿县。不久,由宝鸡、凤县进入甘肃两当、徽县,12月,攻克略阳,由宁羌再入四川广元;最后在仪陇土门铺遭清军周达武部歼击,不幸牺牲。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6月初),进入陕南的蓝朝柱部,由定远厅(镇巴)入汉中,攻占西乡,而后北渡汉江,占据洋县。不久,曹灿章、蔡昌龄到洋县会合。他们在洋县建立根据地,重建政权,蓝朝柱被称为“大汉显王”。占领洋县以后,他们向陕、鄂、豫三省边境发展,这时,太平天国西北远征军扶军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祐王蓝成春、启王梁成富等率大军由河南西上,来到陕南,与蓝朝柱等会师。同治二年九月(1863年10月),两军联合攻克汉中府,旋又攻占城固县。1863年冬,两军雄据陕南,北克周至,兵锋距西安不过百余里,西安一夕数惊,危如累卵。同治三年(1864年)初,天京被围,西北太平军奉命回援天京。太平军东归后,蓝

军势孤力单,在清军强力围剿下,各自为战,最后陷于失败。

4 太平天国在四川的活动 太平天国革命后期,翼王石达开于1857年被逼离京,率部远征广西、贵州、四川,至1863年在成都就义为止,前后历时6年,驰驱万里。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太平军一部由贵州平远、毕节、大定、婺川进入四川綦江境,活动于南川、涪州、綦江、彭水、黔江一带。这是石达开部下、宰制曾广依下属的一支先遣部队。咸丰十年(1860年)春,太平军石达开部转战广西庆远府(今宜山市)。由于缺粮,石达开下令分兵活动,曾广依率部进入贵州,活跃于黔东北20余个州县。1861年夏,曾广依派遣部下傅丞相、李检点等率兵一部由黔北进入川东。

清廷误认为是石达开亲率部队入川,十分担心石达开与李蓝义军联合图川,因此急调湖南巡抚骆秉章入川剿办。1861年秋,傅丞相、李检点率部攻克黔江县城。不久,他们得知石达开将率全军从湘西北上,志在夺取四川时,立即撤出黔江,挥军进入湖北,攻克咸丰、来凤两县,为石达开入川扫清道路。

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1862年1月31日),石达开全军6~7万人,与傅、李部队2~3万人在来凤县城胜利会师。两军会合后,整顿合编,全军人数超过10万。同治元年一月十九日

(1862年2月17日),石达开率领太平国由湖北咸丰、利川县进入川东。

石达开入川时,四川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李蓝起义前,四川官兵素质差,战斗力弱,数量也很小。通过1年多对李蓝义军的剿办,官兵数量成倍增加,由于实战机会增多和南北各省军队的协同作战,战斗力大为增强。特别是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入川,使四川战局发生很大的变化。正规军和地方团练严密配合,重点围剿与全面防范配合,使义军很难行动。加之,此时李蓝义军已成强弩之末,官军气焰嚣张,更使他们面临逆境,事与愿违。

(1)涪州攻城战 石达开入川后,分兵三路:宰辅李福猷率领前队,进攻石砭厅(今石柱县)、宰辅赖裕新率领一军直趋长江南岸,溯江而上,伺机渡江,若渡江不成,遂攻涪州(今涪陵市)。石达开自领中军随进。

同治元年二月七日(1862年3月7日),石达开部主力进入涪州境,攻占高寨,在涪州东岸连营200里,山上遍插太平天国大黄旗。涪州知州姚宝铭闭城求援,血书告急。骆秉章急令候补道章源带兵千余,炮船数十艘,先期赶赴涪州布防,并将涪州以下长江所有船只集中北岸,严防太平军渡江。又调记名总兵唐友耕、已革知府唐炯、湘军悍将刘猷昭率军驰援涪州,以涪州为中心,涪陵江(今乌江)以西、长江以北200余里江岸,均由清军营兵、水

师严密封锁。当时,蓝朝柱、曹灿章、周绍勇等李蓝余部,由大竹、垫江急行军到涪州北岸鹤游坪,迫切希望与太平军会师,合兵图川,由于敌重点封锁江面,终未实现共同战斗的目的。

守城清军参将徐邦道将城外居民全部迁入城内,又将近城庐舍肆廛悉数焚毁,拆墙垣砧石修筑水城。

三月初(3月底),太平军击溃徐邦道部的阻击后,由赖裕新部于4月1日半夜由朱家嘴扎浮桥渡过涪陵江,昼夜行军200余里,直进南川、巴县境,威逼重庆。李福猷部则进军涪州兴隆场五马石等地,以牵制敌兵力。4月5日,石达开亲率主力由陈家嘴、夏家嘴搭浮桥抢渡涪陵江,占领涪州城四面高地,以黄泥堰、仰天窝等处为据点,绵延数十里,居高临下,准备攻城。

石达开带领太平军用统炮猛攻城墙,并开挖地道,以巨棺盛火药爆破,当月初战获胜。从4月6日起,涪州连天大雨,不能进兵。石达开命部下加紧开挖地道,准备以火药炸城。为蒙蔽城内清军,他们在大营附近的草房中敲锣打鼓,通宵达旦,使敌人误认为他们在演戏庆功。但是,狡猾的守将徐邦道明白了石达开的意图,下令掘渠积水,挖深壕放置大缸,并命人监听,一有响动,就放渠水灌壕。因此,炸城行动未能成功。4天以后,雨过天晴,清军唐炯、唐友耕等部援涪军队

到达。4月12日,太平军与清军大战于黄泥坡、龙王嘴、仰天窝等地。石达开不顾矢石,亲自督战,居高临下,命部众用火统、石块痛击仰攻之敌,打退了清军多次冲锋。但是,黄泥坡阵地终因敌人火力凶猛,被唐炯突破,致使全线动摇,优势转为劣势。涪州大战持续6日不克,太平军转而西向,分兵再入南川,计取巴县,试图乘清军东顾之机,直捣重庆。

(2)进攻綦江之战 石达开涪州撤离后,迅速分兵沿长江南岸进入巴县、南川、江津、綦江县境。太平军进入巴县时,驻防清军已撤往长江北岸,因此并未发生战斗,沿途百姓见太平军军纪良好,也不逃避,太平军途经巴县一品场,乡人象以往一样赶集,毫不惊慌,太平军称之为仁义场。

巴县与重庆一江之隔,本可以直取重庆,但清军已将南岸船支全部集中北岸,加之骆秉章见太平军西进,急令唐友耕、刘猷昭兼程回防,两军沿长江南北岸竞走,使石达开渡江北进计划受阻。石达开为摆脱困境,决定实行新的进军计划,他注意到綦江上游的綦江县城,地方偏僻,船支易得,应当攻下此城,再顺流而下袭取重庆。于是太平军折而向南,进入綦江、江津境内,主力进围綦江县城,并在围城前已在城内安插了内应。然而昼夜环攻,战斗激烈。因清军唐炯闻讯驰援,攻城战事进展不利,加之,内应税朝南

事败被执,石达开决定放弃取綦江计划,撤兵南去贵州仁怀。

(3) 横江会战 同治元年四月(1862年5月),石达开率主力部队由綦江南下贵州。当时,李永和、卯德兴正在宜宾八角寨浴血苦战,派人拜请翼王入川,联合图川、南溪地方起义军张四皇帝也在江安、兴文一带活动,派人前来迎接。石达开抓住这一时机,派先锋傅廷佐由仁怀间道西上,同治元年四月中旬(1862年5月中旬),傅廷佐率前队经合江、长宁,到达叙永厅。正在叙府八角寨苦战的李永和得到消息,以为石达开本人已到叙府,急忙派人送信联络。傅廷佐复信要他们暂勿移动,等待主帅到达后再定行止。随后石达开率主力由綦江经贵州仁怀到达叙府。四月三十日(5月28日),宰辅赖裕新率前军到达兴文县城,与已攻占兴文县城的张四皇帝会师。五月十六日(6月12日),与张四皇帝合兵攻克长宁县城,并分兵活动于叙永、长宁、兴文、古宋、庆符、珙县,与清军唐友耕、唐炯等部激战,准备抢渡长江。由于川督骆秉璋调动湘军、四川军队和地方团练围堵石达开部太平军,加强了长江防线,又分割包围太平军,进而围困太平军占据的长宁县城。六月十六日(7月12日),石达开为保存实力主动放弃长宁,退回叙永,准备绕道进军,伺机渡江北进。

同治元年七月下旬(1862年8月

下旬),石达开率部由川南经仁怀、合江回师江津、綦江。八月四日(8月28日),太平军在江津羊义溪、清平场、水碓滩等地与数万武装团练激战。八月六日(8月30日),太平军在墨斗溪、清白滩等处赶造木筏。八月十六日(9月9日),太平军大部聚集綦江赶水,准备浮江攻重庆,在清白滩为地方武装击败,损失木筏150架。9月底,石达开全军集中于川黔边境,大营设在綦江东溪镇。在此,石达开召集将领研究了一个分路绕道进取成都的作战方案,当即分兵三路:由宰辅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军,从贵州绕道云南,抢渡金沙江;石达开率领中军,仍进军叙府以南地区,全军约期在金沙江以北的沐川司(今沐川县)会合,进取成都。

同治元年闰八月初八日(1862年10月1日),石达开全军进入贵州遵义、金河、黔西,兵锋直指大定府(今大方县),在这里与两年前离开广西的曾广依部太平军会合,由曾作赖、李两军前锋,南进云南。石达开自领中军西进毕节,到达镇雄州。

镇雄州是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区,清军控制力较弱,石达开清除少数防军后,下令在此稍事休息。为壮大实力,他发布文告,招募新兵。在翼王的号召之下,许多贫苦人民,有志青年纷纷参军,石达开本军人数又迅速扩大到10余万人。

同治元年九月二十四日(1862年



11月15日) ,石达开本军10余万人自云南镇雄州出发 ,分兵5路 ,大举入川 ,攻占筠连、高县。7天以后 ,攻占叙府所属的横江镇 ,并北进庆符 ,连日渡江不成。大兵夹横江(金沙江支流)两岸为营 ,纵横数十里 ,旌旗相望 ,鼓角相闻。

横江发源贵州 ,全长500余里 ,向东北汇入金沙江 ,直达叙府。横江镇距叙府不到200里 ,顺流而下 ,攻占叙府比横渡大江进攻叙府要容易得多。石达开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作北进之计。但是 ,由于时值隆冬枯水季节 ,河道险滩礁石密布 ,无法行船。石达开指望长期驻守横江两岸 ,等待水涨下驶。

与石达开进军川、滇、黔边境同时 ,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军 ,南趋水城、郎岱、绕道云南 ,抢渡金沙江。后来李福猷一军经过宣威、昭通 ,到达金沙江畔的副官村 ,后迂回北进川南 ,与正在川滇边境的石达开中军取得联系 ,并回归本军。

川督骆秉章得知石达开占领横江 ,逼攻叙府的消息后 ,十分震惊 ,急忙饬令湘军悍将胡中和、刘岳昭、何胜必、肖庆高诸部和唐友耕部前往横江会剿。

同治元年十月上旬(1862年12月上旬) ,横江地区战云密布 ,各路清军先前进入叙府 ,恶战即将爆发。石达开为了集中优势兵力固守横江阵地 ,

下令将川滇各州县活动的太平军全部调回横江 ,准备与官军决战。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三日(1863年1月2日) ,太平军主力与来犯清军胡中和、何胜必、唐友耕三部初战于横江双龙场 ,清军未能得利。同治元年十一月九日(1月8日) ,横江会战全面开始 ,太平军全军主动出击 ,由石达开亲自指挥 ,三路大军直扑各路清军。石达开自率中路猛攻清军提督胡中和大营。清军各部急忙应战 ,由于太平军以逸待劳 ,又有险要地势和坚固营垒作掩护 ,清军伤亡甚重 ,石达开各路反击均获胜利。

双方激战十余日 ,太平军坚守阵地 ,清军围剿战略不能奏效。胡中和等探得可迂回通往太平军大营的山间小路。同时 ,刘岳昭通过收买内线 ,弄清了石达开各军布置情况。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二日(1月30日)黎明 ,清军倾巢出动 ,一军正面进攻太平军横江营垒 ,胡中和自率一军从山间小路袭击石达开大营。大营已被叛徒郭集益、冯百年纵火焚烧 ,火光冲天。这时 ,胡中和率湘军乘机猛攻 ,全营大乱。石达开见大营已失 ,兵心不稳 ,急令撤退 ,于是太平军撤出横江地区 ,退往云南东川巧家。横江之战 ,石达开部伤亡惨重 ,几乎溃不成军。

#### (4) 赖裕新率“中旗”转战川西南

同治元年十至冬月(1862年12月) ,赖裕新与李福猷分兵后 ,率中旗南趋云南东川(今会泽) ,经米粮坝(今巧

家)抢渡金沙江后,由披砂(今宁南)、普格西上。从此,赖裕新“中旗”与石达开失去了联系。同治元年十二月十一日(1863年1月29日),赖裕新率“中旗”进至宁远府(今西昌市)古家坪、庄家堡、隗罗沟等地。沿途“旌旗蔽日,杀气腾腾”,不下3~4万人。十二月十二日(1月30日),赖裕新在宁远府属鹿马站一带活动。次日进入河西司辖地,兵锋直指宁远城,在遭到地方围绕阻击,发生激战后,迂回北进。同治二年一月(3月),南下会理白果湾,北上德昌,问道插入礼州所,再进冕宁泸沽,越小相岭进逼越西厅,与越西厅同知周岐源、参将杨应刚、彝族土司岭承恩等连日激战。赖裕新率“中旗”击败了土司岭承恩所带彝兵的包围,队伍在险要的白沙沟谷地前进。不料,岭承恩彝兵在西侧高山上准备了大量滚木礮石,中旗后队进入谷中时,突遭滚木礮石袭击,太平军将士死伤惨重,赖裕新亦牺牲。余部在旗帅郑永和等率领下,继续北进,二月十日(3月28日)，“中旗”抵大树堡,击退武装团练阻击,扎浮桥抢渡大渡河口。二月十三日(3月31日),武装团练趁“中旗”部队渡河之际,突然袭击,后队遭受重大伤亡。4月初,“中旗”翻越大相岭,攻占荃经县,攻占芦山、天全县,主力突入川西崇宁县、邛州境,清军唐友耕部急忙驰赴邛州、崇宁阻击。“中旗”后队在芦山、名山亦遭团练袭

击。二月下旬(4月中旬)，“中旗”先后在邛州、崇庆、大邑各县流动作战。三月上旬(4月下旬)，“中旗”受唐友耕等部清军追剿,在大邑、温江、崇庆、灌县、崇宁、彭到等县活动。4月底,“中旗”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县到绵竹、德阳;一路由新繁进入什邡。其中一支由绵竹经罗江到达绵州、潼川,成为小股部队;另外一支由川北进入川甘陕边境,不再有大的战事。

(5)大渡河畔受困,石达开被俘  
横江一战不利,石达开败走云南,活动于永善、昭通(今恩安)、东川(今会泽)一带。当他得知宰辅赖裕新已率领“中旗”从米粮坝(今巧家)渡过金沙江,北上宁远府(今西昌市)的消息,迅速决定寻踪入川,与“中旗”会合。

同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领本军4万余人,由米粮坝渡过金沙江,以急行军的速度,直捣西陲重镇宁远府。三月十四日(5月1日),太平军攻克宁远府属河西镇;三月十五日(5月2日),抵达樟木箐驻扎,纵横20余里。宁远府清军设防阻击,遭到太平军迎头痛击。为安抚川西南各地彝族,避免彝族头人产生误解,石达开北进路上,向各土司散发文告,阐述太平军起义宗旨和用兵川西南的原委。北上途中,石达开详细了解到进军成都的路线,决定不走“中旗”由樟木箐经越西到大渡河的大路,而走清军尚未注意的由樟木

菁斜插冕宁瓦磊,经铁宰通往大渡河的小路。

三月二十日(5月7日),石达开率本军由拖乡、沙坝进入冕宁境内,二十二日(9日),至冕宁瓦磊。二十七日(14日)凌晨,石达开部队绕越冕宁小路到大渡河南岸的紫打地。紫打地北濒大渡河,西临松林小河,东南两方均为崇山峻岭,在松林小河对岸,有番族土司王应无率军驻守。当石达开到达紫打地时,清军唐友耕部尚未赶到北岸布防。可惜,石达开未及时渡河北进,而让全军于5月14日~5月17日休息3天,登山采粮,充实行囊。17日夜间,山洪暴发,大渡河水猛涨,河面虽不超过300米,但水流湍急,北岸峭壁林立,平常渡河已非易事,何况清军赢得时间后,17日即在对岸布署河防,并联络土司共同进行围剿石达开的活动。

三月三十日(5月17日),重庆镇总兵唐友耕、雅州知府蔡步钟率清军8000余人沿岸阻击船筏。同时,唐友耕又派人收买番族、彝族土司,要他们与官兵配合进攻太平军,事成之后,太平军所有资财归其所有。又派越西同知周岐源、参将杨应刚、都司庆吉带领彝族土司岭承恩从竹马岗北上,堵住太平军东进道路。为截断太平军南退之路,再派南字营游击王松林把守箐箕湾一带险要,为全歼太平军作好了准备。

同日晚,石达开发动首次抢渡大渡河的攻势。他精选千余壮士分驾船筏,沿河抢渡。但船筏在汹涌澎湃的狂浪中无法施展,每到河心,便被冲回,无法前进。石达开只好下令暂时退兵,等待水势稍消,再行抢渡。

从5月21日~6月9日,石达开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抢渡行动:

四月初四日(5月21日),石达开选拔5000精锐,分乘木船、竹筏,每人手握长矛,腰佩利刀,在万众呼啸声中鼓浪前进。清军隔岸施发枪炮,但距离稍远,伤亡不大。船筏渡到河心,清军排列北岸以枪炮轰击,击中船筏火药,引起炸裂燃烧。加之渡船至一半,河水暴涨,太平军战士无一生还。

同治二年四月十七日(6月3日),石达开发动第二次抢渡行动。清军炮火密集,加之水势湍急,渡河的太平军战士全部淹死。再次抢渡失利,石达开只好设法从陆路突围。四月十九日(6月5日),他以箭传书,射入松林河对岸王应元营中,许以重酬,请求让路。但是王应元已被唐友耕收买,拒绝了石达开的要求。而后,石达开又将箭书射入彝族土司岭承恩营中,希望撤兵让路,并要求商谈条件。岭承恩不仅不答应,反而“攻之益急”。至此,石达开深知走入绝境。但他不计成败,又发动了第三次抢渡行动。

四月二十三日(6月9日),石达开集中渡河船筏20余只,每船载勇壮

70~80人,彭浪冲锋,以死求生。结果,被猛浪飘没5只,其余被北岸清军击沉。石达开走投无路,一筹莫展。由于被困多日,粮食日益枯竭,不得不杀马度日,继以桑椹充饥。

6月9日以后,敌方眼见石达开部队饥病交迫,死者日众,战斗力日减,加强了攻势。王应元率番兵杀过松林河,岭承恩从马鞍山俯攻,紫打地终于失守。石达开决定向东突围。当时伤病员太多,全军行动困难,于是首先将伤病难行和从军不久的新弟兄数千人给资遣散。石达开带着精简后的残部6000余人向东突围,经过两天浴血战斗,冲破了敌人围堵,到达利济堡。在这里,石达开发现前方老鸦漩也山洪翻腾,无法飞渡。而且敌人早已对他们实行坚壁清野,得不到任何粮食接济。全军面临断粮,饿毙的绝境。石达开清醒地知道失败在即,忍痛将爱妻投入江中,同时,伤病员和体力不支的战士也相继投河,以免被俘受辱。

陷于老鸦漩绝境之后,石达开完全失去了“血战出险”的信心和力量。他死不足惜,但深感痛惜的是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也不免同归于尽。石达开在绝望之际,希望通过牺牲自己,来保全余部将士的生命。于是向川督骆秉章写信,提出“舒命以全三军”的要求。唐友耕等利用石达开身处绝境和舍身保全部属的一线希望,策划了生

擒石达开、杀戮其余部的险恶计谋。

四月二十四日(6月10日),接受计擒密计的清军参将杨应刚、南字营游击王松林商定了计擒细节。先由王松林赴石达开营中谈判保全部属的条件,再由杨应刚亲到石营订约、盟誓,保证履约。石达开轻信了他们的诺言,于四月二十五日(6月11日)携其一子及宰辅曾仕和应约前往洗马姑杨应刚营中,听候清军践约。四月二十六日(6月12日),唐友耕派兵将石达开父子及曾仕和等护送过河,成为唐友耕的俘虏,其部属2000余人则仍被阻渡,滞留大树堡。四月二十八日(6月14日),骆秉章得知石达开已被计擒的消息,担心唐友耕等计划不周,不能将其部属一网打尽,就地屠杀。于是派遣布政使刘蓉驰赴大渡河,会同唐友耕等研究处置石达开部属问题。五月初三日(6月18日),唐友耕将石达开等5人押赴成都。五月初四日(6月19日),清军将石达开部属2000余人团团围困,同时围杀。个别逃出的义军,也被彝族士兵沿途截杀。

五月初十日(6月25日),石达开被解到成都。成都将军崇实、四川总督骆秉章在督署大堂审讯石达开,石达开长揖不拜,痛陈金田起义以来的丰功伟绩。后石达开被绑赴刑场凌迟处死,神气湛然,毫无畏惧,表现了临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 5 咽嚙、会党的反抗活动

(1)巴县张大童起事 张大童,巴县北碚人,咸丰初年的巴县蓄名盐梟头目,与其第二童、三童、四童聚集数百名盐梟在三峡私设炮船关卡,强抽盐厘。清廷曾多次派兵剿捕,终在清廷重庆围攻下失败星散。

(2)福教宋士杰起义 福教为红灯教的一支。宋士杰原为马边生员,因故被革。同治三年(1864年)初,红灯教徒、屏山县人高德芳来马边传教,收宋士杰为徒。宋士杰自称古佛转世,被众教徒尊为古爷,又被推为总教头。由于清廷查禁红灯教,宋士杰所传之教改名“福教”,入教门徒甚多,乡民加入者踊跃,达600余户。宋士杰名声远扬,马边周围屏山、洪雅两县,门徒如云。其后,影响到高县、邛州、大足、威远、乐山、荣县、仁寿、成都等地。宋士杰不仅用浓厚的迷信色彩激发人们对古佛的崇拜,而且把这种迷信信仰引导到反清起义。这一事态的发展引起清廷的关注,谕令马边、屏山地方官严查并预为防范。由于信徒陈志金被捕后,受不了刑讯,供出宋士杰反清起义的内幕。清廷谕令有关厅州县严密缉拿宋士杰和福教教徒。

同治五年九月初三日(1866年10月11日),宋士杰为摆脱福教教徒和自己的危迫处境,与红灯教首领刘俸凯、何玉贤等揭杆起义,设立官制,制备旗帜,连营结寨,攻占屏山县杉树岗、玛璃沟等地,又向犍为、乐山进逼。

洪雅福教首领尹益山、尹钟玉等人,也立即响应,聚众1000余人,于17日从四面山火烧走马场。福教头领宋二光、熊有仁等也率众起义,打算与总会会合。川督骆秉章派遣提督胡中和、总兵周达武率湘军、黔军10余营,会同马边、洪雅、屏山、乐山、犍为等州县地方官所领兵丁、团练围剿洪雅、马边、屏山义军。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洪雅、屏山义军先后失败。11月1日,大批增援马边清军到达马边厅城。宋士杰率义军退至烟登山,在山顶设总部,各部义军合驻周围山头,营垒连续不断,坚固可靠。清军发动多次进攻,均被义军击溃。清军转而以招降为诱饵,瓦解义军士气。部分义军被清军宣传迷惑,希望投降免死。清军趁机发动攻势,突破义军木城卡寨,义军英勇顽抗,1400余人战死。宋士杰率余部转移白石坝。12月初,清军、团练约万余人,对义军发动围攻,义军伤亡惨重,宋士杰在麻柳塘被俘,押解成都,与其他义军首领一起遇难。

(3)灌县会党起义 灌县历来是会党活动的重要据点。同治十三年(1874年),会党“孙抱鸡婆”、“杨夏侯登”、“骆锦太”、“邵三帽顶”等在县境发展会众,入会者必须割去发辫。灌县会党与邛州、大邑、蒲江、芦山、天全等地会党互相联络,密谋起义。同时又与聚众于怀远镇的红灯教教徒李三少等联络,共襄义举。灌县官绅面对

这种形势束手无策。“孙抱鸡婆”与李三少等决定立即在灌县起义,制备旗帜等物,并派人潜入县城,作为内应。7月22日,孙、李等率众于太平场,袭击地方团练,然后放火烧场。灌县知县黄毓奎率领清军团练前往剿办。“孙抱鸡婆”、“杨夏侯登”等20余人被俘遇害。李三少等率余党退入山中,转移崇庆、汶川等地。川督吴棠派兵进山助剿,又饬令瓦寺土司索世番率藏兵在汶川阻击。清军团练沿山搜捕,杀死义军多人,仅李三少等突围逃亡。

(4)“盐泉”任韦陀起事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后,长江水道被阻,两湖淮盐销区被川盐占据。太平天国失败后,淮盐与川盐争夺两淮市场,川盐销区屡遭侵削,四川地方当局为保护盐税收入,对无照私盐实行缉拿打击,对走私者实行严刑峻法。广大依赖运销私盐为生的盐贩盐泉则拉帮结派,明火执杖,武装走私与之对抗。盐泉每股以数万计,泸州、合川、富顺、隆昌、永川等10余州县都有其足迹。

光绪元年九月初(1875年9月底),江津会党首领、大盐泉任韦陀率十余人起事,攻破泸州府属永安寨、云锦寨、白云寨等处,打毁盐店,强拉盐商,公开贩卖私盐,张贴抗官告示,并在永川、江津一带进行“劫掠”活动。另一盐泉江大烟杆率众200余人,分乘炮船十余支,以嘉陵江小三峡为基

地,出击江、巴各盐商店铺,占据北碚,与任韦陀互相呼应。红灯教首赵海山也约众起事,于10月11日攻占永川朝阳寨,准备与任韦陀会合。

川督吴棠饬令川东道、重庆知府会剿外,又命四川提督从云南回师泸州,并从涪州调兵前往永川、泸州助剿。清军和地方团练迅速攻克朝阳寨,义军伤亡被俘60~70人,赵海山脱逃。任韦陀在清军追剿下化整为零,暂避其锋。江大烟杆退回小三峡。

光绪二年三月(1876年4月),任韦陀又在江津永川交界处纠众结盟烧香,准备东山再起。江大烟杆也率众出小三峡劫掠盐商,动辄号召1000~2000人,置备枪炮旗帜,抗击清军。川督丁宝楨集结重兵,加强团练武装,在合江白云场围剿任韦陀、谭二疯王,义军伤亡甚重,任、谭突围逃走,江大烟杆也在巴县文华沱被围,寡不敌众失败,江率残部逃走。光绪四年正月(1878年2月),江大烟杆、任韦陀分别在贵州丹江和陕西城固被捕遇害。

6.东乡的抗粮斗争 光绪元年(1875年),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人民因不满于清官府的苛敛与土豪劣绅的勒索,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粮斗争。

东乡县位于大巴山麓,地瘠民贫,清代时属川东道绥定府。清初,东乡县每两地丁银只纳制钱1400文,到同治年间,则每两加至5500文,又随粮征收津贴1两,派钱2200文,捐输1

两,派钱 5250 文,茶课 1 两派钱 80 文 4 项共完钱 13030 文,其它斗厘、猪厘等捐税不在其内。东乡县局绅在征收钱粮的过程中,与官吏勾结,大饱私囊。他们操纵银价,使银价在交纳钱粮时增至数倍,每两加至 5500 文。农民无钱交纳,倾家荡产,一遇天灾,颗粒无收,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悲惨景象。群众被逼上绝境,自发地起来进行抗粮斗争,袁廷蛟被拥为东乡抗粮斗争的领导人。

光绪元年五月十九日(1875 年 6 月 22 日),袁廷蛟率 700 ~ 800 农民,高举书有“粮清民安”4 个大字的旗帜,进驻与东乡肥城一河之隔的观音崖,向清官府提出清算粮账,减轻粮税的要求。四乡群众闻讯赶来,3 天之内,请愿队伍扩大到 2000 ~ 3000 人。著名盐梟马洪斋率手下兄弟 400 余人加入了请愿队伍,开县会党首领吴奉山也率数百人赶来声援。绥定知府易荫之接到东乡知县孙定扬的电报,率勇到东乡,为稳住民心,表示同意群众要求,次年减低银价,以钱 2500 文完粮 1 两,并允许袁廷蛟亲到绥定府清查历年粮账。袁廷蛟唯恐有诈,派邓洪熙等 8 人赴府查账。不出所料,邓洪熙等人到府后全部被扣留。袁廷蛟再次召集群众千余人进驻官渡场,并与马洪斋、吴奉山联络,请求声援。易荫之见群情激愤,恐再生事,只得将邓洪熙等人释放。

光绪元年(1875 年)冬,官渡场团首梁天贵、吴仁堂等人假意请袁廷蛟到官渡场算粮账。袁不知是计,率领数十人到官渡场。当晚梁天贵派团丁将其住处包围,并放火焚烧,袁在众人保护下冲出重围,幸免于难。事后,官渡场的团首们怕袁廷蛟报复,加强团防,规定乡民卖米 1 斗须抽 1 升做为办团经费,这更激起官渡场乡民的愤慨。在王盛祥的领导下,将团防局打毁,并拿走枪械。知府易荫之闻报后即派千总杨开泰带大队人马到东乡弹压。东乡群众在东乡厂溪附近的山沟设伏,缴获了清军的全部装备。抗粮、打团防、伏击清军等一系列事件使清吏和局绅们惊恐万状,即向川藩司谎称袁廷蛟聚众叛乱,请求发兵围剿。护理川督文格得到东乡告急禀文后,如临大敌,飞檄提督李有恒率 5000 余官兵驰赴东乡,清廷也传谕川陕楚三省合力剿办。

光绪二年二月至三月(1876 年 3 月),李有恒率军兵分三路直赴东乡,以拘捕袁党为名,到处骚扰百姓,抢劫钱物,奸淫妇女。百姓纷纷呈递冤词,裕字左营总兵谢思友了解真实情况后,告知李有恒,请求撤兵,游击金德成也提出同样的请求。李有恒不但不撤兵,反将告状百姓捆斩。一时人心惶惶,乡民纷纷逃到山中寨峒避祸。李有恒下令对乡民实行血腥镇压。清军在深山寨峒见人就杀,逢屋便烧,劫

掠财物,并带走年青妇女几百人。东乡成为一片焦土,李有恒还向清廷邀功请赏。

袁廷蛟此时突然进京,“叩阍鸣冤”。清军屠杀东乡县数千乡民的消息迅速传遍京城及全国,举国上下一片哗然。御史吴镇等川籍京官得知东乡惨案的真象,十分同情。吴镇先上奏揭露东乡惨案真相,又与在京47名川籍官员联名参奏孙定扬、李有恒等人。清廷命护督文格调查该案,同时又将袁廷蛟收监听候处理。

东乡惨案与文格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格向清庭复奏中极力掩饰真相,推卸责任。御史李廷肃对文格的奏折逐条加以批驳,吴镇等京官也再次参奏,文格不得不将李有恒革职,并自请处分。清廷将山东巡抚丁宝桢与文格对调,要求丁宝桢彻底清查东乡惨案。

丁宝桢派人去东乡调查,明了事实真相,却极力替文格和李有恒等人推卸责任,并拟将袁廷蛟斩首。这引起四川各界人士的不满。光绪四年二月(1878年3月),翰林院侍讲张佩纶上书弹劾丁宝桢。清廷不得不另派前两江总督李宗羲前往东乡复查,据实禀奏。

李宗羲经明查暗访,弄清事实真相。李虽感到据实禀报得罪官府,不据实禀报得罪百姓,前思后想,终以人命悠关为重,将东乡惨案原委向清廷

一一奏明。清廷于光绪四年十月(1878年11月)派恩承、童华为钦差大臣前往四川提讯结案。而恩、童二人入川以后,接受丁宝桢贿赂,巧为遮掩,使案仍不能了结。

光绪五年五月十一日(1879年6月30日),时任国子监司业的张之洞向朝廷上了一道《奏为重案未协有关治本民心疏》,详叙东乡惨案始末,分析群众抗粮原因。指出真正的祸首在官而不在民。希望清廷为王朝长远利益,严惩制造东乡惨案的罪魁祸首。

光绪五年十月(1879年11月),清廷被迫惩办了一些官员以平民愤。东乡知县孙定扬、四川提督李有恒均处以斩刑,前护理川督文格革职,川督丁宝桢降四品留任,其余有关知府、总兵、局绅,或革职、或充军。袁廷蛟以聚众闹事的罪名交成都县永远监禁。川督丁宝桢派人将袁廷蛟及其子袁能柏鸩杀。袁廷蛟牺牲自己,争得了东乡血案的昭雪。

7 四川的团练武装 太平天国时期,四川是全国举办团练最多的省份,其规模与范围比过去大得多。咸丰元年七月(1851年8月),四川总督徐泽醇拟订全省保甲章程32条,其中有“变通堡练”、“守要隘”、“协捕通衢盗贼”等条款,以防民众反抗。咸丰三年元月(1853年2月),清廷下令各省办理团练之后,四川各地大举兴办团练。四川大吏直接掌管全省团练事宜,各



道府设团练总局,各州县设团练分局,各乡各镇建立“民团”。民团的成员叫“团丁”,按每户人口多少进行摊派,一般按大户派三四名,中户派二三名,小户两户合派一名。再由各民团按一定比例抽派丁壮入县,组成团练分局。其成员称“练丁”,由州县官亲自统率,司缉捕、弹压、守城之职。

骆秉章在围剿义军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地方团练的作用,一再告各州县整顿团练,严饬地方重订团练章程,如雅州府《捐钱练勇章程》规定:大州县练丁(或称练勇)1000名,中州县练丁700~800名,小州县练丁500~600名。骆秉章饬令各地练丁“就地筹饷”,地方采取向居民抽收练捐的办法。该章程说:川省百余州县,大州县不下二、三十万户,中州县不下十余万

户,小州县不下数万户,将各州县居民按收入分为20等,上户每年捐钱5000文,以次递减,少至250文,平均每户年捐500文,以10万户计,每年得练捐50000串。每丁日给口食钱100或80文,练丁1000人,每年只需36000串,其余经费留作置械、赏号及出征加给口食之用。照此办法,四川百余州县约计可得练丁80万到90万人。官府不用糜费军饷就增加了近百万兵力,清廷又何乐而不为?于是,团练武装在四川,在全国迅速纠集起来。

地方团练武装的进一步强化,配合湘军作战,的确给李蓝义军和太平军造成新的威胁。团练遍布全川,到处袭击义军,使义军失去了活动的广阔天地,很快走向败亡。

## 二、重庆开埠后的四川

光绪二年(1876年)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及其以后续订专款,使包括四川在内的西南各省相继成为西方列强的侵略目标。从此之后,列强不断扩大以商品输出和掠夺原料为主要手段的经济侵略活动。进入十九世纪90年代,这种经济侵略进一步加剧,同时开始向四川输出资本,从而促使四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并促使四川商品市场逐步适应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需要。

### (一)四川被迫向列强开放

1 列强获得在川通商投资权利—从《烟台条约》到《马关条约》

(1)洋船通航川江与重庆被迫开放 由于四川在内地各省中极为富庶,素称“天府之国”;又居西南地区要冲,因此外国侵略者把四川列为“第一

注意之地”。

帝国主义列强把夺取重庆作为他们进入四川地区的第一个目标,把川江航道看成是他们对四川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通道。因此首要的目标,是要将重庆作为他们的商埠,将川江作为他们的轮船航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外国侵略者不惜采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同治十三年(1874年),英、法、美等国假借洋船、货物上行四川,被川省夔关扣押,船货均遭损失,向清廷要求照数赔偿。经四川总督吴棠调查,所谓美国商船纯属渝商假冒,英商信和、法商泰昌货船及货物并无损坏。诈骗失败,外国侵略者又施出他们的战争惯技,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公使威妥玛借口“马嘉理案”,向清廷提出包括开放宜昌、重庆为商埠的无理要求。这一要求遭到清廷的拒绝。但是,英国此举,关系到列强共同的殖民主义利益,因此得到美、德、俄、法等国的支持。窃踞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出面“调停”,伙同威妥玛对清廷施加压力。软弱无能的清廷既无力拒绝侵略者的图谋,但又不愿他们进一步深入腹地,只好一方面承认他们在重庆派员驻寓,另一方面又企图以川江险阻、通航困难作为缓兵之计。当年英国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同清廷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打

开了通往四川的门户。条约规定,开辟川江要隘宜昌通商口岸;“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条约又规定:“轮船未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条约未正式允许英国在重庆设立商埠,使其未能达到在重庆开埠的目的。

四川地势险峻,四周为龙门山、大巴山和云贵高原所环绕,陆路交通极为困难,并且,又远离海岸线,外国商品不能直接输入。自古以来,外界和四川的交通,除川陕栈道外,主要依靠长江水道,由宜昌经长江三峡抵达重庆。但由于三峡险滩、暗礁密布,给航运带来了不少危险和限制。迄止19世纪末期,川江航道业只能行驶载重二三十吨的小型木制帆船。这种帆船使用大量纤夫推挽,行进缓慢,上航一次,顺利时须经40余日,如遇险阻,则往往拖延三至六个月。清廷无法阻挡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深入,只好以川江航道不能通行轮船作为最后的一张王牌,来遏制侵略者的野心。

事实上,宜昌开埠的结果,大大刺激了外国侵略者的胃口。洋货入川,汉口至宜昌间开始由外轮往来运输。光绪三年(1877年),重庆进口洋货总值达到1157000两,是宜昌开埠前一年(1875年)的6.4倍。这一初步成

[法]得酿德勒《吞灭四川策》,见《云南杂志选辑》第443页。

功 强烈刺激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探险川江、进而改变川江交通状况的勃勃野心。他们认为 ,只要轮船从宜昌开到重庆 ,那么重庆开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因此 ,自烟台条约订立后 ,英商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屡探峡江险阻。光绪七年 (1881 年) ,英国冒险家立德凭着他从汉口乘木船经 40 余日抵重庆的经验 ,受到英国政府、商人的全力支持 ,建立了川江轮船公司。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英公使照会清廷 ,英商立德拟于月内由宜昌上驶重庆。清廷无奈只好于光绪十五年 (1889 年) 重开谈判 ,清廷以川江险狭为由请求拖延 ,英方明白清廷的手法 ,坚决不同意轮船延期上驶。清廷惧怕英国侵略者扩大事态 ,终于放弃种种理由 ,于 1890 年 3 月 3 日在北京与英国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 ,正式承认重庆为英国通商口岸 ,英国商船可在宜昌重庆间自由运货往来 ,“ 税收” 即照条约税则及长江统共章程一律办理”。根据这一条约 ,1891 年清廷正式勘定重庆南岸王家沱为商埠地址。同年 ,重庆设立了海关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任命英人霍柏森为重庆海关税务司 ,掌握了四川进出口贸易的咽喉。依照最惠国待遇 ,其它帝国主义各国也相应取得了英国在四川享有的侵略特权。日本虽是后超的资本主义国家 ,1895 年 ,日本侵略者通过《马关条约》 ,不仅取得了西方列强享有的各种特权 ,而

且又摄取到了“ 往来侨居 ,从事商业、工艺制造 ”等更为优惠的侵略特权。至此 ,外国资本主义在四川取得一如沿海地区的各种侵略特权 ,四川开始落入帝国主义列强的势力范围。

但是 ,从 19 世纪晚期 ,帝国主义列强大举进入四川 ,到 20 世纪初期 ,川江航道始终因为水道险狭、季节水位变化的影响 ,并没有成为外国货轮出没往返的中外水上动脉。这时期经川江抵达重庆为数不多的几艘轮船是 :

1898 年 ,英国商人立德载重 7 吨小轮船“ 利川 ”号在枯水季节由宜昌溯江而上 ,到达重庆。此轮牵引力小 ,沿途险滩须由纤夫拖拉 ,轮小不能运货 ,1899 年返回上海。

1899 年 ,英国炮艇“ 山鸡 ”号及“ 山莺 ”号访问重庆。上行途中 ,“ 山莺 ”号遇险 ,船头洞穿 ,经检修始获重航。

1899 年 ,第一艘英国商轮“ 先行 ”号 (载重 331 吨) 自宜昌启航 ,经 7 天时间抵达重庆。但在行驶险滩时 ,轮船尾浪荡翻民船两只。

1900 年 ,德国商轮“ 瑞祥 ”号 (载重 358 吨) 自宜昌开出 ,甫行 40 里 ,至崆岭滩即触礁沉没。

1901 年 ,法国炮艇“ 奥立 ”号自宜昌到达重庆。

上述首航川江的外轮 ,除立德那艘 7 吨小轮而外 ,大多遭遇险阻 ,或伤

或沉或颠覆民船,使外国冒险家改变川江航运工具的野心受挫。因而,帝国主义还不得不仍然依赖很多世纪以来沿用的木帆船来行驶。根据《重庆海关 1892~1901 年十年调查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十年间洋商租用民船进出重庆港只数和吨数可以清楚地看到

帝国主义对四川进行经济侵略的大致规模。

根据 19 世纪 80 至 90 年代有据可查的洋货输入记载可以看出,外国资本主义是在持续不断地增加对四川的商品输出(见下表):

外国商品对四川输出表

年度	价值(海关两)	年度	价值(海关两)	年度	价值(海关两)
1875	156000	1894	5114013	1899	13075176
1877	1157000	1895	5618317	1900	12918073
1881	4000000	1896	6929393	1901	12598741
1892	5825474	1897	8444081		
1893	4574298	1898	7967012		

从表中可看出,在《烟台条约》签订前的 1875 年,输入四川的洋货总值是 156000 海关两,而到 1877 年,输入总值猛增 6 倍半。进入 80 年代,输入总值增至 400 万海关两。90 年代,输入数值稳步上升,一直达到 1899 年的 1300 万海关两。这一经济掠夺,直接给四川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正在滋长的资本主义萌芽造成沉重的打击。

(2) 外商获得在川投资权利 帝国主义在 19 世纪后半叶已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从 19 世纪末期到 20 世纪初期,外国企业在中国已达到 136 家,资本额已超过 1 亿元。这些外国

企业基本上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19 世纪末,随着国际垄断资本的形成,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向中国西部输出资本。这一过程在四川的发生,比东部沿海地区晚 40 年左右,而资本输出的规模和金额比上述地区也小得多,行业也局限在土产加工和煤铁矿业,对四川经济的影响,比沿海微弱得多。

帝国主义早就垂涎四川土产、矿物资源,1872 年,德国传教士恩伯提专程前往自流井探测盐矿、天然气资源,并将所见情况作了报告。1891 年法国传教士寇德瑞考察了四川石油资源。1877 年以后,英国“驻寓官”开始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第 188 页。

汪敬虞《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 2 辑,上册,第 1 页。

“遍历川省”，调查四川土产资源，为他们资本输出准备条件。

在四川开办的第一家外国企业是英国商人立德设在重庆的猪鬃加工厂。立德洋行于1890年成立后，最初经营航运和进出口贸易。四川所产猪鬃数量巨大、质地良好，其中“大河毛”硬度颇大，光泽较差，用途甚广；“山河毛”质地柔软，光泽甚好。但两种猪鬃均须进一步加工，除去“霉毛”，才能适合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需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立德洋行所属的重庆贸易公司在南岸设置猪鬃加工厂，专门洗制熟猪鬃出口。该厂工人最初是由洋行买办前往天津招雇的10名洗房工人，给每名来川路资银70两，以后每名每月工资银25两，并另雇天津洗房工人用德启为工头，负责工厂厂务。为扩大生产，又招收70~80名学徒，每月除伙食外，只发给洗浆费制钱500文。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立德再次从天津招雇工人10余名，同样带领学徒工作。为提高猪鬃竞争力，该厂规定了严格的质量要求：每长0.25吋为一级品，无短毛，无混杂，洗制彻底，高温蒸制，这样可以保证色泽光洁，毛身挺直，然后按天津装璜，将鬃毛捆扎成直径1.8吋一束，每箱装足关称100斤。立德给这种猪鬃制定商标为“鸡牌”，并很快在国际市场赢得了声誉。在伦敦、纽约市场成为畅销品。为了提高猪鬃产

量，该厂规定每个工人每天必须做足熟鬃关称8斤，不足定额者，轻则责罚，重则开除。学徒3年出师，须评定合格，始得转为正式工人。立德猪鬃加工厂自开办以后，产量倍增，最初每月1000~1500公斤，后增加到2000~2500公斤，最后发展到50000公斤。20世纪初，立德将洋行转顶与隆茂洋行，于是隆茂洋行继续经营猪鬃加工厂。同时，法商安利，德商宝丰、英商怡和等洋行也纷纷设立猪鬃加工厂。宣统元年（1909年），日本新和洋行也开始加工猪鬃业务，各洋行掠夺四川猪鬃出口形成激烈的竞争关系。由是猪鬃输出量猛增。根据重庆海关统计：1892年（光绪十八年），猪鬃输出量为3606担，价值40619海关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输出量为8070担，价值159812海关两，数量增长1倍多，价值增长近3倍。

川江航运业是帝国主义在四川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就企图取得由宜昌经川江而达重庆的航运特权，以实现其开重庆为商埠并进而将整个四川纳入他们势力范围的野心。帝国主义为开辟川江航线，弄险三峡，窥测水道。但是，无论是立德，还是德商瑞记洋行的“瑞祥”号货轮以及英国炮艇“山鸡”、“山莺”号、法国炮艇“奥立”号，均未能开辟出一条可以畅行运货轮船的川江水道。川江险阻，使帝国主义不得不

暂时放弃大规模使用轮船航运的计划。但是,他们转而问津当时在川江担负主要运输任务的民用木船。这种木帆船船体轻巧,每艘载重可达20~30吨,由人力纤引,行动虽缓,却稳妥

实用。洋行投资航运,一般采用租用形式,前根据重庆海关调查报告统计,将1892~1901年10年间洋商租用民船进行货运的只数和吨位罗列如下表:

洋商货运吨位表  
(1892~1901)

年 度	抵埠(进港)		离埠(出港)		年 度	抵埠(进港)		离埠(出港)	
	支数	吨数	支数	吨数		支数	吨数	支数	吨数
1892	1203	33518	676	9776	1897	1444	49036	787	19408
1893	1034	27922	727	11895	1898	1434	48298	681	16877
1894	1180	34134	813	12945	1899	1894	76009	1014	24878
1895	1200	36881	917	17237	1900	1846	62147	835	22715
1896	1279	36500	779	16114	1901	7130	209148	7017	200882

此外,洋行涉足的川江上游航运,开始租用民船航行于泸州和叙府(今宜宾)间,据估计,常年抵埠和离埠民船约750只,运货量约15000吨,同时航行于嘉陵江上常年租用民船约5000只,运货量约80000吨。上述数字合计,洋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川江航运业中,常年租用民船不少于13万只,运货量约达29万多吨。通过这种方式,帝国主义不仅垄断了四川的进出口贸易,获取了巨额利润;而且到20世纪初,除了食盐和茶叶为专卖者所有,其余货物如鸦片、桐油、黄蜡、烟草、食糖、煤炭、生铁等主要通过民船运输,帝国主义通过这种方式夺取了

川江航运权利,扼住了四川与东部省区交通要道的咽喉。

19世纪90年代后期,国际垄断资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四川矿产资源。以英法等国有资本集团为首的外国公司,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始,到光绪三十年(1904年)为止,先后与清廷签订了一系列开采四川矿产的合约,同时不择手段,私下勾结官吏、商人,甚至少数地方上层,订立合同,开采各地矿产。这里爱就所见资料,将各公司与四川签约时间,开采期限、范围、矿藏种类、资本额、承办人等列表如下:

外国公司在四川开采矿产表

国别	公司名称	订约时间	经营期限	承办者	资本额	开采何种矿藏	地区
法国	享达利公司	1892		雷达到		石油	重庆、叙州、嘉定、泸州、自流井、贡井(与私商钟毓灵等签约)。
英国	会同公司	1899.4	50年	摩尔根	1000万两	煤、铁、煤油	全省范围
法国	福安公司	1899.4	60年	余德乐	1000万两	煤、铁等矿	灌县、嘉定、犍为、威远、重庆、綦江、合州、巴县
法国	福成公司	1899		裕富	1000万两	五金矿产	天全、懋功
英国	普济公司	1902	50年	立德乐	1000万两	煤、铁、石油	乐山等8州县
法国	和成公司	1902.9	50年	雷达到	200万两	石油	巴县、万县、富顺
法国	华利公司	1903		代码德	30万法郎	金、铜、煤各矿	巫山、大宁、云阳、开县、万县(与川省管解白蜡委员刘鹏私立合同)
法国		1902				铁路	
英国	江北厅煤铁矿务公司	1904.4	50年	立德乐	50万两		重庆江北厅(1909年赎回)
英国		1906	永远开采			煤	云阳县(与万县刘凤藻订约)
法国		1906				金矿	打箭炉(与少数民族头人订约)

上表说明,从1892年到1906年,英法两国的8个公司与四川有关方面签订了开采矿产合同,主要开采煤、石油等工业燃料和铁、铜、黄金等五金矿藏。合同规定的开采范围广阔,会同公司取得了“全省范围”的采矿权,而其它公司取得了矿藏丰富的一至数县

采矿权;标有投资数者,投资金额从30万法郎到1000万两白银不等,而开采期限长达50~60年,有的甚至规定“永远开采”。

上述合同大部分均是英法等国商人胁迫四川当局,而后由所谓的省矿务总局以保富公司、华益公司等名义

与外国公司签订的。其余4份合同则是收买地方官吏、商人和少数地方上层人士私下签署的。

国际垄断资本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对四川全省矿权的掠夺,是将四川推向半殖民地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英法等资本家与四川矿务总局所订采矿合同,在经济收益方面,英国会同公司作为矿业经营者,在矿产收益中居主要份额,占总收益的65%。而四川当局的收益只占35%,其中包括华益公司提取的5%的地租、5%的落地税和25%“报效中国国家”的部分。在税课方面,外国资本享有特别优惠权,进口机器设备“概不重征”。产品的外运只完纳出口税,内地厘税“概不重征”。这一条款的订立,使外国投资者获得了厘税豁免权,而损害了民族资本的利益。

19世纪末期,外国资本集团在棉纺业方面,有向四川投资的意向。经多年筹备,1898年,川东道黎庶昌在重庆正式提出设立官商合办棉纺厂的计划。这一计划,因受清廷的反对,抽出官股而搁浅。

其次,从1901年开始,日商先后在重庆至家沱设立有灿火柴公司和友邻火柴公司,制造红头火柴,销往贵州。除日商外,德商也于二十世纪初在重庆开设了一家火柴公司。与此同时,日商新利洋行大班宫坂宫伙同买办陈瑶章等,在租界附近开设又新丝

厂,主要股份均为日商所有,进口400余台日本缫丝机器,技术人员均来自日本。在经营管理方面,全按日本办法。全厂有工人400余名,女工和童工过半。

自19世纪末期开始,帝国主义将资本输出的重点转向铁路。1899年,英国的云南公司致函英国外交部,要求支持该公司取得缅甸到扬子江和四川的铁路建筑权。20世纪初,各国正式向清廷索取四川铁路投资权。1903~1904年,美国接连向清廷要求提供的川汉铁路借款,要求承办成都至叙府、成都至泸州、成都至万县3条支线。1905年,四川总督锡良拟定了川汉铁路自办章程,成立了川汉铁路总公司,经清廷批准同意自办。同年,法国驻重庆领事照会四川总督锡良,要求投资建筑并经营管理川汉铁路。德国公使穆默也向清廷外务部提出的川汉铁路“各国人民均应一律同沾利益”。但是,此举遭到四川人民的反对,使帝国主义掠夺四川铁路的图谋没有成功。

## 2 四川近代商品市场的初步发展

(1) 商品市场 19世纪70~80年代,以宜昌开埠为起点,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的商品输出进一步增加,开始深入到川东不少州县。但在重庆开埠前,中外贸易尚不发达。为了便于直接掌握四川市场,自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到宣统三年(1911年)止,



英、法、美、德、日各国相继在重庆建立洋行、公司、酒店、药房 51 家。这些外国机构在四川主要从事进出口贸易，代表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输出商品和购买工业原料。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输出的商品主要有棉纱、生棉、棉布、毛织品、丝织品、煤油、染料、药品、食品、卷烟、火柴、五金制品等。

洋货的输入，以棉纺织品，特别是棉纱，在四川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在 19 世纪 70、80 年代就是主要的输入品，到 90 年代，每年平均占输入贸易总值的 60% ~ 70%。1889 年，销售四川的洋纱 6700 余担；1890 年，激增为 69700 余担，一年之间，就增加 10 倍有奇。1895 年更增至 115000 余担，1896 年增至 16 万余担，1899 年达到 32 万余担，占输出品总额的十分之六七。

洋纱大量销售四川，给四川经济带来很大影响。首先破坏了棉纺织业生产结构，使原来纺与织结合的手工业发生变化，纺纱工业逐渐衰落，终归消灭。由于棉花销路日减，洋纱销路日广，专门经售棉花的花行开始变为棉纱铺，经营洋纱的商人日众，大者形成纱帮，小者称为贩庄。

棉纺织业中，原有的织布工业在 19 世纪 90 年代前，保留下来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却只有转向对进口洋纱进行加工，才有利可图。外国资本主义通过提供原料、掌握价格，

对它进行控制。洋商对洋纱市场的控制和操纵，就实际上掌握了四川棉织业的命运。三台、遂宁地区素为棉花产地，同时也是四川棉纺织业集中区域，洋纱摧毁本地棉花后，这一地区棉织业开始衰落。棉布产量下降到先前的 70%，每年产值从 100 万两降为 70 万两。

洋布的输入虽与洋纱同时，但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洋布的花色、式样尚未符合四川民众的需要，因此一时还未打开销路。四川棉纺织业虽然在洋纱冲击下遭到分崩离析，但在各城市 and 沿大江大河一带地方，织布工业却利用廉价劳动力，全用或部分用洋纱，畸形地发展着。19 世纪 70 年代，重庆已形成进口洋布的水陆枢纽，有商号 30 余家，80 年代达到 60 余家，并形成极为繁盛的布匹交易区，花色品种齐全的数十种英国洋布占据了重庆市场。在广大乡村，技艺落后的织布业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劳动力并不计算报酬，而只是为了求得最低限度的生计，因此尽管受洋纱价格上涨的影响，还是能够艰难地存在下去。整个 90 年代洋布的销售额保持在 50 余万匹至 80 余万匹之间。

棉制品外，其它种类的商品对四川输出情况大不一样。如各种毛织品在四川的销路就有日趋下降之势。在 90 年代初，销售总数即达到 49000 余匹，到 1894 年降为 28000 余匹，1900

年又降到不及 20000 匹。四川人民冬季御寒品习惯用棉布或丝料加棉花制作棉袄,没有穿呢料的习惯;同时,呢料价格高昂,只有城市富商大户才购用。外国毛织品因此未能成为输入的畅销品。

日用品方面,用以制针、钉的铁丝常年输入量约为 1000 担。煤油在 90 年代取得了显著增长 1896 年为 28000 加仑,1898 年上升为 11 万加仑。洋纸的输入也在逐年增加,1891 年输入 99 担,价值 1979 海关两,到 1900 年则增至 1657 担,价值 41846 海关两。在高档商品方面,也有相当的输入。1896 年输入的金银器、钢针、钮扣、钟表、各色瓷器、鱼胶、燕窝、鱼翅、药材、樟脑等进口总值即有 932000 余海关两。这些日用品的输入数,与四川幅员和人口相比较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主要是四川消费水平极低,日用消费品仅限少数官僚、商人和大地主以及部分城市市民,一般人民在微薄的衣食以外,没有能力再向市场购买日用品。

(2)原料市场 与商品输出几乎同时开始的,是外国资本主义在四川收购工业原料的过程。重庆开埠前,四川土产物资只是由“胶帮”、“广帮”商人零星转销国外,并未形成引人注目的市场。1891 年,英国商人立德在重庆设立立德洋行,主要从事中国土产品收购加工出口业务。继立德洋行之后,英国太古、隆茂、白理洋行、法国

东方、利昌、吉利洋行,德国瑞记、宝丰、森村、福记洋行等相继设立。“这些洋行多半是以经营山货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其中包括猪鬃、各种动物皮、禽类羽毛、肠衣、生漆、白蜡、蚕茧、生丝、牛骨、棕丝、五桔子、芋片、青麻、桐油、牛油、人头发等数十种土特产品,还有多达 250 种以上的药材。1891 年 4 月,英商太古洋行使用的第一号挂旗木船,运载四川白蜡、黄丝出口,同时,英商立德洋行雇用的挂旗木船由宜昌运载煤油来重庆销售。从此洋行开始大规模收购四川土产原料的活动。

随着四川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为洋商服务的买办行业也出现了。为了熟悉市场,掌握行情、掩护身份、媒介生意,这些洋行大都雇佣中国人替他们办事。如“立德洋行”1890 年开设之初,就雇佣三个中国买办,一个是大写卢序东,广东人,是随立德由上海来重庆的,月薪 50 两银子;一个是二写阎春荪,宜昌人,月薪 30 两银子,后任怡和洋行买办;还有一个是三写周云浦,重庆人,月薪 25 两银子。这些买办在同外国商人合作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特殊身份和经济实力的买办阶层。

外商在四川收购原料的过程中,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手法:

第一,他们对四川的经济情况有着周密的调查,其中包括自然环境、土

产资源,农业和手工业产品、市场物价、交通运输等基本方面及其变化情况,掌握了大量细致入微的材料和统计数据,从而对于他们向四川输出商品和掠夺原料两方面,均能做到准确无误。在对四川蚕丝资源调查之后,他们认为:“在桑树种植上只须稍加注意就一定能发展川省的产丝能力,如果当地缫丝方法改良,更好的质量必定出现。”对于西藏与四川的贸易情况,他们最为留心,认为麝香和羊毛是极有价值的两项土产。

第二,他们把四川原料源源不断地输往国际市场,使四川与国际市场密切联系起来。蚕丝为四川土产输出的大宗,19世纪90年代,四川全省蚕丝平均产值约为350万两,输出量即占半数。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1893年,四川商务总办曾向川东一带发放优质桑树秧苗;意在改进当地生产,不断提高蚕丝的产量和质量。四川桐油自19世纪70年代、80年代,即开始“整批输入美国”,此后美国成为四川桐油最大的销售市场。四川输出的药材达250余种,其中,大黄“销路甚旺”,成为外国市场上的热门货,被殖民主义者认为“是最有用的一种”,因而蓄意高价收买,以刺激大黄生产。四川猪鬃是日美市场的畅销货,1884年,重庆汉阳帮振记字号开始将白毛加工制成“洋装”出口,但加工欠佳,不能达到优质品的规格。于是重庆英商

立德乐洋行专司设立加工厂对猪鬃进行清洗整理,很快适应了国际市场的质量要求。西藏和四川西部羊毛深受美国商人欢迎,多运往美国,用以织毛毯。为了增加羊毛供应量,他们调查了这一地区的羊毛产地,认为产量还能够无限增加,对于供应量充足的鸭毛,经过加工后,质量优良,在外国市场上成为畅销品。甚至于华阳县出产的不大引人注意的草帽辫,也为英国商人所重视,提出“只须把辫法稍加改动,就可使出品处于竞争地位。”

第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商在四川鼓励鸦片出口的手段及其后果。四川的鸦片生产,是外国殖民主义者带来的一大祸害。洋商得到了自由输出四川鸦片的特权,他们凭借一纸子口税凭证,向中国各地乃至向海外输出鸦片,而不受限制。据重庆海关税务司霍特森估计:“在四川省内出产的大量鸦片(我估计每年为十五万担)中,55%完纳厘金出境供其他各省消费,约12%向海关报税运出,其余33%在本省消费了。”这个销售统计反映了鸦片的流通情况。洋商虽在四川鸦片贸易中所占份额不大,但他们在子口税制度保护下,将鸦片运往东南各省销售,以谋求暴利。这就必然助长了鸦片在全国范围的泛滥。

根据重庆海关的调查,种植鸦片的平均收益比种植小麦、水稻等主要农作收益高80%,这就给放弃粮食作

物和其它经济作物的种植而改种鸦片提供了强有力的利润刺激。川东各县特别是重庆与万县间的涪州、忠州、丰都、梁山、垫江、邻水、大竹、新宁(今开江)、绥定府、东乡、巴县等成为鸦片的主要产区。其中,巴县在鸦片生产和消费方面均居首位。其次,产区还逐步扩展到永川、荣昌、隆昌、富顺、大足、遂宁,川西南的叙州府、永宁(叙永),甚至川西北的松潘厅也大量生产。鸦片进入四川商品市场后,外商在谋取暴利外,还庇护中国商人走私鸦片。鸦片的泛滥,使四川商品经济向畸形发展,并造成烟毒泛滥。据局部地区估计,每二名男子中就有一名是瘾民,甚至妇女中也有大量瘾民。

外国资本在四川掠夺工业原料的情况,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据重庆海关出口主要商品的统计数字。

从蚕丝和蚕茧的输出看:1892年蚕丝出口总额为13507担,其中废丝8268担,蚕茧出口总额562担,其中废茧298担。此后蚕丝逐年输出量不足50%,蚕茧输出却直线上升,到1901年蚕丝总额为7023担,其中废丝797担,蚕茧总额11346担,全为废茧。这个统计数字表明:1.作为半成品的蚕丝出口在逐步下降,而作为原料的蚕茧出口却在大幅度增加;2.无论蚕丝或蚕茧,大部或全部作为废品出口,以极低的价格向外国资本主提供丝织原料。

其他原料的输出情况:

猪鬃,1892年为3806担,1900年达到9284担,到1901年为8070担;

白蜡,1892年为8390担,1899年达到17193担,1901年为10356担;

羊毛,1892年为10478担,1897年达到23696担,1901年为16824担;

铅,1895年首次输出1000担,1897到17352担,1901年为8908担;

青麻,1892年为9365担,1897年达到13549担,1901年为12594担;

大黄,1892年为4622担,1898年达到9839担,1901年为5760担;

五倍子,1892年为8159担,1895年达到17317担,1901年为9287担;

麝香,1892年为46328两,1896年达到53490两,1901年为46342两。

上述原料的输出额以1892年与1901年相比,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增长最大的是猪鬃和铅。猪鬃增长2倍左右,铅增长8倍。其余几种,幅度增长不大,而且往往呈现波动状态。白蜡增长23%,羊毛增长61%,青麻增长34%,大黄增长25%,五倍子增长34%,麝香的增长不到10%。多数土货输出量不大的原因是复杂的,它受生产、运道、市场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曲折的增长。

有关四川向国际市场输出原料的总额,由于清代对外贸易管理上的混乱,无法求得一个比较确切的数据,这里依据重庆海关统计的1892~1901

年由重庆输出的货物总值(鸦片除外)略窥其豹:

重庆输出货物总值表

年度	海关两	年度	海关两
1892	2604500	1897	4325713
1893	3135776	1898	3693510
1894	3413900	1899	4610822
1895	3521563	1900	3398008
1896	3506387	1901	4837178

从输出货物情况看,1901年比1892年10年间增长85.7%。这表明由于四川环境闭塞和交通运输的极其困难,外贸的发展远不如东南沿海地区兴盛。

### (3)农产品商品化

辛亥革命前,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十分缓慢;但又出现了农副产品商品化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的走向受特定的内外动因所影响。

推动农副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原因,除本省手工业发展、城镇人口增长、赋税的货币化这些重要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因,人口增长的压力,这一内因在四川地区十分突出。

清初,四川地广人稀,施招民垦荒,人口日增。乾嘉时,人口的增长已超过耕地增长的速度。辛亥革命前,四川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宣统二年(1910年)全国耕地面积约145523.6万亩,人口约

36814.7万人,人均耕地面积约3.95亩;而同期四川耕地面积约为9102.1万亩,人口5021.7万人,人均耕地仅1.81亩,仅及全国平均数的1/2。以清末民初四川部分州县人口、耕地情况来说,人均耕地稍多的州县不过2亩余,少则不足1亩。人多地少成为四川农村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给农村经济造成了压力。

人口急剧增长造成了对社会经济的压力,苛繁的封建剥削,使这种压力不断加重;矛盾尤为突出。鸦片战争后,清廷对四川人民的压榨日趋厉害。仅以清廷的税收为例:鸦片战争前,川省田赋杂税约征库平银180余万两,到宣统三年(1911年)已达1730余万两,净增8倍多。其中田赋一项,由原来的66万两,增加到430万两,净增5.5倍。加上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广大农民负担日益沉重。沉重的人口压力和苛繁的封建剥削交织在一起,迫使农民不得不在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及其它方面找寻出路。

种植粮食和种植经济作物相比,在清代后期收益大有差异。《绵竹县乡土志》对种植粮食的收益作了如下估算:该县人口218581人,耕地573186亩,人均耕地2.6亩。上田一亩年产粮食约值钱10千文,中下田产粮食约值钱6000文。全县合计4105500千文。绵竹县人均耕地2.6亩,高于全省人均耕地数,以全县人口

均分“一人一岁约得钱十七千零,仅给衣食。”

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超过种植粮食。如种蔗制糖“利常十倍”。种烟叶“过稻麦五倍”。南川县农民除种植粮食外,“专力经营获利者”,有烟叶、蓝靛、药材等。井研县农民植桑饲蚕,出售生丝。

清代后期,甘蔗、烟叶、麻、药材、水果等经济作物都有不同程度的商品化发展。以甘蔗烟叶为例:川省产糖盛地内江,在鸦片战争前,该县农民就“尤以甘蔗为务”,到清末民初达到极盛时期,种蔗面积约20万亩,年产蔗糖达89万担。南溪县种蔗,清初由广东人传来,经百年时间,已为该县经济作物大宗。资阳县在咸丰时才广种甘蔗,清末民初也成为重要的产糖区,年产糖约30万担。其他如富顺、资中、简阳、荣县,都是重要的产糖区。一些原不产糖的州县在清后期也开始种蔗制糖。据估计,清末民初川省产糖最盛时年约300万担,种蔗面积约60~70万亩,除供本省消费外,还远销鄂、湘、赣、苏、皖、豫、陕、甘、云、贵等省。再如烟叶,在清中叶,烟叶种植已在四川推广,郫县、什邡等县均为著名产地。清末民初原有的产地仍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商品量也随之增长。郫县烟草销本省及湖北,交易额达数十万金,什邡销售额每年也有数十万金。南溪县清末民初每年运销外地达60

万斤。新都县在嘉庆时还不产烟,到清末时每年约1万石有奇,行销本省及云贵;辛亥革命后产烟达30万石。1914年统计,全川种植面积为46.4万亩,产量120.2万市担。辛亥革命后产销最旺时,产值达200万两,输出在100万两以上,远销陕、甘、云、贵、新疆、西藏等地。

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外部条件是外国资本主义掠夺原料,推动了农副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最为典型的的就是蚕桑业和山货业。

蚕桑业在四川历史悠久。到了近代,由于生丝出口而得到迅速发展。1871年,川丝6000包首次从上海出口国外,在东南沿海和国际市场与浙江丝竞争。1891年重庆开埠后,出口生丝逐年递增。1891~1895年平均每年出口价值为888933海关两,到1911~1915年平均每年为3707792海关两,20余年间增加了3倍多。农村蚕桑业在清末民初随着生丝出口出现空前兴旺的局面。原来的蚕桑基地产量上升,达到鼎盛。南充最初产茧7000担,最盛时产21000担。西充产茧量在清末民初比南充多,约40000担。尤其原来不植桑养蚕的地区如新都、中江、川东江北厅、巴县、三台等地也纷纷发展起来,三台县到20世纪初一跃而为川省丝业中心。据1911年调查统计,全川种桑已达2600余万株。全川生丝产量最盛时约40000担,出

口 25000 担 ,内销 15000 担。

自 1890 年外国洋行在重庆收购土货土产以来 ,山货土产出口品种由最初的数种增至 30 余种 ,数量急剧上升。以经重庆出口的猪鬃、熟皮、生牛皮、羊皮、木耳、五倍子、大黄、麝香、未列名药材等 9 种为例 ,1891 ~ 1895 年平均每年出口 112 万海关两 ,到 1911 ~ 1915 年平均每年出口 578 万海关两 ,净增 4 倍。在经重庆海关出口的货物中占比例由 28.8% 上升至 45.4% ,居出口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也有一些传统经济作物因外货冲击而日益衰败。

川省产茶有悠久的历史 ,历来行销川边藏区和西藏。清嘉庆时每年运销藏区达 615 万公斤 ,光绪年内减至 550 万斤。主要原因是受到英国控制的印度茶叶的打击。其余如红花、蓝靛、白蜡等如日益衰败。这表明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已经对四川的农产品商品化起着决定其兴衰和发展方面的作用。四川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直至辛亥革命前后 ,也仅仅相当于 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全国平均水平 ,远远低于同时期全国农产品商品化的平均水平。

总之 ,近代四川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是缓慢、畸形的。一旦内在的压力超过小农的负载能力 ,外因的刺激发生了变化 ,农村经济就可能衰败。

### 3 四川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

(1)近代工业的产生 帝国主义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开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 ,加剧于 90 年代 ,晚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大约 30 年 ,因而 ,原来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 ,在这期间 ,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旧有的手工业工场生产规模空前扩大 ,生产技术日益改良 ,劳动过程分工较为细密 ,资本的积累达到相当的程度。外国资本主义进入四川后 ,在棉纱、棉布等洋货冲击下 ,四川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和与此相关的手工业生产 ,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是 ,在洋货未能取代土货的那些领域或土货在对外出口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那些行业 ,资本主萌芽不仅未遭到扼杀 ,而且进一步发展 ,有些原来的手工业工场开始向近代工业转化 ,还有的在手工业工场物质技术基础上开办的部分新式企业 ,成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的一个途径。

在外国资本主义直接作用和影响下 ,出现了一批新式工业 ,如棉织业适应洋纱的大量进口 ,形成大量的棉布加工业。猪鬃、采矿、制革等业 ,则适应国际资本主义市场对猪鬃、皮革、五金矿产的需要形成新式工业 ,而火柴、电灯、玻璃、肥皂等制造业 ,则受到西方生产的影响而兴起。

19 世纪中叶 ,四川部分手工业作坊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 ,在不同程度

上具有了手工工场的基本要素。19世纪70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四川,对四川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了一定程度的分解作用。但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外国资本主义对四川的商品输出活动十分有限。相反,由于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日趋活跃,给四川食盐、生丝、蔗糖、造纸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造成了比较有利的客观条件,促使这些手工业作坊向新式企业转化,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井盐业看,在19世纪中叶,由于井盐生产工艺的进一步革新,深井浓卤和天然气资源的开采,使井盐业生产力获得了奇迹般的提高,每井日产卤水高达数百斤至千余担。不少井,每井产天然气可供数百口盐锅制盐。与此同时,由于太平天国占据长江流域,淮盐不能上运,川盐取代了淮盐在两湖的广大销区,给井盐生产以强有力的刺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销售量的激增,造成了全川各盐场井在数量和盐产量的直线上升。到20世纪初,有盐井100814眼,灶7943座,锅25913口。与道光初相比,井增10倍有奇,灶增百倍有奇,锅增近5倍。从产销总量看,清代前期核定的产量总额为,水引10027道,陆引130000道有奇,折合食盐650万斤。但到19世纪70年代,全省年产销总量达7670水引,折合食盐8亿斤有奇。其中:富荣

盐场占全川1/2以上。在此过程中,盐业资本得到迅速积累,表现在各大盐场生产规模空前扩大。劳动分工日益细密,雇佣劳动的发展、商业资本大量转化为盐业资本,盐业资本集团的涌现等几个方面。随着生产的日益社会化,盐业资本原始积累的实现,市场的大规模开拓,生产和流通渠道的畅通,说明四川井盐业已经具备了工场手工业的基本要素,进一步向资本主义发展,是它的历史趋向和基本要求。

从缫丝业看,19世纪中叶,四川蚕丝的生产已相当普遍,劳动规模扩大,分化出缫丝、洗涤、漂白等专门工序。成都、嘉定、顺庆、重庆缫丝工艺水平较高,已能生产各具特色的生丝。川丝成为本省和南北各地丝织业的重要原料而畅销于国内市场。丝商资本已进入生产领域,通过定期收购生丝和借贷“丝黄钱”控制生产。资本主义因素获得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蚕丝进入国际市场。到光绪六年(1880年),四川缫丝作坊和手工工场达到2000家,年产生丝6000担,居当时全国各省厂家第3位和产量的第5位。但四川蚕丝,由于质量不合国际市场要求,大多作为废茧、废丝出售,价格低廉,使四川蚕丝生产遭到很大损失。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四川开始出现蚕丝生产技术改革的热潮,其主要标志是:改进缫丝方法,制造优质丝品,建立“蚕桑公社”,扩大蚕



桑种植面积,引进优良桑苗、蚕种等。在蚕丝生产技艺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四川缫丝业在产品质量、生产规模、投资、经营方式方面,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四川蚕丝质量也显著提高。

由于蚕丝销售市场日益扩大,种桑养蚕、缫丝技艺普遍精良,维护缫丝业的利权,成为振兴实业的一个热门。从19世纪晚期,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涌现了三台县永靖祥丝厂等30多家脱胎于旧式缫丝工场、作坊的新式缫丝企业。这些企业均采用新式缫丝技艺,仿制日本、意大利等国缫丝新车,着重训练熟练劳动者,因此能缫制出高质量的生丝。

从制糖业看,19世纪中叶,蔗糖生产技艺有了明显的进步,劳动过程实现了专业化分工。迄于20世纪10~20年代,四川蔗糖并未被洋货所取代。相反,由于商品市场的扩大,蔗糖销路更为广阔。除在本省销售外,还通过水路运往湖北。内江、资中、资阳、富顺等县所产桔糖、红糖、白糖有的销往沙市、汉口,有的在本省销售。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蔗糖产地从传统川中各州县扩大到川西之邛州、蒲州,川东的达县、开县、万县。仅传统蔗糖产地内江在极盛时期就有糖坊、漏棚3000多家,川东地区糖坊、漏棚数量达100家以上。虽然多数制糖方法陈旧、粗糙,但也有一部分糖坊生

产工艺、设备开始进行改进,专业化程度提高,经营方式起了显著变化。首先是将分散碾制蔗汁这一工序集中于糖房,与专门制作蔗糖的熬房组成互相衔接的生产过程。其次,生产工艺和设备进一步改进,将石碾改为带齿轮的大型石滚联动系统,这样适应了大批量生产的要求。制糖工艺水平提高,专业化分工得到发展,糖坊向手工业工场演变。由于销路和利润均有保证,因此,19世纪晚期,糖业资本的增值极为可观。

从造纸业看,19世纪中叶,造纸作坊和手工工场已极为繁盛,分布全川10余县,尤以夹江、梁山、绵竹、大竹、达县、广安、綦江、璧山等县最为重要。19世纪晚期,夹江出现了生产规模较大的“丰裕者”,他们资金雄厚,技术高超、雇工操作。与此同时,夹江纸厂遍布县西南及洪雅与峨眉毗连山区。由于造纸技术的提高,四川夹江等县所造的“优质之纸”驰名国内,纸品种类甚多,按尺寸划分,有大纸、小纸。大纸有对方、水纸等;小纸有贡川、川连、印纸、黄连等。制造这些种类繁多、质地良好的纸品,对原料选择,制作加工方法,都很考究,劳动过程实现了严格的专业化分工,每道工序,都有一套独特的技艺,与其它工序互相衔接。销售渠道也不再局限本地,与全省和全国许多地区建立了网点,夹江纸除本地纸市,沟通本地与省

内外销地的行商,分为经纪、纸贩、纸铺、本地贩运商与外来采购商5种。除销售本省主要州县外,还远销陕西、云南、贵州等省。绵竹纸除销本省,还销往云、贵、陕、甘、湖广等地。

迄止1911年,四川大约创设造纸厂、造纸公司7家。这些企业除直接由官僚、商人在成渝新设而外,其余各厂均分布于夹江、彭县、梁山、忠县、铜梁、嘉定等传统造纸地区,主要是在原来生产水平上改良和提高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虽然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向四川进行商品输出和开始资本输出,但由于四川与外界交通困难,其冲击力远不及东南沿海地区。在那些洋货尚未取代土货的地区,或土货适应国际市场所需的行业,部分旧有的手工工场和大作坊,反而出现了继续增长的趋势,资本主义趋向是比较明显的。

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四川地区出现了一批与旧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割断了关系或根本没有关系的新式企业。这些企业直接受到国际市场、资本与技术的刺激和作用而涌现出来,形成新式企业。

如火柴业,这是四川开办最早的新式工业,从1889~1911年四川先后建立的主要火柴企业有森昌正、聚昌火柴厂,由川商卢干臣、邓徽绩、建商黄龙章合资兴办,两厂资本前后达80000两,最盛时年产火柴126000箱,

两厂雇佣工人数百名。火柴生产过程虽有若干工序,但由于全部是手工,效率并不高。后来,厂商改进生产,使经营情况发生了变化。19世纪末,森昌正、聚昌两厂开始在川滇黔边建立分厂,1900年,获准在滇黔交界处各设分厂1所。同年在重庆设同德立火柴厂。1901年在泸州、嘉定增设1厂。20世纪初,厂商又在重庆添设5~6厂,每厂日出火柴200余箱,销路极畅。森昌正、聚昌火柴厂以其巨大成功,先声夺人,取得了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的优势地位。其余还有1900年开办的立德燧火柴厂、1902年开办的丰裕火柴厂、1901年开办的信诚火柴厂、1902年开办的溥利火柴公司、1907年官办的惠昌火柴厂、1913年开办的协义火柴股份有限公司。迄止20世纪初年,四川开设9家火柴厂,其中重庆6家,日本公司2家、德国公司1家。四川火柴企业基本上发展完善,较稳固地占据了四川火柴市场。

又如棉织业,20世纪初,织布业获得了显著的增长,其主要表现在织布机的改良。19世纪末叶,四川由湖北等省引进扯梭木机,其效率增大1倍,织成的布匹较宽,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使棉织业出现了投资热潮。璧山张某集资数万设织造厂,购买机器80台。泸州购织布新机5部。铜梁罗某在县属某场集资设厂,招工试办。迄止1911年,四川新式棉织企业共有

21 家。

新式棉织企业虽然分布在省内不少地区,但主要厂家集中于重庆。因为棉织业所需要的原料(洋纱)和生产设备(新式织机)来源于长江中下游,由长江水道输入。作为近代四川水陆交通枢纽的重庆,自然成为棉织业厂家的聚集之地。

新式棉织企业的规模,一般有新式扯梭木机数十架,少数企业达到数百架;使用织工数十人,少数达数百人。企业资本既有集股合营,又有独资经营,资本额一般为数千元,很少上万元。有代表性的企业有吉厚祥布厂、裕源布厂(渝济公司)、昌华(振华)毛葛巾公司、幼稚染织厂、富川布厂、复原布厂、谦复恒宽布厂、裕华染织布厂等。新式棉织工厂的大量出现,造成了棉织工业的畸形繁荣。根据民国初年统计:上海棉纱每年销入四川 30 余万包,这些洋纱作为四川,主要是重庆棉织企业的主要原料,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四川棉织工业的盛衰存亡,造成了四川棉织工业的不稳固性。

又如采矿业,根据 20 世纪初有关统计,仅盐源金矿 1 处,即有矿工 110 家;白水江流域金矿,仅金沟 1 处,有棚户 20 余家。四川金矿多在川西北、川西南山区和河道冲积处。由于矿石、沙砾含金少,开采纯用手工,提炼技术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其他如冶铁业、煤炭业也多为资金微薄的小生

产。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开始掠夺四川矿权,四川商民、官绅为挽回利权,开始兴办五金煤炭各矿。1894 年春,重庆商民凑集 700 股,约合银 30 万两,准备开采川西各矿。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开始集资开采川西五金各矿。因此,四川采矿业中,出现了一批新式企业,诸如官商合办冕宁金矿、彭县大宝山铜矿、商办江合煤矿等,这些采矿企业在生产技术方面,主要引进外国机器采矿设备,采用新式生产方法。企业投资来自官僚和商人,经营方面采取官办、官商合办、商办 3 种形式。这些企业均为独立办矿,不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但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多数企业最终办不下去。

再看玻璃、化学工业,19 世纪 90 年代初,四川已有 7 家工场,每家雇工约 80 名,使用卵石粉、石灰、木炭末、木末和硫酸盐作原料,技术水平不高,产品为普通、脆弱的制品,但也在全省行销,工场间还相互竞争。20 世纪初,仅重庆玻璃厂已有 10 余家,年产值 30000 余两。1905 年开办的东华玻璃厂,资本 20000 元;1906 年成立的惠昌玻璃厂,资本 32000 元。根据 1907 年统计,川省其它一些地区也能制造玻璃。巴县有玻璃厂 10 家,每厂 2~3 炉,每年生产玻璃 26 万斤,值银 2 万余两。在诸多玻璃企业中,1906 年由江津人何鹿蒿创办的鹿蒿玻璃厂为近

代玻璃制造业中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该厂有仿日圆炉 1 具,石质坩锅 5 口,从日本进口各种模具、机床等。1911 年,加筑圆炉 1 座,并添坩锅 6 口;使产量增大 1 倍。厂里聘请日本技工,招收学生 40~50 人,后来发展到 100 余人。主要产品有压机所制的杯盘、灯具等日用品,人工吹制的各种瓶罐,手工花瓶、茶杯等,销路极好。除在本省销售,还销往云南、贵州、湖北诸省。清末成渝二地举行商品赛会,该厂产品均获金质奖。1911 年,出口参加巴拿马博览会,又获一等奖。

除玻璃工业外,还有部分化工企业如瓷器、樟脑、制酸、制碱、肥皂各业在四川开办。如川南瓷业公司、乐山嘉裕碱厂、洋合公司、官办裕德肥皂厂、重庆商办祥合肥皂厂等。

(2)官倡官办企业的兴办 四川近代官办工业首倡于洋务运动,继行于维新运动,勃兴于光宣新政。其间,先后在川任职的张之洞、丁宝楨、鹿传霖、锡良、岑春煊、周善培等尚能明察时势,求富自强,积极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举办了不少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企业。

印刷业:19 世纪 70 年代初,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提倡通经读史,开办尊经书院,四川学风一时大变。张之洞以白银 300 两,资助周达三志古堂扩大印书业务。志古堂先后刻印《说文

解字》、《玉海》、《十七史商榷》、《读通鉴论》、《读史方輿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文史通义》等百余种重要典籍。由于版本精善,校勘认真,志古堂在成都印刷业中声誉卓著。光绪八年(1882 年),吴绍伯在桂王桥南街开办石印和照像业务,所印《四川盐法志》插图极为精美。光绪十年(1884 年)樊孔周等在学道街开办二酉山房,转贩江浙刻本,代销商务印书馆、点石斋、扫叶山房图书。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以后,上海铅石印、铅印新版书在成都大量流行,上海商务印书馆率先在成都青石桥北街开设分馆,主持人朱锦章善于营运,所印新书销路很好。中华书局于 1913 年在成都卧龙桥开设分店。稍后,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在成都春熙路、祠堂街均设分店。

1884 年,川省书商裴子周开办铅石印书店绿海山房于成都东御街,其重要业务是以蜀版书贩远上海交换洋版书。宣统元年(1909 年),四川官办木刻书店存古书局开办,大量印行锦江、尊经书院原刻典籍,并于成都学道街开设书店。

机器印刷业始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由童某由上海购回小型铅印机 1 台,在三道会馆开办文伦书局,曾代印《蜀报》创刊号,刻印《新政应试必读》6 卷。光绪三十年(1904 年),官办铅印官报书局设立,初印《四川官

报》,后增加印书业务。民国初改名四川印刷局。商办木刻铅印企业还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办的福昌印刷公司,1912年开办的聚昌印刷公司以及随后开业的日新印刷公司。这些企业规模虽小,有的技术却很先进,如日新公司,已能照相制版。

造币厂:造币厂的前身,是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楨创办的四川机器局。机器局进口英、德等国机器,生产新式枪炮弹药。19世纪末,机器局开始生产银元,铜元。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总督奎俊委任机器局总办赵鸿猷兼任银元局事务,由德国进口制造银元机器设备,在机器局设计银元样币。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式铸造。银币种类有龙大元、伍角、贰角、壹角、半角。造币厂原料由藩库、盐库指拨,成品在成都总府街设立四川银元总局兑换,银元兑换银锭,银元作71钱计换,每10枚银元付给银锭贴水3分。造币厂还铸造藏洋、当十、二十铜元等。

劝工总局: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川督岑春煊奏准在成都创办劝工总局,局址在旧皇城后事门内东侧宝川局,委任原成都府沈秉堃为督办,有员司30人,先设正副厂,后设织造厂及东区外厂区。内分刺绣、染织、陶瓷、卤漆、竹丝、丝棉、麻织等30余个生产项目,改良工艺20余种,先后培养熟练工人2000余人,并兴办各厅州

县劝工局54处。

劝工总局所开办各厂,意在“养民”、“靖乱”专门接纳穷民、游民,劳动者多从事传统手工业生产,并未倡用先进技艺。但开办后,成效日见显著,仅官纱一项,已行销本省,且轻细缜密,鲜亮夺目,价格便宜。比较畅销的还有布匹、绢扇、毛巾等。

官商合办乐利造纸公司。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由劝业道沈秉堃发起,开办乐利造纸股份有限公司,资本60000元,采取官商合办方式,每股50元,共1200股,周年行息6厘,一切章程均照商律。公司一切办事权归总理,总理及各司事人员由董事选派,而董事由股东选举。

公司选派学徒6名赴日培训,并购办机器,延聘总工程师1人。因股本不足,由商务局、劝工局附入官股400股,又由股东会议续招商股400股,合计800股,40000元,新旧股合计100000元。乐利公司生产“着色洋纸”,承造8种公牍纸张和四川暗记官状格式,劝业道已定价值,公牍纸每张25文,官状格纸每张30文。

(二)观念更新—改良思潮的传播与维新运动的发展

19世纪后期,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出现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和意愿的资产阶级变法维新思想。由于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国内社会危机的加

剧,从中法战争以后,这种变法维新思想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引人注目的思潮,至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这种思潮便迅速演变为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政治活动。

### 1 尊经书院的创办与蜀学的勃兴

(1) 尊经书院的创办 1873年,清廷派张之洞为四川学政。张之洞到任后,目睹当时文化教育闭塞、沉闷的状况,提出振兴蜀学,磨励人才,并倡办尊经书院。

先是,同治十三年四月(1874年5月)川籍洋务派官僚、工部侍郎薛焕丁忧回川,同一些著名官绅投书总督、学政,请建学院。这一建议引起张之洞的注意,他以振兴蜀学、改革教育、培育人才为己任,与总督吴棠奏请清廷,筹措资金,择地新建尊经书院。

光绪元年(1875年)春,尊经书院落成,规模宏大,堂室宽敞,中门匾额“石室重开”四个大字,大门两侧有“考四海而为雋,纬群龙之所经”的对联,反映了尊经书院的办学宗旨和特点。尊经书院按照张之洞读书、育才、绍先哲、起蜀学的办学方针,从师长的择聘、学生的招考选拔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制定,均极严肃认真。

书院分经术、词章两科,学生由学使选拔,在全川科岁两考中,选拔各府县名列前茅的生员入院学习,学生定额100名,不足额则举行甄别考试加以补充。书院首批100名学生是从全

省30000余名生员中择优选拔。院生每月有膏火银3两。院内课税和考试制度严格,按月行使堂课,由山长主考,第1名给奖金银3两。定期举官考,由总督、藩台及成都知府轮番主持,第1名给奖金银10余两。

尊经书院特别重视师长的择聘。书院分东、西、上、下四斋,每斋设斋长1名,辅助学生。山长总揽全院行政讲学一切事务,下设襄校工人为助教,山长出缺,由襄校工人主持院务。山长由总督、学政礼聘,先后在书院担任山长、襄校、主讲的著名学者有薛焕、钱保塘、王闿远、薛华墀、伍肇龄、刘岳云、宋育仁、杜嗣兰等。

尊经书院始终坚持笃学、崇实、戒浮之风,以培养博学、通识致用之才为教学目的。在教学内容方面,尊经书院反对将读书作为制艺八股应试阶梯,要求士子“首励廉耻,次励以读有用之书”。张之洞提出:“经史、小学、舆地、推步、算经、经济、诗、古文辞皆学也。”同时指出,通才和各类专才都是有用之才,应根据士子秉赋的不同,确立不同的培养目标,更易成长。为使士子找到读书门径,专门编著了《书目答问》和《轺轩语》两书,广为散发。《书目答问》是张之洞为士子开列的读书目,共列举经、史、子、集各类图书2000余种,未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录》,以展示清代学术源流。《轺轩语》是张之洞在四川各府州县考之后,

对各地生员所写的赏罚教戒之语,其中颇多读书成长经验之谈。为了保证书院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张之洞还为学生制定了18条章程,规定学生要遵守“本义”、“定志”、“择术”、“务本”、“知要”、“定课”、“用心”、“笃信”、“息争”、“尊师”、“慎习”、“善诱”、“程功”、“惜力”、“恤私”、“约束”、“惜书”、“释疑”等条规。

在尊经书院各时期的山长中,对尊经书院影响最大的要算湖南籍学者王闿运。1878年底,川督丁宝桢5次函约他到川担任尊经书院山长。到院后,他除管理院务外,还主要讲授“公羊”今文经学。他强调要以经、史、词章等实学来教育学生,分科授业,按时讲解,严格要求。

王闿运之后,其他山长对尊经书院的发展也有贡献,特别是宋育仁影响突出,在他任山长时,尊经书院成四川维新运动的一个基地。

(2)今文经学的发端 1840年以后,社会进入中国激烈动荡时期,传统儒学中的今文经学派重新活跃起来。龚自珍、魏源等一批学者,面对社会的激烈变化,产生了对民族、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特别关注的使命感。由于他们的提倡,今文经学展现蓬勃生机,引起学术界的浓厚兴趣。今文经学在近代的发展为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

尊经书院要求学生抛弃门户成

见,广泛吸收古今的一切有用的学问,成为通才。张之洞认为:“学术有门径,学人无掌援”,鼓励学生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诸子百家学问,取长补短。与此同时,尊经书院又提倡疑古批判精神,敢于向陈说挑战。王闿运为晚清今文经学家,他精习春秋微言大义,笃信公羊改制之说,又擅长庄周笔意,为文汪洋恣肆,曲直而达于理,其论著新颖而富有启发性,在他的影响下,院生廖平通晓古文经学,著有《今古学考》、《续今古学考》等著作,力辩古文经为伪学,今古经为孔子真传,这些著作作为近代改良维新思想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武器。

廖平,字季平,号四益,又号六译,四川井研县人,生于咸丰二年(1852年)。幼时家贫失养,勤奋好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参加县学考试,“技置第一,补县诸生”。光绪二年(1876年),以优等食廪饩,选拔到尊经书院深造。光绪五年(1879年)中乡试第二十四名举人。这一年,湖南学者王闿运主讲尊经书院,使廖平深受教益,改变了读书和治学的方法。他明白了经学的门户虽由小学始,但不得以小学终,于是决心研习《春秋公羊传》。他经常向王闿运求教,二人论学,有时通宵达旦。廖平“拙于言”,但勤于思索,敢向陈说挑战。

19世纪80年代,廖平先后刊行《谷梁集解纠谬》、《公羊何氏解法十

论》、《今古经学》、《知圣篇》、《辟刘篇》、《续今古学考》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他提出“礼制”是划分今、古文经的标准。廖平突破了前辈经学家皓首穷经,人云亦云的死胡同,而将经学的探讨推进到政治制度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当洋务运动失败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正在觉醒的中国知识界急于解答的问题。廖平的今古学观的问世,为近代改良主义和维新思想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廖平提出古文经为刘歆伪托的,今文经才是孔子所作,因此应当尊今抑古,托古改制。他使今文经学具备了新的现实意义,他的学说,在顽固守旧的封建卫道士眼里,有如洪水猛兽,引起激烈反对。光绪十五年(1889年),他被罢去四川绥定府教授职,但是他的学说却不胫而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霹雳前之特异的电力”。近代维新运动的主要代表康有为,就是在他的今文经学的思想启发下,写出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篇巨著,为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 2 西学的传播与川人的维新运动

(1)西学与四川知识界 当廖平在经学中探求经义的奥微时,宋育仁则踏上了向西方学习,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历程。

宋育仁,字芸子,一字芸崖,晚号道复。咸丰七年(1875年)生于四川

富顺县。双亲见背,幼年失养,天资聪颖,勤奋好学。15岁应童子试,得张之洞赏识;“以高材生调尊经书院肄业”,是尊经书院的优秀学生,被誉为宋玉再生。

晚清中国内忧外患交织,列强侵华,蚕食鲸吞,边疆危机;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会党教派不断起事。清王朝面临覆灭的危机。怀着沉重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竞相寻求对策,要求改良变法。宋育仁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产生了改良主义思想。光绪十年(1884年),他写成了《周礼十种》、《周官图谱》两书,初步阐述了“托古改制”的思想。

光绪十二年(1886年),宋育仁赴京参加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宋育仁受尊经书院优良学风熏陶,在北京又接受了中外进步思想影响,逐步具有了改良维新思想。他开始认真对比中西文化制度,探求西方富强和中国贫弱的原因,他认为中国必须以欧美强国为榜样,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否则国家民族难以摆脱危亡命运。光绪十七年(1891年),宋育仁著《时务论》,系统论述了他的维新变法主张。

光绪二十年(1894年),宋育仁受命出使英、法、意、比四国,任四国使馆二等参赞。在欧洲驻节期间,他十分留心考察西方各国政治、经济制度、文化教育、风土人情,并实地参观了议



院、监狱、法院、学校、工厂、商业贸易场所等,并将见闻和感受以随笔形式写成《采风记》一书。甲午战争后,宋育仁回国,将《采风记》刊行。同时又将自己对西学的认识进行系统整理,修订《时务论》,再次刊行。两书发行后,士大夫争相阅读,一时洛阳纸贵,宋育仁被尊为“新学巨子”。

《采风记》和《时务论》全面介绍了西方强国的基本情况,并对中西方异同进行对比分析,解答了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提出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若干设想。宋育仁对西方的追求,表达了正在形成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反映了时代思想发展的趋向。为四川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准备了条件。

(2)戊戌变法中的杨锐、刘光弟  
杨锐、刘光弟是百日维新中的活跃人物,戊戌变法中殉难的“六君子”中的二位。杨锐,字叔峤,四川绵竹县人,幼时聪明好学,钦差学政张之洞“奇其才”,招入幕。尊经书院开办后,“以优廪生,调院肄业”,在尊经书院同学中,杨锐年纪最轻,而学业常居优等,被列为“尊经五少年”之首。以壬午优贡,朝考得知县。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顺天乡试。光绪十五年(1889年),考授内阁中书,后入张之洞幕僚。维新运动中,为“军机四卿”之一。刘光弟,字德星,号裴村,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幼年饱受农家生活的艰苦

磨炼。1878年(光绪四年)应童子试,县令陈锡鬯奇其才,拔置案首,厚遇之。光绪八年(1882年),四川乡试中试举人,是年北上应会试。次年春,“试礼部,登进士,授刑部主事。”在作京官期间,刘光弟目睹国步唯艰,政事日败,心怀隐忧。甲午战争爆发后,中国形势危迫,刘光弟不顾个人身家性命的安危,大胆向皇帝上了一道痛陈变法维新大计的《甲午条陈》,请求皇帝“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下诏罪己,团结人心”;“严明赏罚,以操胜算”;“隆重武备,以振积弱”,《甲午条陈》充分表现出刘光弟赤诚的爱国热情和改良主义思想倾向。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深重,杨锐、刘光弟迫切希望皇帝维新变法。当年底,在杨锐多与努力下,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由给事中高燮曾递交光绪帝,并极力列举康有为学问人品,请求皇上召见他。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初,杨锐、刘光弟联合在京四川爱国志士在四川会馆观善堂旧址成立“蜀学会”,宗旨是“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会员定期集会,讨论或演讲,所谈“不离乎西学”。为了研讨西学,培育维新人才,他们在蜀学会外,成立了“蜀学堂”,课程有中外政治、英文、聘请英文教习,购置西方图书仪器,随时观览。英文字学成后,进入专门班,研习西方各门学问。据统

计 报名入蜀学堂者 73 人 ,其中有功名者占 71.24% ,状元出身的翰林院修撰骆成骧 ,以及三位刑部主事、一位工部主事均报名参加学习。同年 3 月 ,康有为组织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保国会” ,宗旨是“保国、保种、保教” ,以推动维新运动的发展。在京四川维新志士积极参加保国会的活动 ,在 186 名会员中 ,四川有 14 名 ,占总人数 7.5% 。保国会成立不久 ,杨锐等人又在北京成立“保川会” ,将保国与保家乡结合起来 ,具有更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虽然保国会、保川会在清廷顽固派的弹劾下涣散瓦解 ,但变法维新的时代潮流难以阻挡。同年四月二十三日(6 月 11 日) ,在维新派的推动下 ,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 ,宣布变法 ,实行新政 ,百日维新开始。8 月 5 日(六月十八日) ,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推荐了刘光第和杨锐。七月十六日(9 月 1 日)、七月十九日(9 月 4 日) ,光绪皇帝先后召见杨锐、刘光第 ,二人力陈变法维新对策。七月二十日(9 月 5 日) ,刘光第、杨锐、林旭、谭嗣同被授与四品卿衔 ,著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正式参予新政。他们竟日批阅各种条陈奏章 ,草拟上谕 ,“忙迫亟矣”。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六日(1898 年 9 月 24 日) ,慈禧太后和封建顽固派发动政变 ,囚禁光绪皇帝 ,废除新政 ,杨锐、刘光第被捕 ,3 日后 ,与林

旭、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一道英勇就义 ,是为“戊戌六君子”。

### (3) 维新运动与四川社会的变化

光绪二十二年(1896 年) ,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在四川兴起。

是年 ,宋育仁被清廷任命为川省矿务商务监督。7 月 2 日 ,他离京绕道入川到重庆。宋育仁到重庆后 ,联络爱国维新志士 ,创办报刊 ,制造舆论 ,宣传变法维新 ,并逐渐向其他城市扩展。报刊、翻译、出版等文化事业 ,是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开通风气、启迪民智 ,改革社会的有效手段。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 11 月) ,四川第一家近代报刊——《渝报》在重庆创刊。宋育仁任总理 ,杨道南任协理 ,潘清荫和梅际郇分别担任正副主笔。《渝报》馆设在重庆白象街 ,后迁至来龙巷。《渝报》在省内成都、嘉定、叙州等设有 22 个代派处 ,在省外设有北京、天津、上海、南京等 26 个代派处。《渝报》为旬刊 ,月出 3 册 ,从创刊起 ,共出版了 16 册 ,每册 60 页左右 ,栏目有辕门钞、上渝、奏折、论文、国内外新闻和本省要闻、译文、重庆物价等。

《渝报》是四川维新派的主要舆论阵地 ,它的章程规定：“本局为广见闻 ,开风气而设。凡有关经世时务 ,中外交涉条约” ,皆予以刊印。在这一宗旨指导下 ,《渝报》每期刊登的稿件大多是宣传维新变法和救亡图存为主题的。此外 ,《渝报》还以较多篇幅刊登

国内各地维新运动的消息和维新派的主张,并且较广泛地介绍西方和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另外,也在每册上登载部分以政治、法律等方面的内容为主的翻译文章。《渝报》与全国各重要的维新派报纸都有一定的业务联系,互通声气,交流信息。在办报方针上,《渝报》直接效仿维新派的主要报刊《时务报》和《湘学报》,因而办得生动活泼。《渝报》还以其鲜明的维新变法色彩和强烈的反帝爱国立场为特色,因而倍受进步知识分子的欢迎,发行量与日俱增,范围日渐扩大。随着《渝报》的创办和发行,维新变法运动开始在四川广泛流传开来。

1908年,因宋育仁应聘到成都尊经书院任院长,《渝报》随即停刊。宋育仁来蓉后,即与杨道南、吴子英、廖平等创办《蜀学报》,并刊《蜀学丛书》,继续贯彻《渝报》的办刊宗旨,为维新变法呐喊助威。戊戌政变发生后,《蜀学报》被迫停刊。

随着百日维新高潮的出现,维新变法运动在四川更加深入发展,不仅成都、重庆等城市出现了维新变法的生动局面,而且一些僻远的山区城镇也受到影响,部分知识分子冲破了传统思想的桎梏,开始追求新的思想。连非常偏僻闭塞的山区小县仪陇也出现了变法维新的迹象。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此时接受了启蒙思想教育。

维新变法运动的蓬勃发展,使沉寂的四川知识界别开生面,许多传统的封建知识分子在维新思潮的激荡下,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化。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主要表现在要求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来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权、平等、自由,以及对妇女问题的提出。这一时期,四川知识分子不仅从人道主义为立场对妇女所受的苦难和压迫表示同情,大量揭露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摧残,要求革除妇女缠足等陋习,成立“天足会”等组织;而且也从民族危机和伸张民权的角度,阐述妇女解放的重要性,把妇女解放问题提高到关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的高度,使人们认识到妇女问题的重要性。妇女解放成为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缠足”和“兴女学”成为戊戌时期四川维新志士的两个响亮的口号。

维新变法运动在四川的兴起,为闭塞的四川知识界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四川的维新志士们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等主张。经过维新变法运动的刺激,四川关心国事,要求改革现状的人越来越多了,四川知识分子开始摒弃改良思想的影响,重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踏上了民主革命的征程。

### (三)光宣新政在四川的推行

#### 1 光宣新政产生的历史背景

(1) 辛丑条约与生存危机 庚子之役,清廷惨败以后,财政面临总崩溃,加以《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巨额赔款,清廷完全无力偿付。为解决财政危机,清廷除大借外债,还在国内加紧搜括,将赔款分摊到各省,限期缴纳。为了完成本地分摊的赔款数额,各地官吏巧立名目,滥兴捐税,竭泽而渔,朘削民众达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宣统元年(1909年),四川预算每年财政收入银1730万两,其中以盐茶课为大宗,其余正杂各税、捐输次之。每年支出银1700万两,以解款、军政费为大宗,协款、教育费次之。岁入岁出相抵,尚有30万两左右盈余,因此,辛亥年藩库还有存银400余万两。20世纪初,四川省的财政支出主要是:偿还赔款、外债,甘肃、新疆、云南、贵州、西藏的“协饷”和“新政”(主要是军费)用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川省供给京外协饷等款项每年均700万两,而本省新政繁多、驻军数量庞大,费用有增无减。在赔款和外债方面,四川每年摊派庚子赔款220万两,仅次于江苏,还摊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等每年百余万两。清廷为了搜括巨款,在四川增旧税,添新税,税上加税,几乎无物不税。

20世纪初年,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在四川的深入,清廷的暴政,四川的经济到了破产的边缘,民不聊生。农业生产凋敝不堪,“农末困窘”。从手工

业和商业看,当时是财力内竭,从上到下财政入不敷出,加之洋货泛滥,严重冲击了国内市场。再如,由于清廷苛收糖捐,使糖坊主破产。农民被迫“锄灭蔗种”,致使制糖业衰敝不堪,这都是洋货和暴政给四川造成的严重恶果。

(2) 聚敛无度,吏治腐败 20世纪初,捐税有增无减。

田赋附加税:庚子赔款,由各省筹解。川省每年派解银两220万,按月摊汇江海关道银183333两,名曰“新案赔款”。为了筹备此项开支,除盐税每斤加收钱3文,肉厘每只猪加收钱200文,税契加解两倍和烟酒税加收1倍外,又加派全省捐输银100万两,名曰“新捐输”。由布政使按各州县情形摊派。综计清末正供之地丁及火耗、津贴、捐输、新捐输4次加数,川省每年田赋收入共为430余万两。

20世纪初年,清廷在四川征收的田赋附加税普遍超过正粮几倍乃至十多倍,只此一项,人民已难堪重负。

加重旧税捐:契税,全省原办78000余两。甲午战争后,川省每年派解赔款银60余万两,于是又加全省契税10万两,计178000余两。辛丑之后,川省因派解庚子赔款,款税又加两倍,全省新旧契税达534000余两。

肉厘,甲午战争后,全省除增解契税10万两外,每一只猪加收肉厘200文,是为肉厘跻入国税之始。当时银

价每两可易钱 1100 ~ 1200 文,故每年可征 50 万两。辛丑之后,每只猪再加抽 200 文,每年亦收 50 万两,两项相加,合收银 100 万两。光宣年间,由于钱价下跌,每银 1 两可易钱 1400 ~ 1500 文,因改为征银。凡从前纳银工钱者,改为纳洋 3 角,每年可收洋 140 ~ 150 万元。由于新政迭兴,各地办学、警察、劝工局、习艺所等所需款项,各地就地加收肉厘,以致参差不一,然每只猪大约总须纳厘钱 1 千数百文。肉厘开始只限于售肉者。此外因婚、表、祭、生辰、过年等杀自饲之猪,概免纳厘。以后厘率逐渐加重,比开始增多 10 余倍,及至光绪末年,婚、丧、祭等自杀之猪,一律收半厘。每年共增加收入达 10 多万两至 20 万两之多。

盐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岑春煊筹练新军,经费无出,便将过去计岸未入官运范围之成都、华阳、温江、新繁、彭县、崇宁、灌县、金堂、新都、郫县、崇庆、新津、双流、汶川、理番、广安、邻水、岳池、达县、东乡、渠县、大竹、太平、垫江、眉州、青神、邛州、大邑、蒲江、仁寿、雅安、荃经、营山、天全、清溪、峨眉、夹江等 38 厅、州、县,水陆盐引共 32929 张,仿照丁宝楨的官运成法,一律改办官运。设计岸官运总局于成都,以盐茶道为总办。每年可增加收入 100 万两有奇。清末,盐先后加厘 5 次,第一次曰旧加厘,第二次曰新加厘,第三次曰赔款加

厘,第四次曰新军加厘,第五次曰抵补土税。其所加之厘,都转嫁于食盐之人。前一二次,每次盐一斤加价钱 2 文,每次年可折收银 40 余万两,第三次因庚子赔款,除筹新捐输及加解契税两倍外,每盐 1 斤,又加价钱 3 文,岁可折收银 60 余万两。第四次因筹练新军需款,除办盐道计岸官运,年可增收银 100 万两外,又每盐 1 斤,加价钱 2 文,岁可折银 40 余万两。第五次因光宣之际厉行禁烟,停收土税,顺另筹抵补从前在土税项下开支各款,又每盐 1 斤,加价钱 4 文,岁可收银 90 万两,因此,川省盐税厘至清末,每年收入银 630 余万两。

新增旧税:光绪三十年(1904年),议收酒税。最初,好酒每斤,征税 1 文;薄酒约 3 ~ 4 文,由各地方官稽征。设经征分局后,即改归分局征解,隶于经征总局。江津、泸州、什邡、绵竹等产酒之区收数最多,每年全省收银约在 9 万两左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又开始办糖税,产糖地区设立机关,每 1 斤糖抽 10 文,每年糖捐 1 项,全省约共折收银 30 万两。光绪末年,又开办油捐,先于春末菜子将熟时,由经征局会同地方官,将境内种菜子之地,共有若干亩,可收菜子若干石,得油若干斤,约可收捐款若干,报经征总局,每油 1 斤,约纳捐钱 10 文,每年全省约共收银 30 余万两。清末还加抽 3 次烟税,第一次照原税率加

收 3/10 ,第二次又加收 2/10 ,第三次国庚子赔款 ,又照原加各数再加收一倍。

除以上几项杂税外 ,尚有其它名目 ,除盐、油、糖、烟、丝、麻、布帛、煤、铁、彩票 ,土行大宗敛钱外 ,还有茶桌捐、床铺捐、鸡、猫入城捐、加卖货物加底捐、提篮叫卖有捐、连粪便、娼妓都有常捐。所以时人称“四川脱过各行省”。在辛亥革命前夕 ,四川各县的田赋附加税、旧税、新税诸端的征收额已超过正粮额的 20 倍左右。

与此同时 ,地方官吏借机牟利。并与地方劣绅相勾结 ,趁清廷重捐掠民之机大肆贪赃、勒索追比 ,大刮民脂。达县县令借办案勒索百姓 ,连过生日也强迫乡民送礼。巫山县差役借征田赋 ,勒索加倍 ,为害乡民。酉阳州牧放任差役以诉讼勒索 ,如此种种 ,不

胜枚举 ,人民头上压着重赋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3)走投无路的农村经济 清王朝的腐朽统治 ,自然灾害的频繁出现 ,农业减产 ,人民困苦 ,大量农民破产失去土地 ,加剧了土地兼并的趋势 ,使四川农村土地问题日益严重。辛亥革命前夕 ,土地日益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 ,封建剥削更为苛刻。

据有关统计 ,合川、眉山、灌县、温江、井研等县 ,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无立锥之地 ,无地或少地的农户在灌县占总农户的 70 % 以上 ,温江无寸土者已达一半。井研县有半数的人没有土地耕种。四川土地集中情况 ,以简阳县为例可见一斑 ,据《简阳县志》的记载 ,该县粮户 粮额数字及比例如下表 :

清简阳县粮户、粮额表

项目	户 口			正 粮	
	户数	户数比	粮户比	粮额(两)	粮额比
总户数	168230	100		10253	100
粮户外的户数	101788	60.5		0	0
粮户	66442	39.5	100	10253	100
粮额 2 钱以上	10836	6.4	16.3	6007	58.6
粮额 2 钱以下	55606	33.1	83.7	6246	41.4

从上表可以看出 :简阳县有田地的粮户只占总产数的 39.5 % ,无地的佃农、雇农及城镇贫民占 60.5 % ,比

率很高。纳粮 2 钱以上 ,即收租 10 石以上的粮户 ,只占粮户的 16.3 % ,但占粮额的 58.6 % ,全县 6.4 % 的粮户

约占耕地 60%。自耕农纳 2 钱以下的,占粮户的 83.7%,占耕地的 40% 约多一点。该县无地和少地的户数占总户数的 93.6%。可见,土地是高度集中的。

据“中央农业实验所”1912 年对四川全省的调查,四川农民中,佃户占 51%,半自耕农占 19%,自耕农占 30%。无地和少地的农户高达 70%。佃农的数字为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有的地主占有田地几千亩,甚至万亩以上。如云阳县的彭祖江、彭明县的严道三以及成都昭觉寺都是田连阡陌的大户。

地主有了大部分土地,对农民实行重租高押残酷剥削。四川在当时地租率一般在 60% 左右,押金也十分苛重。合川县水田出租每石取保租银 200 元,地租占产量的 6/10;旱地每石取保租银 60 元,地租占产量的 5/10。农民为缴纳“押租”,往往借贷付利缴纳。广大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劳动繁重,生活艰难,痛苦不堪。有人估计,1908 年前后,川北农民生活费每年只 6 元。如每月吃米 6 升,需制钱 500 文,其余用费诸如油盐百文,每年也不过 10 元,因此,农民穷困已达极点。

(4) 余栋臣和四川义和拳、红灯教代表的农民暴动 甲午战争后到辛丑之役,四川人民的反侵略斗争进入了救亡图存的新阶段,广大人民开始联

合起来,举行持续不断的反帝反清斗争。

余栋臣第一次起义虽然被官府镇压下去了,但人民的反抗怒火并未因此熄灭。余栋臣兄弟潜伏西山一带,出没无常。数年之内,屡与清军作战。1898 年 4 月 18 日,川东道任锡汾设置圈套,将余栋臣捕获,关进荣昌监狱。4 月 20 日,张桂山、蒋替臣等率领数百民众奔赴荣昌,救出余栋臣。余栋臣回大足龙水镇,再次举起义旗。2 日之后,队伍发展到 5000~6000 人。7 月 3 日,余栋臣派义军突袭荣昌河包场天主堂,逮捕了法国传教士华芳济作人质。

1898 年 8 月 3 日,余栋臣颁发檄文,正式宣布起义。檄文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控拆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并提出了“顺清灭洋”的口号,声明“但诛洋人,非叛国家”。在提出“顺清”口号的同时,还指责官府与洋人沆瀣一气,如果官吏兵役对义军视如仇敌,义军对他们与洋人同等对待。檄文发布后,影响极大,起义队伍迅速壮大,最多时达到 10000 多人。义军以大足龙水镇为大本营,分兵出击。由余栋臣、蒋替臣、唐翠坪、张桂山、余绍文分别率部进攻安岳、荣昌、隆昌、资州、内江、铜梁、江津、江北、合州、永川等地。所到之处,打教堂、逐教士,惩办不法教民,抗击清军。许多州县闻风响应,震动全川。

清廷对这次起义最初采用“招抚议和”政策,并渝令川督文光、川东道任锡汾派员与余栋臣谈判。谈判中,清官员提出释放教士、改编义军并给义军首领封官等。余栋臣同意“交锋受抚”,但清廷必须保证义军的安全,提出给义军洋枪1000杆,带兵30营,将各国列强逐出中国境地。余栋臣的反帝爱国立场,与清廷完全对立,清廷之所以不敢强硬用兵,主要是义军以法国传教士华芳济等作为人质,害怕义军杀害洋人而得罪于法国。谈判至此,毫无结果。于是清廷改变策略,将招抚不力的川督文光撤职,另调江苏巡抚奎俊继任。奎俊主张“以剿为抚”,一面派员继续与余栋臣谈判,一面暗中调兵遣将,准备进剿。是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了一条毒计,就是事先疏通法国领事同意,不再顾及洋教士的生死,然后派大军攻剿义军。清廷采纳了张之洞的计谋,经过与法国公使疏通认可后,于1899年1月10日谕令四川总督调集大军,分路对义军进行围剿。

此时,余栋臣已处于不利的地位。义军虽曾分路出击,但大多只在各县进行打教活动,没有广泛发动群众,对于各地的响应也未主动联络和给予支持。加之在谈判期间,义军内部领导人之间出现分歧,蒋贇臣等力主议和,唐翠坪等坚决主战,余栋臣本人在和与战之间犹豫不决,致使义军无法集

中力量抗击清军的围剿,最后被一个个击破而失败。义军将领唐翠坪在资州战败,牺牲于贾家场。何希然出内江也战败牺牲。张桂山等在战斗中惨败。

1899年1月16日,四川布政使王之春等率清军分东西两路进攻龙水镇。18日夜,余栋臣因寡不敌众,遂挟司铎华芳济、黄用中等撤离龙水镇。其时尚有义军3000余人,与清军战于西山之麓。1月19日,余栋臣带华芳济到王之春军营,数月后又携眷下山赴清营请降。随即被押赴成都,终身监禁。蒋贇臣也投降清军,被遣送西安军营服役。

余栋臣超义是鸦片战争以来四川人民历次反帝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不仅四川境内有38个州县闻风响应,而且直接推动了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等省许多县民众的反帝斗争。1902年爆发的四川义和拳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受余栋臣起义影响而发生的。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川人民在北方义和团的鼓舞下,掀起了反帝爱国的斗争。名山庞山珙指挥众人打教堂;大邑罗文榜举起“顺清灭洋”旗帜,发动起义;犍为、富顺、宜宾、蒲江、邛崃、雅安、崇庆、双流、郫县、温江、崇宁、灌县、阆中、南部、叙州、建昌、大足等地部发生教案。巫山千余人“滋事”,成都附近群众自称“保国



团”，到处打击教会势力，保宁府、綦江、重庆等地时有打教发生。

北方义和团失败后，四川义和团揭竿而起。有的义和团成员在北方失败后分散潜入全国各地继续进行反抗斗争。北方义和团传入四川后，很快与四川原有的会堂结合起来，用红灯教名义展开斗争。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四川当局闻报安岳、乐至、永川、简州有义和拳活动，随派兵会同地方官搜捕，杨祖平等因杀死教民10余名，遭到清军镇压。同年6月，义和团首领李刚中以反洋教为名，聚众800余人进攻资阳县城，释放被捕团众。李刚中殉难后，义和团据胡家沟，杀清水河保正。资中义和团首领凌元顺、曾洪春等人率领群众起义响应资阳义和拳斗争。

自资阳义和拳起义之后，川东各地习神拳者日渐增多。永川县陈福兴等起义于朝阳寨。大足县龙水镇杨可亭聚集永川、荣昌、大足三县的义和拳群众出没于永川、大足、铜梁、荣县之间。在川西，义和拳的气势更为磅礴。仁寿、简阳、金堂、华阳等地义和拳聚众进攻龙潭寺，省城戒严。在川西的各支起义军中，以廖观音、曾阿义为首的队伍最为强大，拥众数千，屡在石板滩、龙潭寺、苏家湾、三水关等处与官兵接仗。1902年9月14日，一小队义和拳突至成都西门青羊宫，同月15

日，另一小队又持刀直奔四川督府附近的走马街。同时，彭山、眉山、新都、新繁、灌县、温江、郫县、德阳等地皆有义和拳活动。成都一时被义和拳所包围，使官府惶恐不安。灌县吴直三提出“替国诛洋”口号，与会党联络，1902年吴直三率众进攻郫县，袭击怀远镇；10月，兵进灌县崇义铺。1903年，灌县又有红灯教起义。在川北，义和拳于1902年6月在射洪县起义，首领徐机匠8月聚众1000人，执武器旗帜，自称“顺天教”，将三台县教堂打毁，占领景福院，与地主武装团练发生战斗，击毙团练20余名，进入太和镇，打毁所有教堂。在川南，荣县天竺桥美国教堂于1902年7月被打毁。庆符、筠连两县也有义和拳的活动。长宁、兴文、江安等地义和拳达4000至5000人。

1902年，义和拳起义在四川遍及数十州县。他们打教堂、杀教士、驱逐侵略者，严惩清军，攻打场镇县城，包围省城成都，致使清吏在事后谈虎色变。这次起义被川督岑春煊镇压。

1905年，犍为县义和拳再次起义，将四川义和拳斗争又推向新的高潮。1904年，犍为县有群众“学习邪教，念咒练拳”。次年1月，犍为县知县李端概得知文家山张老三等练习神拳，立即派兵前往镇压，群众奋起反抗。3月8日，观音店地方的义和团在王子田等人率领下，以红灯教名义，

反对官府“借案勒索”聚众1~2万起义,占领龟头寨。将罗城场等地保正、学董杀死。9日,在石板溪袭击清军靖川炮船,杀管驾史元豫等人。11月,义和拳1000余人分两路由镇江渡、真武山进攻犍为县城,与清军激战于凤凰山,战斗失利,义军牺牲400余人。义和团后退守铁山,虽多次与清军激战,但寡不敌众,遭到失败。

犍为义和拳起义后,又有屏山、宜宾、眉州、渠县、温江、平武、南部、盐亭、资阳、昭化、樟潼等地义和拳先后起义。1907年5月,开县红灯教起事,初有200余人,数日之后发展到数千人,打教堂,占领陈家场,群众将酒捐、肉厘等局打毁,并准备攻城。赵尔丰急调重庆等地重兵,镇压了起义军,起义军首领和群众惨遭屠杀。

(5)反清斗争的持续高涨 20世纪初,四川群众的反清斗争持续高涨,绝大多数是人民群众的反压迫斗争,反映了四川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

抗交捐税:清廷有增无已的苛捐杂税的剥削,引起了遍及全川的群众抗捐税,反压迫的斗争高潮。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灌县发生了群众反对厘金苛索的暴动。灌县群众不满于清官府在灌县设立厘金关卡,对一切出入的商人,从药材、皮毛批发商到贩卖花生的小商小贩苛收厘金,税额往往超过货物的价值。1902

年,群众捣毁了厘金关卡和经征局,商店关门,停止营业,全城罢市3天。灌县知县见事态严重,被迫自认不是,请求开市。经征局在事变后的两月内无法征税,不得不表示不再向零售商人索取税款。光绪三十年八月(1904年9月),重庆群众为反对清官府厘金局苛索,全城罢市。

光绪三十一年以后(1905年),抗捐抗税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1905年,成都群众反对清官府征收房捐罢市。同年冬,余切等人联络会党起兵于彭县石洞堰后山,称“大同军”。起义军1700余人与彭县乡勇、团练及崇宁、什邡、新繁、崇庆各县团练4000余人进行多次斗争,毙伤团练丁勇,烧毁思文场等地天主教堂。附近蒙阳场等地的群众纷起响应。嗣后彭县县会赵嘉惠派人分化瓦解了这次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邛州团派捐作学堂经费,群众打毁收捐派行。同年,垫江、永川、綦江等县群众因土行勒捐起而反抗。宣统元年(1909年),清官府抽收门牌捐,11月,威远县刘香廷父子起事反抗,与群众打毁公所、团局,后又进军资州罗泉井,将票厘局人员刺伤,意在进取富荣盐场。川督赵尔巽调防军飞驰资州、富顺、威远等地镇压,刘香廷等开炮抗拒,终因寡不敌众,被捕遇害。

宣统二年四月(1910年5月),眉州议收警察补包费,按亩查收烟捐以

作教练自治研究所用款。王家场之冷中坝“缴数抗延”，张坎场业“鸣锣集抗”，官府派兵弹压。群众到府署，扯毁渝牌，打伤兵役巡警，打毁宅门，使官府被迫“暂缓酌减”。6月，夔州府厘局办理税厘、加收轿捐，导致夔州商民两次抗捐事件。同年，铜梁、大足等县大小纸厂约千余家，因抗收纸捐“相约罢市”。各纸厂工匠与群众一起将附近的厘局悉数捣毁。重庆知府率兵前往镇压，捕杀群众数人，群情激愤，举行起义，占领官府储藏火药军械的多宝寺，与官兵抗击。由于大足县令率重兵镇压，群众才不得不分散隐蔽起来。宣统三年（1911年），西昌城发生了反对县令章庆勒收茶铺捐的罢市斗争。抗捐抗税斗争也发展到工厂、作坊之中，如1904年，成都兵工厂600余名职工罢工，抗议工头克扣工资。1908年5月底，富、荣盐场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等。

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自1903年至1910年，四川大凉山彝族不断起事抗清。1903年7、8月间，西昌县阿什支彝族反抗清官府，烧毁府州城外黄连坡等地。又聚众千人，袭击小麻柳、合龙场等处，团勇死亡60余人。1905年，马家支彝族再次起义，焚劫西昌大兴场。锡良派高培焜率领常备前后两营前往镇压，但该军出省城即纷纷逃散。吉耳等支彝民据碗厂河、四块坝等地节节抵抗清军，后据勺勺梁天险

守卫。清军向彝民开炮，又纵火烧林，杀死彝民百余名。前后历时半年。1908年，美国传教士巴尔克由西昌昭觉至牛牛坝，测绘地图，勘查矿产。当地彝民群起阻止。巴克尔用手枪将工人数名杀害。愤怒的彝民当即将巴尔克用石头砸死并杀其随从。1909年7月，清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率兵3000人由西昌、马边两路进兵镇压彝民起事。彝民起而抵抗，一度击退由马边前来的一路清军，由西昌前来的一路清军也遭苏呷家支彝民的阻击。清军到达牛牛坝后，由于阿侯家、马家等彝族家支观望不动，彝民的反抗斗争才被官府镇压下去。

1907年，成都发生了满族群众“纠众哄堂塞署”的事件。清军机处电寄成都将军绰哈布、护理四川总督赵尔丰，严令查明首犯，从严惩办，并将“管理不善”之官员分别查处。

2 光宣新政的推行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一系列事件变以后，清廷看到再也不能依老法统治下去，必须搞一些改革，缓和国内人民的反抗情绪。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上谕：“法积则敝，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3月初，她又下令成立“新政”统筹机构——“督办政务处”，派奕劻、李鸿章等人为督办大臣。此后数月内，又接连下诏“变法自强”。

(1) 新政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四川陆续设立了学务处、劝工总局、矿务调查局、农政总局、铁路公司、通省劝业道、商会、教育会等机构,宣布奖励和保护工商实业,振兴工艺制造,鼓励自办铁路,提倡发展教育,启迪民智,并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创办《四川官报》,作为指导各地新政、预备立宪的喉舌。

商务与实业: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阴谋夺取川汉铁路利权的斗争日炽。四川总督锡良把自办川汉铁路作为赴川任职的第一要政。1903年7月,他奏请设川汉铁路公司,自办铁路,挽回利权,主张迅速筹款自办。1904年1月,官办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设立。1907年改官办为商办。

1904年以省设立劝工总局,作为推行实业的总机构,并通饬各州县也遍设劝工局或迁善所。劝工局的设立是为了使川省商品力求精进,以敌洋货,鼓励民间仿制洋货或别省工艺以及独创新颖器物,均可呈明地方官,申送总局,以便推广。总局还选派学生赴日本、比利时留学,学习各种工艺制造,以推进川省工业的发展。到1905年,四川官办的各属劝工局设制革、肥皂、火柴、印刷等厂,办兵工厂、工业学堂、工业化学试验所等,共计70余处。

1905年,四川设矿务调查局,勘测全川矿藏,作为开采矿产的前导。

同年又设农政总局,设农田、蚕桑、树艺、畜牧4个部门。各县也设农务局,改良农业在全川渐成风气。

1907年,四川设劝业道,使官商两方积极扶持现有工业及倡办新工业。委周善培为川省劝业道总办,统筹农工商矿各业。劝业道设立后,开办了劝业员养成所以培养商业人才,积极扶持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如潼川锦和丝厂、三台裨农丝厂,在资金短缺面临倒闭的困境下,由劝业道拨款资助,度过难关,并改良机器,促进了生产发展和质量提高。与此同时,还在成都设立了劝业场,将百货商品集中展销,并在成渝两地举办赛会和博览会,对各公司、局、厂所造的机器和商品百货进行展览、销售和评比。成都还在1906年、1907年、1908年举行了小型博览会,全省铺户都被邀请,各出制品展览。1907年的第二次商业劝工会上,展出的产品有学界、工界、商界发明的应用机器及模型标本,以及数十种精新物品,提供展出品有千余家,售货价值达40万元。1908年成都举行第三次商业劝工会时,还发布了《晓谕商民白话告示文》,晓谕大家只有开辟利源,才能抵挡洋货。同年,劝业道会同川东道在重庆菜园举办工商赛会,川东各县均派人携展品参加,一时游人云集,盛况空前。1910年5~12月,南京举办近代中国第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工商产品交流盛会—

南洋劝业会时,四川省也单独设馆,参加交流。

办警察、练新军: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颁布改革军制,编练新军,令各省裁汰保营防勇,精选若干,分为常备、续备、巡警等军,操练新式枪炮。设立练兵处,计划全国编练新军36镇。清廷规定四川应练足3镇新军。1902年,川督岑春煊遵旨编练常备新军4营。次年,又在成都开办武备学堂,培养下级军官。锡良继任川督后,也着手整顿旧有防军,改作续备军。将原川省绿营兵共82营,33081名,缩减为16400多名。与此同时,又编练新军4个营,约1000余人。1905年设新军督练处,亲任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3处。同年,又编两协,程文葆为第一协协统驻军省城,陈宦为第二协协统驻凤凰山。同时还发展武备学堂,创办官弁学堂,设测绘学堂等。至1910年,四川已编足步队两协,炮兵3营,马兵、工兵、辎重各4队,共计8194人,由朝廷练兵处编列为陆军第7镇,朱庆澜为统制。1909年,按清廷统一军制,将成都驻防旗兵改编为巡防队,共3营,有旗兵900多人。

1902年,川督岑春煊首办警察,委成绵龙茂道沈秉堃兼警察局总办,派候补道李觐光为警政学堂总办、周善培为教习,从州县选拔数十人入校学习,培训四川首批警政员弁。1905

年,锡良改委周善培为警察局总办,并设巡警教练所,招收1000人,编为巡警两营。1907年又设通省巡警道,主持全省警务,兼管成都府城警务,警察由警政学堂或短期训练班培养。警察分为执勤、司法两部分,各司其职。省城警察总局还成立了消防队,并设罪犯习艺所收容罪犯、游民,管理妓院、戏院。

(2)新政实施利弊 实施新政时期,四川第一次设置了地方官府中从未出现过的组织机构。如设置劝工总局和通省劝业道,学务处,督练处、巡警局等。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四川的资产阶级逐步被推上历史的前台,他们的政治代表—立宪派与革命派,为保卫铁路主权,收回利权等经济利益而奋勇抗争,革命派还为君主立宪发展到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而积极奋斗。新政的施行,增强了从事实业的资产阶级和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士绅,参与政权、实行政治改革的民主要求。他们与资产阶级立宪派一起,宣传实行民权、宪政、国会,鼓动蜀人立宪。

特别是四川近代学堂的建立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使近代知识分子的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在民权、民族运动中成为先觉者和抗争者,许多人还走上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道路。

20世纪初新政的实行和收回利

权运动,为川省工商实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新政时期,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地方官府的承认和支持,以及一系列实业政策的实施,封建势力的压制相对减轻,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宽松,从而刺激了资产阶级和绅商们创办实业的热情。他们独资或集股开工厂、办公司,努力振兴实业。1902年,四川只有1家猪鬃厂,而新政时期有21家。1901~1911年,四川所办的108家厂矿中,有官办的6家,官商合办的3家,商办的99家。商办企业不仅从数量上占99%以上的绝对优势,还比前10年增加了10倍,资本也比较雄厚,有的商办工厂创办资本达30万元。而以民资为主的川汉铁路公司,历年积资高达1645万元,在各省商办铁路公司中位居第一。

四川民族资本的发展,还反映在由19世纪末的火柴、矿业、扩大到了

电灯、自来水、肥皂、玻璃、化学、印刷、航运、铁路、缫丝、织布、面粉、制革、电镀、机械、纸烟、建筑等业,从而扩大和增强了近代经济的基础。不过四川民族资本在这一时期比过去虽有较大发展,但仍不能有效抵制外资在四川的扩张。封建势力的干涉、侵扰也给近代企业的发展壮大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

新政的推行,虽对四川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起过积极促进的作用,但因机构频设、开支递加,赋税猛增,给四川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也很大。20世纪初,四川财政支出除日常旧项外,加上新政用款,使负担加剧。省上收,地方也照例加重增收,致使赋税猛增,负担加重。这必然引起群众的强烈愤懑,导致全川各族人民举行的反苛捐、抗暴政斗争。

### 三、辛亥革命前后的四川

辛亥革命前,四川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由立宪运动、保路运动引发的大规模群众反清斗争,导致了辛亥革命的胜利。1912年开始,昙花一现的民主共和政治很快被袁世凯独裁统治所取代。1915年,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悍然复辟帝制,南方各省发动护国战

争。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实行独裁统治。孙中山联络南方各省,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领导滇、粤、桂、黔、湘、川各军进行护法战争。但因南方军阀各怀野心,排挤孙中山,使护法运动归于失败。四川

也卷入了民初护国、护法等南北战乱之中。

### (一)四川立宪与革命

#### 1 四川的立宪活动

(1)商会的成立及其活动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商部设立不久便上奏朝廷,在京师倡议商会。并颁发劝办商会谕帖,制订《商会简明章程》26条。

川东道和川东商务局在奉令建立重庆商务总会以后,便逢人开导,为赢得商人的信任,制订了《严惩倒骗章程》。川东道、川东商务局会同重庆府,巴县知县传集各帮商人开会,演讲兴办商会之必要。因重庆有关商务等事,例由每省商邦公举1人任首事,共8省首事,负责官商交涉事件。各行帮公举8人,会同8省首事作为重庆总商会会董,各帮又举帮董1至2人,公推重庆最大票号“天顺祥”老板、分省补用知县李耀庭为总理。1904年10月14日开会,订立重庆总商会章程18条,并将总协理、会董上报川督转商部立案,重庆总商会正式成立。

1905年9月,成都官绅召开会议,制订会章,成立成都总商会。由商务总局札委盐商、成都举人、候选知府舒钜祥为总理,宝龙银号老板,补用知府齐世杰为协理。一年期满再按章程另行推举。川督锡良亲临成立大会并在训辞中说,成都总商会的设立,是为使官商同心合力,并保证大凡有益于商

家的事情,官府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以保护。

1910年,通省劝业道规定,凡是“商务繁盛”之村、镇、乡都应设立商务分所。隶属于本厅、州、县商务分会,以分董主持。1909年和1910年川省商会增加迅速,两年间就设商会81处,超过其它省份。到1911年,川省商会数名列全国第一,占全国商会数的12.3%。

在商会设立之初,它的功能和活动范围可从其章程中得到了解。《四川成都总商会章程》规定了以下条款:惩倒骗、保行商、昭诚信、兴制造、备书报、卫商业、除讼累、惩败类、奖有人、广联络、结团体、列商品等。1907年8月,成都总商会设立“成属商事裁判所”,公拟裁判所章程101条。从10月21日开判至1908年1月23日,先后准理判决商事诉讼23起。1907年9月,渝商与法商涉讼,由巴县传讯,但法商拒不到案,法驻渝领事也出面干涉,不准地方官审理,后同意由商事裁判所解决。重庆总商会设“商事公断处”,每遇处理各帮纠纷时,重庆知府或亲往参加,或派人出席,并担任监督。

总商会还负责商业注册登记,自立工厂、公司等。1906年,成都总商会设立自来水公司。1908年底,成都总商会饬各地商家分别向总会、分会或商务分所注册,分商号注册、公司注

册、凭据注册3种。1910年,成都总商会准备设一纺织工场,特请曾留日学生杨善庭前往日本考察,订购机器,招股开办,用款由商会筹垫。此外,还采取了一些保商措施,考察商情,整顿商务,奖励成效显著者,召开商品展览会等。

随着四川资产阶级队伍和力量的壮大,在许多地区他们已渐趋于“四民之首”的地位。他们通过商会逐步控制了一些城镇的组织机构,并开办学堂,提倡戒烟,组织消防,维护社会治安,为扩展商务,参加各种博览会;为保护商权,参加各项争取民权活动,或集体抵制洋商。商会成为商人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的最好场所。

1911年3月,四川商会联合会成立。其目的是:“组织大群为商事上谋扩公益之计画”。联合会号召川省绅商奋起“商战”,力挽利权,以固国基。

## (2) 省咨议局的建立和实际作用

1908年12月,川督赵尔巽接到各省设立咨议局谕令后,组织了咨议局筹办处,会同士绅协拟章程15条。筹办处由布政使王人文充当总理,提学使方旭、巡警道高增爵、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在籍即用知县邵从恩充当协理。咨议局筹办处成立后的要务是举办议员选举。特派人员赴各选举区讲解咨议局章程及选举章程,帮助监督办理一切选举事务,要求各选民在1909年1月21日之前一律成立选举事务所。

筹办处筹划初选事务、制造名册时,由各地处团保以及绅商学界查造草册,交由事务所汇核,再编制选举人名草册。各地方官为初选监督,各选区选举经费自行筹措。

筹办处章程规定了筹议期限,初选、复选以及各属选出议员到省日期。

四川各地参加选举的人数共计191530名,仅占当时全省人口的0.39%。实选结果,全川共选出正式议员107名,候补议员54名,共计161名。

1909年10月14日,四川省咨议局在成都正式成立。总督赵尔巽、成都将军马亮、布政使王人文、提学使赵启霖、提法江毓昌及巡警道、劝业道、盐茶道、成都府、成都县令、华阳县令等都莅会。会上以投票方式,选举了蒲殿俊为议长,萧湘、罗纶为副议长。

四川咨议局成立后立即组建了机构,任命了编制、文牒、庶务、会计4个科的书记,设立了议员办事处及书记办事处。同时组织了“全部委员会”。

四川咨议局是在总督衙门和朝廷控制之下限制很严的“民”议机构,但也初步具有近代议会的性质,如议员通过选举产生,立宪派起领导作用,新兴阶级开始参政等等。

四川咨议局第一次会议从1909年10月14日开始,11月28日闭会,共46天。会间,总督提请咨议之案有“巡警经费”、“保护森林”、“征收小学



学费”等三项,其中两项被多数人否决,咨议自提之案 18 项。

1910 年咨议局第二届年会共开了 50 天,有议案 40 多项。

咨议局两次会议,承认和自提的议案涉及面是广泛的,最主要的是关于财政税收、实业、文化教育、司法、民族、征兵、宪政、纠举等。

在辛亥革命前夕,四川咨议局除发动保路运动外,还在会场内外进行了大量活动,涉及川省政治生活的许多重要方面,在抨击现实丑恶,打破专制局面,带来民主气息,启导开发民智以及组织训练人民运用政治武器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3)自上而下的地方自治运动  
清末试行地方自治,各县相继设立了县议事会和县参事会。这种制度从 1910 年开始,到 1914 年奉令停办,历时 4 年。城镇和乡也相应成立议事会,并订有《简章》,议员视居民人口多寡而定,依法选举。

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护川督赵尔丰设立成都自治局筹备成都自治事宜。赵尔巽督川后,于次年改名四川全省地方自治局,内设法制、调查、文牍、庶务四科。以布政、提学、按察三使为总办,巡警、劝业、盐业三道为会办。

宣统二年(1910 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护督王人文向清廷报告四川筹备宪政情况,共分以下几端:

续办全省城乡自治。根据清廷要求,全省繁盛城会 40 处、乡会 10 处,本年夏间已设立议事会、董事会。巴州、叙永厅、邛县等 58 个中等城会也设立了议事会、董事会。岳池、叙永、泸州等厅州县乡也已成立 133 处。盐亭、雷波等偏僻城会,简州、绵州、成都、新宁、梁山、资阳、绵竹、仪陇、宜宾、仁寿、荣县、大竹等州县 67 处偏僻乡镇先后成立乡会。总计全省已成立城会 100 处,镇会 143 处,乡会 67 处。

筹办州县地方自治。清廷要求各省会地方首县筹设议事、参事等会,四川除成都、华阳两首县遵照筹设外,并在江北厅、泸州、巴县三属同时成立。绵竹县也呈请批准成立。

## 2 民主革命的孕育与发展

(1)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 邹容与《革命军》:邹容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光绪十一年(1885 年)生于重庆一个商业资本家家庭。在时代的感召下,邹容不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走民主革命的道路。

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开始在四川传播,邹容在此期间,阅读了大量的维新派报刊书籍。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从谭嗣同等人的殉难敏锐地感到维新改良道路在中国难以行通,由于在国内找不到答案,遂于 1902 年,渡海到日本东京,入宏文书院学习。在此期间,邹容除了读卢梭、孟德斯鸠等

人的著作,还自觉接受了孙中山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斗争中。在留日期间,邹容写成了“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的不朽著作《革命军》的初稿。1903年4月,邹容因剪掉学监姚文甫的辫子被迫回到上海,住入蔡元培任总理的爱国学社,结识了著名的革命志士章太炎、章士钊等人,并结为莫逆之交。此时,拒俄运动在上海兴起,邹容立即投身其中,并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然而清廷命令各地逮捕爱国学生,就地正法。严酷的现实使邹容深切地感到,必须唤醒广大人民起来进行革命。他将在日本撰写的书稿题名为《革命军》,自称“革命军马前卒”,由章太炎作序,于1903年5月付梓出版。

《革命军》出版后,在革命者中大受欢迎,而中外反动派则极度恐慌。他们相互勾结,于6月30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关进监狱。次日,邹容自投到案。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外国侵略者未敢将邹容引渡给清官府,判处监禁两年。邹容在狱中身患重病,于1905年4月3日凌晨病逝,年仅20岁。

邹容的《革命军》全书近2万字,分7章。它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为指导,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意识形态,阐述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革命军》的主题是“革命排满”和“民主共和”。首先指出

用暴力革命手段取代维新改良手段来改造旧中国这条正确道路,并以西方天赋人权学说为武器来剖析中国社会,参照西方政治制度,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中华共和国”方案。

该书于1903年由上海大同书局第一次刊印,以后各地纷纷翻印。为避免查禁,翻印时多半改换书名。据不完全统计,武昌起义前《革命军》一共翻印了20多版,总印数超过了100万册,在清末革命书刊销量中占第一位。1912年,孙中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后,追赠邹容为大将军。

卞薰与《重庆日报》:卞薰是四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的创办人,他最早将《革命军》、《警世钟》等革命书籍带回四川,对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在四川的传播有重大贡献。

卞薰是四川江津人,卞家世代书香,是江津十大家族之一。卞薰从小读经史百家之书,光绪十四年(1888年)考取秀才,但他并不热衷于科举应试,只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探讨历朝兴亡盛衰之道。戊戌政变后,卞薰眼见清王朝专制残暴,国势衰微,列强交相入侵,他期望维新变法,积极倡导蚕桑业,欲以实业作为基础,徐图发展。1902年春,卞薰去北京,盘桓数月,欲说服当局以行其志,然而目击清王朝腐败无能,深感清王朝摇摇欲坠,革命

高潮即将来临。这年冬天,卞鼐转道上海,与马君武、谢无量等结识,畅谈革命,过从甚密。拒俄运动发生后,他常参加蔡无培等人领导的爱国学社每周在张园举行的演讲会,立志反清。“苏报案”发生后,卞鼐三次到狱中探望邹容、章太炎,同仁人密商革命办法。在章、邹的建议下,卞鼐决定回川开展革命活动。

1903年夏,卞鼐回到重庆,与杨庶堪、朱之洪等商议,决定在四川办报纸、开学堂、建工厂,并变卖家产,得银6000余两,从上海秘密购置《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宣传书刊数百册带回四川,广为散发。

光绪三十年九月(1904年10月),卞鼐在杨庶堪等人协助下,办起四川第一家带有反清色彩的日报——《重庆日报》,社址设在重庆方家什字麦家院。特聘请日本进步人士竹川藤太郎任社长,聘萧九垓等人分任编辑、采访工作,他本人则以该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在卞鼐的主持下,《重庆日报》着重揭露清廷的黑暗腐朽和官吏的贪婪凶残,同时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提倡办工厂、办学校,积极传播新思想,得到社会上进步人士的欢迎。不到半年,由创刊的500份陡增至3000多份,在四川地区影响很大。

卞鼐在创办《重庆日报》的同时,又集资创办了东华火柴公司、筹办东文学堂、女工讲习所等。东文学堂被

誉为“蜀中独一无二学堂”。卞鼐还常举行集会,演说“君为天下之大害”等民主主义思想。川东道贺纶夔、重庆知府鄂芳对卞鼐多次构陷,经周密策划,于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1905年6月1日)晨,将卞鼐逮捕,秘密软禁,奉锡良之命,押往成都审讯。同时,清官府查封了《重庆日报》。

卞鼐在成都待质所禁押3年,在狱中写下了《救危血》、《呻吟语》等。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908年6月13日),在护理川督赵尔丰授意下,成都知府兼巡警道台高增爵派人刺杀了卞鼐。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四川蜀军政府追赠卞鼐烈士称号。

《广益丛报》在重庆创刊: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广益丛报》在重庆创刊,由广益丛报馆编辑发行,每旬出1册,每册栏目众多,内容丰富。

《广益丛报》的革命倾向比较明显,辛亥革命前,它发表了不少文章激烈抨击清廷的内政、外交政策,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广益丛报》发表了大量的论文、诗词、小品、新闻报道,揭露清廷的腐朽,抨击清朝官吏“病国殃民”,呼吁人民奋起斗争,推翻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广益丛报》还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表一些公开介绍革命党的历史、斗争业绩、政治主张以及歌颂革命志士的文章。《广益丛报》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

文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文章与论著,对封建的宗教迷信、社会陋习、虚伪礼教进行揭露和抨击,提倡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思想。

《广益丛报》的发行,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在四川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四川近代知识分子的觉醒 20世纪初,随着社会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革命思潮的兴起,四川近代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觉醒。其特点是,提出了“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的命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甲午战争后,民族意识和民权意识开始觉醒,思想发生了飞跃,从爱国维新到爱国革命。吴玉章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一个维新改良思想的拥护者,当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等文章时,思想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随着革命的觉醒,他们的民权思想从“君主立宪”上升到“民主共和”,其间,是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的认识和宣传。他们认识到中国若不被世人淘汰,跟上世界潮流,必须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去专制而实行民主共和,是“世界大势”。邹容在《革命军》中第一次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代表了辛亥革命前进步知识界觉醒的高峰。

(2)同盟会武装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爆发之前,由四川革命党人领导

的起义多达 10 余次。这些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却推动了四川革命运动的高涨。

彭县之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川彭县爆发了大同军起义。由余切、萧光前等率部分群众在彭县石堰洞后山宣布起义,提出“驱逐鞑虏,创立民国”的口号,组织大同军,以余切为元帅,杨钧为军师,歃血结盟,号召群众起义。1905年12月13日,大同军马彭县团练、堂勇及什邡、新繁、崇庆等地团练在牧马河展开激战,大同军胜。潜伏在濠阳场、海窝子、河坝、思文场等地的大同军大受鼓舞。彭县知县赵嘉惠惶恐万分,派朱三益等人去游说萧光前罢兵。萧光前经不住威吓利诱,退出了起义。大同军发生分化,简化南率所部离去,余切、汪泽被迫隐匿到成都。彭县起义失败。

江油起义:光绪三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二年(1905~1906年)初,部分留日学生陆续返川,并在四川建立组织,发展甚速。

1906年,同盟会员李实发动了江油起义。李实为四川绵州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并与民间秘密宗教首领何如道等人建立了联系,得其支持。李实决定于1906年9月起义,因消息泄漏,川督锡良闻警,立即派兵勇、团练掩袭。李实等人毫无防备,仓卒应战,兵败。李实率余部进入南部小燕山。锡良调巡防军张孝侯部围攻,激

战数日,李实牺牲,起义军兵败,江油起义失败。

江安、泸州、成都、叙府武装起义: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同盟会会员余英、张培爵、谢奉琦等分别在江安、泸州、成都、叙府举行了武装起义。

泸州为川南重镇、水陆要冲,战略地位重要,加之余英控制的哥老分势力雄厚,因此泸州成为革命重心,同盟会的基地。余英联络巡防军哨官刘安邦和川滇黔边区会党首领刘天成及其部属刘子成、刘希成等,预定由同盟会会员刘安邦、鲍九成首先在江安起义,然后顺流而下,攻打泸州。但在准备过程中,黄复生、熊克武、杨雄等人在永宁兴隆场黄方家制造炸药不慎爆炸,黄复生受重伤,引起官府注意,特别是各路会党3000余人云集泸州城内外,旅店暴满,为清吏警觉,泸州知州杨兆龙在诱捕余英不遂后,下令搜捕党人。同盟会会员决定于1907年11月5日发动江安起义,并通知成都革命党人同时行动。但是,由于江安知县预作准备,先发制人,紧闭城门,大搜革命党人,并令巡防军阻击刘安邦部,江安起义遂告失败,泸州起义也因此未能发动。

成都起义计划由张培爵、谢持、余切、黄方等人负责,预定在11月14日西太后寿辰之际,乘清朝地方官员交集于会府,举行祝寿典礼时,聚而歼之。并以泸州、叙府两地响应,三处同

时并举,造成全川革命声势。江安、泸州起义失败后,党人陆续潜入成都,多达100余人。十月一日(11月6日),各路会党约4000人集中成都,分住小天竺、安顺桥、茶店子,由余切指挥,闻警则发。新军和学生中党人也作好了一切准备。但是,起义的密谋泄露,清军大军迅速被调进城,实行戒严,成都革命人起义计划失败,只好遣散党人作罢。革命党人杨雄、黎靖瀛等6人被捕下狱,新军中同盟会会员伍安全被害。

成都起义失败后,部分党人转图叙府,同盟会会员谢奉琦筹备了叙府起义,与曾省斋联络叙府堂勇管带刘绍峰、县幕詹树堂发动堂勇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一日(1908年1月4日)发难,因团首惧祸自首,叙府知府宋联奎捕杀刘、詹2人,叙府起义也半途而废。叙府起义总指挥谢奉琦回到家乡自流井,伺机再举,但遭到同盟会叛徒江慰然出卖,被清防军诱捕,解往叙府杀害。

广安起义: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1908年3月1日),四川同盟会在广安发动起义。

同盟会在川西南发难的计划失败后,熊克武等考虑到广安距成都较远,水陆交通便利,革命势力集中,又可依靠李绍伊统领的“教义会”群众。因此决定在广安起义,准备夺取广安后,建立同志军武装部队,进而攻占保宁、顺

庆。

起义当天,由熊克武组织以同盟会员为核心的突击队进攻广安州署,余英率领会党攻巡防营,秦炳领会党和学生为后援。当晚9时,熊克武率队入城,一举攻进州署,但余英部遭警察阻击不能入城,熊部孤军深入,广安清军迅速反扑,起义军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只好乘夜突围。广安起义失败。

嘉定起义: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同盟会筹划在嘉定(今乐山市)起义。

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1910年1月23日),经同盟会员廖宗位设在嘉定的秘密机关中暗中准备,税钟麟、秦柄等率数百义勇,突袭嘉定童家坊、白马埂、土主场的团防局,缴获快枪1000余支,并在新场正式宣布起义。义军顺流东下,直趋嘉定城,但因清军沿河布防,义军渡河失利,转移至嘉定、屏山间的宋家场与追击而来的清军激战,又遇到马边增援的清军,腹背受敌,死战一日,弹尽粮绝,突围四散。余英率义军一部走叙府,图再举,被捕于豆河关,惨遭杀害。嘉定起义中死难同盟会员和会党群众达200余人。

黔江起义:宣统二年十一月(1910年12月),同盟会发动了黔江起义。

这之前,同盟会员程昌祺与温朝钟、王克明、谭茂林发起组织“铁血英雄会”于黔江县八面山小南海。他们

印制邹容的《革命军》万余册散发给群众,在湖北咸丰、利川,四川黔江、酉阳、彭水等地发展会员,参加群众多达万余人。起义时,温朝钟、王克明在彭水凤凰山率200人割辫起义,聚众千余人,分三路进攻黔江县城。知县王炽昌派把总曾吉芝据守要隘大垭口,革命军猛攻大垭口,斩曾吉芝,直逼黔江县城,知县弃城逃走。宣统二年十二月七日(1911年1月7日)革命军占领县城,召集全县群众大会,宣传革命大义。酉阳知州杨非霖闻讯领兵进攻黔江,革命军作战失利,退入咸丰破水坪,清廷急调川、鄂、湘、黔四省军队围剿,温朝钟、王克明相继遇难,起义失败。武昌起义爆发后,王克明之妻王杨氏率温朝钟余部再举义旗,光复县城,成立黔江军政府。民国初年,四川军政府将“铁血英雄”的金匾授予黔江,省议会通过议案,称这次起义“实为民国之先声”。

3 从铁路主权到政治风暴—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5~9月的四川保路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1911年5月清廷皇族内阁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又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借款筑路、以权抵债的合同。这一切直接促成了四川人民在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领导下,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是四川和全国辛亥革命的前奏,它加速了武昌起义的准备,为同盟

会领导四川革命斗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川汉铁路公司 19世纪末,帝国主义阴谋夺取川汉铁路,四川民情激昂,反对帝国主义勘测铁路线,要求自办川汉铁路,抵制侵略。1903年9月9日,锡良抵成都接署督篆后,经过一番筹备,于1904年1月在成都岳府街设立了官办川汉铁路总公司。最初锡良奏委署藩司冯煦为川汉铁路公司督办,继委成绵龙茂道沈秉堃为会办。又因新任藩司许涵度到任,加委许为督办。1904年11月5日,改派建昌道现任永宁道赵尔丰为督办。1905年,赵尔丰赴巴塘镇压藏民起义离省,川汉铁路公司督办由沈秉堃代理。

锡良在筹设川汉铁路公司时提出:“官设公司,招集华股,自保利权”的原则。“专集华股”,如不是中国人之股,公司一概不予以承认。川汉铁路预定路线自汉口起,经宜昌、夔州、重庆、永川、内江、资阳以达成都。全长约1980公里,建筑费用需银两5000万以上。

1905年1月18日,锡良奏报川汉铁路集股章程六章55条规定了川汉铁路股本的四个来源:认购之股(官绅商民愿入股冀获铁路权益者,即以已资入股者)、抽租之股(按租抽谷入股者)、官本之股(以官款拨入公司作股本者,即由国家库款拨作股分者)、公利之股(本公司筹款开办别项利源,收

取余利为股本者)。实际上“抽租之股”是主要来源。抽收的办法是,凡有田产的人家,不论“祖遗、自买、当受、大写、自耕、招佃”,凡收租在10石以上的人家,均按当年实收数的3%抽取。在《川汉铁路按租抽股详细章程》中还规定,此项抽收,只在收租之家中抽取。租股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开始征收,铁路公司凭借官府、依靠士绅征收,有强迫征收的性质。当时人称“铁路捐”。此后,公司虽由官办到官商合办继而商办,但抽租始终未变。据1911年川汉铁路公司所公布的《总纂实收数目简明表》所载,自公司开办起至1910年底,实收官股银236730两,购股2458147两,租股银9288428两,共银11983305两,其中租股占77.5%。1908、1909两年租股所占的比例更高。

1906年,川省留日学生蒲殿俊约集胡骏、肖湘、张智远、李大钧、邓镛等300余人,组织川汉铁路改进会,上书锡良,要求川路公司实行商办,并每月出版《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书》1册,印送到各股东手上;主张凡出资者都是股东,有义务,有权利。川汉铁路公司应先正名为商办,依公司律,由股东选举董事、查账员及职员。由蒲殿俊、邓镛、肖湘、吴虞、邵从恩等44名留日学生署名的《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集中反映了四川绅商对川汉铁路的要求。根据清廷所颁“商律”,要求改川

路公司为商办。

由于四川绅商的一再要求和全国范围内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锡良不得不在1907年3月4日奏报:川路公司遵商律改为商办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举乔树枏为总理,胡峻为副总理,原设官总办予以裁撤。

《川汉铁路公司续订章程》规定:川路公司改名为商办四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预定川汉铁路自成都经重庆、万县至湖北宜昌,路分3段,分段动工。先请中国人为总工程师,再应聘日本及欧洲等国技术人员,若应聘者不尽职,公司可随时通知总工程师辞退。《续订章程》还重申了本公司专集华股自办的原则。募股办法仍沿袭征收租股。《续定章程》除肯定商办外,还明定了股东权利,规定设立股东会,由股东会选举董事13人和查账员3人,董事与总副理共同议决本公司重大事件。

1908年1月,清廷邮传部奏请援照湖南粤汉铁路公司设三总理成案,改派胡峻为驻川总理,费道纯为驻宜总理,乔树枏为驻京总理,以三总理名义组织总公司于成都。“刊换股票,评定租股,增岁偿息率为六厘,创起各属城股东分会。”1909年11月19日,四川省咨议局鉴于川路公司6年以来,组织并不完善,虽有商办之名,而无商办之实,总理由选派奏委,而没有遵照商律由股东选举,以至“股分难

集,资本无多”。提出《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要求议改章程,使公司组织得到完善,真正收到商办铁路的实效。还提出清查账项、整理财务等为主要内容的整理川路公司纲要。同月,川路公司召集第一次股东会于成都。12月,成立董事局,举肖湘、江树、汪世荣、沈敏政、邓孝然等13人为董事,由刘紫骥任主席董事兼铁道学堂监督。郭成书等3人为查账员。商办川路公司至此稍具规模。

1908年,电邮传部派詹天佑为川汉铁路总工程师。1909年3月,川汉铁路公司又任颜德庆为副总工程师。詹天佑、颜德庆先后到宜昌,亲赴工段,勘定路线,制定计划,在宜昌设立工程局。9月,乔树枏因工程重大辞代宜总理,川路公司驻宜总理由李稷勋充作。12月28日,川汉铁路举行开工典礼,宜昌至归州300余里间同时开工,是为川路开工建筑的开始。

(2)保路运动 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9日,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规定所有宣统元年以前商办干路一律收回国有。宣统三年四月十二日(1911年5月10日),清邮传部、度交部电告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粤汉、川汉铁路皆属干路,应遵旨收归国有,并要王迅速查明川汉铁路公司的账目以备接收。12日,王人文召集川汉铁路公司主席董事彭兰村、副主席董事都永和等会商收路办法。彭兰村同四



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商量对策。蒲、罗主张召集临时股东会,但消息一经传出,股东们大哗,要求象湘、鄂、粤3省一样展开保路斗争。

四月十七日(5月15日),川汉铁路总公司董事局致电邮传部,要求维持川汉铁路商办原案。邮传部置之不理。四月二十五日(5月23日),川汉铁路董事局上海分局向成都报告湖南、湖北、广东3省争路热潮高涨情况,川路股东大受鼓舞。

5月18日清廷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22日,命四川、湖南两省一律停收租股。四月下旬(5月下旬),四川省咨议局呈请护督王人文代奏。呈文严厉批驳了清廷强加给商办铁路公司的种种罪名,从法制的角度提出,取消商办就是剥夺人民权利,应由资政院议决。稍后又历数川路自办的艰辛,人民数年以来万众一心的感人情形,要求清廷收回成命以免激成民变。

五月初一日(5月28日),川汉铁路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议,到会股东722人,其中立宪派人及其支持者占多数,但也有少数同盟会员参加。商讨应付“非常变局”的对策。集中讨论了如何对付清廷接收川路问题。与会代表情绪惨痛,议论纷歧。邓孝可提出,只有清廷答应退还路款,才能承认路权国有,大多数代表们反对清廷派员接收川汉铁路。会后,川汉铁路公

司董事局、翰林院侍讲学士衔编修伍肇龄等都上书护督王人文,陈述形势危迫,要求清廷取消铁路国有政策。四川咨议局、省城各法团绅商以及川籍京官均纷纷出面呈请清廷收回成命。护督王人文在法团、绅商一再恳求下,电请内阁暂缓接收川汉铁路,此案应由资政院交咨议局议决。清廷对王人文严旨申斥。

6月11日,四川绅商从王人文处得知清廷欲举现存已用之款,一律填给股票。如川省定要筹还路款,清廷必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政作抵。9日,邮传部令上海、武昌、长沙、宜昌、成都各电报局不得收发争路电报。6月11日,川路公司开始攻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6月14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寄达成都,清廷借款卖路的真相大白。四川绅商争路情绪高昂。邓孝可在《蜀报》第10期撰文,直呼邮传部为卖国部,盛宣怀为卖国奴,号召川人坚持商办,反对国有,死里求生。

清廷收回川汉铁路商办成命后,川汉铁路公司于6月16日召开在省股东及各团体开会筹商,到会者数千人,皆以收路国有,川人可从,收路为他国所有,川人死不能从。与会者决定组织保路同志会,“拼一死以破约保路”。会后,蒲殿俊、罗纶等20余人连夜聚议,筹建保路同志会。

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一日(1911年6月17日)上午,四川铁路公司召开

大会宣布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会址在岳府街铁路公司内,公司特拨银40000两作同志会活动经费。大会由罗纶致开幕词,邓孝可、刘声元、程莹度等相继发言,言者历数清廷举债列强、出卖路权的亡国行径,听者无不声泪俱下。大会宣布同志会的会长为蒲殿俊、副会长为罗纶,下设总务、文牒、讲演、交涉4部,分别由江三秉、邓孝可、程莹度、罗纶任部长。会后,保路同志会发动了到总督衙门的请愿游行。由80岁老人翰林院编修伍肇龄领头,罗纶、刘声元、池浅谦、彭兰村、叶秉诚、林山腴、邓孝可、蒙裁成随后,再后面是声势浩大的群众。

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向全川各界发表了《保路同志会宣言书》、《讲演部启事》、《致各府厅州县有司启》等文告,以外争国权,内争民主为宗旨,号召全川士农工商联合起来“破约保路”。《保路同志会宣言书》揭露清皇族内阁铁路国有政策的专横、野蛮、痛斥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是葬送人民于死地,将3省3600里路权彻底拱授外国的合同。四川保路同志会对这一关系国家安危、民族危亡的借款合同必须坚决反对,以表救亡之苦心。保路同志会要求省内外各府厅州县的自治会、城会、县会、教育会、农会、商会、股东会等团体团结一致,积极参加保路斗争。不到半月,入会者达数万人之多。成都各街道、学校、省城外各州县

的保路协会也纷纷成立,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

8月5日,股东特别大会在铁路公司开幕。罗纶担任主席。到会代表500余人投票选出颜楷、张澜任股东大会正副会长。当天下午,赵尔丰致“训词”。同日,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转来端方8月3日中伤股东大会电文并同时转来北京电文,清廷已有旨交川督“将倡首之人,严拿惩办”。8月7日,股东特别大会代表得知端方电文,顿时会场声如沸鼎,重庆代表朱之洪登台逐条驳斥端方诬蔑中伤,代表们齐声附和响应。会议当即通过抗议端方电文一通。利用赵尔丰与端方的矛盾,由赵尔丰代转。8月9日,股东特别会议讨论了盛宣怀收买李稷勋吞没路款、没收路权问题,决议将李辞退,请赵尔丰责令李稷勋在10日内办理交卸手续,并反对邮传部任命李主持宜归段路工。保路同志会也召开职员评议员会议,集会众6000~7000人为股东大会呐喊助威。此后,股东特别大会的议题便集中在李稷勋的进退上,直至罢市、罢课的爆发。

七月初一日(8月24日)上午,在川汉铁路股东审查会上,重庆代表朱之洪要求股东会长公布清廷8月19日来电,顿时会场群情激愤,一致通过罢市、罢课决议。同日下午,保路同志会召开大会,与会群众一致要求前往

督署请愿。罗纶、邓孝可等担心失去控制，说服群众后由他们向赵尔丰陈诉衷情。但是，成都全城已不约而同地关门罢市，百业停闭，各学堂也一律停课。

宣统三年七月九日(1911年9月1日)，川汉铁路公司股东会一致通过全省不纳粮税决议并通告全省：(1)自本日起即实行不纳正粮，不纳捐输，已解者不兑，未解者不必解；(2)将本日议案提前交咨议局，照例呈院，并咨各厅、州、县地方官；(3)布告全国，声明以后不担负外债分厘；(4)恳告全川人民，实行不买卖田地、房产；(5)广告全国人民，俟前四条实行后，自行开市、开课。赵尔丰电告清廷：“川人已定宗旨，不能俯准商办，即实行停纳钱粮，杂捐以为对待。他不具论，即兵饷立竭，势将哗溃，全省坐以待毙。”将军玉昆、赵尔丰与司道官员联衔上奏，要求清廷罢斥盛宣怀，重新考虑川路问题。清廷坚持已见，降旨严厉申斥川省地方当局，还严令端方带兵入川查办清剿。

1911年9月5日，在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会场门口，突然有人将同盟会员朱国琛等起草的铅印传单《川人自保商榷书》散发给正在入场的股东代表们。这在当时是一件具有爆炸性的事件。《川人自保商榷书》首在鼓动四川人民反清独立，它指出：“今因政府夺路、劫款转送外人，激动我七

千万同胞翻然悔悟。两月以来，其团结力、坚忍力、秩序力中外鲜见，殊觉人心未死，尚有可为。及是时期，急就天然之利，辅以人事，一心一力，共图自保。”商榷书明确倡议“现有自保条件”4条、“将来自保条件”15条、“筹备自保经费”办法5条，其核心内容是筹措经费、“练国民军”和制造军械，武装群众，实现“川人自保”。商榷书的问世，使清廷大为震惊。赵尔丰把商榷书看作是四川反清独立的信号，决心镇压日益高涨的保路运动。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借口《川人自保商榷书》隐含独立，开始镇压保路运动。首先查封立宪派和保路同志会的喉舌《四川保路同志会报点》、《蜀报》、《西顾报》、《四川商会公报》、《启智画报》等报刊，同时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和股东招待所。

七月十五日(9月7日)，赵尔丰以请到督署看电报为由诱捕保路运动领导人——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纶，铁路股东会正副会长颜楷、张澜和主事邓孝可、江三乘、胡嵘、王铭新、叶秉诚、彭兰村等人，本拟立时处决，因将军玉昆要赵请旨定夺，才改为严加监禁。成都人民得知蒲、罗等被捕，十分震动，群众扶老携幼，沿街呼号，不约而同地蜂拥至督署请愿。赵尔丰令营务处统领田征葵率军开枪，在督署内外屠杀平民，并派马队分巡各街，冲截践踏，伤毙群众，一时，伏尸累累，鲜

血成溪,平民、学生、小儿无辜死伤者甚众。这就是清廷及赵尔丰制造的震惊中外的“成都血案”。它迅速激化了四川的矛盾,成为同志军大起义的导火线。

### (3)同志军起义

成都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即下令全城戒严。正在城中的同盟会员龙鸣剑缒城而出,直奔城南农事试验场,偕同朱国琛、曹笃等人,削制木片数百块,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全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21字,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时值秋潮水涨,音讯立即传遍全川,成都附近的华阳、新津、双流各县同志军率先举起义旗,其它各地也纷纷揭竿而起。

七月十六日(9月8日),同盟会员华阳县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率义军千余人抵成都牛市口,沿途与清军激战,并派人四出鼓动,征招同志。十八日(10日),同志军扩大至万余人,与清军激战于琉璃场,次日,大张旗帜军械,攻打省城东门,攻城失利,退至仁寿县籍田铺,设立东路民团总机关。数日内,队伍发展到20余万人。秦载赓所率东路军,旋与王天杰、龙鸣剑所统荣县民军,陈孔白所统井研民军会师于仁寿籍田铺,复与清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等蓉城近郊。然同志军卒以武器陋劣,遂放弃进攻成都,分兵收复州县。

同时,新津县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率所部同志军,与双流县同盟会员向迪璋所领双流、温江、华阳、崇庆、郫县各场镇同志军6000余人会合,集中于双流县城和簇桥。七月十七日(9月9日)与清军激战于红牌楼,乘胜进迫成都城下。同盟会员灌县哥老会首领张捷先、郫县哥老会首领张达三统率西路军,分5路向成都城郊进军。打死打伤清巡防军200余人。同时又击败清军第67标,迫使清军退守城垣。同志军团团包围成都,砍断电线杆,阻截官方邮递文件,同清军英勇战斗。

七月二十四日(9月16日),温江同志军统领吴庆熙率军参加红牌楼战斗,与巡防军在辜家碾大战6小时。两天后,又会同孙泽沛在温江三渡水伏击新军,擒斩队首陈锦江,毙敌80至90人,缴械百余支,威名大振。

同盟会员蒋淳风曾组织西路同志军学生大队,由成都府属中、小学生500余人组成,与清军激战郫县,犀浦间,大队长蒋淳风阵亡,学生多英勇牺牲。原《西顾报》总编辑池梁矩、编辑陈宽均投笔从戎,同时参加同志军武装起义。池以后成为綦江独立的领导人,陈为著名的东路同志军反清檄文的执笔者。省城学生王西平亦于血案后,返西昌原籍组织同志军,策动各族人民反清起义。

崇庆同志军声势浩大,各区树帜开会声讨赵尔丰,攻占州衙,炸毁狱

署,各乡镇响应者 2000 余人,形成东南西北中 5 军,其中以西军战斗力最强,与温江、大邑互相配合,断敌通讯联络,与清军大战数次。

数日间,华阳、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灌县、大邑、崇庆、邛崃、蒲江、广汉、金堂等成都郊县,富顺、荣县、威远、峨边等川西南州县群众纷揭义旗,每县大者万人,小者数千人,一时同志军大盛。到处砍断电线,截阻邮路交通,截留粮税作为义军饷需,使赵尔丰龟缩成都,坐以待毙。

七月十九日(9月11日),清巡防军第8营书记周鸿勋率部起义于邛州,旋进军双流,与南路同志军首领侯宝斋会师于新津,聚众至10万,侯、周分任川南全军正副首领,掌管县政,军威大振。周鸿勋又乘胜攻占邛州,枪毙知州、劣绅,造成震撼全蜀之势。赵尔丰急令新军统制朱庆澜、提督田振邦亲率重兵会剿。侯、周协力保卫新津,激战达半月。由于同志军决岷江上游堤坝,使新津河水猛涨,东岸清军无法渡江出击。同志军采取偷袭侧击战术,牵制敌人。加之各地义军大声援,使清军腹背受敌。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清军凭借优势火力,猛攻抢渡,同志军退守县城。二十一日(12日),清军破城,二十二日(13日),同志军向外州县转移。

九月初(10日)下旬,周鸿勋率南路同志军一部攻打嘉定(今乐山市)。

在名山县稍事休整后,由夹江、洪雅至牛华溪、五通桥,歼盐务巡防营,得快枪数百支。攻犍为失利。应荣县、威远同志军邀请,率部众千余驻荣县,被秦载赓、王天杰推为川东南同盟军统领,合兵攻克自流井。周鸿勋是策动四川清军倒戈反清的第一人,率部趋驰川西南各县,发动各地起义战绩卓著,牺牲时年仅28岁。

在遍及全川的同志军起义中,新津保卫战和大相岭阻击战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的主力,掩护了川东南各地同志军斗争的发展,从9月到11月,威远、荣县等地相继独立。九月二十四日(11月14日),赵尔丰被迫释放蒲殿俊、罗纶、江三乘、张澜、胡燏等9人。

11日,四川各地相继光复。21日,大汉蜀北军政府成立,都督曾省斋,副都督张观风。军政府组成后,废除清朝统治的一切制度,改州为县,并发布告示安定社会,奖励生产。同时扩充武装部队,全部民军整编为三个大队,共2000余人。

22日,蜀军政府在重庆成立,都督府是蜀军政府的最高机关,设正副都督各1人,总揽军务及一切政务大纲。设立总司令处以保持军事的统一。还设立参谋、司令、军务、行政、财政、司法、外交、交通等部。都督张培爵、副都督夏之时,顾问杨庶堪、朱之洪。

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早在9月2日,清廷即命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率鄂军引31及32标一部共2000人入川镇压保路运动。10月13日当端方到达重庆时,武昌起义已经发生,四川的起义正如火如荼,端方迫于形势不得不变“剿”为“抚”,希图转向拉拢四川立宪派绅士以撑危局。他上奏弹劾赵尔丰“构成冤狱”,要求释放蒲殿俊、罗纶等保路同志领袖人物。11月18日,端方军抵资州,此时,隆昌、荣昌、资州、简阳、威远一带已为同志军占据,端方陷入了四川同志军的包围之中。鄂军党人于11月26日夜,在郊外举行紧急会议,一致决议杀端方起义。公举陈镇藩为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树立大汉国民军旗帜。27日凌晨,陈镇藩命王占林等30余人拥到天后宫,逮捕端方及其弟端锦,32标军士卢保清挥刀立斩端方,任永森击杀端锦。陈镇藩等立即通电响应武昌起义。11月27日,赵尔丰发布《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宣称“四川全省事务,暂交四川咨议局议长,设法自治。先求救急定乱之方,徐图良善共和政治”,这不过是赵尔丰以退为进的韬晦之计而已。同一天上午12时,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设军政府于明藩王皇城。都督蒲殿俊,副都

督朱庆澜。

大汉四川军政府成立后,面临的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如何处置哥老会,二是如何整编军队。这两个问题纠缠在一起,使独立后的局面愈加复杂、险恶。蒲殿俊等人既不能采取有力措施解散各处“公口”,安定社会秩序,又不能整编清军,以防止其叛乱。独立后的成都社会秩序紊乱不堪,危机四伏。12月8日,蒲殿俊、朱庆澜在东较场阅兵训话。巡防军借名索饷,举枪射击,骤然哗变。蒲、朱一闻枪声,狼狈逃走。叛兵拥至市内烧杀抢劫,全城乱枪四起,火光冲天;“省垣公私财货,军需利器,抢掠一空”。兵变后,“四城无一片国旗,人尽闭门未敢出,市上购寸畜不得,惟运赃者络绎于途”。当时人估计:“公私损失财产不下有千万金,全省精华尽于此劫。”

成都兵变发生后,同盟会员尹昌衡立即奔赴陆军小学,令陆小学生武装占领北门,并在北门至北较场附近布防,并召新军63标标统周骏等人速集士兵,入城弹压叛军。12月9日,新军将领周骏、彭光烈等约集士绅徐炯、邵从恩、张澜及同盟会员董修武开会,推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重新建立了四川军政府。四川军政府

戴执礼《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12页。

秦枏《蜀辛》卷下。

杨少基《四川革命小史》。

成立后,采取平乱措施,发布告示,严禁纵火抢劫,仇杀奸淫。对聚集在成都的20万陆军、巡防军和同志军进行整编。当时,成都群众讨赵的呼声高昂,尹昌衡采取断然措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通过严惩赵尔丰的决议。12月22日,军政府军队包围督署,擒获赵尔丰,押至皇城明远楼下,历数其罪;“明刑正典”,枭首示众。与此同时,成都的旗兵官民疑惧不安,军政府遣通省师范学堂监督徐炯劝旗兵缴械投降,尹昌衡亦往满城宣讲:“衡虽志在革命,绝不多杀无辜。”促使清成都将军玉昆率旗兵向军政府投降。军政府“畀以所驻甲地,得自鬻,营生计,与汉族杂居”,“拨旗饷安之,不戮一人,内外欢呼。和平处理了省会2万多满族官民问题,避免流血事件发生。

四川军政府还宣布“一切病民旧法概行破除”,“百货厘金业已全裁”,提倡振兴实业,恢复新式学堂。严禁蓄辫、赌博和种植吸食鸦片,对腐朽的封建官场风气和社会恶习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传至成都,四川军政府即表拥护,通告省城及各州县“一律悬挂国旗三日,以志庆

祝”,并“传令遵南京临时政府令改行西洋历”。

(4)四川独立后的短暂统一 辛亥革命在四川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成、渝两个军政府峙立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给革命后的四川政局带来若干影响。首先,行政力量削弱,在一些地区出现统治真空;其次,事权不统一,财政无法整理。其三,援川滇军利用四川不统一,力量分散之机,在四川任意扩张势力,抢夺地盘。并采取扬此抑彼的办法,只承认蜀军政府的合法地位,对四川军政府则攻击中伤,借机遣散和镇压同志军,杀害同志军领导人,其骄悍蛮横,使四川各界均感到严重威胁。另外,清王朝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大批清军南下,陷潼关,犯皖北,陕西告急。因而为了彻底推翻清王朝,成、渝两军政府均主张以全川、全国大局为重,联合两军政府,统一四川,以清内乱而谋北伐。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日(1911年12月29日),四川军政府致电蜀军政府,提出合并初步条件,其要点有:(1)以成都为四川政治中枢;(2)重庆应设重镇,置镇抚使1人,领兵1镇;(3)拟以成都正都督为四川正都督,重庆正督

《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卷下,第475页。

《蜀党史稿》。

纺铭《尹太昭小传》。

《四川都督府政报汇编》。

《民国重修彭山县志》卷2。

为四川副都督 ;(4)两处副都督 ,拟担任重庆镇抚使或枢密院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 ;(5)各部长官 ,合两地人才组织之。

蜀军政府对于合并无大的异议 ,两地党人军很快取得了一致看法 :暂认成都为政治中枢。1912年1月27日 ,成渝代表拟就《成都四川军政府、重庆蜀军政府协议合并草约》11条 ,双方签字盖印。合并草约基本上是以四川军政府提出的合并条件蓝本 ,但在确定正、副都督问题上略有改动 ,规定正、副都督由合并后军政府各处、部、院职员投票决定。

1912年2月17日 ,四川军政府致电孙中山、黎元洪、黄兴报告四川统一经过。四川统一得到南京临时政府的承认。

3月3日 ,张培爵在赴成都途中致电孙中山等 ,推举尹昌衡的蜀军政府正都督 ,自己愿为副都督 ,以勉尽国民之责。3月9日 ,张培爵到达成都。11月 ,尹昌衡、张培爵正式就任四川军政府正、副都督 ,罗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 ,夏之时任重庆镇抚府总长。同日 ,致电孙中山、黎元洪正副总统 ,报告四川统一。合并后的四川政权称中华民国四川都督府。

(二)民主政治的脆弱尝试—民国初年的政治角逐

### 1 短暂的民主风潮与民主政治

(1)民主共和风潮 辛亥革命给

中国人民带来了一次精神大解放 ,随着2000年来君主制度的结束 ,四川社会的变迁首先突出的反映在人们思想观念、风俗时尚的变化 ,其变化的主要标志就是民主共和的观念正潜移默化地震荡人心。四川人民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活动 ,悼念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献身的四川先烈。这些活动本身就是一次民主共和思想的宣传。1912年2月22日 ,川籍各界人士在南京为辛亥四川死难烈士举行追悼大会 ,到会者达千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亲临致祭。川籍革命党人黄复生等42人呈请南京临时政府优恤为革命而壮烈死难的川籍烈士。3月29日 ,孙中山明令陆军部 ,邹容、喻培伦、彭家珍照陆军大将军、谢奉琦照陆军左将军阵亡例赐恤 ,准崇祀忠烈祠。5月12日 ,大足县军商学界800人 ,在县城中学堂召开大会 ,追悼黄花岗死难烈士饶国梁。成渝合并不久 ,为纪念蜀军政府和革命党人的历史功绩 ,在重庆府中学建立了“蜀中起义纪念碑” ,在朝天观建立“蜀军光复纪念碑” ,在都督府建立了“蜀军成立纪念碑” 。9月7日 ,时值辛亥“成都血案”1周年 ,四川各地举行了保路纪念大会。四川都督府特于事前通令全省于9日举行纪念会。

民国初年 ,四川舆论开放 ,报刊蜂起 ,进一步开展了一次民主共和的思想启蒙。在辛亥反正民国成立的时候 ,成都报界出现兴盛局面 ,先后创刊



的报纸就有数十种之多。如《都督府政报》、《四川独立新报》、《蜀江报》、《蜀风报》、《民鉴日报》、《大岷报》、《鸿音报》、《西成报》、《宇一报》、《民极报》、《新民语》、《庸民白话报》、《民主急进报》、《天民报》、《社会新闻》、《白话进化报》、《民意报》、《益风报》、《大汉国民报》、《共和日报》、《公论日报》、《演进报》、《女界报》、《西蜀新闻》等。这些报刊发表的论说新闻“也能够准人尽情倾吐,不必忌讳”,对于宣传民主、启迪民智起了一定作用。

辛亥革命后川剧的革新,也是民主共和观念震荡人心的一个反映。1912年成都川剧界艺人在“五族共和”思想影响下,打破旧的戏班制度,建立新的组织“三庆会”,共同改良川剧。他们改革旧戏班在艺人中的封建等级制度,按艺人工作轻重和艺术水平,建立起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尤其是进行艺术改良,提倡严肃舞台生活,纯洁表演艺术,清除庸俗表演。1913年,在成都出现的新的剧团“教育会”,除了对传统剧目改革创新外,还大演颂扬辛亥革命的新剧目,如《重庆独立》、《陕西独立》、《黄兴挂帅》、《祭邹容》、《徐锡麟刺恩铭》等等。扩大了民主思潮在群众中的影响。

民初,四川许多民众团体纷纷出现。南溪县有“天足会”、“崇俭会”、“旅外同乡会”、“校友会”、“自治会”、“佛教会”、“道教会”、“文艺会”等。泸

县有“砺学会”、“观摩会”、“体育会”、“慈善会”、“同善会”、“佛学会”、“医学社”、“阅报社”、“讲演会”、“游艺社”等。绵竹县有“佛学会”、“哲学会”、“十全会”、“赈济瞽目公社”、“立善堂”、“济公会”、“慈善公社”、“医药会”、“施棺会”、“义冢会”等。

在众多民众团体中,最响较大的有“教育会”、“农会”、“工会”、“商会”4大团体。这4大团体是从清末时出现的,在民初仍继续发展。1913年,四川各地商会总数已达102个,入会商号有34649家,议事员2099人,会议次数9322次。议事6144次。这些民众团体的出现和发展是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

清末民初,地方政治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县议会和参事会的成立。这种制度始于清末,民初,各县仍陆续成立。据《荣经县志》所载《县议会简章》规定:“县议会为本县最高立法机关,得自行集会、开会、闭会,但必先知会本县官府。”“议员名额以该县人口为准,人口总数在20万人以下的定额20人,每增加人口2万,增选议员1人。议员由本县公民选举担任。县议会设议长1人,副议长1人,由议员用无记名方式互选产生。县议会的职权,主要是对地方行政实行咨询和监督。由县议员中举出5人成立参事会,以县知事为会长。”

民初,地方司法制度也有所改革。当时,成都设立省级上诉法庭“高等审判厅”。在其下,成都、华阳两县合设一个“地方审判厅”,各设一个“初级审判厅”。1912年,重庆设立高等审判厅。司法改革禁止刑讯体罚。县级的司法仍归县知事兼理。

1912年7月,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教育家蔡元培主持召开了中央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改革的宗旨、政策和措施。9月,教育部根据临时教育会议的决议公布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教育。”公布了学制系统和各级各类学校的法令。废除“忠君”、“尊孔读经”的封建信条,贯彻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精神,增加自然科学课时,加强生产技能教育。这一改革促进了四川地区新式教育的发展。1916年,全省有男生高级学校6所,法律学校2所,师范学校18所,中学67所,小学14547所,共有男学生500661人;女生师范学校1所、中学1所,小学493所,共有女生24624人;男女教员合计22172人,外加校长及督学等15257人。

## (2) 昙花一现的民主政治

民初,四川出现了政党纷立的局面。新兴党派中,以四川社会党支部成立最早。在1911年9月,江亢虎为首的中国社会党在上海成立。1912年3月6日,四川社会党支部在重庆

成立,唐廉江任部长。唐与重庆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曾积极支持革命。重庆光复后又首先联系省内外光复各地组织北伐军。支部成员还有燕梓材、周文钦、何子桢等人。开展了一些普及平民教育、开办小型工厂等平民福利事业的宣传活动。又与哥老会组织“汉流唯一社”结合,唐廉江任社长,出版《国是报》,宣传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1912年5月,统一党、民社等团体在上海组成共和党,推黎元洪为领袖。其后派黄云鹏回川组织支部。1912年8月18日,在成都铁路公司举行四川支部成立大会,由四川已有的“统一党”、“民社”、“演进党”、“政进党”、“政济党”、“民主党”、“国民共济会”等7团体代表组成。推出胡景伊、黄云鹏、印焕门、张子梁、刘冕为常务干事,裴钢、杨光护等30人为干事。由朱大镛代表胡景伊主持党务。办有《共和日报》。

1913年春,“民主党四川支部”在四川共和建设讨论会的基础上成立,推胡骏、邵从恩为正副支部长,邓孝可、罗纶、张澜、沈宗元、萧湘等人为骨干人物。发展党员数千人。同年6月22日,改组为“进步党四川支部”。

1913年9月,四川同盟会员根据国民党总部指示,组成国民党四川支部,设机关于成都簾官公所街原周善培宅所。由董修武、张培爵任支部长、

下设党务部、交涉部、文书部、财务部、庶务部、评议部等6部,并创办《四川民报》,宣传该党政见。还办有“共和大学”。

上述政党代表了在四川三种政治势力: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袁世凯在川势力。围绕四川省第一次省议会的召开,三种势力展开了第一次交锋。

1912年7月1日,四川临时省议会在成都纯化街开幕,选出骆成骧为议长、胡骏、邓孝可为副议长,姚弼宪为秘书长,临时省议员计292名。原立宪党人占了很大优势。

1912年8月,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正式公布由临时参议通过国会组织法。按规定参议院由各省议会选出,四川省应选出10名。众议院议员由各地方人民选出,四川名额为35名。9月,公布《省议会议员选举法》、《各省第一届省议会议员名额表》,四川应选出省议员140名。预定在1913年春成立国会和省议会。

1913年1月26日,全省分7区进行复选,选出第一届省议员140人。2月26日集会选举议长,出席者119人。选举结果,国民党候选人杨庶堪和共和党候选人朱大镛票额均未过半,民主党候选人胡骏仅得10票。为了在省议会中击败国民党,共和党和民主党秘密订约,共和党放弃正议长

人选,选民主党胡骏为议长,共和党朱大镛为副议长。3月1日,再次集会,出席投票者123人,胡景伊为选出预定人选,竟以兵力威胁议员,强迫投票。结果胡骏以63票当选议长席位。次日共和党朱大镛当选为副议长。3月7日国民党唐宗尧当选为副议长。但由于国民党议员对于胡景伊的作法极为愤慨,控告国务院并不出席会议以示抗议。10日,胡骏辞职。

在省议会正式成立后,围绕“预决算案”和“迎严拒胡”,三种政治势力再次展开较量。国民党与民主党联合对付共和党,最终是胡景伊占了上风。

尹昌衡在四川陆军武备学堂时,是胡景伊的学生,在广西时,与胡景伊有厚交。为加强自己的势力对抗蜀军政府,尹昌衡于1912年2月27日任胡为全川陆军军团长兼军事参议院副院长,命令川军各镇均受其节制调遣。川军将领周骏、彭光烈、刘存厚等人也是武备学堂学生,与胡有旧,遂一致表示拥护,从此奠定了胡景伊窃夺四川军政大权的基础。胡景伊上台得力于尹昌衡的扶持,而革命党人的退让也是一个因素。成渝军政府合并后,因夏之时辞职,尹昌衡任命胡景伊为重庆镇抚府总长。胡到重庆不久,见革命党人势众,便着手废重庆镇抚府。在尹昌衡的支持下,6月10日,重庆镇抚府宣布撤销,改设府知事。原由革命党人掌握的各机关也一并撤销。

至此,革命党人失去了与胡景伊抗衡的阵地。

尹昌衡利用胡景伊排斥革命党人,然而也导致他自己的下台。1912年4月,在英国的唆使下,西藏上层农奴主以“驱汉”为名,策划武装叛乱。英国以保护商务为名乘机出兵侵占西藏的江孜、围攻昌都、巴塘,川西震动。7月10日,尹昌衡率兵2500人从成都出发,与原有边军及以前陆续所派部队共1万多人,进行西征。分兵直赴理塘、昌都、巴塘,击溃藏军,收复失地。英国为实施侵藏计划,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袁世凯北京府接连电令尹昌衡停止进军。尹昌衡设镇抚府于打箭炉,借此控制川边。

袁世凯为加强专制集权,在尹昌衡出兵西征时,借“军民分治”之名,于1912年7月12日任命胡景伊护理四川都督,贬副都督张培爵为民政长,后又电召张人京,由胡兼任民政长,使胡景伊独揽了四川军政大权。

在川革命党人对胡景伊上台后所做的种种坏事虽愤懑于怀,但由于内部涣散无力,不得不借助民主党势力,采取“迎尹”、“拒胡”的斗争策略。由熊克武、杨庶堪等人商议,遣人与尹昌衡联络,策划其回成都复任都督,取消胡景伊的护理都督职。1913年6月,尹昌衡由川边回省。但胡景伊凭借手中大权,调集军队,密布爪牙,四门戒备,欲以武力阻止尹昌衡入城。尹昌

衡无决心同国民党合作,仅绕道驻扎城外。7月11日,袁世凯不顾川人輿情,强行发表胡景伊实授四川都督,调尹昌衡为川边经略使,因“各方反胡甚烈”,改任尹为川边都督。15日,胡景伊正式就任四川都督。曾经一度出现的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很快消失了。

## 2 共和与专制的较量

(1) 癸丑讨袁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伤重致死。很快就发现确实证据,其直接主使人是袁世凯的亲信、内阁总理赵秉钧,袁世凯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与此同时,袁世凯正与英、德、美、日、俄5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谈判,取得帝国主义的支持,镇压反袁力量。

胡景伊在四川积极配合,对李烈钧等三都督(国民党人)以及两院国民党人横加指责。唆使四川都督府参谋长张毅领衔,以川军1、2、3、4师师长及全体军官名义发出电函威胁。

6月,袁世凯先后下令罢免国民党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并出兵南下。国民党被迫应战,在孙中山、黄兴的号召下,南方各省国民党起来反对袁世凯。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告独立。15日,黄兴在南京成立讨袁军。安徽、广东、福建、湖南于7月份内宣布独立;“二次革命”开始,也称“癸丑讨

袁”。

8月4日,川军第5师师长熊克武在重庆宣布独立,建立四川讨袁总司令部,熊克武为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兵力有川军第5师和蜀军两个团。熊克武发动讨袁的同一天,四川都督胡景伊颁发了“查禁乱党令”。袁世凯8月12日下令,解除熊克武的官职,责成胡景伊严拿惩办。胡景伊兵力有川军第1、2、3、4师及模范团,袁世凯又令鄂、陕、滇、黔等省派兵参加围攻。

战争初起,讨袁军取得一些胜利。主攻方向讨袁中路在永川至泸州道上立石碣击退川军第1师张鹏舞旅,进据特材铺、寒坡场。随中路部队前进的水师余际唐部迅速越过江津朱沱,进至合江王场、白米场、望龙场一带。8月11至13日,中路分遣的吕超所率右支队与周骏部激战于隆昌土地坎,败退石燕桥。8月14日,周骏部第1团5个营起义,参加讨袁中路军。第1师师长周骏因小市失守,泸州难于守御,仓皇逃往纳溪。北路讨袁军大败王陵基部于合川。

讨袁军兴,四川各地民军乘时而起。8月中旬,张伯祥、张品山、张曲东由广汉起兵,占领绵阳,张伯祥称讨袁军总司令。9月中旬,尹昌衡的护卫团团团长张煦响应讨袁,在打箭炉宣布独立。9月15日,国民党人王天杰响应讨袁,率地方民军2000人起义于荣县自流井之间。9月,国民党人龚

焕然等人袭击阆中县城,成立北伐军司令部。此外还有酉阳、开县、中江等地均各举义兵,共为声援。

当熊克武部各路讨袁军已西达资州,北抵顺庆(今南充),南面泸州指日可下之际,奉袁世凯之命入川的陕军9月17日到达夔府,进趋万县,下川东告急;滇军进至宜宾,南面受到威胁;黔军突陷綦江,进至距重庆不远地形险要的三百梯。重庆守备兵力极为单薄,熊克武急调吕超率1支队回援重庆,但已来不及了。熊克武、杨庶堪于9月11日、12日离开重庆东下出川。黔军与川军王陵基支队先后进入重庆,熊克武讨袁军败北,讨袁各部民军也被镇压,四川讨袁“二次革命”以失败告终。

9月12日,黔军进驻重庆。16日,王陵基率队赶到重庆。17日,袁世凯任命黔军黄毓成为重庆镇守使。20日,川军周骏、刘存厚两师前队到达浮图关。川黔两军为争夺控制重庆,剑拔弩张。黔军宣布戒严。是日夜,川黔两军爆发了争夺重庆的火并,焚烧民房多处,居民死300~400人。川黔两军各有伤亡,王陵基被逐,移驻江北。最后处理办法,是由袁世凯给黔军黄毓成军费银20万元,奖银3万元,黄毓成于10月5日率部回黔。

袁世凯、胡景伊镇压讨袁军后,对四川国民党人大加杀戮,王天杰等40余人被害。1914年1月23日,袁世凯

下令通缉参加讨袁起义者 108 人。“癸丑讨袁”的失败,使国民党在川的实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2)护国之战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梦寐以求爬上皇帝宝座。在镇压“二次革命”中,北洋军阀势力伸入南方,加快了袁世凯的复辟活动。只是两广和川、滇、黔 5 省,尚为地方势力所据,特别是四川对其统治威胁最大。四川反清武装斗争最为激烈,同志军武装起义,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烈火,摧毁了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胡景伊虽为袁世凯镇压四川“二次革命”出过大力,但胡不是袁北洋嫡系,且不能完全控制和统一四川各派势力。因此袁世凯决心以其亲信陈宦取代胡景伊,并派北洋军进入四川,加强对四川以及云南、贵州的控制。

陈宦曾任袁世凯威虎营的管带,颇得袁信任。1904 年,袁将陈宦荐于川督锡良,锡良委以四川常备军教练官兼帮统重任,不久升统领兼四川武备学堂总办,再升四川新军第 33 混成协的首任协统。锡良调任云南及东三省总督时,陈宦随之。袁世凯当总统后,陈宦被荐为参谋次长。川滇两省高级军官,多为陈宦门生故旧,加之陈宦与南方军事派系无任何联系,派陈宦入川袁世凯是放心的。

1915 年 2 月 20 日,袁世凯任命陈宦为毅威将军,会办四川军务。同时派北洋军 3 个混成旅 12000 人随陈宦

入川。另外陈宦还带亲兵两营和 1 个技术营约 2000 人。4 月 29 日,陈宦顺利到达重庆。5 月 1 日,令署四川巡按使陈廷杰晋京觐见,任命陈宦署四川巡按使。此后又委任陈宦监督四川司法、行政、财政事宜。28 日,陈宦抵达成都。6 月 22 日,袁世凯令胡景伊晋京觐见,任陈宦兼行督理四川军务。

7 月中旬,陈宦整编川军为两个师又两个混成旅。大量裁减了川军部队,安插亲信,使川军逐步北洋化。在军队设置“督察员”、“专员”、“承审”等特派员,监视川军的行动。并着手实施“大清乡”,进一步分化瓦解川军力量;“扫除乱党”与“匪患”。

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登基称帝。25 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戴戡、任可澄等在云南宣布独立,成立护国军,声讨袁世凯,并号召各省同时起义。1 月 1 日,云南成立都督府,举唐继尧为都督,蔡锷为护国军总司令。下设三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统军攻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滇南,攻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昆明。戴戡率黔军入川,为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护国战争开始。

1916 年 1 月 5 日,袁世凯令长江上游总司令曹锟,自将北洋军第 3 师 8500 人,率张敬尧的第 7 师约 6000 人,李长泰的第 8 师约 7800 人,入川抵御护国军。10 月,命伍祥桢为川南镇守使,以抵御云南护国军入川。19

日,曹锟率所部3个师抵重庆,又遣兵向泸州、綦江出发,抵御滇、黔护国军。北洋军前后入川人数达36000余人,为护国军的10倍。

1916年1月16日,蔡锷军刘云峰团击溃伍祥桢和汉军朱登五部。1月21日,护国军占领叙府。陈宦令冯玉祥部攻叙府之东,朱登五部攻叙府之南,警卫团长倪聘率部及川军数营自成都顺流而下,总计兵力约15000人,四路围攻叙府。刘云峰急电驻纳溪川军刘存厚部,希早日进攻泸州,解叙府之围。1月31日,刘存厚在纳溪宣布独立,通电讨袁,称护国川军总司令。2月5日攻占泸州蓝田坝。护国军与围攻叙府的袁军血战8昼夜,6日将其击溃。3月1日,冯玉祥部反攻叙府。8日,纳溪失陷被占领。17日,护国军大举反攻,先后收复纳溪、江安、南溪等地,北军溃散。

1916年2月3日,护国第一军右翼总司令戴戡率黔军由贵阳出发。14日向四川綦江前沿阵地发起进攻。18日,攻占马口垭。历时4天的初战,歼敌2000余人。2月17日,两军在綦江、江津之间龙台寺一带展开激战,3月10日,又激战于草坪垭一带。14日,护国军又与敌人5个营在石牛口等地激战,毙伤敌军数百人。

护国战争爆发后,四川各地民军和部分川军纷起响应。1916年2月,萧德明在大竹宣布独立,同时有郑启

和等在广安宣布独立。23日,卢师谛率部在自流井起义;3月,石青阳等在酉阳起义;4月,杨维在灌县起义,同时王靖澄在金堂起义,占领潼川,宣布独立。川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钟体道与张澜在南充独立,前川军第二师旅长刘成勋在雅安起义。

云、贵宣布独立讨袁后,广西、广东先后宣布独立。四川将军陈宦和湖南将军汤芑铭迫于形势,于5月22日、23日相继宣告独立。5月23日,袁世凯申令撤销帝制案。6月7日,黎元洪代理大总统。24日,北京政府特任蔡锷督理四川军务兼四川巡按使。各省纷纷取消独立,护国战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3) 护法与靖国之役 1917年7月,张勋等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率兵逐走张勋,复任内阁总理,黎元洪辞职,冯国璋以副总统例行大总统事。两院议员相率南下。8月25日,孙中山召集南下广州的国会议员成立非常国会。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法》。9月1日,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2月,选举广西督军陆荣廷、云南督军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言戡定内乱,恢复约法,宣布段琪瑞为叛逆,并出师北伐,开始进行护法战争。川军第5师师长熊克武及驻川的滇、黔军将领,响应护法,称“靖国军”,

因之护法战争在川又称“靖国之役”。

1917年7月16日,唐继尧发出通电,声讨刘存厚犯上作乱,并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对刘进行讨伐。唐继尧并不愿意与北京政府决裂,他的“靖国”实为“靖蜀”,把四川“靖国之役”引入川滇黔军阀争夺四川的混战之中。

1917年7月24日,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8月24日,任命张澜暂代护理四川省长。8月6日,任命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10月24日率北军入重庆。

滇军川南战败后,军长顾品珍等集中川南准备反攻。在重庆的熊克武派人到川南与滇军联络,会攻重庆。退驻綦江的黔军与四川靖国军石青阳等部分3路突然进攻重庆。时川军集中叙、泸,吴光新孤军难敌,12月3日撤退重庆南岸驻军,当晚率卫队乘轮东下。周道刚见北军已去,也乘夜逃离重庆。4日,黔军袁祖铭部与川军石青阳部入重庆。刘存厚部被迫从川南撤退,滇军乘机进攻,12月14日,攻占泸州。

“靖国”军兴,四川民军纷起响应。开江、达县、宣汉、大竹、合江、川西、潼南、荣昌、宁远、雷、马、屏、峨等地相继举兵,参加“靖国”。

12月15日,川、滇、黔三省各军将领会商于重庆,推举唐继尧为川、

滇、黔靖国联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商议决定,川、滇、黔靖国联军分3路进取成都。北京政府12月18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20日,任命徐孝刚为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刘存厚率川军1、2、3师分路抗拒靖国联军。1918年1月14日,滇军与刘存厚部及第3师激战于内江、隆昌一带。30日,滇军入宜宾。2月1日,入自流井。5日,占内江,向资中方向挺进。熊克武的川军第5师与黔军袁祖铭部于1月28日攻占遂宁。2月5日,入乐山。18日,攻入简阳,在简阳与金堂间与刘存厚部激战,夺取淮州镇。2月18日,川军第1师以及刘存厚部旅长刘成勋等通电一致护法。19日,刘存厚、张澜、钟体道由成都退往绵阳。川军靖国军纵队、黔军袁祖铭及靖国军石青阳等部先后进入成都。25日,唐继尧以滇、川、黔联军总司令名义,任命熊克武兼任“四川督军省长”两职。

6月9日,刘存厚、张澜败退陕南。四川护法之役遂告结束。

1911年12月,滇军以援助革命名义进入四川,在叙府、泸州一带攻击革命政权和军队,劫夺税款,自行委派地方行政和税务官吏。旧川军周骏、刘存厚等部霸占自流井,随意掠夺。滇、黔军则长期占据川南至成都一带。1917年2月17日,四川省长戴戡应四川督军罗佩金要求发出训令,承认驻



军在当地税项下提留军饷,从而使“就地划饷”成为定制。1917年10月4日,刘存厚逐走罗佩金、戴戡之后,以四川陆军第1军司令部名义发出训令,进一步肯定了“就地划饷”;“防区”之名始见诸于政府文件之中。

(4) 沉闷中的惊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对四川的震撼 袁世凯出于帝制复辟的需要,大肆提倡尊孔读经,企图把“孔教”定为“国教”,写入宪法。四川的一些封建耆老、旧官僚和原来的改良派也遥相呼应,推波助澜。1913年,四川都督尹昌衡致电袁世凯,鼓吹孔子之道,请袁命令全国学校尊孔读经。封建文人曾学传在成都发起组织“孔教扶轮会”,旋又作为孔教会成都支会,各县成立支会者20余处并向国会请愿,请求定“孔教”为“国教”。徐炯倡导成都华阳两县成立孔教会支会,于1918年创立“大成会”,自任会长,鼓吹尊孔读经。

立志变革的中国人却坚信只有彻底铲除封建专制,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他们从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必须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的结论,把改造中国社会的入手方向,从变革政治制度引向更深一层的文化观念的变革。1915年以《新青年》创刊为兴起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变革的号角。

《新青年》创刊后,相继在四川的成都、重庆、泸州等地设有代售处,广

泛发行,使新文化运动在四川激起了反响,吴虞是在四川高呼“打倒孔家店”的杰出代表人物。

吴虞(1872~1949年),字又陵,祖籍新繁,出生于成都。1892年入尊经书院,戊戌变法后“兼求新学”。1902~1903年间,与友人在成都创设“溥利公书局”、“开智阅报社”传播新学。有人赞誉他是“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1905年赴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速成科。1907年回国后,先后在成都县中学、嘉定府中学、官班法政学堂执教,常发表“非儒”言论。所编《宋元学案粹语》公开引述李贽文字,被清廷学部令四川提学使赵启霖查禁。1910年在《蜀报》发表《辩孟子辟杨墨之非》一文,痛斥君主专制与教主专制为天下“二大患”,表明自己要“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也”。他反抗父亲虐待,散发《家庭苦趣》,揭露其父丑行,为四川教育总会会长徐炯等目为“忤逆不孝”、“名教罪人”,被赶出教育界。1911年因撰写反对儒教和家族制度的文章,被护督王人文下令通缉。辛亥革命后,他担任过《西成报》总编辑、《公论日报》主笔、《四川政治公报》主编等。1913年在《醒群报》发表非儒言论,为北洋军阀电令查禁。

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吴虞任教于四川法政学校、外国语专门学校、国学专门学校,与学生一道组织《星期日》、《威克烈周刊》,倡导四川

地区的新文化运动。受吴虞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纷纷在各校组织书报社,购买新书杂志。同时,吴虞在《新青年》杂志上连续发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读荀子书后》、《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1919年6月在《川报》发表《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11月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吃人与礼教》。吴虞在这一系列论著中阐明了思想观念的变革问题,他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政治,必须从根本上改造文化思想,从专制主义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吴虞论著中还集中批判了儒家学说的内核——“孝”,认为“孝”为封建家族制度和专制政治的根本,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革新的桎梏,革儒教之命,首先在于破除以“孝”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规范。此外,他对“礼”和“刑”进行了剖析,认为二者均为封建统治者实行专制主义的工具。

吴虞的批孔反儒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以至“五四”运动中,影响极大,对于青年一代追求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陈独秀称他是“蜀中名宿”,胡适称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支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1919年5月7日,成都《川报》在显著位置刊登特约驻京记者王光祈5月4日从北京发来的关于天安门广场学生大游行、火烧赵家楼、以及痛打北洋军阀卖国贼的通讯。

5月9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各校学生酝酿组织“四川学生联合会”。同时,重庆各校学生抗议北洋军阀逮捕学生,发动罢课,游行示威,并发出通电,强烈谴责北京政府的卖国行为。

5月16日,《川报》收到王光祈写的关于五四运动的长篇通讯,《川报》编辑李劫人加上按语连夜编排付印。于5月17日在《川报》头版头条刊出。当日,以成都高师为首的各校学生数千人在高师致公堂前广场上集会,高呼口号,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随即整队上街游行、讲演,并向督军署和省政府请愿,要求通电各省,奋起抵制仇货(日货),爱国救亡。5月24日,重庆各校学生集会,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发表宣言,散发传单,并致电北京政府提出释放被捕学生、拒签巴黎和约等强烈要求。

5月下旬至7月,爱国运动从学界扩大到工、农、商、绅、军、政和女界,各界各阶层广大群众纷纷集会、游行,并组成各种救国团体。5月25日,成都学界和各界人士上万人在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召开声援北京学生爱国斗争大会,并组成学界外交后援会。6月8日,成都数万人民在少城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共谋救国方略。全川近百个县的各界群众先后加入爱国运动行列,成立国民大会的分会,参加爱国“十人团”的达10万人以上。与此同

时,在全川范围内掀起了提倡国货、抵制日货运动,重庆、成都和全省很多县都成立商学联合会,普遍抵制日货,重庆受雇于日人的工人、雇员纷纷罢工或辞职。工人拒运日货和日人,成都、重庆、泸县、江津等地都发生了群众大批焚烧日货的斗争,抵制日货运动持续近3年,对日本帝国主义打击很大,使日货在川几乎绝迹。五四爱国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在四川的发展,进步组织和刊物纷纷出现。较大的组织

有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四川学生联合会、川东学生联合会、救国毅进会、劳人团、綦江青年砥励会等;影响广泛的刊物有《四川学生潮》、《星期日》、《川东学生周刊》、《半月报》、《友声》、《新空气》、《威克烈》、《直觉》、《卫声》、《新蜀报》、《渝江评论》等。进步团体和刊物的先后问世,促进了四川爱国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 四、军阀混战至抗战前夕的四川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代之而起的是袁世凯的反动统治。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中国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四川的军事将领,乘时而起,拥兵自固,割占地盘,互相争雄,混战不已。从1917年刘存厚与罗佩金、戴戡之战起,到1935年蒋势力入川,军阀割据持续了长达18年之久。军阀混战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危害之重,堪称全国之冠。蒋介石势力入川后,防区制被打破,四川军阀从此衰败没落。

(一) 军阀割据,群雄并起——四川防区制的形成

##### 1 实力与防区

(1) 胜者为王——以兼并求生存

1918年3月,熊克武以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兼摄军民为政的名义进驻成都,7月发布《四川靖国各军卫戍及清乡剿匪区域表》,实行各军就地分防。但是滇军顾品珍对于盐款,仍然把持独吞,对他驻防区域内的行政官吏仍随意任免。熊克武通令统一军令政令之后,顾品珍并不通过督署,自行撤换资阳县知事沈燕贻,并自行委人接替,督署也只有听之。熊克武的命令在滇、黔军驻区内行不通,川军各师也相率效尤。至于税收款项,报解者少,索饷请款者多。在这种情况下,熊克武不得不决定各军就防区划饷,防区制逐渐形成。1919年4月,熊克武又明令发表《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

将原来“卫戍区域”的名称,改为“驻防区域”;“防区”作为军阀割据地之特定含义的名称,在四川固定下来。各派军阀分据情况是:第一师驻防区域在川西,计13县;第二师驻防川东北计13县;第四师驻防川西南计16县;第五师驻防川西计16县;石青阳驻防川东北计16县;颜德基驻防川东北计11县;黄复生驻防川东等9县;独立第一旅驻防川西南5县;独立第二旅驻防川西南计11县;屯殖军驻防川西北计5县;川边镇守使驻防西康计33县。另外万县、巴县及江北附近由江防军及黄复生选派驻防。第一混成旅及吴游击、郭守备所部暂驻成都。江防军担任川江正支河流防务。川南22县由滇、黔军驻扎。《四川靖国各军驻防区域表》公布后,川军又经过改编扩为8个师。第一师但懋辛、第二师刘湘、第三师向传义、第四师刘成勋、第五师吕超、第六师石青阳、第七师颜德基、第八师陈洪范。黄复生、卢师谛分任援鄂总副司令。

滇黔军被逐出川以后,川军内部夺地争霸的火并开始,接连发生了熊克武联合刘湘,驱逐刘存厚之战,结果刘存厚再次被逐出川。刘湘、杨森为首的川军第二军与熊克武、但懋辛为首的川军第一军的争霸之战,第二军失败,杨森被逐,刘湘下野。川军发生内讧,在吴佩孚支持下,杨森打回四川,刘湘东山再起,熊克武举兵“讨贼”

失败,军事力量被瓦解,熊克武被迫出川。杨森、刘湘再重新结合,将黔军袁祖铭驱逐出川。通过兼并战争,形成了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5大军事集团。

(2) 实力平衡—防区政治 从1911~1926年,四川有四件重大的事情。首先是军阀主义的浪潮占据了整个地方政府和社会;第二是统一的省级政权让位于省内的地方割据;第三是四川卷入了全国战乱割据的大环境与省外的政治领导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第四是辛亥革命后控制本省权力的第一代军人在20年代中期失去职务并让位于下一代的年青将领。在20年代后期,30~40年代,第二代军人构成了掌握四川大权的主要力量。

从1916年到1927年,四川军阀划区割据,自行其是。军阀轮换占据四川省的两个最高职位即军事和民政长官。军队数量激增,各自为政,任何一个军阀都可以在其管辖的地区内巧取豪夺,勒索军需,任命县知事和巡检等民政官吏。四川军队的急速增加,省级政府已名存实亡。征税、任命官吏、维持秩序、行使审判权,维修公共设施等,都落入军阀手中。

从1911年四川独立时滇、黔军进川,到1926年,四川曾多次遭到外省军队的进驻与侵扰。有的川军将领邀请“客军”入川协同作战,其后又与其

他川军将领组成广泛的联军,把进驻的客军逐出四川。1920年以前,对四川时局干扰最严重的是云南与贵州军阀。在反袁战争中,滇、黔军大量涌入四川,成、渝两地长时期被滇、黔军占领。190年后,刘存厚、熊克武在“川人治川”的口号下,联合将滇军驱逐出川,这以后,来自外省的侵扰次数减少,规模也缩小了。1924年,吴佩孚同杨森合作,曾从湖北派兵入川,但当时受华北战局牵制,最后这些军队撤走了。同年,黔军袁祖铭部也进入四川并占据重庆,川军于1926年将其逐出四川。外来军队在四川的出现,说明四川卷入省外以致全国性的政治冲突。川军之间的互相争夺,同时反映了第一代军人受到全国政治形势影响较大。虽然省内各将领之间一系列的联盟变化,似乎表明他们不可能始终如一的支持外部的某些主张,但1926年以前,四川的历次内战却同国民党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斗争发展是一致的。但川军很少出省作战,刘存厚几次越省逃到陕西,但都紧靠川省边界。1921年8月,川军曾进军湖北西部,配合湖南赵恒惕向湖北进军。这次北进的战斗很快失败,川军溯江而上,逃回四川。这次出川得罪了吴佩孚,幸而四川将领同吴达成一项友好协议,才阻止了吴佩孚入川。在20年代,川军偶尔出兵湖北西部,但时间短,人数少,川军各将领的精力仍集中于省内

的战线上。

随着地方分裂主义的日益增强,川军将领更不愿出川冒险。在四川军阀的互相残杀中,年轻一代四川军事将领凭借实力,很快取代老一代军人,担任了四川的主要军职。他们很少卷入象辛亥革命和南北冲突那样的政治纠纷,只顾自己以及地方的利、权,自行其事。这是辛亥革命以后全国政治进程屡遭失败的产物。第二代军人认为南北双方都不可能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因而不复依于南北势力,开始为谋求地方实力而自行其事。他们追求个人名位的野心,从地方的角度看待自身的利益。因此,1921和1922年,川军将领带头提倡川省自治。1920年12月20日,滇军被逐出四川后,驻防重庆的川军将领刘湘、杨森、邓锡侯、田颂尧致电熊克武和刘存厚,主张地方自治,认为自治可使四川摆脱南北冲突中的尴尬处境,并宣布“先改进对人民的治理方式,然后革新政府”。他们的公开观点是在集中的权力建立之前先使地方得到发展。实际是企图长久保持地方独立的权力。

(3) 割据状态的“列国” 1927年后,川军中的5位将领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对四川进行分治。各部各自占据相邻的若干个县,构成“防区”。各部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他们在各自的防区内行使自己的实际权力。

防区以县的多少衡量其大小,防区面积悬殊,也不断变化。防区边界的重大变化有两次:1929年杨森大败于刘湘,1932年刘文辉败于以刘湘为首的本省联军,丢失了大部分四川中部土地。1927年以后的十年间,各防区势均力敌,进入相持阶段。杨森于1927年将司令部从万县迁到重庆北面的广安,刘文辉于1933年将司令部从成都迁到雅安。刘湘的司令部设在重庆,邓锡侯的司令部设在成都,田颂尧的司令部设在三台,川东北刘存厚的司令部设在绥定(今达县)。

刘湘最初只在川南占据几个县,1929年后他控制了川东的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直到湖北边界。刘文辉占有川南及川西南的大部分地区。邓锡侯占有成都以西和以北的许多县。田颂尧的防区在川中北和川东北。杨森一度占有长江下游地区,1929年战败后,他的防区只有广安周围的几个县。刘存厚占有杨森防区东北的几个县。除杨森、刘存厚的防区大为缩小之外,四川其余防区都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其中最大的是刘文辉的防区,有八十个县;刘湘、邓锡侯、田颂尧分别占有十至二十几个县。每个防区内部设有兵工厂,铸造货币在防区内流通。防区政府的各项职能分别由军长以及部属或委派人员掌管。

在20至30年代军阀统治时期,

军队与地方是相互依赖的。军人用武力占据防区,又依靠防区提供给养。因此,防区设有民事行政机构。每一防区负责民事行政的是隶属于军队的政务处或政务委员会,主席是军长。在委员会或处以下分设各部如财政、教育、民政、公用事业和建设,还有矿务局及工业试验所等专门机关。由军长本人任命知事(县长)和县政府各科室负责人。县政府机构繁琐,除总务、教育、财政、建设与秘书各室外,还有工会、商会之类的许多“法团”,以及民团、赈务委员会等。县政府官员与地方绅士组成县议会,每半年开会一次,有的县还设有县政会议。县以下还有自治机关。

此外,这些处、局、科、室和非权力机关的委员会等复杂的机构,主要是为军事将领及文职食客提供机会,防区内一半以上的行政官吏,都是通过军人的特殊关系而谋得职务的。县长一般由下列人员担任;一是为将领服务多年的文职官员,二是与将领有私人关系的人。

在四川的每个防区内,各种资源的税收在驻军的整个收入中占有不同的重要性。税收主要有田赋、盐税、禁烟捐、交易与商业税、田赋附加税、地契税、烟酒税、杂捐以及各种形式的借款。1934年田赋约占各项总收入的19%,杂税占18%,鸦片税约12.5%,盐税超过11%。1933年,从成都到重

庆、万县的道路上,设有 280 个沿河税收站,重庆至泸县间设有 134 个税收站。此外,商品的附加税也多如牛毛,如“子弹捐”、“冬防基金捐”、“北伐捐”、“国防费”以及其他几十种捐税。在利用鸦片买卖筹款时,不仅要征收种烟税、吸烟税,对不种不吸者还要征收“懒捐”。

对四川军阀来说,控制产粮区是十分重要的,但非农业的经济活动也同样重要。刘湘的防区中拥有非农业资源的重要地区有:出口鸦片的涪陵、产盐的云安场、万县港以及后来占据的川西南自流井的制盐业。但刘湘的主要优势是占据了重庆。重庆控制着整个四川对外贸易的巨大咽喉,它提供了增加军费收入与积聚个人财富的机会。刘湘的 21 军对重庆的内外贸易实行征税;在 30 年代,还通过发行债券与“自愿”捐助,从财力雄厚的商界搞到大量的资金,因此,刘湘的军队人数众多,装备良好,具有作战能力,实力超过其他军阀。军人要在各自的防区内维持个人的地位,就必须占有—些富裕的通都大邑,并用自己的武装力量加以控制,供给他们搜刮大量税收。1933 年以前属于刘文辉的自流井盐场和宜宾鸦片集散地,就是税源地,田颂尧占有的潼川盐场也是如此。1929 年,整个川东地区都落入 21 军手中,重庆及其四周都变成了刘湘保持他在军队内部从而也在整个四川

的个人实力的基地。

(4)百业凋敝与民生倒悬 辛亥革命以后,四川财政逐渐陷入紊乱之中。及至防区制的形成,军队、地盘都成了军阀的私产。一切税收由各防区将领自筹、自征;一切支出,也由他们视其政治、军事、经济的需要自由支配。省城的财政厅徒有虚名。军阀的财政与军阀的“账房”对其财产的收入与支出的管理活动无异。全部活动服务于军事割据与扩张势力,争夺地盘;服务于军阀头目的敛财自肥。

民初四川财政沿袭清末体制,年度收支状况亦相似。罗佩金督川之初,即令各县征收局长将所有税款概解各道转拨军饷,主要财政系统无形破坏,省长戴戡只好承认这一既存事实。以后随着防区制的逐步形成,军阀自委官束,自征捐税,截留国税,财政方面紊乱不堪。防区制形成以后,军队无限制的扩大,军费急遽膨胀,是四川财政支出的一个重大特点。从 1912 年到 1934 年,20 余年间军费开支竟扩大了 15 倍。加上军实之补充,临时军费及作战军费的支付等,每年人民供给军费一项就在 1 亿元以上。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军阀自身敛财的贪欲,使其向民众榨取的钱财也大量增加,反映在四川历年财政收入上。1934 年比 1916 年的财政收入剧增 10 倍以上。如此庞大的财政收入就是竭泽而渔,从民众身上征敛而来的。

1915年,全川盐税共征6731618元,到了1935年竟达19088628元,近于民初盐税的3倍。清末民初,曾一度实行禁烟。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官僚不仅偷运鸦片,还强迫农民种植罂粟,榨取高额利润和税收。四川各派军阀也强迫农民种烟,苛征烟税,并勾结奸商,贩毒牟利。致使四川产烟及吸烟着居全国之冠。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1919~1935年),每年产烟量是120万担到140万担。1932年,四川鸦片产量在4万万两以上,以每亩产烟50两计算,川省种植鸦片的土地为800万亩。四川军阀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从种植、运销到零售、吸食各个环节都标立名目,征收捐税。如窝捐、秤捐、特税、护送费、统费、出口税、进口税、红灯捐等。在征收税捐时,还另有各种名义的“附加”。1931年,20军烟税收入达10551853元,占总收入的32.57%。1933年,21军特税收入达9277876.18元,占总收入的20.55%;1933~1936年,四川禁烟收入合计为30889953元。四川农村凋敝、工业衰退、商业萎缩,都与烟毒泛滥有关。

在各防区中,可以任立税捐,一税多征,随税附加,一加再加,毫无限制。自1913起至1924年止,各县地方为办理教育、国防、警备、议会、选举、农会、实业、城堤及补助行政作公益之费

用者,先后开征杂捐,其名目有99种。省会警察厅的杂捐有24种。重庆警察厅的杂捐也有13种。军阀对输出的物产,运进的商品,巧立名目,诛求苛征。名目繁多的杂项捐税,榨取的款额为数甚巨。在21军8年总收入(盐税、田赋、特税、税捐)百分比中,税捐为最大。1933年税捐额为13650987元,占总收入的29.28%;1934年税捐额为15600000元,占总收入的21.56%。1914年,四川国家预算总收入为10323149元,1916年为11551052元。到防区制末期,一个军阀的杂项税捐大大超过此数,合计各军征收总数,川省实收捐税在3000至4000万元。川民负担之重,由此可见。

军阀对拖欠税款的人,动辄捆、打、吊、押,致残、致死者不知多少。缴不起钱粮的百姓,被军阀捉去吊打还要收“吊费”、“打费”。1926年,田颂尧部罗迺琼旅接到刘存厚要求助战电,限令广元在3天内筹足20000元银两作开拔费,违者军法从事。1927年,军阀当局宣布郫县征取20万元军费,声称如收不齐,割人肉补齐。1932年,南江筹集军款数达到历年最高峰。县长出示宣称:“杀人可恕,欠款难容。”1932年,刘文彩退出宜宾前,以武力强筹20万元才退走。

在军阀统治下,四川出现了田赋附加和田赋预征。田赋附加是在征收田赋时,附加上各种杂税;田赋预征是



在 1 年内 ,不仅征收当年的田赋 ,而且预征往后若干年的田赋。这给四川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手段之一是在扩大了的正税基础上 ,附加各种杂税 ,由军阀政府、驻军、团甲自由加派。1934 年 ,巴县、江北、潼南、华阳、灌县、温江、成都、彭县、眉山、丹棱、犍为、盐亭、营山等县统计 ,田赋附加税有 26 种。项目有地方、学费、自治、司法、夫马、工本、票据、杂费、县志、助款、被服、司书、备丁、团费、党费、剿赤、公安、建设、教育、部队、铁栅、电机、公债、伟粮、财科、职科等。南川县各种田赋附加税竟达 30 余种。手段之二是实行预征。初为“借垫” ,允许在他们代征田赋时扣还。初犹偿还 ,后来就借而不还 ,实行预征了。以 1928 年开始预征计算 ,从 1923 年到 1934 年的 12 年间 ,少则预征了 21 年的田赋 ,多的预征了 57 年的田赋。而在川陕军防区内 ,更有预征至民国 100 年以上者 ,把 21 世纪的田赋也预征了若干年。

在军阀统治下的四川 ,田赋无限制的附加和预征 ,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土豪、劣绅、高利贷者的剥削 ,拉兵、拉伕 ,战乱不断 ,兵匪横行 ,四川农村到处都是“室无烟火” ;“人皆饿殍” 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境地。

(5) 自治运动与民主呼声 四川的自治运动 ,是 1920 ~ 1923 年国内兴起的“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分。“联省自治”是由本省人来制定省宪法 ,选举省长 ,管理本省事务 ,联合各省组成联省政府。地方军阀为了对抗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 ,维持封建割据 ,为了标榜民主 ,欺骗群众 ,也利用这个口号。1920 年 ,湖南军阀谭延闿、赵恒惕先后提出联省自治以后 ,其他一些地方军阀也发表宣言实行自治。四川也不例外。

1920 年 ,熊克武联合刘存厚等 ,将滇、黔军阀驱逐出川以后 ,四川内则形成熊、刘对峙的局面 ,外则面临北洋军阀和滇、黔军阀的侵扰。为“脱离南北战争之漩涡” ,川军将领刘湘、但懋辛、刘成勋等 21 人 ,于 1920 年 12 月 11 日 ,在重庆讨论四川政治自治的方针。13 日 ,电请熊克武、刘存厚联衔致电全国 ,宣布四川自治。16 日 ,熊复电赞成川省自治。刘存厚复电则借征民意予以否定。12 月 30 日 ,熊克武通电解除四川督军职务。1921 年 1 月 8 日 ,刘湘、但懋辛联名宣布四川自治。

1921 年刘存厚被逐以后 ,6 月 6 日 ,川军各派推举刘湘为四川总司会兼省长。7 月 2 日 ,刘湘宣布就职。8 月 ,熊克武、刘湘发动了援鄂战争。战争失败后 ,熊刘矛盾日益尖锐 ,刘湘与北洋军阀相勾结 ,公开反对自治。1、2 军火并 ,熊克武取得胜利。国民党在四川的军事力量大张 ,暂时形成了压倒川军各派的优势 ,为四川自治运动

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20年11月6日,由国民党人所控制的四川省议会曾发出通电,主张四川省自治。1921年2月10日,四川省议会宣告川省自治内容四端:(一)四川省于中华民国合法政府未成立以前,完全独立自主,不加入南北政争;无论何种官吏,亦不受南北政府任命。(二)废除督军及类似督军之制度。(三)实行裁兵。全川军费不超过四年度之预算。(四)民选省长,以为实现民治之初步。”

四川各界对川省自治热心赞助,在重庆成立了自治期成会。当时驻重庆的第2军军长刘湘,也积极主张自治,企图通过制定省宪法,为自己当民选省长和川军总司令开辟道路。吴玉章对刘湘并不抱幻想。但他认为自治运动提供了一个合法讲台,可以利用它来发动群众,进行争民主、反军阀的斗争。1921年4月,重庆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有100多个县的代表参加,吴玉章被推选为主席。并由吴玉章拟定《全川自治联合会成立通电》,得到了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在四川自治联合会的推动下,还成立了“自治协进会”、“川江船民自治共进会”、“旅沪四川自治期成会”、“自治学会”,一些县城成立了自治会。一些法团也通电要求自治。此后,由于刘湘与北洋军阀勾结更加紧密,“自治”成为他争霸的障碍。于是下令镇压自治运动,通

缉吴玉章,自治运动一度消沉。

1922年7月,1、2军之战以2军失败告一段落。国民党系军阀在四川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巨大优势。在熊克武支持下,7月12日,第3军军长刘成勋当上了川军总司令兼管军民两政,并宣布四川自治,筹备制定省宪法。

1922年8月9日,国民党人控制的四川省议会议决,制定《四川省宪法会议组织法》及《四川宪政投票法》,并设立省宪法会议筹备处。9月9日,四川省宪会议筹备处正式成立,互推刘成勋为筹备主任。11月2日,四川省议会选刘成勋为四川省长。四川省宪筹备员,全部都是掌握四川军政大权的军阀官僚。但在筹备处成立后不久,除向仙樵、曾子玉外,其他筹备员均托人代表。可见,“自治”在他们手中只是一个玩具,随时可以抛弃。

## 2 中央与四川实力派

(1)北伐易帜后,实力派之间的火并之战 1926年下半年,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央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名义,以国共合作的形式,组织发动泸州、顺庆起义。9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约集川军左派旅长在重庆开秘密军事会议,随后,又秘密召集驻防南充、合川、泸州的秦汉三、黄慕颜、袁品文等开会,部署起义事项,决定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指挥部。12月1

日,陈兰亭等人在泸州发动起义;3日,秦汉三等人在南充起义,黄慕颜在合川响应。因泸州起义队伍拖延了开拔时间,未能按期与南充起义队伍汇合,导致南充起义失败。泸州起义在四川军阀的镇压下,终因寡不敌众,于5月底失败。

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江流域,北方直系、皖系军阀节节败退;1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到武汉。顺泸起义失败后,军阀们看到形势逼人,不得已,刘湘于1926年12月29日解散了国民党右派省党部。杨森、刘相、刘成勋、赖心辉、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于1926年底到1927年初先后宣布易帜,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刘湘于宁汉分裂之初,即公开投靠蒋介石,于1927年3月31日解散重庆莲花池国民党左派支部,并制造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打枪坝事件。在此前后,支持策划镇压顺泸起义。6月1日,就蒋介石所委第5路总指挥职,宣言“清共讨共”,在其防区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电调杨森率部出川,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5月5日,杨森率兵45000人从万县东下。6月8日,在仙桃镇被武汉政府唐生智部围歼,杨森被歼七个团,直辖第9师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溃回四川。

1927年9月24日,军刘文辉派兵进

攻23军刘成勋,不一月,攻下邛崃、雅安。刘成勋退蒙经,欲走川边,为孙涵、羊清泉等所拒,遂宣布下野。刘文辉绥抚孙、羊两部,拥有上、下川南和川边的61县防地。

1928年7月,杨森和刘湘两军发生冲突,四川局势又呈混乱状态。11月,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长,又令派刘湘、邓锡侯、刘存厚、杨森、郭汝栋等为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委员,指定刘湘为委员长,邓锡侯、刘文辉为副委员长。在裁编军队中,川军罗泽洲、李家钰部受到打击,反对四川编遣会议,遂于12月联合杨森、赖心辉等部组成同盟军,推举杨森为主席,进攻刘湘,刘文辉在幕后支持。同盟军从各路进攻重庆,先后均遭失败。杨森失去涪陵、万县等地,退到渠县。罗泽洲退回广安。其余各部均退回原防地。这次下川东之战,同盟军遭到惨败。国民政府令免杨森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1929年4月,正当蒋介石和桂系军阀爆发大战之际,刘湘奉蒋令率部到宜昌讨伐桂系军阀,刘文辉调拨劲旅移驻重庆,与刘湘所部衔接,控制川东。四川同盟军李家钰、杨森、赖心辉等部,以李家钰为总司令,配合桂系军阀的行动,趁机进攻资中、内江等地,企图切断成渝大道,先打垮刘文辉,再吃掉刘湘。刘文辉亲自到资中督战,同盟军大败。后经邓锡侯、田颂尧调

停,同盟军撤回原防,川战暂告平息。

(2)稳定中的不稳定—蒋介石的驱虎吞狼之计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宣告清共,与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遥相对峙。4月19日,刘湘与川中各军长联名,由他领衔发出通电,表示拥护南京政府。5月初,南京政府任命刘湘为国民革命军第5路总指挥,仍兼第21军军长,杨森为第5路前敌总指挥,仍兼第20军军长。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刘湘与武汉国民政府已成对立,不得不放弃武汉这个对外活动据点,并将驻武汉代表乔毅夫撤回。刘湘又叫他的政治部主任范崇实促成与蒋介石的联系。果然,范一到上海,蒋介石就约范到南京。见面时蒋极力赞扬刘湘,加委刘湘为第5路总指挥。1927年8月,蒋介石辞职下野,3月之后,由日本回到上海,12月14日,刘湘即去电请蒋复职,向蒋表示忠诚。

1928年1月4日,蒋介石正式复职。6日,蒋以杨森纵庇吴佩孚、图谋不轨为词,令免杨森本兼各职,命将所部交由刘湘、刘文辉接收。这无异是助长刘湘兼并杨森。5月,刘湘策动的第一次下川东之战实即肇因于此。5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来电嘉勉刘湘,使刘湘大受鼓舞。认为这正是解决易帜以后四川军政问题的有利时机,因与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三军

长在自己防区内的资中县举行会议,以便瓜分权益。1928年9月23日,资中会议召开,就川事协调办法进行磋商,关于统一意志、裁编军队及组织省政府三大问题,并取得一致意见,达成了协议。随即据以呈报南京国民政府。10月31日,蒋介石批准成立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指定刘湘为委员长,组织四川省政府,刘文辉为主席,邓、田等为委员。刘湘、刘文辉叔侄二人成为四川军政的首脑人物。继之蒋介石派其亲信黄埔生、曾扩情为代表,持蒋亲笔信来到重庆,受到刘湘的热情接待。

1929年春,发生蒋、桂之战。4月18日,蒋任命刘湘为讨逆军第7路总指挥,并饬曾扩情在渝督促刘湘东下。先是蒋介石3月下令讨伐桂系,4月2日,刘湘即电蒋介石表示支持作战。4日,刘湘即命唐式遵率部出发,8日由奉节东下。15日进至宜昌附近,与胡宗铎部接触。这对桂系放弃武汉不无威胁作用。月底,长江上游局势趋于稳定,川军返川。

1930年初,汪精卫、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谢持、邹鲁等举行太原会议,进行反蒋。成都方面在刘文辉纵容下,1月1日在成都少城公园召开了讨蒋迎汪大会。1月13日,刘湘在重庆支持重庆市及江北、巴县国民党部联合市内各民众团体,在夫子池举行各界救党驱汪第一届代表大会,

21军政治部主任陈学池担任主席,并报告开会宗旨,3月15日,鹿钟麟等57将领通电全国,推举阎锡山为全国海陆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4月1日,冯、李联名就职。5月,蒋介石下达对冯、阎总攻击令,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将宜昌、沙市驻军调赴前线,令刘湘出兵接防,并进剿洪湖红军。刘湘派唐式遵、郭勋祺等部开赴宜昌、沙市,并将赖心辉扣押于宜昌,失去兵权。

蒋、冯、阎中原大战时,刘湘开始时观望徘徊,犹豫不决。当得知张学良决意助蒋时,立即表态拥蒋。由此更获蒋介石的青睐。中原大战蒋介石获胜,于次年2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特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明令所有四川各军,统归该督办全权编遣。

### (3) 重排座次——二刘之战的结局

从1932年10月1日泸州之战开始,中经成都巷战、荣威大战、毗河之战到1933年8月刘文辉败退雅安,二刘大战结束。以二刘势均力敌为中心的群雄割据局面被打破,联军突破岷江防线,刘文辉部迅速崩溃。刘文辉退守雅安后,凭河防守,联军环攻不已,刘文辉率残部退至汉源。

刘文辉的大哥刘升廷去刘湘处以“家族情谊”疏通,加之蒋介石有意保留刘文辉残部,以牵制刘湘,电令停火,才使二刘“言归于好”。刘湘念叔侄之情,将雅安、荥经、天全、芦山、宝

兴、名山、洪雅等县划作刘文辉防地,刘文辉再度回驻雅安。此时,刘文辉将第24军所属部队12个团编为2个师。

刘湘、刘文辉之战,是四川军阀400多次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也是最后的一次混战。自1932年10月起,至1933年9月止,历经近1年时间,战地绵亘川西、川北和川南的数十县,纵横千余里,动用兵力20余万,大小军阀几乎全部卷入,仅战争的前3个月,刘湘的第21军和刘文辉的第24军就死伤官兵60000左右,仅荣县境内就死伤达30000人。两军共耗资5000万元,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数计。在这场战争中,刘文辉损失部队逾3/4,丢失防地近4/5,势已不可复振。刘湘取得重大胜利,为使全川归于统一奠定了根基。

1934年12月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甘绩镛、刘航琛、杨全宇、郭昌明、邓汉祥、谢培筠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原省主席刘文辉虽早于1933年7月退驻雅安,但一直无人取代,至此始将原有委员、主席、厅长悉行免去本兼各职。于是“四川善后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四川省政府主席”(并兼省保安司令)三大官职,悉集刘湘一身。1935年11月22日,刘湘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 3 红军在川边的活动与川陕、湘鄂川

## 黔革命根据地的兴衰

(1)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维埃的建立 1932年12月12日,红四方面军14000余人开始从陕西向南进军,经过天池寺、核桃树,翻过大巴山,于18日进占四川通江县两河口。正值刘湘、刘文辉的争霸之战,全川大小军阀几乎都参加了混战。川北地区的田颂尧为与刘文辉争夺川西,抽调30多个团的兵力到成都与刘文辉部进行巷战,通江、南江和巴县诸县守军不多。红军入川后,乘虚挺进,势如破竹。

1932年12月25日,红四方面军占领通江县城,消灭军阀田颂尧部两个营和当地团防武装大部。通江解放后,于12月29日成立了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1933年1月1日解放南江县城。红军第12师和第11师的一部分又逼向巴中,于鹦哥嘴、清江渡等地大败田颂尧军的罗迺琼、李炜如部8个团,打死打伤田军1000多人,俘虏600余人,缴枪1000多枝。1933年1月23日巴中解放。至此通江、南江、巴中3县大部分地区解放。

1933年2月中旬在通江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下辖红江、赤江、赤北、南江、巴中5个县和通江特别市及陕南特别区,辖区人口100余万。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

正式建立。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自南昌委任第29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发给子弹100万发,现款30万元,另派遣飞机4架助战。田颂尧投入围攻的兵力达38个团,近40000人,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总部设在阆中。根据蒋介石“着重右翼”防止红军西进的指示,将兵力集结于旺苍地区,企图夺取南江,控制大巴山南麓,切断红军退往陕南的道路。再扫清巴河沿岸,威胁红军侧翼,协助夺取南江,继而夺取通江,迫使红军撤离川境。根据当时敌我情况和川北山高路险,易守难攻的地势特点,红四方面军总部采取“收紧阵地”的方针,打破敌人的围攻。从2月18日至3月18日的战斗中,田军虽占领了巴中、南江二城,却付出了近8000人伤亡的重大代价,士气大挫。红军主力在北起贵民关、南沿官路口等地,又由得胜山向东线麻西场一线占领新的阵地,继续阻击敌人。3月下旬至4月25日,战局呈现对峙状态,田军加紧整顿补充,准备新的进攻。红军准备迎战,作好反攻的准备。4月26日,田军发动了全线猛攻。各路纵队直扑通江城,企图将红军主力歼灭。红军以少数兵力,猛烈的火力和灵活的战术,顽强阻击。29日,红军主动撤出通江城。红军退至方圆不到百里的狭窄地区,战线缩短,主力集中,田军连遭打击,伤

亡逾万。5月15日晚反击开始。16日,刘存厚部全线崩溃,退出竹峪关,红军乘胜追击60余里,毙、伤、俘敌800余人。20日夜,红11军秘密插入敌之左侧。21日拂晓,敌左侧遭到红11师的突然攻击,红73师从正面,红11师及红12师从右翼向敌人发起猛攻,经3昼夜激战,至24日,全歼敌人7个团,击溃6个团,毙伤及俘虏敌官兵近5000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余枝。田颂尧左路军惨败,其他各路仓惶退却,全线崩溃。红37师26日收复南江,红11师抵长池附近,红12师于29日收复通江,6月5日收复巴中,继克恩阳河,另一路收复江口(今平昌县)。田军在后撤中,溃不成军,被红军俘获军兵6000余人。红73师歼敌1个旅,直逼广元城下。红11师收复长池,逼近苍溪。红2师威逼仪陇,红10师迫使刘存厚部后撤,进抵土地堡。

四川军阀3路围攻川陕根据地,历时4个月,损失人员14000人,被俘万人,丢失长、短枪18000余枝,机关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田颂尧部损失过半,余部退守嘉陵江沿岸。

粉碎田军3路围攻,红军在川北站稳了脚跟,根据地扩大1倍以上。与此同时,红军又主动出击,开展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外线进攻战役。红军总部令4军、9军和31军的1部,集中兵力,首先拿

下仪陇、南部两个县城。战斗历时半个月,歼灭田颂尧部3000人,缴枪1000枪余枝。9月下旬到10月初,再败杨森,毙、伤、俘其官兵4000多人,缴枪2500余枝,解放了营山县,抵达渠县近郊;又移师东向,于10月19日解放宣汉,10月20日攻占了刘存厚的老巢达县。“宣达战役”前后11天,歼敌6个团,溃敌9个团,打死、打伤及俘虏敌兵4000余人,缴获刘存厚的兵工厂、造币厂并各种枪枝弹药及大批粮食、物资。革命根据地发展到总面积4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8座县城,全区建立了二个道、22个县和1个市的苏维埃政权。红军发展到80000余人。川陕根据地成为次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杨森、李家钰亦遭受红军沉重打击,其统治因围攻红军所遭受的惨败,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2)红二、六军团在川边的活动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兴衰 1932年10月,贺龙率领红三军冲破敌人围剿,撤离湘西,转战到达湘鄂边宣恩、咸丰、桑植一带开拓游击根据地。1933年12月,贺龙率领红三军向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发展,先后一度攻占黔江、彭水等城镇,发动群众打土豪、分钱粮,深受群众欢迎,报

名参加红军的人数众多。刘湘急调21军第5师的两个旅进行围剿。贺龙率红三军以游击战对敌,直到1934年7月,都转战于川鄂黔边的黔江、酉阳、彭水、咸丰、利川、沿河、印江一带。对围攻红军之敌给予了机动灵活的打击。

1934年7月,贺龙所率的红三军召开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特区革委会,建立了黔东革命根据地。其范围包括黔东的沿河、印江、松桃、德江和川东的酉阳这5个县的毗邻地区,共建立区苏维埃政府14个,乡苏维埃政府30个,在酉阳县南腰界区的4个乡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了红军游击队。8月1日,南腰界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贺龙在会上讲话,号召农民打土豪、分田地。

1934年10月24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6军团由湘东到黔东,与红3军在印江县木黄会师。10月27日,红三、六军在四川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会师大会。会后部队进行整编,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组成红二、六军团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的行动。整编后红二军团有4000多人,红六军团有3000多人,共约8000人。另外,部分游击队整编为川黔边红军独立团。

与此同时,川黔军也调动7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围攻川黔边境的红军。1934年10月28日,红二、六军团向湘

西转进,川黔边红军独立团仍在原地坚持斗争。11月26日,中共川黔边省委在湘西大庸县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省革委,贺龙任主席。至此,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正式建立。其游击区遍及4省边区。1935年2月,由于敌人加紧围剿,川鄂黔边的红军独立团奉令撤往湘西。

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突破敌人围剿,从湘西的桑植、大庸出发,开始转战长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随即被敌人侵占。

(二)釜底抽薪——蒋介石统一四川的措施及成效

#### 1 取消防区制

##### (1) 实行省、县行政制度改革

1935年初,根据国民党蒋介石的意见,将四川划为“剿匪”省份,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实行“剿匪”地方行政制度。具体内容是:(1)省政府合署办公,厅处长不对外行文,一切发号施令均以省主席名义行之,加重省府秘书长职权,各厅处文稿,集中秘书处审核。(2)划全川为若干行政督察专员区,每区设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专员兼区保安司令,并兼专署所在地县长,另设专任副司令1人。专员兼司令主要责任,系监督和指导下辖各县执行省政府政令,并负责治安责任。(3)在县以下分区设署,每县至少3区,至多6区。(4)各乡镇一律改为联保,设联保主任。乡以下编组



保甲,10户为1甲,10甲为1保。以甲为单位,实行联保联坐,即10户之中互相监督,互相保证,检举奸宄、盗匪,实际则重在对付共产党,如有窝藏或发现共产党地下人员而不检举,一家受罚,九家连坐。

四川省政府下辖18个行政督察专员区,刘湘为了照顾到各方面的关系,分别安排各个派系的人员担任督察专员。第1区专署设温江,专员嵇祖佑,北洋时代曾任刘湘驻京代表。第2区专署设资中,专员王次甫,由杨永泰介绍。第3区专署设重庆(后迁永川),专员沈鹏,由杨永泰介绍。第4区专署设眉山,专员梁正鳞,曾任邓锡侯秘书长。第5区专署设乐山,专员陈炳光,西山会议派。第6区专署设宜宾,专员冷薰南,刘文辉部师长。第7区专署设泸县,专员裴刚,共和党四川负责人,与胡景伊接近。第8区专署设涪陵(后迁酉阳),专员赵鹤,刘湘速成同学。第9区专署设万县,专员罗经猷,由杨永泰介绍。第10区专署设大竹,专员侯健国,刘湘速成同学。第11区专署设南充,专员刘光烈,曾任熊克武代表。第12区专署设遂宁,专员罗玺,刘湘速成同学。第13区专署设绵阳,专员鲜英,曾任刘湘部参谋长。第14区专署设剑阁,专员田湘藩,由杨永泰介绍。第15区专署设达县,专员王铭新,前清举人,老学究。第16区专署设茂县,专员谢竹

筠,省政府委员兼。第17区专署设雅安,专员刘骏明,杨森部参谋长。第18区专署设西昌,专员王旭东,曾任熊克部参谋长。

省政府将各军防区接过后,为安抚各军,对各军原委各县县长、征收局长一律留用,但全部调动。1935年4~5月,分批进行县、局长对调。由此,打破了各军霸占地盘、自委官吏、自征赋税的防区制。军阀与地方政权脱离了关系,存在近20年的四川防区制从此结束。

(2)参谋团、别动队入川 参谋团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昌行营参谋团”,于1934年底在南昌开始筹建,1935年1月设重庆,11月改组为“重庆行营”。根据《入川参谋团组织大纲》规定:“参谋团以主任,副主任,秘书,第一处,第二处,政治训练人员,以及高级参谋,督察专员,各级督察员等组织之。”其编制设中将主任1,少中将副主任1,少中将高级参谋10,参议无定,上校秘书2,中校秘书1,另有各级督察员、副官、电务员等。参谋团第一处担任军事,第二处担任政治。在川军各军师均设政训处。参谋团的机构设置远远超过《组织大纲》的规定,又相继设有主任办公厅,第1、2、3处,政训处、军法处、交通处、运输处、边政委员会、铁肩总队、别动总队、川黔二省公路监理处等。

蒋介石在重庆设立参谋团的主要

目的是第一,策划“围剿”中国工农红军,消灭中共在川的各级组织。第二,控制四川,统一四川。参谋团政训处在川的公开工作方针是:“援川、助刘、剿共”,秘密工作方针是“消灭赤匪,控制四川,打击刘湘。”参谋团的具体任务是:(1)运筹“剿匪”作战计划;(2)指导“剿匪”各军军事行动;(3)维系各军之间密切联络;(4)督察各军对于“剿匪”之勤惰,审拟奖惩,呈请委员长核示遵行;(5)考核各军之械弹与消耗情形,及“剿匪”军费之支用,查考经理卫生情报事宜;(6)搜集诸种情报,随时向委员长呈报;(7)督促并指导与“剿匪”有关之政治设施。

参谋团是代表蒋介石发布命令、指挥监督的全权机关,职权非常大。其成员分别指挥、监督刘湘及川军各军、师、旅长。刘湘及川军各部必须服从参谋团,为参谋团所控制。

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11月1日,重庆行营正式成立,参谋团即行撤销。参谋团在川军活动了10个月,在“督剿”红军方面以失败而告终,但在消除防区制,统一四川军队,削弱军阀势力,整理财政金融,开发交通问题上,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为蒋介石控制四川打下基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是蒋介石直接控制、康泽领导的一支武装特务部队。别动队起源于1933年7

月,当时蒋介石为收容训练黄埔军校各期失业学生,使之成为反共反人民的力量。8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驻赣暑期研究班开赴庐山编入“庐山军官训练团”。1933年10月3日,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别动队在庐山成立,全部人员都由特别研究班调拨,由康泽任总队长。不久,经由南昌开赴临川,参加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5次“围剿”。别动队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进行法西斯宣传,推行保甲制度,组织训练民众,建立反共组织,及地方武装,组织“复兴社”,发展特务等。

1934年底,康泽率领部分别动队员入川,筹建参谋团政训处,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活动。别动队和参谋团都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直接指挥,一文一武,入川的目的都是反共图川,使四川服从蒋介石的中央。参谋团代表蒋介石发号施令,从行政领导的领导的角度指挥川军、省政府及各民众团体,别动队深入川军各部、各政府机构及四川各地宣传蒋介石及其法西斯主义,用武力保证蒋介石的意图实现。别动队随参谋团于1935年初先后入川,分赴重庆、成都、自贡、乐山、宜宾、雅安、万县、达县、南充、涪陵等地区,进行了种种活动。

(3)对军、政人员的特别训练 蒋介石中央势力源源入川,刘湘为巩固地方政权的根基,对培植基层政权人

员特别用心留意,他在就职宣言中说,要“设定期训练班以培植真材”,而办训练班的主要目的是在于牢固掌握基层军政人员,以防蒋介石挖墙脚。

自刘湘新省政府成立后,先后开办过7种训练所(班),受训人员达7000多人。有县政人员训练所、财务人员训练所、保甲干部人员训练班、社会军事干部人员训练班、统计人员训练班、农村合作指导人员训练所等。

刘湘最为重视的是县政人员训练。这一训练开办最早,省政府成立之初,蒋介石到重庆时,即叫杨永泰向刘湘说,要仿武汉行营先例,在重庆训练四川县政人员,训练结束后,由省政府以县长、区长委用。刘湘坚持这项训练由省政府主办,结果改由行营与省政府合办,刘湘兼任主任,行营派人任副主任。实际是由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代刘湘负责主持。刘湘嘱邓汉祥要用全部精力注意此项训练,绝对不要受训人员走中央的路子,因为要利用这些人员到基层去防制中央势力的渗透。县政人员训练所先后办过3期,每期历时3月,受训人员达1017人。录取办法除少数人为调训,大多数人向社会公开招考,并成立典试委员会,聘请名人如张澜、尹昌龄、邵从恩等为典试委员长。学员结业后,分别以县长、县政府秘书、科长及区长任用,当年全川约近150个县,县训人员同时出任县长者达70至80人。其余

如秘书、科长、区长等干部,全部为县训人员。

1936年10月,保甲干部人员训练班开办。它分期调训各县联保主任(乡、镇长),共开办4期,每期历时两个月,全省4000多个联保主任几乎全部受训。此时,蒋介石势力已渗透基层,刘湘为扭转行将失控的局面,认为联保主任是基层政权的关键,必须控制在手,所以决定一律调训,并仍命邓汉祥代为负责主持。省政府明令指示:凡经过受训人员,职位一律不变,规避受训者立予撤换。训练班最后一期举行毕业典礼时,刘湘亲临致训,公开为这些联保主任撑腰。

财务人员训练所办过两期,每期历时3月,共有530余人受训。受训结束,委以各县征收局长、县政府财政科长及会计主体等职。该所由行营监理处长关吉玉、省财政厅长刘航琛主持。

社会军事干部人员训练班是刘湘出川抗战前开办的,受训人员有1000余人,多为刘湘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结业后派往各县充任军训教官兼县社训总队副总队长及各区督练兼副区队长,负责训练壮丁。

## 2 1935年的财政金融改革

(1) 实行国省联合预算,成立国省联合金库 1935年7月13日,四川省政府财政整理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由行营和省政府的财政负责人、企业家、

银行家和社会名流学者组成。委员会的职责是：(1)调查设计省税县税；(2)整理改善省税县税之征收机关及征收方法；(3)审核省库收支额概算及其报销事项；(4)公布省库县库收支账目；(5)讨论省政府或财政主管机关交付事项；(6)讨论本会会员建议之事项。7月14日，蒋介石颁令《“剿匪”区内整理县地方财政章程》及各关系法规合订本，飭省政府通令各县办理。7月15日，蒋介石又电令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驻川财政监理处。并就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立联合金库，要求“所有国省两税收入，自7月16日起，应悉数解存，以备支拨。”

1935年7月21日，四川省政府财政整理委员会召开第3次会议，通过对各县市财政之整理及监督计划。飭令各县市造预算，呈报审核，由征收局统收分拨，以期减少烦苛，款不虚糜。“统一整理各县财政开支”，规定各县设置财政委员会及县金库，分别办理各县财政之审核及收入支出保管事项，决与经收机关立于相互监督之地位。7月30日，四川省政府制订《各县编制二十四年度预算标准及犹豫期间过渡办法》，通令各行政督察区专员转飭所属县长切实遵办。

1935年底，四川财政的统一已初见成效。在田赋方面，过去1年有征7~8次，甚至有上10次的，省政府成立后，改为1年1征，另加临时征收3

倍和附加保安费1征，即1年5征。在税收方面，防区时代，关卡林立，名目繁多。省政府成立后，采取一税制。四川省政府的成立和改组，军政、民政、财政的统一，促使四川军阀防区制解体。

(2)币制改革 为统一货币，稳定金融，国民政府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在四川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发行法币，收销地钞。1935年省财政厅调查结果表明，四川共发行地方钞票3300余万元，银铜杂币7000万元。货币种类共34种。为统一货币，稳定金融，1935年9月10日，蒋介石以行营名义发布《收销四川地钞及收兑四川杂币办法》，规定有6条，其要点是：自9月15日起，所有四川境内一切公私交易，均以代表国币之中央本钞为本位，地钞即停止使用；凡持有地钞之军民人等，准以地钞10元，掉换中央本钞8元，无论额票大小，均照此推算。自9月20日起，随时向中央银行重庆分行、成都分行，万县办事处，及中央银行所委托之其它银行、钱庄，就地掉换，限11月20日掉换完毕，逾期不换者作废。8折收回地钞的命令一出，四川群众哗然，市场立陷混乱。持地钞者要求政府十足收回，否则要求政府另行补偿损失，而政府又不同意。在蒋介石和四川省政府

的强烈压制下,收销地钞风潮被平息下去。针对法币面市初期,在商民中缺少信誉,不少人拒绝使用,行营又发出布告,如拒绝使用中央钞券,以扰乱金融治罪。至此,法币在四川通行。四川的货币得到了统一,金融渐趋稳定。

### (3)军费划归财政收支

四川省政府成立后,各军防区交出,财源断绝,各部队统由四川善后督办公署领导,军费粮饷由督办公署发给。1935年2月27日,督办公署主任兼总司令刘湘电令杨森、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罗泽洲等,规定各部队每月所需经费由督办公署统筹,从3月1日起按月核发。要求各部将该部官兵姓名并月支经费数目,分别列表具报督署,以凭核发。

3月1日,四川善后督办公署公布所核定的各军经费数目。第20军杨森部造报数目为590900元,督办核定月支180000元;第28军邓锡侯部造报数730700元,核定月支数500000元;第29军田颂尧部造报数1448500元,核定月支数400000元;川康边防军刘文辉部造报数424900元,核定月支数120000元;陆军新编第6师李家钰部造报数562400元,核定月支数200000元;陆军新编第23师罗泽洲部造报数341700元,核定数100000元;刘湘所属第21军和23军,月需3170000元。总计4500000元。

1935年6月25日,行营参谋团着手整顿川军,将核实名额,裁汰老弱,作为第一期编缩任务,约计平均缩减员额1/3。将原350个团减为200个团左右。对空额兵员、骈枝机关部队,亦酌情裁并,以合定制。而被裁军官,选择其学习优良的进行集中训练,以备将来之用。关于裁减兵员的工作,要求川军各部在7月15日前完竣,从7月16日起,不问是否裁竣,一律照原军费减发1/3。原定军费为每月420万元,军实及军事机关费为90万元。核减军费,包括军事机关费在内,也应照减。

### 3 解决冗军办法

#### (1)一箭双雕——川军抗击红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攻占遵义。四川各派军阀陷入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的南北夹击之中,被迫投靠蒋介石,成为蒋介石新军阀的附庸,并追随其参加围堵红军的战争。

1935年1月,红一方面军击破黔军,渡乌江攻占遵义等地。12日,刘湘调派潘文华部沿江布防,在重庆、江津、合川、泸县、纳溪、江安、宜宾一线重兵把守。23日,又派遣部队由江津入黔,直插温水,堵截红军西进。28日,红军与该部激战,歼灭敌人1000余人。2月2日,红军向川南挺进,围攻叙永。蒋介石调川军刘湘部、滇军孙渡部及薛岳部进攻叙永。5日,红军撤围出走,川、滇军及国民党军队

10万人扑了一个空。6日,红军在距叙永110里的南天堂坝全歼范子英部第6团。此后,刘湘一面加强长江防线,并由宜宾延伸至屏山、雷波,一面命郭勋祺越境追击红军。杨森被调到金沙江左岸阻挡红一方面军。5月8日,红军胜利渡过金沙江。

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突破嘉陵江防线,开始长征。8天中接连攻占阆中、剑阁、南部、昭北4座县城,歼灭田颂尧、邓锡侯部8个团。田颂尧由此被蒋介石“撤职查办”,29军由副军长孙震率领“戴罪图功”。

4月10日,红九军渡涪江,包围江油。三十一军一部北出,10日占领青川。14日攻克平武。为解江油之围,邓锡侯亲率14个团的兵力,在国民党空军配合下,与红军在江油激战。邓军全军溃败,被歼4000余人。17日,红军攻克中坝,18日攻克彰明,21日攻克北川。

4月下旬,蒋介石令邓锡侯封锁土门、干沟一带。邓部8个步兵团及马队12000余人封锁了茂县、土门、干沟隘口。5月15日,红军与邓部激战于土门,歼敌1100人。红军占领茂县后,沿岷江南下,直逼汶川。另一部渡岷江西进,占领理番,6月8日攻克达维。12日,中央红军在达维和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15日和20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向阿坝和班佑地区挺进。9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各部和五、九军

团分别自阿坝和包座地区沿原来北进道路南下。10月,击溃杨森、刘文辉6个旅,俘获人枪3000,占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所属之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10月24日,红军越过夹金山。11月1日,占宝兴。9日,占天全。12日,占芦山。毙伤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部5000余人,缴枪5000余枝。蒋介石、刘湘集中了20余万兵力,于11月13日与红军在名山、邛崃间的百丈关血战7昼夜,刘湘部被歼15000余人,红军伤亡近万人,未取得胜利,遂逐步向西撤退。1936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撤到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泰宁,北靠草地的地区。

(2)两阶段裁军 1935年6月5日,蒋介石在成都行辕召开川军将领会议,宣布整编川军,只有经过裁减、整编、点验而且至少要裁一半的川军,才能得到中央承认,照中央军一样发饷。

6月25日,行营“参谋团”着手整理川军。第一阶段裁军从6月25日开始至10月中旬结束。主要是核实名额、裁汰老弱、缩减人员约1/3。将川军350个团减为200个团。9月6日,点验川军各部编余中级军官1000余人,下敌军官约5000人。被裁减的军官,选择其中学识优良者送入“峨眉山军官训练团”集中训练,以备将来任用。川军营团以上军官和一些编余军

官送入中央军校成都分校受训,毕业后派到川军任带兵官,控制川军。10月20日,第一阶段裁军结束后,以全国陆军统一番号命名:陆军第20军,军长杨森;陆军第21军,军长唐式遵;陆军第23军,军长潘文华;陆军第24军,军长刘文辉;陆军第41军,军长孙震;陆军第44军,军长王纘绪;陆军第45军,军长邓锡侯;陆军第104师,师长李家钰;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直属部队(3个师6个旅)。在这次整编中,川军各部都有较大的压缩裁减,只有刘湘的部队从原有的第21军扩编为第21军、第23军、第44军,共3个军和督办公署的若干直属部队。蒋介石对裁军未达1/3,很不满意,决定再次整顿川军。

1937年7月6日,在重庆召开了第二阶段裁军会议。蒋介石在6月28日,曾电令重庆行营发表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人选:何应钦为军事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祝同、刘湘为副主任委员,贺国光、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孙震、范绍增、唐式遵等19人为委员。并颁布《川康军事整理委员会的组织大纲》共7条,批出“本会处理整军诸业务,由行营兼理之”。会议召开后,矛头直指刘湘,刘湘对裁减军队不表态,使会议陷入僵局。刘湘部属范绍增已被蒋介石许诺委以军长,因此,在会上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同意裁减,使川康裁军出现转机。

整军会议第二天,“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掀起抗日高潮,不少川军将领请缨出征,主持会议的何应钦见群情激愤,中日大战已不可避免,遂于9日结束会议。会议通过各军及独立师旅整编案,军费支配案,人事处理案,川康整军实施步骤与日期案等。议决川军各部缩减2/10;团以上军官由国民政府直接委派,川军军饷由国民政府军政部派员每月点名发放,整编期限为1个月。整编后川军的用人权、财权等都统一于中央,川军各将领失去了控制权。

(3)中央军入川 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6路围攻被红四方面军粉碎后,四川军阀元气大伤,在政治、军事、财政方面陷入严重危机。刘湘为巩固其统治,于3月11日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求援助。此时,中央红军已进抵湘黔边境,向川黔方向长征。为防止中央红军由黔入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急于追剿红军,进而控制和统一西南。因此,蒋刘很快达成协议,蒋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大权,结束防区制,使川军统一受刘湘指挥,并任命刘湘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军军费和武器弹药由中央供给,同意刘湘发行巨额公债,偿还历年积欠。刘湘同意开放四川门户,允许蒋介石嫡系部队入川,同意蒋介石派行营“参谋团”入川,督导“剿共”军务。

参谋团、别动队入川前后,蒋系中

央军胡宗南一部由甘南进驻广元、昭化；上官云相亦率中央军 47 师、54 师、44 师及独立第 4 旅由湖北开赴川东奉节、万县、重庆一带驻防。中央军薛岳所部的几支纵队，也先后入川追剿红军。

1935 年 1 月 17 日，参谋团通电四川各路川军总副指挥加紧“剿共”，如畏缩不前者，军法处分。3 月 2 日，蒋介石飞抵重庆，督导“剿共”。3 日，蒋介石手令各军，凡驻川谷军统由他本人指挥，如无蒋本人命令，不得擅自进退。4 月 2 日，蒋介石下令撤职查办在“剿共”中“防守不严”、“玩忽命令”的第 29 军军长田颂尧，并对“辅助不力”的副军长孙震“记大过一次”。蒋介石直接掌握了川军的军事统领权和指挥权。

#### 4 其他措施

(1) 省际公路建设 1935 年开始，在中央政府帮助下，四川先后修筑了川黔、川陕、川湘、川滇公路，这些公路构成了抗战时期西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

四川的公路交通直至 20 年代才开始起步，成都到灌县的公路是四川的第一条公路。1926 年成都到万县的公路分段开工，到 30 年代初相继完工。1931 年 10 月，重庆到嘉定的公路建成通车，全长 385 公里。同年开工修筑的渝简公路也建成 45 公里，这是成都到重庆的重要公路。随着中央势

力的入川，公路建筑的主要方案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蒋介石为了改善四川的交通，同时也为了把四川纳入全国的公路网，就要求修筑由四川通向贵州、湖南、湖北、陕西、甘肃、青海、西康和云南的公路。

1935 年，四川省政府大规模修建公路，是年，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加紧修筑川黔、川陕、川滇、川湘公路。川黔公路成都至贵阳全长 979 公里，1936 年完工。川陕公路成都至广元段，1935 年全线通车，共 413 公里。川湘公路由綦江经彭水、酉阳、秀山到川湘交界的茶洞镇，共 689 公里，1936 年完工。川滇公路东路由隆昌南经泸县到贵州毕节再到昆明，1939 年通车。1935 年末四川公路通车里程已达 5691 公里，以成都为中心，形成了东西南北四大干线：成都—重庆—万县，成都—松潘，成都—乐山，成都—广元。这一时期四川各路行驶汽车约 2000 辆，成渝线占 1/4。汽车除客车外，还有货车、邮车。这些公路大多数质量较差，汽车行走不畅，班车不能正点到达，时有事故发生。

(2) 禁烟计划 四川在中央政府敦促下，由省政府公布了分期禁种鸦片的计划，要求到 1939 年全部停止鸦片种植。但刘湘与川军将领在中央势力入川前，只是口头执行，1935 年以后，才开展了一些禁烟宣传活动。蒋介石入川后，重庆 1300 多家烟馆全部



关闭。

但随着蒋介石离开四川,禁烟计划也松懈下来。甚至准许四川主要产烟地区继续种植鸦片。1935年10月,一位老传教士报道说:在我旅居中国的各省份中,四川鸦片的种植、贩卖和吸食的数量居全国之冠。我可以在成都大街上公开而自由的买烟卖烟,就象买卖面包一样。1937年,四川当局和一些商人在重庆银行家的支持下成立了一个专利公司,垄断全川的鸦片买卖,售价很高,创办人和支持者从中获利。因此,禁烟计划实则是一纸空文。

#### 5 上述措施实行结果及弊端

(1) 防区制名亡实存 中央势力入川后,采取几项措施刚刚开始,省和中央为控制地方实权的斗争展开了。在以后的两年中,蒋介石与刘湘之间的初期合作关系已名存实亡,继之而来的是明争暗斗,使中央势力不能达到对四川的完全控制与统一。

1936年夏到1937年夏,四川全省大部分地区遭受严重干旱,这使蒋刘之间的斗争扩大化了,蒋介石批准的1935年统一行政、财政、军政的措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防区虽从表面上看已经消除,但是刘湘所希望的对川军各部的控制却未能如愿。川军各部将领在形式上把政权和财权交给了省政府,实际上“防区”依然保持着。各防区的将领不仅

大权在握,而且拒绝中央政府实施的行政措施。省政府成立1年之后,秘书长说,对全川的地方官吏和社会情况仍心中无数,省政府命令的贯彻执行受到严重的阻碍。

1936年,刘湘的办公厅在秋天号召来一个全面更新时曾说,重新改编和训练川军的计划几乎毫无进展。对民团分期加强控制的原有计划,遭到团阀的抵抗,计划还未实施就已流产。原定专区一级对民团加强控制的期限是1936年3月,但又被推迟到1937年6月,以后就不了了之。

夺取最高权力的斗争扩大到许多领域,但受影响最严重的是对四川行政人员的训练。中央政府入川的最初几个月,在建立机构审查在职人员的证件和训练县政府、县财务部门和警察的人员方面,四川是按照湖北和江西的模式进行的。尤以县政人员训练所引人注目,该所只办了三期,但在短时期内它却成了四川地方行政人员的主要来源。1936年5月,在头两期的毕业生中,出任县长的有54名,出任科长或主任秘书的有120名,出任乡镇长的有232人。该所的大多数教官来自外省。但刘湘派遣邓汉祥在该所任他的代表,对学员施加影响。这是地方利益与中央在四川的利益日益冲突的明显例子。

当刘湘知道中央政府在川势力竭力破坏他对川军各部的统一领导权并

打算夺权的时候，蒋刘冲突就更加明显了。别动队队长康泽甚至公开称刘湘为“土皇帝”，号召打倒他。刘湘也不甘示弱，扬言说康泽继续煽风点火，那么蒋的某些支持者也可以号召推翻蒋本人。蒋刘的主要调停人贺国光竭力制止危机扩大，最后以1936年5月康泽辞职而避免了武装冲突。

1935年，王又镛出任四川省政府民政厅长。正当刘湘力图挫败康泽及其别动队的锐气的时候，刘湘和王又镛共谋把康泽从事的地方政治活动直接纳入省政府王又镛的民政厅管辖。两月后，中央政府要求刘湘撤去省政府王又镛和另一位厅长的职务，遭到刘湘的拒绝。最后虽达成协议，王又镛被留任3月后自行辞职，但蒋刘矛盾却进一步加深了。

1936年春天，川局更加混乱。原定在蒋介石召开的川、滇、黔专员会议之后一周召开的四川专员会议被省政府取消，县政人员训练所第4期也于4月下旬被取消了。国民党的财政要员孔祥熙和宋子文撤销了四川之行。4月10日，刘湘回到家乡，避开4月17日蒋介石的成都之行。省财政厅长两次赴南京借款，及刘湘派代表到南京同蒋讨论预算都遭到拒绝。1937年春，刘湘与蒋介石的部队几乎发生冲突，尽管刘湘退避三舍以及中日战争的爆发使四川政局得到改观，但国民政府直到1938年1月刘湘逝世时

也未能控制四川。

(2)新的苛捐杂税代替旧的横征暴敛 统一财政及税负是省和中央政府在川政统一时强调要解决的问题。从形式上看，随着征收的田赋已变成按比率逐年征收。事实上，由于临时开征“剿共费”，把田赋提高了4倍。此外还有保安队的经费加征1年的粮，为省政府的“建设公债”再加征1年。凡在新指令得到贯彻的地方，税收改革后的谷物税增加到年征收额的6倍。

新的苛捐杂税取代了旧的税收。保甲制度恢复后开征的“保甲费”相当于又上一年的粮。在全川修建碉堡开支的可观经费，有时相当于再上两年的粮。

1935年税收方案宣布后，遭到川军各部将领的抵制。刘湘和蒋介石试图用函电对地方将领和各县县长进行诱导，但却缺乏有效的手段迫使地方当局遵从他们的决定。省政府对军队财权的控制也难以奏效。刘湘主持省政府工作届满1年后，在总结统一财政方案失败的教训时说：在省政府改组和防区制废除之后，民众的负担反而加重了。根据计划，在“剿共”时期各县应该征收的粮是年应征粮的4倍，但许多县却随意增加。

中央政府入川后，也有一些经常的非财政性的勒索，如征用劳力、牲口和物资以及运输军需品，修建碉堡和

公路等。

1936年,教育家黄炎培在访问四川时,曾记录下老百姓的呼声:“我们都是穷人,种啥吃啥,现在正是农忙时节,他们不让我做庄稼,拉我们来做工,不给钱,不给粮食,……我们会饿死在这儿的!先生,我们咋个办?”

### (三)战前四川经济状况

1 农业 军阀统治时期,四川农业以种粮为主,川东南一带间作果树,川北地区产棉,川中产甘蔗,主要农作物有稻、麦、高粱、玉米、甘薯、黄豆、油菜、豌豆。1933年统计全川水稻种植面积占总农作物面积的24%以上,大小麦种植面积占22%以上。全省稻谷产量为726879.1万公斤,居四川主要农作物产量的第一位。甘薯299573.4万公斤居第二位。麦产量为191120.1万公斤居第三位。玉米产量为110957.3万公斤居第四位。油菜籽产量为22838.2万公斤,居第七位。其中玉米、甘薯、油菜籽产量名列全国首位,稻谷产量居全国第二位,麦类产量也居全国的前列。

四川经济作物种类多,总产量也较高。产品主要有食糖、桐油、蚕丝、夏布、药材、畜产、林产等。四川正常年份每年产茧478000担,桐油15684000担、棉737100担,甘蔗25377.4万公斤、药材产量约4515992公斤。1928~1932年5年间,年输出黄丝12016担,桐油363489担,糖

39837担。其他如药材、林产品、畜产品输出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四川输出的农副产品价值占总输出额的92%。

四川农业生产工具、农田耕作方法相当落后,生产用具从耕地、播种、施肥、灌溉、收获都采用手工旧式农具。加之战争的破坏,畜力不足,不少地方还用人力拉犁,边缘山区仍沿用刀耕火种。农产品亩产量相当低,稻谷亩产在150公斤左右,低于两湖,与明清时期水平相当。蚕茧、棉花、药材等农副产品质量低劣,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防区时期,四川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手中,兼并日趋激烈。1922年,四川有人口48129596人。军阀混战十数年,造成了无穷的灾难,但人口仍然增长了数十万,到1933年四川人口仍达到50766336人。人口增长,苛捐杂税猛增,使许多自耕农、半自耕农贫困破产,失去土地,沦为佃农。大批军阀官僚和地主通过各种手段聚敛财富,买田置地。农村阶级分化日趋严重,地主同佃农的对立日益尖锐。据统计,四川全省地主户数为7.6%,占田达77.6%。江安县地主以7%的户数占田63%,崇庆县地主以8%的户数占田80%,江津县地主7%的户数占田90%。

佃农耕种地主的土地要向地主交纳地租。川政统一前,四川地租剥削极其沉重,年年有增无减。20年代

末,上等地地租在 50% 以上,30 年代初,上等地地租上升至 65% 左右,有的地方甚至收二八租、三七租,迫使农民将收获物的 70~80% 以地租形式交出。地主剥削农民的另一种形式是押金,就是佃农为租佃土地而先交押金。押租使佃农不敢拖欠租谷,地主则不论丰歉均可获利。地方通过这种形式可以长期无息占有佃农的钱财。押金一般每亩在 4~20 元左右,成都平均每亩 7.5 元。重庆平均每亩 8 元。川东地区押金为田租的 80%。川西为田租的 60~70%。佃农的押金是靠借高利贷,因此佃农被置于高利贷的盘剥之下,押金成为佃农的沉重负担。

由于军阀官僚地主的疯狂掠夺,农民的负担不断加重,农村经济窒息、农业生产迟滞萎缩,致使大量土地抛荒。1935 年荣县荒地 347290 亩,重庆荒地 16200 亩,彭水荒地共计 16957 亩。荒地增加,粮食减产,农业畸形发展。1934 年广元秧苗栽种面积仅为全县稻田的 1/10,梓潼全县播种面积不足 1/3。1932 年全省产稻为 15207 万担,1933 年只有 12405 万担。大米进川量急剧增长,1929 年进川湘米 14 担,1930 年进川 26 担,1931 年猛增 10512 担。与此同时罌粟种植面积不断扩大。民初,只川南一带、川北巴中、川西的懋功等地种植罌粟。防区时期,军阀强制推行种烟,全省 140 余

县,不种烟的县寥寥无几。涪陵年产烟 90000 担,丰都年产 80000 担,宣汉年产 70000 担。1932 年罌粟种植面积达 800 万亩,产量达 4 亿两。强制种烟导致农副业衰败,1930 年四川生丝出口值仅为 1247 万两,1932 年减为 605 万两,省内丝厂纷纷倒闭,缫丝业濒临破产,蚕农不得不放弃养蚕业。四川夏布盛年出口值达 600 万两,隆昌一县即达 200 万两。由于税捐繁重及外销市场日衰,1932 年出口值仅达 58 万余两,不及以前的 1/10。其他农副产品如杂货、五倍子、牛皮、棕丝、鸭毛等也因捐税繁重产量减少,1933 年出口仅为 5 年前的 2/5。

农村经济日益凋敝,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加之赋税苛重、胥吏勒索,兵连祸结,水利年久失修,遇自然灾害景况惨不忍睹。1925 年巴中等地遭受旱灾,全县饿死人口达 3/10,巴县饿死 70000 人。1934~1936 年四川水旱灾交困,饥民四起,饿殍遍野,家破人亡比比皆是。1934 年邻水县饿死 300 人,古蔺县饿死 3000 人,逃亡者千户。长寿县 40 余万人中,有 20 余万人生活无着,卖儿鬻女。饥民只能以草根树皮、白泥充饥,川北地区还发生人吃人的惨况。

2 工业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四川各类工矿企业 715 个。其中,1918 年以前开办的 132 家,占企业总数 18.5%;1918~1937 年间开办的

583家,占企业总数的81.5%。大多数企业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开办的。

四川传统手工业,如丝织业、井盐、制革、印刷、五金矿产、煤矿、陶瓷等业,有大幅度增长。如丝织企业57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就有44家。井盐业大小企业数百家,采用蒸汽汲卤机车99部,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就有61部。制革企业39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就有35家。印刷企业34家,均为1918年以后开办。五金矿产20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有11家,煤矿企业16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有11家。陶瓷企业13家,均为1918年以后开办。

近代工业企业在这一时期得到迅速发展。如棉织企业127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有102家。火柴企业30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有18家。食品、自来水企业29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有28家。日用化工企业28家,均为1918年以后开办。玻璃企业26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就有22家。

在工业企业中,日用轻化工企业仍占四川近代工业的较大比重。但是,五金矿产、机械、电力、建筑等重工业也有较多的发展。如五金、翻砂、机械企业90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就有75家。电力企业67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有65家。建筑、建材企

业16家,开办于1918年以后的有15家。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四川工业主要集中于四川对外贸易中心地区重庆和四川传统手工业发展地区成都、自贡、乐山、泸州、南充等,而战前四川工业的地域分布,除上述地区工业有所增长外,工矿企业开始由点而面,向成渝以外各县伸延,其中特别是火柴和电力企业进展最为显著。火柴企业扩展到渠县、合川、遂宁、合江、广元、涪陵、万县、资中、永川等县。电力工业更具有普及之势,扩展到四川数十县。

从企业资本额看,较过去数额大为增长,一般中小企业资本额稳定在数千元,拥有数万到数十万资本的大企业比过去有所增加。如丝织业,资本额在50000元以上的企业,达到12家,占企业总数的23%。棉织业中,资本额在50000元以上的企业18家,占企业总数的14%。印刷业中,资本额在50000元以上的企业11家,在企业总数中占32%。

在生产技术方面,机器的使用较过去广泛,机器生产企业有较大增加。1921年统计,缫丝业10年中,蒸汽缫丝数量增加1倍。重庆10家缫丝厂,雇佣3000人,全部是现代机器装备。成都的一些丝织厂也用机器织造丝料。但手摇丝车仍占居主要地位,全省约有20000部之多。四川造纸业,

除乐山、嘉乐等纸厂采用了较为先进的生产设备外,各地纸厂均采用传统生产工艺造纸。夹江县年产纸数量6000~7000吨,日产20吨,居四川之首,但其造纸办法,仍为手工工艺。可见,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手工操作水平;只有少部分企业采用了机器生产。据不完全统计,一些重要企业中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值是:火柴业13%,玻璃业46%,缫丝、丝织业36%,印刷业82%,棉织业17%,造纸业18%,面粉业56%,碾米业21%,五金、机械、翻砂业14%,煤矿业31%。使用机器的企业在企业总数中只占少数,使用率很有限,只在一些关键的生产环节上实现机器操作,大部分生产环节仍用手工生产。

### 3 商业与交通

(1)商业 川政统一前,四川的省内商业呈现出畸形发展趋势。与清末相比,四川商业行业大量减少,一些商业中心表现出衰败的迹象。传统的商品如丝、夏布、桐油数量呈下降趋势。但随着洋货大量输入,四川对外贸易的发展,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业却十分活跃。

四川商业以经营农产品和洋货为主,商业中比较发达的行业有匹头、棉纱业、盐业、山货业等。重庆开埠前,山货还未独立成帮,重庆开埠后,经过清末的发展,山货业十分活跃,收购范围极广,有黑白猪鬃、牛羊皮、漆蜡、白

蜡、丝筋、牛骨、棕丝等数十个品种。重庆的山货业成为与盐业、钱庄业、匹头棉纱业并列的四大商帮,推动了四川商业的发展。商业资本此时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以重庆为例,1937年重庆资本2000元以上为商号有700余家。较为发达的布业中规模大,资金雄厚的商号数量增多。1930~1931年,重庆有匹头商号150家,其中大型商号4家,中型商号21家,小型商号120多家。重庆盐业中最大商号资本达20万元。

民初,农村集镇与集市贸易兴盛繁荣,形成遍及全川的集市贸易网。郫县集市以米为大宗,菜籽及油、麦次之,其他县如成都、新都等地商人也前往赶场,交易金额每场数十万、数万、数千不等。

四川商业中鸦片贸易极为猖獗。1932年重庆专作鸦片生意的商号、土行达17家,账面资金总额达3000万元左右,每年每家盈亏金额多者达20万元以上。四川鸦片贸易得到军阀的大力支持,同时也给军阀提供巨大的财政援助。重庆与鸦片有关的行业每年为军阀提供700~1000万元的税款和借垫。这种特殊行业吸引了大量的资金,使四川商业得到畸形的发展。

四川商业中心多分布在江河沿岸,如重庆、成都、乐山、宜宾、泸州、南充、阆中、资阳、万县、合川、内江、自贡等城市。重庆是四川物资集散地。

辛亥革命后,新式的金融机构大批出现,银行钱庄经营汇兑,吸纳存款,发行钞票、债券、投资工商业和各种投机事业。30年代初已形成成都、重庆两大金融中心。抗战爆发前,四川有银行总行15家,其中9家在重庆。银行总行、分行和办事处总数达124处。四川的金融机构有国家银行、省地方银行和一般商业性私人银行。四川军阀官僚开办银行也为数不少。

(2)交通 重庆开埠后,四川的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始发展。在此以前,川江航运主要靠木帆船,陆路运输靠人力和牲畜。民初城市的交通工具是各式轿子,直到30年代前后才逐渐被人力车、马车、汽车所取代。

川江航运是四川交通运输的主要航道。重庆开埠后,1898年英国人立得乐率小轮“利川”号从宜昌出发作首次川江试航,取得成功,为轮船入川打通了航道。接着外国军舰上溯嘉定、泸州,外轮得以自由出入,川江水道主权丧失。清廷解除华商行驶轮船的禁令,华商轮船航运业作为合法的商业在四川各地兴办起来。1907年川江轮船公司成立,以后又有民生、合众、亚西、强华、三北等大小轮船公司十多家,其中尤以1926年创办的民生公司最为成功。民生公司的创始人是卢作孚。初期经营合川至重庆的航线,经营管理有方,业务发展很快,取得与外

轮竞争的胜利,相继合并了一些航运公司。1937年民生公司拥有大小轮船46只,总载重量18000吨,占川江中外轮总数一半以上,航线由嘉陵江扩大到长江,业务为客货兼运,并在长江沿线各埠如宜昌、沙市、汉口、南京、上海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川江航线开通后发展迅速。至1921年运输总吨位为13390吨,轮船20艘。30年代初,宜昌至重庆轮船增至58艘,吨位近18万吨。川江航线也不断开拓,宜昌至重庆航线、嘉陵江航线、川江重庆以上航线和至嘉定的岷江航线相继通航,加强了四川各地的联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15年成立了长江上游河道视察局,设立了28处信号站,7只标志船,数十处指向标,并清理河道,炸暗礁。1917年设立了1所领航学校,1919年培养出第一批领航员。

民初四川还没有铁路,20年代末民生公司筹建北川轻便铁路,改善嘉陵江产煤区与重庆之间的运输状况。1930年1月,北川铁路正式通车,这是四川最早投入运营的铁路,该路全长约10公里,1935年延长至26.5公里,主要用于运煤。1936年3月21日,国民政府特准组织“川黔铁路特许股份有限公司”,先行建筑成渝线及内江至自流井支线,股本总额为2000万元,1937年春开始建筑,预计两年完成。后因抗战爆发,器材来源困难,只完成了重庆到永川段路轨铺设工作。

4 外贸 四川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重庆、万县这两个对外开放的商埠进行的。抗战前夕,四川对外贸易总额约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0.15%。进口货物主要有棉纱、棉布、毛织品、纸烟、煤油及五金器材等。其中以棉纱为主,棉货约占总值的 60%,匹头约占 8%,纸烟约占 6%,煤油及五金器材各占 2% 左右。出口的货物主要有皮货、桐油、生丝、药材、猪鬃、木材、矿石等。抗战前夕,出口货物中,猪鬃约占 23%,桐油约占 20%,生丝约占 15%,药材占 12% 左右。进口货物中,制成品占绝大多数,其中以消费品为主,五金工业器材占很少的比例。

出口以农矿产品为主。据万县和重庆海关统计,四川对外贸易长期以来处于入超地位。1911 年重庆海关进口货物总值为 1900 万海关两,出口总值为 10070 万海关两。1935 年进口货物总值为 46794860 元,出口总值为 25169000 元。1911 年入超约 900 万海关两,1935 年入超 2100 万元。15 年中入超数扩大 2 倍多,1935 年的入超数几乎与同年的出口总值相等。

四川对外贸易主要由分散的商号和行庄经营,多从外埠订货,转运,进口则向本地洋行,有的也向外国大公司订货,资本额度小,货物质量不齐,难以在国际市场立足和长期经营。

##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四川

1937 年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人民掀起抗日怒潮。四川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川军出川抗战,川军将领也纷纷请缨杀敌。不久,大批川军开赴前线参战。

1938 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方面力量云集四川,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仍坚持片面抗战,限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四川人民抗日运动横加压制。同时也将四川地方实力派则视为异己,随时加以剪除。不少川军将领激

于民族大义,也为自身生存计,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因此与蒋介石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产生磨擦。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经济文化一改战前缓慢发展的常态,得到迅猛的发展。抗战初期,东部大批工厂、银行迁川,国民政府又把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有力地促进了四川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东部学校、科研机构,以及文化、教育、科技界人士大量迁川,为四川文教、科技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四川文教、科技水平



迅速提高。由于民主进步力量与国民党独裁统治在四川地区的不断较量，四川成为光明与黑暗势力斗争的重要阵地。

### (一) 抗日战争与发展机遇

#### 1 川军出川抗日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李家钰等先后电呈蒋介石，请缨抗战。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川军编为第二路预备军，辖两个纵队，任命刘湘为第二路预备军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司令部暂设河南许昌。刘湘与邓锡侯研究决定，第1纵队以第45军军长邓锡侯为司令，第41军军长孙震为副司令，下辖邓、孙两军及李家钰的第47军，第2纵队以刘湘统辖的第21军军长唐式遵为司令，第23军军长潘文华为副司令，下辖唐、潘两军。川军首批出川开赴前线的共有15个师：唐式遵、潘文华、王缙绪3个军每军出两个师，邓锡侯、孙震两军各出两个师，李家钰军出2个师，驻防贵州的杨森部两个师、郭汝栋1个师全部开赴前线。

川军陆续出川后，10月15日，蒋介石下令，改任刘湘为第7战区司令长官，战区仍在平汉铁路沿线，设长官司令部于南京，将出川川军划归刘湘统一指挥。又令编组第22集团军，任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下

辖原第1纵队41军、45军、47军3个军，第23集团军，以刘湘兼任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下辖原第2纵队21军、23军、王缙绪的44军共3个军。但当第23集团军所属部队一到宝鸡，又奉蒋介石命令拨归阎锡山的第2战区指挥，第23集团军的陈万仞师拨第1战区，由程潜司令长官指挥。

1938年1月20日，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病逝，第7战区长官司令部无形取消。8年抗战中，川军先后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共约40万人，编组为6个集团军，另2个军、1个独立旅。集团军的编组是：初以陆军第41、45、47军编为第22集团军，由川陕公路北上，经宝鸡向西安集中，增援前线。以陆军第21、23、44军编为第23集团军，由川东顺江而下，向宜昌集中，准备增援平汉铁路前线。以驻防贵州的陆军第20军、配属1军编为第27集团军，由贵州出发，经武汉增援上海前线。中间又因前线需要，又从23集团军内，抽调出第44军，由川军加编1军，合编为29集团军，向鄂东前线增援。由四川保安各旅中，抽出8个保安旅。编为陆军4个师，组合两军，编为第30集团军，增援湘赣前线。由第22集团军中抽出第47军，配属1军；合编为第36集团军，增援山西太行山前线。除上述6个集团军外，还有郭汝栋的43军、范绍增的88军以及独立第35旅。

(1)参加淞沪抗战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挑起淞沪战争。驻守闸北、江湾路、宝山路 的 88 师等部奋起抗战,阻止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10月上旬,淞沪战场上日军已增加至 20 万人,中国军队与日军第 3、第 9 师团在蕴藻浜一带展开激烈的争夺战。10月11日,日军又继续猛攻中国军队驻守的大场镇附近,从贵州飞速赶到上海的陆军 43 军 26 师接防大场镇阵地。这支由刘雨卿任师长的川军,脚穿草鞋,手持川造步枪,顽强地投入战斗。日军使用飞机、大炮集中攻击 26 师阵地,掩护步兵冲锋。川军官兵主要靠步枪加刺刀与敌人短兵相接,鏖战 7 昼夜,完成了阻击日寇的任务。第 26 师损失惨重,全师官兵伤亡 70%,两个旅指挥所均被敌机炸弹击中,指挥所官兵绝大部分殉国。1939 年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 26 师为淞沪战役中战绩优异的 5 个师之一。

9月下旬,由军长杨森率领的陆军 20 军从黔西大定火速到达嘉定南翔车站,10月9日,全军编入第 6 军团战斗序列。20 军奉命进入淞沪前沿阵地大场、蕴藻浜、陈家行一线,军指挥所设在南翔车站。次日陈家行失守,战局危急,杨森当即下令,由副军长夏炯率两团兵力夺回陈家行阵地。此时陈家行已成日军锥形攻击的顶点。夏炯部奋勇冲锋,与敌人展开肉

搏战,杨森亲临火线督战,当日收回陈家行。日军凭借优势兵力、大炮疯狂反扑,川军承受着巨大的牺牲,与敌苦战 13 个昼夜,守住了阵地。这一战役 20 军士兵死伤 70%,下级军官几乎全部殉国。10月15日—日军增援部队赶到,与杨森军对峙。杨森令师长杨汉忠率 134 师在大场、蕴藻浜一线与日军开战。日军投入 9 师团 1 个旅团、近卫师团 1 个旅团和其它兵力,以大场镇、南翔为双轴,猛攻 20 军。杨汉忠 4 个团扼守顿悟寺和石桥阵地,在 802 团团长林相侯的率领下,冲出战壕,与敌人白刃相接,反复拼搏。全团 1000 余官兵英勇杀敌守土,直到援军接防时,几乎全部壮烈牺牲。20 军 804 团团长向文彬率部坚守顿悟寺阵地,与日军苦战,力撑危局,化险为夷,完成了阻击任务。向文彬在 1 天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升少将,这是东部战场绝无仅有的事。

在陈家行阵地上,日军增加兵力猛烈进攻,杨森军 133 师寡不敌众,被迫后撤。第 6 军团司令长官薛岳令杨森部立即夺回阵地。杨森遂与战区炮兵总部联系,集中重炮百门,于午后 1 时轰击陈家行阵地上的日军,双方展开炮战。之后,杨森令 397 旅 794 团猛攻陈家行阵地,全团官兵奋不顾身,英勇杀敌。这场战斗,794 团虽伤亡惨重,但亦予日军以重大杀伤,令其仓惶北窜,收复了陈家行阵地。

20军在淞沪抗战中共计伤亡团长20余名,连长200余名,士兵7000余名。因战绩突出,受到蒋介石嘉奖。1938年11月,杨森升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27集团军总司令。20军军长由133师师长杨汉域升任。

(2)参加山西战事 1937年9月底,日军大举进犯山西。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将注意力放在忻口战场,忽略了娘子关一线的防务。10月中旬,日军第10师团一举攻占石家庄,进而又派14师团109师团向娘子关发动猛烈进攻。阎锡山急令刚抵达太原的陆军第22集团军41军122师转向晋东娘子关西南地区,截阻西进的日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命364旅于10月24日由岩会镇出发,迎战日军。25日在娘子关西南马山村与日军109师团发生遭遇战。战斗一开始,364旅两挺机枪即被打坏1挺。日军以优势火力作掩护,向川军发起冲锋。364旅官兵只好抽出背上的大刀与日寇肉搏,反复冲杀几次,伤亡过半,被迫后撤。

10月22日,第122师366旅旅长童澄奉命率部奔赴东西回镇迎战西进日军。该旅732团于25日深夜接近西回镇时,被日军包围,血战至拂晓,一营官兵以身殉国,另外两营被迫后撤。后续部队731团于26日在西回镇以西柏水井沟与日军相遇,日军用大炮、机枪作掩护,冲入731团阵地,

该团官兵手中步枪无刺刀,只好用枪托与敌肉搏,血战一整天,夜晚被迫后撤。10月26日,娘子关失守。

(3)参加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下旬,日军自浙江金山卫登陆后,浙江、南京告急。刘湘第7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芜湖,令唐式遵率21军、潘文华率23军经句容县分道向溧阳沿太湖西岸宜兴、长兴、泗安、吴兴一线构成第二道防线,以阻遏内犯之敌。11月23日,144师师长郭勋祺率全师到达长兴县,刘兆藜率146师扼守李家苍及新塘间从吴兴北上之路,饶国华率145师固守广德东面的界牌、泗安间的道路,148师及13、14独立旅在林城红星桥至长兴间协同上述各师作战。147师作为预备总队,策应各部队作战。

11月24日、25日,日机轰炸长兴,26日,日军进攻夹浦,川军奋起抵抗。经几天激战,144师伤亡官兵200至300人,直至弹尽粮绝,撤往广德。11月22日,刘湘令潘文华率145、147师在广德布防。23日,145师师长饶国华为掩护友军安全,令先头部队436旅869团攻占泗安阵地。该团与日军苦战3昼夜,伤亡惨重。26日,日军出动坦克向泗安进攻,并在空军掩护下突破了145师守卫的泗安机场阵地。饶国华当夜通电全师官兵,誓死守卫国土。次日,870团团团长刘子生率全团血战,全团官兵伤亡3/4以

上。涇安机场失陷。日军主力沿吴嘉公路直趋广德,饶师困守广德,与日军苦战。

26日,875团团长潘寅久在146师436旅旅长廖静安支持下收复了涇安镇。进占广德的日军在饶师的顽强抵抗下退出广德。第146师和独立14旅对日军实行反攻,各军直指界牌一线。

此战歼灭日军数千,缴获装甲车十余辆,卡车二十余辆及大量军用物资。刘兆藜命令14旅642团便衣队收复了东湖亭镇。

11月30日,饶国华奉命收复广德。他亲率1营官兵反攻,冲入日军阵地血战,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围困。当夜,饶国华在弹尽粮绝之后,写下绝命书,自戕殉国。国民政府为表彰他的忠烈,特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4)刘湘之死 1938年1月20日下午,第7战区司令长官、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病逝,终年48岁。刘湘赶赴前线时,胃溃疡病已很严重,邓汉祥等力劝其不必躬亲赴敌,但刘湘去意甚坚。刘湘认为:自己高呼抗日,战前不能退缩;出川为国效命,洗刷自身污垢,出川军队约占半数,如不亲自指挥,当被蒋介石分化消灭。因此,他在后方军政要务布置就绪后,于11月9日飞赴前线。刘湘到前线后,旧疾突发,11月28日被送进汉口万国医院。

1938年1月13日以后,病情恶化,于20日下午逝世。

22日,国民政府明令褒扬刘湘。25日刘湘治丧委员会为刘湘举行追悼会,蒋介石参加了追悼会。26日,刘湘灵柩从汉口运回四川。2月4日运抵重庆,5~8日重庆各界公祭,9日移送成都。2月14日,国民政府明令为刘湘举行国葬。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举行。

(5)王铭章战死滕县 1938年初,第22集团军划归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统辖。因邓锡侯奉命回川担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孙震继任司令。孙震兼任的第41军军长职务由122师师长王铭章代理,邓锡侯兼任的45军军长由副军长兼125师师长陈鼎勋继任。3月初,川军在滕县前线由孙震、王铭章指挥。当时邹县日军不断增加,台儿庄地处徐州要津,成为日军攻占徐州的必争之地。滕县地处津浦路徐州门户,日军夺取滕县成为台儿庄大战的序幕。3月10日,孙震从临城到滕县及其北部界河视察,并同王铭章等研究了作战计划和部署。由集团军总预备队王铭章的122师师部和364旅旅部、124师师部由利国驿进驻滕县,127师师部驻扎滕县城内。王铭章为第二线指挥官并任22集团军前方总指挥。

3月14日凌晨,日军万余人在大炮、坦克、飞机的掩护下,向两下店、界

河一线川军发动全面攻势,第125、127两师与日军激战1天,少数前沿阵地被日军占领,界河东西一线川军主要阵地完好无损。15日晨,日军向九山、五福庄阵地进攻,受川军阻击,未能突破。日军改变战术,迂回川军左后方,占领了柳泉埠,截断了滕县到界河的公路,使127师陷入日军包围。另一股日军从济宁东南出发,向守深井的124师370旅进攻。该旅兵力单薄,苦战支撑,伤亡惨重。日军万余人向滕县城右侧迂回,到下午5时,日军已到达距滕县城东北十余里一带,城防兵力除122、124、127师部和364旅部警卫人员外,还有少量的警察、保安人员。王铭章向临城孙震求援,孙震无兵可派,只好令特务营长率步兵3营驰援滕县。

王铭章知大队援兵无望,于是电令227团团长江宣武率1营军队回防县城,并表示决心固守滕县城,与滕县共存亡。3月14日,日军从两下店附近发动攻势,15日抵达县城附近。16日,日军10000余人向界河一线发起总攻。并在城外东西两高地架设10余门山炮向城内开炮,日机10余架向城内投弹、射击,日军步兵进攻东关。川军采取近距离手榴弹反击,使日军难以入城。与此同时,汤恩伯集团军北进临城,以侧击日军左侧为由,拒绝援救滕县。困守孤城的王铭章部遭到日军猛烈的进攻。17日晨,日军第10

师团30000余人以50余门大炮和20余架飞机对县城进行攻击,又用坦克为前导,掩护步兵冲锋,川军与日军晨开肉搏战,反复争夺东南城突破口,收复东南城防。下午,县城遭到敌人四面进攻,形势急迫。王铭章亲率师、旅长和县长登城督战。日军凭借火力掩护,蜂拥入城,王铭章率领幸存官兵与敌奋战,不幸中弹,为免落敌手,一面高呼“杀敌”,一面拔枪自尽。身受重伤的300余官兵,纷纷自戕。参加滕县保卫战的41、45官兵伤亡数千人。其中困守滕县城川军官兵牺牲2000余人,日军伤亡4000余人。川军坚守滕县苦战36小时,为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王铭章牺牲后,国民政府于4月6日明令褒扬,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6) 参加华中战事 1943年10月,日军调集约9个师团的兵力和大批伪军,进犯湖南常德、桃源。29集团军和74军奉命反击,“常桃会战”开始。

会战之初,44军在南县、华容、安乡和石首、公安、津市地区与日军鏖战20余日,将日军击溃。许国璋师在虎河两岸及澧县、津市与敌激战,毙敌2000余人,击沉日军汽艇和机器船20余只,夺获大宗枪弹。因另一路日军攻占澧县、石门等地后,包围常德的44军被隔绝在常德地区。许师奉命转移到常德西北太浮山、太阳山阻击

日军。日军骑兵万余人在空军掩护下分路攻击,两翼友军也被击败。许师伤亡惨重。11月20日拂晓,日军千余人进攻师部排头岗,附近仅有449团约1营兵力及师部特务连、工兵连各1队,经激战后,被迫退守澧市北的畚田坪。随又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速到太浮山”的命令,许国璋部仅存官兵不足200人,突围时遭敌攻击,血战中许国璋中弹身亡。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中将。

(7)长沙会战 1939年9月,王陵基率领的第30集团军参加长沙会战。9月初,日军对华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参谋长板垣制定了攻占长沙的战略计划。日军第101、106、33、13、6、3等6个师团及长江舰队舰艇300余艘,配合海军陆战队一个联队、飞机百余架、化学兵队合计18万人,于9月14日由赣北、鄂南、湘北3路同时进攻长沙。30集团军奉命固守修水、武宁间阵地,并以新14、15师分别挺进德安以西,阻击南下之敌,增援傅家埠。杨森的第20军也参加了长沙会战,该军先在鄂南通城南楼岭、桃树港一线阻击南犯日军33师团,又在湘东长寿街与日军作战。10月6日,奉命东进,协同王陵基30集团军反攻修水。12月又攻鄂南通城,毙伤敌千余人。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香港,加强对中南地区的攻势,长沙会战再

次开始。第27集团军总司令率领第58、20、37军与湘北岳阳、鄂南通城日军对峙,采用纵深防御战略,构筑密集的工事,加强战备。20年担负新墙河以南地区防务,37军担负汨罗江以南地区守备任务,58军担负通城至黄岸市地区守备任务。会战前夕,第30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奉命率新15师、78军从赣北开赴湖南平江地区,与薛岳拨调给他指挥的37军担负聚歼逼攻长沙的日军主力的任务。

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向南发动进攻。第20军133师在汨罗江以北、新墙河以南地区阻击日军,血战7天。134师阻击日军后续部队。第30集团军78军追寻日军主力,37军歼击福临铺之敌后,集结待命。1942年1月上旬,日军发动长沙攻城战。第27集团军第20、37、58军分别在新墙河以南、西影来山、福临铺以东阻击日军后勤工程兵部队和沿粤汉路南下的日军,30集团军第78军在长沙东南迎战日军。两支川军在这次截击作战中获得了战果。

(8)李家钰战死河南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4月17日,开始豫中会战。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得知日军作战计划,会战初,就先弃洛阳南逃。原集结于洛阳附近的6个参战集团军也闻风西溃。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新安、淝池之南奉命掩护友

军转移。该部由于多次恶战,实力大为削弱,仅有47军的4个步兵团。与敌周旋于新安、浣池以南地区。

5月21日,李军总部在陕县东南地区与日军主力遭遇,他亲率总部官员和特务连官兵与敌人反复拼杀。在转移陕县秦家坡时,不幸中敌埋伏,李家钰在激战中中弹殉国。6月22日,国民政府特追赠他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

(9) 四川人民支援抗战 8年抗战期间,四川人民出钱出力出粮为全国之冠。

四川除组织6个集团军、1个师、1个军及1个旅,计40万兵力参加抗日外,还大力补充兵源。于各专员公署处设立师管区,专门负责征兵,包干补充川军。在抗战期间,四川先后应征赴前线抗日的壮丁达302.5万余人之多,占全国应征入伍的1/5。征用民工近500万人次。

四川人民在抗战期间,除募捐、献金和购买公债外,还负担国家财政支出的50%。四川由于日机狂轰滥炸,不少城市、乡村房屋被毁,造成工厂停工停产,商店停业,农田荒芜,给四川财政带来极大困难。但四川人民不屈不挠,千方百计加紧生产,支援抗战。据国民政府不确切的统计,抗战期间,国家总支出的金额为14640亿元法币,而四川人民负担了4400亿元左右,几占1/3。

抗战期间,四川每年调运大批粮食到省外供给前方将士。从1941年到1945年的5年间,四川人民以征、借和捐献诸种方式付给国家的粮食为8443万市石,占全国征、捐、借粮食总数的1/3。

## 2 国民政府开发西南的经济战略与四川经济发展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移驻重庆宣言,此时重庆尚为四川省辖市。1939年5月改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定为陪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原因:首先,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很快被日军占领,上海失守,南京危急,必须从速迁都。武汉、广州等地易攻难守,故选择重庆;其次,重庆为西南重镇,地处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口,水陆交通方便,为四川门户;第三,参谋团和重庆行营入川已近3年,重庆和四川已为蒋介石完全控制。同时,四川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可为战争提供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抗日战争。

为增强经济实力,支持战争,国民政府确立了以西南地区为新建工业基地的决策,实行了国家管理工矿企业的体制。将沿海沿江地区重要的工矿企业大规模迁往以西南为主的大后方,对主要工矿业的生产及产品实行统制,采用多种渠道为国营工矿筹集建设资金,用投资兴建或入股合办的方式建立内地钢铁、电力、化学工业的

基础及各矿业的生产基地,对民营工矿业,运用行政干预和经济手段解决其生产中的困难,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合并强化行会组织等。

(1) 东部大工业内迁与战时四川工业的快速发展 1937年8月10日,行政院第324次会议通过资源委员会

关于拆迁上海工厂的提案,首由资源委员会、财政部、军政部及经济部会同组织上海工厂的拆迁,工厂内迁由此开始。

据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统计,截至1939年底内迁厂情况如下表:

内迁厂情况统计表  
(1939年)

业别	钢铁	机械	电器	化学	纺织	食品	文教用品	其他	合计
厂家	1	168	28	54	92	22	31	14	410

据经济部1939年上期工作进度报告,当时内迁厂复工的民营机器厂每月生产能力已达到:车床、刨床、钻床等工作母机100台;蒸汽机、煤气机、柴油机、水轮机、小型发电机等动力机420部;轧花机、针织机、纺纱机、织布机、抽水机、造纸机等作业机1400部。这些内迁厂的机器制造生产力,为西南后方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永利、天原等化工厂的内迁,为西南后方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化学原料;豫丰、申新、裕华、沙市等纱厂的内迁,使西南后方的纱锭数量猛增10倍以上,为纺织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

在这些内迁工厂中,机械厂占40.9%,纺织厂占22.4%,化工厂占13.17%,教育文具厂占7.56%,电器厂占6.82%,食品厂占5.36%,钢铁

厂占0.24%,其他厂占3.41%。

民营内迁厂迁入的区域,以四川为首位,据统计到1940年底,共内迁工厂448家,其中以上海与武汉两地最多,分别为148家与160余家。这些工厂迁入四川254家,占54.7%;迁入湖南121家,占29.2%;迁入陕西27家,占5.9%;迁入广西23家,占5.1%;迁入其他各省23家,占5.1%。实际上迁往湖南、广西两地的民营厂随着国民党的湘桂大溃退,绝大部分又迁到了四川。因此,四川事实上成了全国民营内迁厂的主要目的地。

(2) 战时农业政策与农村经济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政府对发展四川的农业,制定必要的改进措施,增加农业投资,推广农业科技等,促进了四川农业的发展。

为发展农业生产,政府颁布各种



法令,对土地的利用进行调整,改种战时必须的粮食作物,利用荒隙地、冬夏闲地,推广冬耕、双季稻、再生稻、间种连作制等。这些宏观的、强制性的调控政策措施,对合理利用土地、促进粮食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抗战爆发后,1938年全省产粳稻12357.3万市担,糯稻871.7万市担,玉蜀黍1443万市担,大小麦5735.7万市担,到1939年,产粳稻13172.9万市担,比上年多产816万余市担;产糯稻1160.2万市担,比上年多产288万余市担;玉蜀黍产2608万市担,比上年多产1165万多市担,除小春作物比上年有所减产,但总的说来,比上年增产约500余万市担混合粮。

政府还制定措施禁止种鸦片,鼓励发展棉油等经济作物的生产。从1938~1940年,全省棉花种植面积由1.9%上升到4.7%,油菜籽种植面积由10.5%上升到15%,黄豆、绿豆种植面积由5.1%上升到7.5%,花生种植面积由0.1%上升到1.2%。农村副业也有较大发展,家庭手工纺织业发展最快。1939年,国民政府经济部拟具了发动川省50万农户从事手工纺织业的计划,选择射洪、三台等5个重要的棉纺织基地为中心区,由农本局负责推进,促进了四川农村手工纺织业的发展。据估计,1941年后方42家纱厂所产的棉纱大约可供织布560万匹,而川省农村的单锭手纺车所产

的棉纱就可供织布220万匹,占1/3多。农村土法制糖业也有显著的发展。1941年四川糖房有3300余家,漏棚约700余家。1942年,糖产量达到了顶点,但后因战事扩大,川糖外销受阻,糖价低落,蔗农转种粮食,形成蔗田减少。因畜产品价格上涨,使养家畜的农民增多了。从1938~1942年,有此副业的农户由56.6%上升到61.1%。

为加快发展农业,政府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农业改良的推广工作。1938年初,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迁驻重庆办公,统筹与指导大后方各省农业的改良与推广工作。1938年9月1日,四川省政府将省家畜保育所、蚕丝改良场、稻麦改进所、棉作试验场、第一林场及农林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园艺试验场及林业试验场等归并成立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负责四川的农业改良推广工作。1937年,在川北推广2905小麦品种,推广种籽150市石,种植面积2300亩左右,到1938年推广面积扩大到23900亩左右,用种籽1600余市石。1938年改良小麦种植面积约达40000亩。1943年,川北改良小麦种植面积达55万亩。1943年6月,四川省试验旱稻、晚稻,增产40%,并在川南川东推广早稻约10万亩。其它如德字棉的推广、农药防治麦类黑穗病的推广等,都收到了成效。

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四川省政府

成立了农田水利局、川康农田水利贷款委员会等,统筹推进四川农田水利建设。1942年8月26日,川省已动工的水利建设有遂宁南北堰、峨眉熊公堰、洪雅花溪堰、三台北堰、雅安青衣渠等5处,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4家银行和信托局贷款500万元。1943年7月15日,四川水利局长何北衡称:川省水利灌溉的农田已达450万亩。

战时,国民政府颁布了《九省荒地开垦计划》,四川省成立了垦务委员会,统筹督导全川荒地开垦事宜。国民政府农林部在四川设立的国营垦殖区及管理机构有:四川东西山屯垦试验区、西康西昌农牧实验场、四川金佛山屯垦实验区管理局、四川雷、马、屏、峨垦殖实验区管理处、西康泰宁垦区管理处。省营垦殖区及管理机构有平北垦务局、东西山垦区办事处、松理懋茂汶靖垦务局、雷马屏峨垦务局等。1938年设立的北川垦区,到1940年底,民营垦殖社区有30个,垦殖公司5个,垦地1585万亩,垦民6516户,共20000余人。1944年1月,据农林部发表的统计,川省公营垦务机关团体共53个,垦民24834人。

在抗战爆发后,政府为发展农业,采取了增加农业贷款,以救济农村金融的政策。在四川和大后方推行建立农村合作社和合作金库,以较低利率帮助农民,克服资金困难,发展生产。

因合作社由政府用半强制方式推行,社员可享受合作社的低息贷款,1940年前入社社员交纳股金仅26元,因此,1941年前四川的合作社发展较快,1941年底全省共有农村合作社约23599个。

(3) 统购统销政策与四川商品贸易状况 抗战期间,政府为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和稳定人民的生活,对战时商业实行统制政策。其主要是对重要商品如粮、棉、丝、桐油、猪鬃、钨、锑、锡等实行统购统销,对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如粮、盐、烟、火柴从1942~1944年实行专卖,后改糖为征实,改其他3项为征税。1943年还颁布《加强物价管理方案》,规定对军需和民用物品中的重要物品实行限价,严禁黑市买卖,对非限价物品实行议价。这些统制政策在执行的后期,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四川的蔗糖,实行专卖前的1941年产量为2209465市担,1942年实行专卖,糖的成本价10000公斤为22~23万元,但收购价仅87万元。1943年蔗糖收购价仅及成本的70%。1942年蔗糖产量降为1668634市担,1943年为1817290市担,两年的产量与1941年相比下降约1/4。其他如猪鬃、蚕丝、桐油等产量,实行专卖后均大幅下降,棉纱布也大量减产,甚至工厂的倒闭。

战时军公粮的配拨,采用定价征购办法。向大户定价征购余粮,使与

田赋征实相辅而行。并发行粮食库券,作为支付粮价之用。在实际执行中,改为随赋征购,按田赋数额之多寡比例征购,事实上已与田赋结合起来。征购的办法是以所购额的3成评价付给现金,7成发给粮食库券。从征购后的第3年起,每年以面额1/5抵缴田赋应征的实物,5年全数抵清。1944年5月26日,粮食征购一律改为征借,采用累进法,提高其数额。征借的粮食,全部发给粮食库券,不再搭发现款。通过田赋征实,征购和征借粮食,使政府掌握大量粮食,充裕了财力,也有能平稳定战时的金融物价。

#### (4) 战时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拨出专款,于1938年修筑川康公路(雅安—康定),1941年完工,全长218.5公里。1939年成立工程处修建康青公路,分期进行。1941年第1期康营段(康定—营管寨)竣工。1942年第2期营甘段(营管寨—甘孜)完工,1944年第3期甘玉段(甘孜—玉树)完工,全长840公里。乐山至西昌公路,西昌地区参加修路的各族民工有10万余名,死亡达1万人左右。乐西公路是1939年10月由国民政府交通部奉命勘测筹备修建的。修筑乐西、西祥公路,可以作为四川通往缅甸国际公路的一个最直接的通道。1940年春,蒋介石下令限乐西公路1年内通车,否则以贻误军机论处。他还召见交通部公路管

理处处长赵祖康,把乐西公路作为最重要的交通线来建设。1941年9月底公路竣工通车。西祥公路于1940年12月动工,1941年6月全线通车。1939年和1940年,川滇路东、中、西路3线分别通车。还先后修建了重庆至达县、南充等地的公路。

四川水运有长江、嘉陵江、乌江、岷江、沱江、涪江、渠江、青衣江等可供运输。到1939年,国民政府共改造轮船106艘,还新造各类客货轮与木船。并对江河航道进行整治,扩大航程,提高航运能力。川江航运在抗战时期成了大后方交通运输的主干,军事运输、工厂内迁、军粮调拨、生产和生活所需物资等,都主要靠川江运输。

抗战期间,四川成为抗日大后方,在重庆、成都、新津等地建立了机场,中国和中央航空公司迁入四川,以重庆为中心,开辟了重庆至香港、昆明、成都、西安,成都至兰州等航线,办理客、货运输。太平洋战争发生后,香港失守,这时美国积极援助中国抗日。经中美英三方商定,开辟飞越驼峰的中印航空线。以印度汀江为起点,中国的昆明、宜宾、泸州等为终点,航程约1000公里。中美双方合运,以美方为主,中国方面由中国航空公司负责。增加的航机、燃料、配件与费用均由美方负责。1942年4月18日,中航公司试航成功,6月正式承担出口运输任务。初期运量月仅百余吨,后运输量

上升为每月千吨以上,最高时曾月运2400吨。在担任中印航运任务3年多时间内,共运各类物资44300多吨。进口主要是军用物资、通讯和工业器材。出口主要是装运钨砂、桐油、猪鬃、生丝等出口物资。美方空运大队每月运量最高时曾达4400多吨。所运物资大部分供应驻华美军,并承运部分美国援华军用物资。中印空运最高时已超过滇缅公路的运量,对战时通外运输有着重要作用。

### 3 教育、科研、文化机构、人才内迁与四川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

#### (1) 学校内迁与四川教育的发展

抗战开始,东部许多高等学校,在政府安排与资助下,纷纷向西南大后方撤退,其中先后迁入四川的共计48所,占战前全国108所高校的44%。

迁川各校分为3个时期,第一期自1937年至1939年,南京、上海和武汉等地高校,迁川复课的有31所;第二期自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春,原迁上海租界及东南各省的高校又有11所迁川;第三期自1944年夏到抗战胜利,原迁广西和云贵的6所高校,再迁重庆复校。

整个抗战时期,迁川的高等学校大部分集中在重庆和成都两地,迁往重庆的有国立中央大学(沙坪坝)、国立交通大学(九龙坡)、私立复旦大学(北碚)等25所。迁往成都的有私立金陵大学(华西坝)、私立齐鲁大学(华

西坝)、私立燕京大学(陕西街和华西坝)等7所。此外迁往璧山3所、乐山2所、万县2所、江津2所、三台1所、南溪1所、金堂1所、江安1所、巴县1所、泸县1所,共计47所高校在川复校复课。

抗战中四川的高等学校,除战前已有的4所和战时外省迁川复校的47所外,又新创办5所:1940年在成都创办了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和私立川康农工学院,1943年在成都创办省立会计专科学校和省立体育专科学校,1944年在自贡创办工业专科学校。抗战后期,在四川的各类高校数已达56所,为战前四川高校数的14倍,居全国各省之冠,使整个四川形成全国文化教育的重心。

抗战中四川的中等教育比战前,也有很大的发展。从1937至1945年中等学校数量有显著增加,划定中学、师范、职业学校3类学区。到1945年有中等学校671所,学生247747人(重庆未纳入统计),达到战前的3倍。四川省自1940年即开始实施国民教育,制订了实施计划纲要及实施办法,将全省县市立完全小学、初级小学、简易小学、短期小学等分别改为乡镇中心学校及保国民学校。预计全省共编为4000个乡镇,50000个保,计划每镇设中心学校1所,每保设国民学校1所,分3期完成,每期1年。到1943年7月,各地设校工作大体完成。

(2) 科研机构内迁与四川科技事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四川本省除有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和省政府的四川地质矿产调查委员会、四川中心工业试验所、川大、重大的理工学院等科研机构外,省外的大批重要工矿、交通企业、高等院校以及国民政府经济部所属的中央水工试验所、矿冶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地质调查所和中央研究院等单位也先后迁入四川。科研机构和工矿企业的增多,推进了四川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工业技术的进步。

1939年和1942年,国民政府两次修正公布《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经济部于1939年公布《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940年颁布《奖励工业技术补充办法》,1943年又颁布《奖励仿造工业原料器材及代用品办法》。资源委员会与国内各高校合作,利用各院校的科研力量促进科技的发展。1942年9月8日,还公布了该会与各院校合作奖励工矿技术进步的暂行办法。1943年,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悬赏奖金100万元,公开征求10项国防工业科研课题的研究答案。1941年至1945年,教育部在重庆连续5年颁发了104项自然科学奖,以此推进自然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进步。

四川科学研究和工业的中心在重庆。1937年11月6日,资源委员会四川油矿探勘处在巴县石油沟钻探天然

气—巴—井,这是中国的第一口深井及高压天然气井。在洗煤炼焦方面,天府、三才生、南桐等煤矿,均能炼出上等洗煤焦,供给兵工和冶炼工业。在钢铁冶炼方面,重庆人和钢铁冶炼公司建有5吨(后扩大为7吨)小型炼铁炉,炼出高达15%以上的高硅生铁。在化工技术方面,重庆的新民、新中国、大成酒精厂能制酒精与醚的混合物,以代替汽油开车。长江制药厂制成硬脂酸,王汉曾以烧碱和木屑制成纯碱。工矿调查处木材干馏厂干馏木材,取得丙铜酸等产品;中国火柴原料厂制造氯酸钾、黄磷、赤磷、硫化磷。中央、中元、建国纸厂利用稻草、竹废花、木材等为原料,自制化学纸浆等。在创造发明方面,重庆中新染织厂发明的各种重要染料、瑞华公司新制纯碱、生生农贮公司干粮粉、生生代乳粉、天府煤矿自制的铁路机车、上川工业会制造塞璐璐成功、经济部中央地质调查所制成水平地震仪、垂直仪,钢铁专家李华研究内燃机成功。中国西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常隆庆曾4次同助手带领马帮进入昔日“不毛之地”的攀枝花地区,1942年2月又同中央地质调查所的人结队,再次探测攀枝花的铁矿,并写成《攀枝花磁铁矿探测调查》。战时迁川的永利化工厂总工程师侯德榜,从事新法制碱研究,不到3年,研究成功“联合制碱法”。利用空气中的氮,煤气的氢,经过提纯与

催化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制成碳酸氢钠,经过煅烧即完成纯碱过程,被称之为“侯氏制碱法”。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有重要的进展。首先在中国通史和思想史研究方面:1941年出版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上册,1942年出版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都先后在重庆完成。1944年3月,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深刻总结了农民起义的历史经验。《新华日报》自3月9日~22日予以连载,受到广大读者好评。中共中央将此文列为整风文件之一。

战时,在川大执教的蒙文通,写出了《周秦民族史》、《中国史学史》、《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等论著。

在哲学研究方面:杜国庠先后写出了《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先秦诸子的若干问题》两书,对墨子、公孙龙子尤其作了深入的研究。同时,他与侯外庐、赵纪彬合作,开始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写作。

在文艺理论方面:王昆仑出版了他的名著《红楼梦·人物论》,蔡仪完成了《新美学》。重庆地区的报刊围绕着关于“与抗战无关论”、“暴露与讽刺”、“民族形式”、“战国派和民族文学”、国民党中宣部提出的“六不”、“五要”以

及“主观论”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3)文化机构内迁对四川文化事业的促进 抗战时期,四川的文化事业贯穿着两种指导方针的复杂斗争。国民政府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提倡复古、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倡导“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儒家的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来指导国民工作,规范国民言行,改造国民精神。并制定了不少报刊、图书、戏剧等审查规则、条例来控制抗战文化运动的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和大后方执行的文化方针是:团结一切抗日、不反共的文化力量,建立文化运动上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黑暗复古主义、反对文化专制政策,发展进步的文化力量,发展民主思想,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研究各种学术,推进中国文化向前发展。

从1937年10月至1939年1月,以白杨、陈伯尘为首的“上海影人剧团”,由熊佛西主持的“农村抗战剧团”,由王肇涇等率领的“四川旅外人抗敌演剧队”,以赵丹等为首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及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怒潮剧社、中电剧团等从上海、南京、香港等地先后入川,到重庆、成都、川东、川南等地进行演出活动。入川话剧团的许多演员、导演、编剧与四川原有的话剧人才相结合,推动了四川话

剧运动的发展。

在川剧方面,肖楷成领导的三庆会改编了许多川剧剧本。如《皮匠爱国》、《姑苏台》等。1940年10月,郭沫若领导的文工会成立后,多次邀请川剧、京剧、汉剧、楚剧界的艺术家们座谈讨论改革地方戏以适应抗日宣传的需要。在重庆的川剧名流张德成、傅三乾、阳友鹤、魏香庭等都应邀参加。他们也慎重选择剧目,积极加工、修正、新编,上演了不少适应抗日宣传需要的优秀剧目。如魏香庭的《李秀成殉国》、《弦高犒师》,当头棒的《乞儿爱国》,周裕祥的《双拾黄金》、《滕县殉国记》、《爱国魂》,张德成等的《扬州恨》等等。

在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方面:抗战期间,从外省入川及本省的重要著名作家有茅盾、巴金、老舍、沙汀、艾芜、吴祖湘、张恨水、碧野、路翎、姚雪垠、靳以等。茅盾有《第一阶段的故事》、《霜叶红似二月花》和《腐蚀》等长篇小说。巴金的抗战三部曲《火》、《寒夜》。老舍有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1943年写出的抗战长篇小说《火葬》,次年写出的《四世同堂》。沙汀的《淘金记》、《困兽记》、《还乡记》等。艾芜的《故乡》、《丰饶的原野》,张恨水的《魑魅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蜀道难》等。抗战时期诗歌发展也很快,1938年,全国著名诗人光未然、臧云远、冯乃超、胡风、艾青等

来到重庆,对四川诗歌的发展影响很大。艾青的《向太阳》、老舍的《剑北篇》、阿垅的《纤夫》、《琴的献祭》、绿原的《哑春》、《雾季》、鲁煤的《牢狱篇》、路翎的《致中国》等,都是一时的优秀之作。抗战中报告文学也和诗歌一样蓬勃发展,当时全国有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有丘东平、周而复、周立波、沙汀、何其芳等。作品有老舍的《五四之夜》、宋之的《从仇恨生长出来的》、秋江的《血染的雨天》。

在美术和电影方面:战时在四川把国画运用于宣传抗日,收到很好效果的是内江人著名画家张善子、张大千两兄弟。张善子善画虎,张大千善画仕女、山水。武汉失守后,张善子画了一幅猛虎扑日图,此画题为“怒吼吧,中国!”1940年,美国空军上校陈纳德率美空军志愿队援华作战,张善子画《飞虎图》赠陈纳德。陈即将志愿队改为“飞虎队”,并按《飞虎图》做了许多旗帜和徽章分发部下,以鼓舞士气。张大千的作品共180件出国举办画展,募集抗日捐款达20余万美元,全部寄回国内支援抗战。这一时期,许多画家以漫画为武器,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9月在中山公园举行单幅漫画展,轰动一时。1940年元旦,举办街头漫画展览宣传周。1945年3月15日,漫画家叶浅予、张光宇、余所亚、廖冰兄、相聪、特伟、张文元、沈同衡等联合在重庆中苏文协

举办“漫画联展”，展出作品 100 余幅，揭露了日本法西斯侵华暴行和国民党顽固派的黑暗腐朽等社会问题。抗战期间，中央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迁到重庆，大批电影工作者也迁到重庆，在四川先后摄制了《保家乡》、《塞上风云》、《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中华儿女》、《东战场》、《克复台儿庄》等故事片、新闻片、纪录片和科教片。电影放映业也有大的发展，重庆、成都等城市都新建了一些电影院。1941 年重庆还先后出版了《中国电影》和《电影与戏剧》两种杂志，登载影评文章，普及电影知识。

在新闻出版方面：因重庆是战时陪都，很多中央级报刊和外省报刊都迁往重庆续办，不少文化人入川后又新办了一些报刊，加上四川原有的报刊，各类报纸达近 200 种，刊物约 1600 种，这是四川乃至当时中国报刊史上所罕见的。其中具有影响的大型报刊，集中在成渝二地，中小型报刊则分布在全省各地区。此外，沿海各省市的一些出版社和书店也陆续迁川，一些爱国的文化人和出版商，为了宣传抗日，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先后在重庆、成都、自贡、万县等地新建了一批出版社和书店，以重庆为中心的图书出版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二) 抗战后期四川社会经济的衰退

1 通货膨胀政策的出台和后果 从

1937 年至 1945 年 8 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军事支出增长最低年分占到总支出的 33%，最高时占 71.36%，年平均为 50.11%。为了平衡财政收支，采取“赊借收入”来填补赤字。赊借收入，是向银行借贷的收入，印刷钞票，扩大发行。

从 1937 年 6 月至 1948 年 8 月这一时期货币发行量是不断增加的，1941 年前后是一个分水岭。1941 年以前是正常的，物价涨幅不大，货币膨胀率也是有限的；1942 年后则呈现一派恶性膨胀的趋势，发行额急剧上升，物价飞速增涨。这 8 年中，法币的发行额增长速度，以 1937 年 6 月为基期 100，1945 年 6 月则为 28298。

1942 年 4 月，普遍发行“关金券”，以“一关金”折合法币 20 元的比率投入流通，作为纸币的一种大量印发，与法币并行流通于市。这样更促进物价飞涨。1942 年 1 月至 1943 年 9 月，重庆一般物价全期上涨 495%，每月平均上涨 23.57%；米价上涨 435%，月平均上涨 20.71%；工人生活费上涨 436%，月平均上涨 20.76%；原材料上涨 400%；日用工业品价格上涨 557%。到 1945 年 6 月，全国法币发行累计总额达到了 3978 亿元，发行指数比 1937 年 6 月上升 282.12 倍，刺激重庆主要商品批发物价总指数比 1937 年 6 月上涨 1533 倍。如此高的涨幅真是骇人听闻！为抑制剧烈的通



货膨胀,国民政府曾采取了诸如推行公债政策,田赋改征实物,战时物价统制,黄金政策,维持官价低汇率等,但大都收效甚微,还往往反为贪官和奸商所利用,成为盘剥人民的手段,造成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困苦不安。

法币发行指数年年上升,到1945年增至738倍,物价指数上升到2126倍,法币购买力随着物价上涨而下降。1937年法币1元到1945年只值4/100分,为1元的1/2500。法币购买力下降,实质上迫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降低。

2 苛捐杂税与战时摊派 抗战爆发不久,国民政府为弥补财政亏空,便决定增加税收,发行公债。首先将过去的统税和烟酒税扩大为货物税。从1937年10月1日起,凡国内运输的货物一律需加征货物转口税;同月开始提高印花税率和加征土酒土烟丝税。这一增税措施,虽在局部地区增加了财政收入,但由于国土的大片沦陷,总收入并未增加,1937年度,国民政府实际收入为4.1亿元,1939年度也只有4.3亿元左右,与战前1936年度收入10.4亿元相比,减少60%左右。1938年4月,国民政府根据“抗战建国纲领”推行战时税制,在国统区开征所得税。1938年,全国有17个行政区征收所得税,预算收入1250万元,而实际收入仅823万余元。1939年所得税虽增加到2900万元,但是,要维

持当年27亿多元的财政支出,犹如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如将抗战初期新增税收加上旧有税收综计,每年财政收入只相当于财政支出。据统计,1938年财政收入只相当于财政支出的56.21%,1939年收入只相当于支出的26.9%。

由于增税收入甚微,国民政府又以发行公债为敛财手段。抗战初期,国民政府除向英、美、苏等国举借外债外,主要是向国内发行公债。从1937~1938年间,共发行5次公债。1937年9月发行救国公债,12月发行整理广西金融公债,1938年5月发行金公债和国防公债,7月发行赈济公债。发行面额共达16.75亿元法币。由于国民政府滥发公债,不讲债信,债券两度破产,广大人民对政府公债丧失信心,而且也被大量认购公债弄得一贫如洗,造成百业萧条。1938年开始,公债发行出现危机,当年各项公债总额14.5亿元,民间仅认购1840万元,余下主要数额,均以“总预约券”形式向中、中、农、交四大银行作抵,由财政部出具债约,再由四行为财政部垫支巨款。四行则将此项空头债券转充发行储备,增发不兑现的钞票,实际就是对广大人民竭泽而渔的搜括和掠夺的一种方式。而其结果则是进一步加剧已经十分严重的通货膨胀,给社会经济造成更大的摧残。

3 社会经济陷入困境 由于通货膨

胀,原材料短缺,战时专卖和物价管制,交通运输困难,使四川经济由高涨到衰退。

抗战期间,政府为保证军需物资的供应和稳定人民的生活,对战时商业实行统制政策。对重要商品如粮、棉、丝、桐油、猪鬃、钨、锑、锡等实行统购统销;对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如糖、盐、烟、火柴等,从1942~1944年实行专卖。这些措施对保证军需物资的供给和人民的基本生活所需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执行后期,由于本身的弊病,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如收购价格低,亏及成本,导致生产萎缩。1942年10月,重庆市的裕华、豫丰、申新、沙市4厂制纱成本,每件纱用棉花5市担,每市担1400元,共7000元,工资、动力、保险、运费等共约5500元,各种税收430元,共计12920元。而当时的物资局公布的20支纱价每件为8580元,较之成本低4340元;军纱每件5300元,较之成本差7620元,按4厂每月提供物资局棉纱400件,军纱650件,每月亏损数额巨大,“因而各厂惶惶不可终日”。尽管对花纱布实行了统制,但由于原料短缺,也无法实现供求平衡。原料供应和加工生产能力失衡,引起工厂倒

闭。1945年时,重庆市因政府无力解决原料问题,出现危机,十几家纺织厂中,大厂半开半停,8家小厂关门者半数以上。

据经济部公布的统计数字说明,后方设厂指数,以1938年为100,1939年为206,1940年为263,1941年为395,1942年为261。设厂指数反映了抗战期间四川工矿企业的增减趋势,1941年为增长比例最高年,1942年进入低潮,仅为1941年的66%,甚至低于1940年的水平。据工矿调查处1943年对重庆工厂异动情况的调整,停工厂数已达52家,占重庆工厂总数的14.3%。未停产的工厂,开工率普遍下降。贵州省企业公司四川工矿参观团调查报告称,四川实际工业生产力仅达到应有生产力的1/2甚至1/3。以几家规模较大的工厂平均每月实际生产力占应有生产力的百分比为:裕华纱厂66%,中新第四纺织公司蓉厂33%,四川丝业公司第一厂42%,四川水泥厂50%,建川电仪公司15%,犍为焦油厂20%,四川酒精厂30%,中国兴业公司57%,南洋烟草公司36%。设厂指数和企业生产力的下降表明,四川工厂的发展进入了衰退期。

## 六、解放战争时期的四川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国民党内有志之士的强烈呼吁和要求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1945年8月14、20、23日连续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商谈战后实现国共合作,避免内战事宜。为了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的愿望,尽可能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目的,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乘飞机到达重庆。

国共双方,通过43天艰苦谈判,于10月10日,在桂园签署了《国共双方代表会议纪要》(即《双十协定》)。由于蒋介石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拒不履行双十协定,暗中积极准备发动国内战争,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从这年冬开始,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中小规模的武装冲突不断发生。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四川人民在中共四川各级组织领导,与反动派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中国各民主党派如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成立于抗战时期,在争取团结抗战和民主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1945年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支持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国共和谈破裂后,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同心同德,对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的内战表示极大愤慨,并组织 and 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斗争。

(一)恶性通货膨胀政策摧毁了社会承受力

内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为维持内战的开支,大量滥印滥发钞票。1945年,法币的发行量为1.03万亿元,1946年增为3.73万亿元,比上年增加2.61倍。1947年为33.1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7.91倍。1948年从1月到8月21日,仅7个多月,法币发行额即达663.69万亿元,比上年增加19倍。从抗战胜利到1948年8月,3年时间法币发行量增加1180倍以上,币值因此急剧下落,物价迅猛上涨。1948年8月,同内战前的物价相比,上海的物价上涨492万倍,重庆的物价上涨150余万倍。法币已完全失去信用,财政

经济濒于崩溃。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开始发行金元券代替法币。规定按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元券1元,限期兑换;金元券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禁止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流通买卖;凡持有上述黄金、白银、银币、外币者,限期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元券。金元券发行后,中央银行仅在成都东较场焚销收兑回的法币就有2000余箱,计18000亿元。经两个多月的强制兑换,国民政府共搜括到各界民众兑出的黄金100多万两,美钞3000多万元,以及港币、银元等,总计约值2亿美元。

11月12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允许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并可以用金元券向国家银行兑换黄金。9、10月在黑市上大幅度贬值的金元券,变成了公开的贬值。金元券发行之初,规定黄金1两合金元券200元,银元1元合金元券2元,美钞1元合金元券4元,这时国家银行已分别将兑换价提高10倍,黄金每两为2000元,银元一元为20元,美元一元为40元。金元券失去信用。物价飞涨,到12月达到高潮。如成都的黄金价,8月19日每两换金元券200元,到12月底每两换6000元;银元价,8月19日每元换金元券2元,到12月底每元值金元券68

元;大米价,8月19日每双市石卖价金元券103元,到12月底每双市石卖价400元。到1949年2月,金元券发行量达到64亿元,物价更是扶摇直上。1949年6月,成都市场上,黄金每两值金元券900亿元;银元每元值10亿元,大米每双市石值97亿元。这3种物价与1948年8月19日发行金元券时比较,黄金价上涨45亿倍,银元价上涨5亿倍,大米价上涨约9亿倍。成都中央银行发行的金元券面额有1万元、5万元、10万元3种,后来还发行有每张1000万元的定额本票。钞票面额虽如此大,但因物价涨了数亿倍,所以现钞仍不敷流通,商家及民众不愿用金元券,一旦拿到此钞,都要换成实物。

金元券仅发行10个月,也跟法币一样失掉了信用。1949年,国民政府逃到广州,政局混乱,外地金元券潮水般涌入成渝等地,抢购金银和物资,市场一片混乱。当时重庆银元黑市每元卖金元券25亿元,买者甚多;而持银元者成为买家追逐目标。四川的金银和物资大批外流,交换到天文数字般的金元券,形同废纸,使四川经济濒于破产。

1949年7月1日,代总统李宗仁命令宣布了《银元及银元兑换券发行办法》15条,规定发行的银元券可以兑换银元。为树立银元券的信用,中央银行让银元和银元券同时流通。8

月中旬,长沙解放后,广州国民政府向重庆撤退,银元券又开始贬值。10月,逃到重庆的许多官员、将校、富商,从广州带来大量的银元券,急于向中央银行挤兑金银,或在市上抢购金银。金价大涨,重庆原来每两黄金不到100元银元券,10月13日涨到每两190元。成都原来每两80多元,10月14日涨到每两160元左右。11月9日,重庆金价涨到每两兑换银元券153元以上,11月25日金价涨到每两换银元券285元。由于货物交易只用银元,国民政府军政机关也拒领银元券,蒋介石不得不批准中央银行由成都商会协助,用黄金收兑银元券。发行仅5个月的银元券再次给四川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在重庆,1947年6月28日,大米每石售价已涨到22万元,1948年3月5日涨到近200万元;6月间,米价1日数涨,16日晨市价达每石600万元,傍晚涨到850万元至1200万元,1个月后涨到1700余万元;1949年3月涨到每石金元券12万元,折合法币360亿元。物价飞涨,职工的收入则急剧下降,生活无着。工人、公教人员、被遣散的军官都深受通货膨胀之害。

在成都,1947年春季因物价上涨,法币贬值,很多人无法生活下去。5月,成都爆发了饥民打粮店、抢米的风潮。成都饥民抢米店300多家,还冲入饭店或富户家中白吃。1949年2

月,政府调整了公教人员的待遇,规定比1948年8月发行金元券时调高35倍,但当时成都大米已涨了72倍,邮资一封平信涨了300倍。同年3月,生活指数已升到3500倍,而公教人员的待遇只及105倍。

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1948年,重庆郊区农民的实际收入已降到战前的25%,加上水旱灾害,生活更加悲惨。1949年重庆农村前遭春旱,5至6月又连续受暴雨洪水袭击,人畜房舍冲毁甚多,饥民遍野。1949年4月,乐山县饥民吃观音土、菜根充饥,饥民四处求食。5月,万县大旱,饥民剥树皮、挖草根充饥,哀鸿遍野,满目萧条。1949年全川农村有饥民2000万人。

## (二)百业倒闭,万众失业

在战后全面通货膨胀的影响下,四川工业遭受致命打击。由于原料价格飞涨,工费、劳务随之上升;因战乱带来的经济动荡,使销路锐减;产品价格呈现下落趋势,使企业难以生存。民生轮船公司在抗战后期扩充航运实力,向加拿大银行贷款1500万加元,订造160呎长江小客轮6艘,270呎长江大客轮3艘,共9艘,15084吨,又以自筹美金200~300万元购得各种运输、船舶若干艘,使民生公司船舶增加到1949年的96艘、72469万吨,航线从长江扩展到海洋。由于战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萧条,百业破产,客货运

量锐减,原来运输棉纱以件计,战后来货稀少,棉纱以并计(40并为1件)。1946年以后,民生公司奉国民政府行政院命将大小18艘轮船客货运全部停止,编为差船,赶运军需和部队。1947年中,应差130航次,共运军、公物资30000吨,军队74000人;1948年中,运军需品30000吨;1949年中,运军需品10000余吨,军队20000余人。差运运价较客运低得多,加上通货膨胀,连成本也不够。民生公司以增加航运能力偿付债务的计划化为泡影。“外无以偿外债,内无以供开缴”全靠借债度日。

抗战时期,重庆主要机制面粉企业有复兴、福民、福新、天源、岁丰5家。受通货膨胀打击,面粉企业均处在一无原料、二无资金的境地。小麦价格由1946年底的1600元左右1石,上涨至1947年2月的6000多元1石,使机制面粉业遭受沉重打击,小厂纷纷倒闭。复兴机制面粉厂为偿还债务,不得不以3000万元价款将南充分厂拍卖,并将企业资本从400万元增加为2亿元。资金裕如后,又大批购进小麦,并积极开拓武汉、广东等外省市场。但全面通货膨胀粉碎了重庆机制面粉厂的美好愿望,1948年,复兴存储小麦22万石,负债额不到20万元。改用金元券后,复兴厂金融市场连续出现5个比期的高利率,使复兴厂遭受高利盘剥。为偿还债务,不得

不大量抛售面粉,到1949年初,债务虽基本清偿,所存2万余石小麦一扫而空。为避免破产,只好做空头面粉生意,以取得资金。复兴厂一次抛售空头面粉多达18万包。重庆临近解放,买方急于处理面粉,纷纷持单取货,复兴厂陷入绝境,存货提尽,尚有6000余包面粉提单和10000余银元债务无力清偿。

战后,四川电力工业受恶性通货膨胀和政府“限价”政策的双重压迫,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成都启明电灯公司一月电价收入,不够买10天的煤,更无力增添设备、更新电路。为维持公司日常开支,只好以借债度日,由于银根奇紧,银行利息很高,月息达30%,不到3个月,本利对翻。无钱偿付,则采用挖肉补疮方式,吸收高利率存款,暂时缓解危机。该公司自1945年起,已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当年亏空29711万元。1946年亏空15265万元,1947年亏空278452万元。到1949年,公司负债30多亿元,燃料仅存1日之用,已濒于破产。公司采取寅吃卯粮的办法,对用户预收电费,收款额只达到50%~70%。重庆电力公司受到全面通货膨胀的沉重打击,资产几乎化为乌有,公司董事会决议资产升值50倍,而经济部只批准升值5倍,其中还必须有500万现金投资。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一日数变,公司电价也应相应调整,重庆市参议会严厉

控制电价,一再拖延不予批准。同时,用电单位支付纸币或支票,均不断贬值,大量军政、警宪机关用电从不付费。到1949年初,公司负债累累,陷入困境,赊购的煤炭达5000吨以上,拖欠职工工资达数月之久。1949年6月以后,物价飞涨,公司所需原料、燃料、职工工资均无力开支,电价亦被冻结,依靠借债度日,面临绝境。

四川盐业在通货膨胀的风暴下,场商筹措盐本,运商垫付运本,均有破产倒闭的危险。1948年,各岸销盐量减少,运商积盐如山,兼之通货恶性膨胀,贷款利息直线上升,银行利率已达100%以上,运商受重利盘剥、销路日减的困扰,无力承运;场商因无商办运,不得不减产停产。1949年初,自贡全场停产。1949年4月以后,自贡场商都陷入困境。向以实力雄厚著称的侯策名、熊佐周、罗筱元等无一不负债贷款。1949年9月,盐场情况愈益恶化,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井灶停产达90%以上,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

1948年初,四川参加产联的企业1200家,歇业的达80%以上。到1949年春季,全川失业人数达370多万人,成都就有15万人。成都100多家工厂因无钱买煤而停工。重庆机器业150多家,停工者60多家。到1949年6月上旬,重庆1000多家大小工厂停业者达80%,其中机器业停工近90%,卷烟业由40家减为12家,常开

工的约3家,面粉业也有20家工厂停业。重庆工业生产不断低落,大批生产设备因停工或开工不足而闲置不用。如全市炼钢能力为40000余吨,但1949年仅钢产量不到设备能力的20%。全市失业员工达12万多人,停产待复工者达10万多人。重庆经济状况已陷于崩溃境地。1949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只有7.3亿元,主要产品产量:钢6100吨,原煤201万吨,发电量1.47亿度,都是一片破产景象。

### (三) 中共地下党的活动与各地抗议风潮

1947年2月国民党通知中共重庆办事处撤退,强令《新华日报》停刊,中共组织转入地下活动。1948年,国民党当局查禁《挺进报》,镇压上、下川东和华蓥山起义,使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委员彭咏梧牺牲,加之一些人的叛变,临委实际上已经解体。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捕充当敌特,重庆市委亦不复存在。

1948年春夏之间,国民党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川东临工委决定由邓照明等清理党的组织,恢复联系,安排善后,重新聚集力量。并联系各地区组织和党员,贯彻中共中央8月22日关于在国统区实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隐蔽下来,暂时渡过难关。并千方百计与上级党组织建立联系。这段时期,重庆城中心区和南岸区党组织未遭破坏,继续坚

持党的工作。8月,中共川康特委派成都市委的部分党员赴渝开展工作,其任务是: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和进步群众团体等,与川东党组织平行活动。与此同时,川东党组织亦派熊扬等赴成都地区,建立党的特支。

1948年9月,中共上海局从北平、上海川籍党员中抽调一批干部回川开展工作,少数人与川东党组织接上关系,大部分由川康特委领导。12月底,邓照明赴香港,向上级党组织系统地、全面地汇报了川东、川南和重庆地区党的工作。上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工作部署和四川党组织的状况,指出全国解放在望,党在国统区的工作重点必须从农村转向城市,实行“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方针,发动群众保护城市,保护工厂、学校和机关档案,防止敌人破坏,加强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注意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在农村建立的武工队,主要是发动组织群众,不再搞大的武装起义,保存力量,避免损失。决定成立川东特委,由肖泽宽任书记,邓照明任副书记,负责川东、重庆和川南部分地区的工作。

1949年1月,邓照明从香港回重庆,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精神分别传达到县级以上的干部。在川东特委领导下,党组织恢复和开展了党的活动。在川西,自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叛变后,副书记马识途等奉命撤到香港,川

康特委所属组织和成都市委下属各组织均相继独立战斗。中共川北工委、雅乐工委等,则在川西北、川康边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1949年下半年,中共四川各级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开展调查研究,加强统战工作和策反,认真进行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护城、护厂和护校工作,迎接解放,配合接管。7月,中共川东特委在重庆召开了川东组织负责人会议,着重对讨论决定了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并调整组织,分工负责。

四川工人阶级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斗争,到1949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党的领导下,工人运动更加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并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1月23日,天府煤矿工人因物价猛涨,又值年关,要求厂方增加工资5倍,2000余人包围厂办公楼至深夜,经过几天斗争,矿局被迫答应增加工资3倍,斗争取得胜利。

大中小学教职员罢教,银行职工闭行,店员罢市,报社编辑、记者辞职停工,构成了四川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月24日,重庆市国立院校教授会决定罢教3天,要求改善待遇。次日,重庆大学、中央工校、教育学院、女子师范学院成立“争取师生员工温饱委员会”,声援教授,要求改善待遇。3月5日,重庆《商务日报》工人20余人举行罢工。3月13日,重庆各大、



中专院校的教职员工为反饥饿、反内战一致罢工罢教,并组织3000多人进城示威游行。同日,成都省立18所学校的教职员全体请假,向省政府要求救济。3月30日《国民公报》编辑和采访记者提出总辞职,致使该报停业。四川工人运动除重庆、成都外,自贡、犍为、乐山盐厂、都江堰电厂、新都唐家寺西安被服厂二分厂、威远黄荆沟煤矿、乐山裕利丝厂等,都展开了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1949年秋,四川工人运动的中心转到护厂、护校、护城的斗争,重庆工人阶级在护厂护城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1949年春,四川学生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更加浩大的争温饱争生存运动,重庆四·二一运动发展到了高峰。同时,农村武装斗争也不断深入,开展抗丁、抗粮、抗捐斗争。

#### (四)特务横行屠杀革命人士

1 特务活动变本加厉 1949年,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宣传媒体进行反共宣传,另一方面加紧动员特务机关和特务分子,采取各种方式,煽动人民反对和仇视共产党,抵抗解放军入川。

1949年3月,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奉蒋介石的命令,到重庆主持召开“西南地区工作会议”,各省市特务头目均参加会议。决定派遣特务到西南各地潜伏,想方设法阻止各地的解放和颠覆新建立的人民政权。并以特务为基本骨干力量,组织交警总队,在华

盖山和川南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进行最后顽抗。会后,四川各地的武装特务和潜伏特务,四处进行破坏活动。在成都、重庆等地,特务还引诱和胁迫工矿企业中的高技术人员到台湾,煽动工商业资本家转移资金,将重要机器设备转移到台湾、香港等地。

2 对中共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迫害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带领毛人凤等到达重庆。除参加西南军政长官会议,部署反共事宜外,特别指示毛人凤令特务机关清理积案,部署有关大屠杀计划。蒋介石指令先杀杨虎城将军,对过去逮捕的共产党人也将其主要者杀掉一批。毛人凤还令成都、重庆的特务机关呈报所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名单,由他签报蒋介石批准全部枪决。9月6日,在重庆歌乐山松林坡戴笠公馆内秘密杀害了杨虎城将军和其子杨拯中,以及秘书宋绮云一家;10月28日,在重庆大坪公开杀害了《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等10人;11月14日,在原中美合作所电台岚垭杀害了江竹筠等30人;11月27日,在歌乐山的白公馆渣滓洞屠杀200多人;12月7日,在成都十二桥屠杀了杨伯恺等35人。国民党特务在两三个月内就先后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300多人。

#### (五)解放四川

1 人民解放军对四川的战略进攻计划 1949年4、5月间,解放军在攻占京、

沪、杭解放江南大片土地后,中央军委于5月23日发出《向全国进军的部署》,命令第二野战军准备向西南进军。进军西南战略采取避实就虚、断其后路的方针,解放军主力避开胡宗南构建的秦岭防线,从南方攻取川、滇、黔、康诸省。贺龙率第18兵团等入川,与二野协作解放四川与西康省。军委的部署指出,二野的主要任务是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指出,国民党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的消息。蒋介石等打算建都重庆,割据西南。消灭胡宗南部及川、康国民党军,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7月16日,中央军委又指出了进军西南,解放四川的战略任务和方针:二野主力于9月从湘西、鄂西、黔北入川。贺龙率第18兵团及一野一部从陕南、甘南入川。二野的第4兵团归四野指挥,在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占云南。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组成西南局,统辖川、滇、黔、康4省。7月17日,第二野战军前委在刘、邓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进军西南的部署,制定了进军西南要旨和川黔作战方案;还决定组成西南服务团,随军西进,解决四川和西南的干部来源。中共中央和二野前委还任命了中共重庆市委及川东区党委的主要成员,又从西南服务团,二野3兵团、中共中央华东局、四川干部队抽调2470人作为接管重庆的骨

干力量。

10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确定西南地区主要领导人选:西南局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经营滇、黔、川、康、藏。10月19日,毛泽东发出进军西南的指示,明确四川为西南的重心,二野主力于12月必须到达叙永、泸县、重庆一线,切断胡宗南部和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同白崇禧部的联系;二野的3、5兵团进至湘黔边境待命,贺龙率第18兵团于1月占领成都一带,并迅速扩占全川,设立西南军政委员会,统筹西南全区。二野领导机关率3兵团从南京西进,23日到达郑州车站,刘伯承在各界群众举行的大会上讲话,宣布向四川进军,给敌人以由陕入川的假象,为二野主力从川、黔边迂回国民党侧后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日,刘、邓对二野下达《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29日又下达《进军川黔作战的补充命令》。要求二野先攻取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并控制这些地区,将川东地区的敌人聚歼。令5兵团及3兵团的第10军挺进贵州境内,直出川南,断敌退路。以3兵团主力和4野47军为左集团,攻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地区,协同第50军、42军和湖北军区组成的右集团,会歼宋希濂

部,打开入川通道。为配合二野的作战意图,贺龙令18兵团在秦岭北麓向胡宗南部实施佯攻,陕西军区部队攻占平利、安康等县,形成解放军主力从甘南、陕南进攻川北的态势,使蒋介石不知二野主力从何处入川。

## 2 国民党政府的“总体战”方案

1949年4月5日,蒋介石升重庆绥靖公署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直隶行政院,张群任长官,钱大钧任副长官,控制云、贵、川、康和重庆4省1市,作为最后基地,并以四川为重点。长官公署内设有政务委员会,把各省、市的主席、市长及省市参议长都作为政务委员会的委员。西南长官公署执行“拒共于境外,歼共于境内”的作战指导方针,企图保住西南。根据这一方针在四川采取了以下措施:加紧增筑大巴山碉堡防御工事,派罗广文到城口、万源一带部署督导;加紧在各管区内清剿“土共”及一切可疑分子和不稳定势力,一年中进行春、秋两季“大清剿”;加紧征粮、征兵,扩充部队;组建、扩充、扩编省保安团及各县警备队、自卫队和反共救国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布署特务插入各基层进行控制。在军事部署上,加紧调集国民党军队防堵解放军入川。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部署西南军事。8月29日,在蒋介石亲临下,由张群主持召开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事会议。提出

“确保大西南”的方针,建都重庆,割据西南,以待国际事变;形势不利,则退守云南,背靠国境,争取国际援助,等待时机反攻复国;在无法存身时,逃往国外。会议认为:川东湘鄂川黔边境一带,地势险阻,交通不便,鄂西、湘西一带没有解放军大部队活动,川东有重兵防守,解放军不会由川东入川。川北方面,有川陕公路与陇海铁路相接,容易运输大部队。因此,判断解放军必会从川北入川。根据判断,军队防御的重点应由川东转移到川西北方面,兵力部署为:胡宗南部13个军约20万人的兵力,沿秦岭山脉构筑重点防线,川陕边的大巴山、米仓山、川甘边的龙门山设置二线阵地,构筑工事,形成阻止解放军由陕甘入川的防守核心。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部的8个军,22个师,约10万人兵力,在巴东、恩施、咸丰一线,构成防守川黔的另一重要阵地,并担任四川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和贵州沿河、松桃在内的川黔湘鄂边界地区的防御任务。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孙震部两个军,约30000人,控制巫山、巫溪及至万县、忠县一线,依据大巴山、巫山屏障川东北。第7编练司罗广文部3个军、9个师,约40000人,主力部署在重庆周围,同20军杨森部、内政部警察第2总队部,共同卫戍重庆。另一部由原驻达县、城口、万源一带,在罗广文率领下,改向青川、平武一带出发,沿川陕甘边境紧

急布防 构筑工事 并相机向甘肃境内白龙江方向派出前进部队 阻止解放军南下。罗广文9月初率部由川东向川西北开动 部署未定 川东告急 又奉命率部回防。在刘、邓大军战略包围下 防守四川的国民党军指挥机构及其将领防守无策 面临绝境。

3 总统府迁川与“死中求生” 1949年10月12日 因广州三面被解放军包围 即将解放 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以及军政要员 急飞重庆 再次迁都。蒋介石企图以西南为基地 四川为主要据点 重庆为指挥中心 负隅顽抗。

为强化国民党政权 蒋介石派王陵基、杨森分任四川省主席和重庆市市长 张群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 4月5日 重庆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 张群任长官。同时颁布法令 加紧对人民群众的镇压。早在1949年元旦 国防部就颁布戒严令 成渝二地当晚宣布宵禁。4月20日 王陵基下令镇压成都各大中学校教师和学生 逮捕四川大学学生田中美等6人 会计专科学校、艺术专科学校多人 石室中学等校的训导主任亦遭逮捕。成都《西方日报》被查封 总经理被捕。4月20、21日 重庆当局实行特别戒严 逮捕进步教师、学生、记者、工人和市民等 并解散重庆市第一中学。4月26日 重庆市警备司令部颁布了10条“杀令” 如反抗政府、阻挠政令、煽

动罢工、鼓动学潮者 一律处以死刑。5月11日 全川各地大批军警出动 禁止示威游行。成渝两地连夜大搜捕 重庆警察局以抽查户口为名 在1~6区逮捕200余人。5月15日 王陵基下令逮捕了民革川南负责人李宗煌。7月12日 行政院又颁布“国民反共公约和实施办法” 其中规定：不与“共匪”合作；不对“共匪”讲真话；不替“共匪”刺探消息；不替“共匪”带路、做工等。要求各保甲应用5家联保联坐办法 互相监督、检举。9、10月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进行“秋季大清剿” 成渝等地经常戒严。11月18日 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再度发布“紧急维持治安办法” 规定10条杀令。12月18日成都防卫总司令盛文继杨森之后颁布12条“枪杀令”。

国民党政府为死中求生 不断补充部队 增加装备 加强四川周围及川内驻军。1949年9~10月间 驻扎在四川周围和川境内的军队计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 辖第5兵团 司令李文；第7兵团 司令裴昌会；第18兵团 司令李振 号称40万人 控制川西北。川黔鄂湘边区绥靖公署宋希濂部 辖第14、20兵团 约15万人 控制川东南。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孙震部 指挥第15兵团、16兵团 扼守川东。川南叙泸警备司令部 第72军军长兼司令郭汝瑰驻防川南。重庆地区有杨森的20军、陈春霖的44军、

罗君彤的 361 师、徐正刚师、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宪兵第 24 团、重庆警备部队。成都地区有成都警备司令部、1 个宪兵团,第 95 军。21 军驻乐山地区。24 军驻雅安。西昌警备司令部,四川省保安司令部辖保安团十余个。

4 实施破坏重庆计划 11 月下旬,蒋介石特派兵工署副署长唐某和毛人凤带领东南技术总队的爆破人员,到重庆执行破坏重庆的兵工厂和发电厂的特殊任务。毛人凤召开了重庆军统公秘单位负责人会,研究爆破工厂问题。交警总局局长、兵工署警务处处长、重庆稽查处处长、重庆警察局副局长,以及第 8 区公路局稽查处、保密局、总务处、东南技术总队、军统西南特区等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毛人凤在会上宣布了蒋介石破坏工厂及设施的指令,决定成立破厂办事处,军统在重庆的公秘单位全力协同完成破厂任务。准备用 300 吨炸药爆破工厂设施,计划要炸的兵工厂有:第 10、20、21、23、24、27、30、31、50 兵工厂,军械总库及广播电台设备、大溪沟重庆电力厂、大渡口钢铁厂等。爆炸时间定在解放军到达南川附近时。会议决定,完成炸厂任务后的特务,采取各种办法潜伏下来,或潜逃打游击。由于解放军迅速进占重庆和重庆地下党发动工人进行护厂斗争,爆炸计划大部未能实施,只有少数几处遭到破坏。

5 重庆解放 11 月 14 日,蒋介石

由台湾飞重庆,亲自指挥防守川东和重庆的战事。蒋介石妄图力保重庆,他决定加强川东的防卫能力,急调罗广文兵团的 108 军等 4 个师,赶赴乌江边增援宋希濂部,保卫重庆,还派蒋经国持其亲笔信赶到川东前线给宋希濂打气。蒋介石还电令胡宗南从川陕边防线上抽调第 1 军,增援重庆。蒋介石的这一系列加强防御的措施,都未能阻挡解放军的进攻。二野 3 兵团主力向罗广文部发动攻势,歼其一部。32 师 96 团猛追逃敌,于长坝歼敌 1 个团。11 月 25 日,解放军攻占南川县城,歼灭宋、罗两部主力 30000 余人,余部向重庆逃窜。胡宗南部无兵力可派,只运回两个团,对加强防御毫无帮助。11 月下旬,3 兵团 12 军主力于顺江场、江口场、江津,47 军由巴县木洞及其上游强渡长江,一举攻破长江防线。47 军主力直插江北,在悦来场俘敌副师长以下千余人。12 军一部绕过白市驿机场直取璧山,俘重庆逃敌千余。一部直出来凤驿、永川,配合 11 军攻占重庆。11 军仅 32 师、33 师在重庆外围歼敌 108、110 军等部 4000 余人。当解放军逼近重庆时,只在近郊发生了小规模战斗,国民党守军不战自溃。11 月 29 日,蒋介石在山洞林园召集海陆空军将领开会,决定撤出重庆,国民政府迁往成都,并下令破坏重庆的工厂和建筑设施。11 月 30 日,蒋介石乘机飞成都,国民党军政要

员争相逃向成都。解放军 11 军 93 团从浮图关进入重庆市区,沿上清寺、化龙桥追击逃敌。30 日下午,中共川东地下组织代表和工商界代表过江欢迎解放军入城。驻守市区的国民党反共保民军 1 个师和江防舰队的 7 艘军舰宣布起义。傍晚,解放军大部队进入市区,重庆宣告解放。1949 年 12 月 2 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贺龙为副主席。12 月 3 日重庆市军管会成立。12 月 26 日川东区党委在重庆南岸成立,谢富治任书记,阎红彦、魏思文任第一、二副书记。

6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宣告起义、西康起义 四川解放前夕,中共统战部门、二野以及民盟等民主党派,都曾派人到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所辖第 24 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所辖第 95 军,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潘文华进行工作,希望他们审时度势,在解放军解放四川时,配合起义,为人民作出贡献。1949 年 10 月下旬,刘文辉将西康的军事、政治重新部署,从雅安移住成都寓所,以便同邓、潘等密商起义问题。

11 月 30 日,蒋介石到成都后,在北较场组成临时指挥部,妄图死守成都,进行川西大决战。当天下午,蒋介石在北较场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等谈话,点名要刘、邓两部配合胡宗南部进行决战。刘、邓对蒋

介石敷衍应付,使蒋放心不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派人上门摸底。12 月 7 日上午,蒋介石侍从室分别给刘、邓打电话,说蒋下午在北较场召见他们。刘、邓商量后,认为凶多吉少,于是立即决定离开成都,到新繁、彭县去准备发动起义。当日下午刘、邓出城后宿崇义桥。8 日上午,刘、邓移住新繁,刘文辉分别通知川西各县的地方武力,立即动员起来,配合起义。午后,王缙绪奉蒋介石之命来劝说刘、邓回成都。遭刘、邓拒绝。9 日晨,刘、邓到达彭县,并派人到灌县通知潘文华赶来参加起义。

1949 年 12 月 9 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正式通电起义,通电声讨了蒋介石窃持国柄 20 余年来的种种罪行,并宣称与蒋李阎白断绝关系,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和公私财物,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12 月 13 日,胡宗南调集部队,将刘文辉部驻武侯祠的董旭坤团和邓锡侯部驻华兴街的秦述观营包围缴械,并抄了刘文辉的玉沙街公馆,抢走金银、鸦片烟和细软物品。

12 月 12 日,24 军驻雅安、西昌、康定的部队也宣布起义。同日,西康省民政厅长、代省长张为炯也通电全省各县宣布起义。13 日,“西康临时军政委员会”在雅安成立,接管西康政权,推刘文辉为主任委员,刘元瑄为副主任委员。当天,西康省临时军政

委员会即布告全康,统一指挥全省军政紧急事宜,要求原西康军政人员恪守岗位,照常供职,保护公共财物,迎接解放。至此,除西昌地区尚为胡宗南、贺国光部控制外,西康的康雅两属地区已和平解放。

7 川南解放 11月30日,二野解放重庆后,兵分两路,一路向川南荣昌、泸州、内江进军,包抄溃集于川西的国民党军队,另一路从垫江、邻水、铜梁、璧山、永川西进,紧追国民党军队孙震、罗广文部,向内江、遂宁、资中推进。12月1日,二野3兵团第10军解放贵州赤水后,也向川南推进,于3日解放纳溪、泸州。同时成立泸县军事管制委员会,王其梅、王晓分任第一、二主任,5日解放自贡市,19日川南区党委在自贡成立,李大章任第一书记,彭涛任第二书记。5兵团由黔北进入川南,向纳溪、富顺、泸州、宜宾进攻。

12月中旬,二野3、5兵团由纳溪、自贡、内江、宜宾等地西进。11日,国民党军第22兵团司令兼72军军长郭汝瑰在宜宾起义。5兵团解放乐山后,主力北进至峨眉、洪雅一线。16军在峨眉西南歼灭宋希濂部残部,宋希濂被俘。3兵团10军由自贡、威远西进,14日占井研,18日夺取丹棱。12军为抢在敌前占领战略要地,断敌西逃之路,遂以34师经球溪场、北斗镇,35、36师经茶店子、富加场等地,

向彭山、新津前进。17日,在双漩子、半边街、江口等地强渡岷江成功,18日攻占彭山,歼敌69军1部,俘敌近千人。19日,35师连克新津以南狮子山、老君山。11军由遂宁、安岳经乐至,于15日解放简阳后,直插双流、新津,50军进至金堂南面一线。

8 川西会战 11月7日毛泽东电贺龙并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刘、邓,为了统一指挥18兵团及临时配合作战部队及领导川西北地方工作,在与西南局合并前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

12月3日,贺龙率第18兵团迅速南下,形成对胡宗南部的南北钳形攻势。在贺龙指挥下,18兵团和一野7军一部,翻越秦岭南下,6日解放陕南重镇南郑城,8日克留霸、褒城、沔县,10日解放川北重镇南充。1950年1月8日成立南充军事管制委员会,赵林、孙先余分任正副主任,11日解放甘南武都,进抵四川边境,挺进川北。胡宗南主力第5、7、18兵团向成都周围溃逃。12月6日,刘、邓命二野继续西进,切断胡宗南部从乐山、邛崃、大邑向康、滇退逃之路。二野各部按照刘、邓部署积极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为断敌逃路,刘、邓电令12军迅速进占邛崃、大邑。进攻邛崃的36师106、108团与邛崃山区的川康人民游击纵队相会合,对敌人发起猛烈进

攻。19日攻占邛崃县城,王陵基部的3个保安团被击溃,向大邑逃窜。106、108团继续追击,在王泗场、桑园场歼敌65军等部,20日攻占大邑。在邛崃、大邑战役中消灭敌人千余人,俘虏敌人7000余人。

贺龙部进入川北后,解放了川北大部分地区,歼灭胡宗南部80000余人。20日解放梓潼,21日解放绵阳,直逼德阳、广汉。同日,另一部解放巴中。胡宗南等部共19个军,52个师,约30万人被包围在成都地区。为阻止解放军追击,国民党军队炸毁了从绵阳到成都和从内江到成都的主要公路大桥。12月21日,刘、邓命所属部队要全力打好成都战役,特别强调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国民党军放下武器。解放军各部队向被包围的国民党军队广播、送信、派人策反,争取他们起义。同日,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及16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率该兵团全部在广汉、什邡起义。陷入重围的胡宗南决定向邛崃方向突围。12月21日,胡宗南在新津召开国民党军各部军以上指挥官会议,作了突围的部署。但罗广文和陈克非拒不听命。胡宗南见军令不行,突围无望,遂于23日乘机飞往海南岛逃命。北线贺龙部也于23日解放德阳、广汉、新都后,进逼成都,追击各部逃敌。23日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裴昌会率7兵团在德阳起义,24日15兵团司令罗广

文、20兵团司令陈克非在郫县、彭县起义,25日18兵团司令李振在简阳起义。

胡宗南临逃之前,将部队交给5兵团司令李文指挥。李文在新津地区坚持顽抗,他收集7个军,从24日开始向邛崃突围。他以第1军沿岷江南岸从新津经蒲江、邛崃向雅安方向突围。第3军在新津担任掩护,90军佯攻邛崃,牵制邛崃的解放军。李文亲率27军、36军等主力沿成雅公路经邛崃南侧向雅安方向突围。遭到解放军迎头痛击,突围失败。以后李文又连续几次组织突围,都被解放军打败。26日,解放军10、11、12、16、18、50军等部队向李文兵团发动总攻。国民党军5兵团在新津、邛崃一线被歼。27日下午,李文率残部5万余众投降。至此,被解放军包围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等部30多万人被彻底歼灭。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南北两线解放军于27日在成都会师。

9 成都解放 在解放军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国民党军队内部进一步分化瓦解,此时,成都市已成“真空”地带。国民党成都市市长冷薰南为迎接解放军,维持成都市区治安,于25日约集各界成立“四川省会临时治安委员会”,并邀联勤部川西补给区司令曾庆集担任城防司令。同日,成都中共地下组织宣布建立“西川人民保卫总司令部”,郭勋祺任总司令员,罗



宗信任副总司令员,胡春浦任政治委员,并发出通告,在人民解放军未到达前,暂维持成都地区治安。

12月30日,贺龙率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受到了中共成都地下组织代表及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成都解放。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等任副主任。

重庆、成都解放后,全川各地陆续解放。1950年2月1日,解放军进驻西康省会雅安。2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雅安军管会,廖志高任主任,刘忠任副主任。

10 西昌解放 1949年12月21日,贺龙及刘、邓大军对被围困在成都地区的胡宗南部发出最后通告。在解放军的政治攻势和大军压境下,敌阵崩溃,多数起义,部分被歼。23日,胡宗南乘机飞往海南岛。蒋介石为此十分生气,速派顾祝同前往查办,后经部属劝解,蒋仍决定让胡宗南回西昌戴罪立功。并指示:固守西昌3个月,以待国际形势变化;收拾从川西突围的残

部,加以整编,不能放弃大西南。1949年12月28日,胡宗南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人员,携带电台、文卷等,由海南岛乘飞机返西昌。胡宗南和西昌警备司令部总司令贺国光用几个月的时间强化西昌防务,建立“大陆游击区”作为反攻大陆的最后根据地。但是,溃退西昌的军队,加上从台湾空运有限的精锐部队,兵力合计万余人,多为残兵败将,战斗力不足。

1950年3月初,蒋介石派顾祝同、蒋经国密赴西昌,滇南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和第26军军长余程万也相继而至。顾祝同举行秘密会议,研究如何建立滇西据点,在必要时向滇缅边境撤退的计划。但因李、余无法在滇西建立据点接应胡部,胡又无力自身在滇西立足,会议没有结果。

1950年3月中旬,解放军分南北两方向向西昌地区猛攻。3月24日南线进攻会理,26日直逼西昌。胡宗南与贺国光等于当晚乘机飞逃台湾。解放军全歼国民党军队残部,从而在四川境内消灭了国民党的正规军。

---